

Jan Petersen
UNSERE STRASSE

德 Betty Rensen 英文译本“*Our Street*”
(Left Book Club Edition)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3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2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1957年印 字数215,000 开本880×1165 1/32 印张5³/₈ 插页2

1959年1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册

定价(2) 0.56元



作 者 象

作者序

这本在极大的困难下在德国写成的书，是叙述柏林—夏洛登堡区“紅色”瓦尔街事件的記事录。它虽然在地域上有局限性，但不仅仅是法西斯德国一条工人街道的史实。法西斯主义在一切德国城市的所作所为都是一样的。所附的名单上开列着夏洛登堡区被杀害的反法西斯烈士的姓名。名单是真实的，但絕不是完整的，而这还只是西柏林这一个区的殉难者。

这本书是献给夏洛登堡的死难烈士的，是为了紀念所有被法西斯党徒杀害的人。它报导了成千上万无名英雄的英勇事迹。他們不顾屠刀和監獄的威胁，勇敢地坚持着斗争，坚持着为爭取德国人民最后解放，为社会主义的斗争！

揚·貝特遜

夏洛登堡死难烈士名单

1933年1月30日^①以前

奥斯卡·奥维格	20岁, 被巡警枪杀
艾力希·弗里许曼	26岁, 被巡警枪杀
汉斯·克拉费特	19岁, 被冲锋队33支队杀害
艾力希·齐姆克	22岁, 被冲锋队33支队杀害
奥图·格吕纳堡	20岁, 被冲锋队33支队杀害
玛克斯·许尔默	32岁, 被冲锋队33支队杀害
艾力希·朗格	24岁, 被冲锋队33支队杀害

1933年1月30日以后

保尔·舒尔兹	20岁, 被冲锋队33支队杀害
汉斯·夏尔	21岁, 被冲锋队33支队杀害
瓦尔特·哈奈克	25岁, 被冲锋队33支队杀害
弗里兹·考洛歇	24岁, 被冲锋队33支队杀害
马丁·米哈拉克	25岁, 被冲锋队33支队杀害
保尔·窝斯	29岁, 被冲锋队33支队杀害
卡尔·马尔兹	28岁, 被冲锋队33支队杀害
汉斯·缪勒	46岁, 被冲锋队33支队杀害

^① 希特勒上台的日子。

德文版序言

这本书从写成到在德国出版，经历了十三年之久。这一叙述反法西斯斗争和柏林夏洛登堡区瓦尔街事件的记事录开始于纳粹上台的前几天，到一九三四年年中为止。这本书的札记是当时事件发生时记载下来的，最后在两个地方写成：在奥兰尼恩堡附近小魏贝林湖边的别墅和夏洛登堡区克乃赛贝克街（和瓦尔街相隔不过几分钟的路）我的斗室中。

写作这本书，就象当时我在抵抗运动中的活动一样，不得不由于和我在一起密切合作的同志的被捕而经常中断，而且国家秘密警察两次把我的名字列在黑名单上，每次我都不得不等着瞧“事情会怎么样”。

每星期，我背包里装着新写成的手稿，从魏贝林湖骑着摩托车经过奥兰尼恩堡集中营的岗哨，到柏林去和一位作家朋友研究手稿。几年以前，他也牺牲了。

我在瓦尔街住了九年，参加了夏洛登堡的反法西斯运动。当冲锋队三十三支队在警察的保护下通过“我们的街”时，那些褐衫队员对着我们的窗户作出要吊死我们的手势。他们上台后，三十三支队队员们闯进了我们的住所，手里拿着手枪，搜查了整个房子。我在不久以前偶然搬了家。他们如果到拐角上主管的警察局去查问，警察局是会把我的新住址告诉他们的。但是没有人去问。有很多事情在事后看来很难解释，使人几乎认为是

“僥倖的”。全書的手稿也是在這種情況下被偷運到國外去的。

1934年秋，我用打字機把手稿打了三份。兩份密封後埋在不同的地點。一份通過地下的交通送到了漢堡。本來計劃，由一位我不認識的勇敢的德國水手把它帶到英國去的。過了好幾個星期，從漢堡來了回話：水手為了避免暴露，不得不在最後一分鐘把手稿扔在港內。經過長期的努力，才能再一次想辦法把手稿帶到國外去。朋友們把它帶到德累斯登，準備從那兒偷運到捷克去。過了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還是無法從德累斯登得到關於手稿的消息。手稿下落不明，看來要丟失了。第三份，也是最後一份手稿埋在柏林城外一個育苗區邊上的一棵樅樹底下。樹上做著記號。這一份如果也丟失，或者無法偷運到國外去的話，那麼以前的一切努力將會落空，向國外宣傳德國反法西斯戰士的鬥爭的計劃亦將失敗。

於是，在1934年聖誕節，我決定執行早已擬定的計劃，把最後一份手稿親自帶到國外，帶到布拉格去。納粹上台後，我已經到過布拉格幾次，為的是和流亡在那裡的德國作家們會晤。因此，我知道怎樣“偷越”國境，然後用同樣的方法從邊境的另一地點回到德國來。

這次我們一行二人，全付滑雪裝備，表面上是去作一次無害的聖誕節旅行。手稿烤在兩塊糕餅中間，裝在我的背包里。我的朋友瓦爾特·史托勒不久以前才從布蘭登堡集中營里釋放出來，他的背包里也裝著自己的一份手稿。我們知道，黨衛軍的滑雪隊帶著卡賓槍在邊境上巡邏。因此，我們想辦法不被人發現，從這些巡邏隊中間偷偷溜了過去。

我們到布拉格的第二天，那位留我們住宿的流亡作家朋友的妻子來告訴我們，她聽說今天有一部反法西斯小說的手稿從

德国运到了布拉格。这就是几个月以来在德累斯登下落不明的那份“我們的街”的手稿。那位負責运送的人进行了一次冒險，他把手稿放在一个沒有盖子的籃子里，上面放着几包糕餅，提着它从一个官方指定的过境地点的官吏身边走过。边防軍拿起几包糕餅来檢查，但只拿了面上的几包。德累斯登的朋友們和我們一样，他們一直在等待着圣诞节，那时边境上往来頻繁，行动方便一些。因此，在这以前，他們一直沒有和我們通消息。后来，在1935年4月，巴黎已經出現了“我們的街”的摘要。我們在柏林沒听說这件事。

我的外国出版商在书付印以前問我，书中现实主义的叙述会不会危及还在納粹德国活动的同志們。这点在写的时候已經考慮到了。在一篇譯者的序言中也明确地指出，事情的經過和人物的命运都是如实叙述的，书的内容是真实的，但形式不一定全是。有关人物的姓名、外貌和家屬經過了必要的改变或調換。柏林其它城区地下工作中的个别事例被編入了书的情节中。在夏洛登堡死难者名单中提到的姓名全都是真实的。他們牺牲的情况都是按事实叙述的。

必須介紹真实的情况，又不給国家秘密警察留下痕迹。举例來說：汉茲·普勒斯其实是我的同志瓦尔特·史托勒，我后来又遇見了他。他是当时少数虎口余生的同志中的一个。他被釋放后，对我講述了艾力希·繆薩姆受虐待的情形。在布兰登堡集中营，他們睡的草鋪紧挨着。

这本书完全沒有給国家秘密警察提供任何綫索。他們如果查出了作者的身份，可能会引起某些后果。我的家屬也可能遭殃。这点，即使后来在国外也一定会知道的。我流亡返国后，有机会看到偶然沒有被燒掉的国家秘密警察档案中关于我的記

录。从档案中可以看出，国家秘密警察到1941年，即战争爆发后两年，一直在向国外调查我的下落。调查的原因是我过去在德国抵抗运动中的活动。国家秘密警察的一切努力全都白费了。

现在，“我们的街”在德国出版了，未经修改，就象我在当时写的一样。这本书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产生的，任何事后的修改都将有损于形式和内容的真实性。据我所知，这是唯一在希特勒德国写成、在国外出版的反纳粹的书籍。也许，这个事实就已经有助于令人信服地向外国介绍“另一个德国”了。

如果这本书在祖国有助于使法西斯主义永远不能再生根，并且通过所有德国反法西斯战士的共同努力，有助于建立一个自由和平的德国，它的任务就全部完成了。

扬·贝特逊

1947年2月于柏林夏洛登堡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六。在傍晚的時分，我同我的同志理查·許提希和佛蘭茲·桑德爾沿着瓦爾街蹣跚。我們走到柏林大街的拐角停了下來。眩目的弧光燈在我們頭上照耀着。汽車和電車川流不息。“那邊又來了一批，”理查用胳膊肘推了推我說。三輛風塵仆仆的敞篷卡車從左面開來。它們緩慢地鱗鱗駛過那弧光燈照射下的光圈。卡車上站滿了穿褐色制服的人。燈光一瞬間映出幾張帶有稚氣的臉。他們好奇地望我們一眼，臉上露出一種對大城市的驚愕的神色。理查念出了最末一輛卡車的號碼。

“他們全是打鄉下來的，把所有的人都弄來了，”他說。

佛蘭茲·桑德爾點點頭道：“他們都是農場工人。”

他靠在路燈柱子上。

“我曾經給農場主干過活兒。過去是參加了鋼盔團^①的人才能找到工作；現在就得是衝鋒隊員^②了，否則是找不到活兒干的。”

一輛敞篷汽車駛過；六個穿褐色制服的人坐在可以扳下來的座位上。

“衝鋒隊的巡邏車！”理查說。

① 反革命的退伍軍人團體。

② 德國國家社會黨的軍事組織，曾以恐怖手段替希特勒政府鋪平道路。

納粹的總部就設在霍恩車倫王室的宴会厅，离开我們不过几条街。他們更多的警車每隔一定的時間就出来巡邏街道。警察从来不搜查他們的武器。

“咱們走吧！”佛兰茲冷冷地說，轉身就走了。

瓦尔街两边是两排鳞次櫛比的房舍，被几盞暗淡的煤汽灯照亮着，在我們面前就象一条漫长幽晦的峽道。在一戶人家的門口站着三个巡警，他們把帽子的皮帶紧扣在下顎上，肩头露出步枪的枪銃。

“崗哨增加了！”佛兰茲說。

房子的門口都站着人。他們在低声談話，仿佛是怕惊醒什么人似的。我們向他們点头。理查把两只手指高举到帽边，就好象他在檢閱他的护房队似的。街道的中段突然折断了，那排房子到这里空出了一大截。这是一所建筑物的基地，上面堆了一片瓦砾，用龕龕的灰色篱笆圍着，我們的政治标語貼在一个巡回演出的馬戏团的破碎的广告上面。邻近就是夏洛登堡发电厂，这是一所宏偉的新式的紅磚建筑物。低矮的木头房子由工厂的左面伸展出去。所有的窗戶里都还有灯光。这些在房荒闊的最严重的几年里赶蓋起来的临时寓所，現在已經成为永久性的住宅了。几乎全部的住戶都是失业者。

理查突然止住了脚步。他仰望着左面高出那些寓所之上的那堵孤零零的厂房側牆。这里很安静，安静得有点可怕。只听见那些日夜不停地开动的机器的单調的响声从发电厂高大的窗戶傳出来。

“我們党的标語，”理查說。

在側牆頂端高高地油漆着几个大字：

反对法西斯主义者！投第三張名單的票！

共产党！紅色陣綫！

理查和艾迪！艾迪——我們區里最出色的爬山能手，夜里用一条繩子从屋頂爬下来，落在—块搖摆的木板上，涂上我們的竞选標語。察警就是在白昼也不敢爬到那里去的，虽然那些字有如胡椒一般地刺痛他們的眼睛。側牆上那排发出亮光的窗戶象是悬在黑夜的天空。

几年前发生的一次煤气爆炸毀坏了那所房子前面靠近側牆的地方，只剩下那門厅的大門成为一件不幸的遺物。后院的倒塌的圍牆正临着大街。我們看見窗戶里有几件家具，繩子上晾着一些洗过的衣服。

側牆附近的凡尔納啤酒店是我們开会的地点。我們穿过馬路。我們的崗哨站在外面。

“紅色陣綫！”

“紅色陣綫！”

窗上有些小圓洞；那是冲鋒队第三十三支队用手枪打穿的。玻璃的上半部已安上了一些圓的銅片。保險公司把窗戶修理过好多次了。

“有什么特殊情况嗎？”

“沒有，許提希同志，只有那些警車……”那站崗的住了嘴，朝着街道中斷的地方点头示意。車头灯隨即把我們照得睜不开眼睛。汽車慢慢地駛过。

閃閃发光的鋼盔。步槍。

“他們已到过这里两回了。搜查武器……这儿……在我們的地方！”那站崗的嘲弄地說。

理查推开了門。一陣喧鬧的聲音迎面扑來。那個肥胖的、長着一把白胡子的店老板在櫃檯那邊向我們點頭。他的紅臉的妻子在洗濯玻璃杯。屋子裡煙霧瀰漫，有着一種忐忑不安的情緒；我的神經立即發生反應。一群激動的人圍着擺在中央的那張大桌子站着。

“……明天是納粹武裝演習的日子。社會民主黨人會不會……？”

“我已經跟好些人談過了；他們明天在街上會同我們在一起的，佛蘭茲安詳地說。

“自從七月二十日普魯士政府被勒令解散以來，許多人都了解……”

“從了解到戰鬥……”

“現成貨”從口袋里掏出一張報紙來。他是白蘭涅克梅耶現成服裝公司的推銷員，總要穿得象個“紳士”。

“……有望于警察總長當此最後一刻深明局勢之嚴重……”

“好象警察會和我們站在一邊似的！”

“連我的社會民主黨的朋友們也要見笑的。他們明天將同我碰頭！”

我從他的肩頭望了那張報紙一眼：一幅卡爾·李卜克內西大樓^①的照片，上面是一行大字：

冲锋队在比洛夫廣場^②上游行！

這還不算故意挑釁？

①、② 比洛夫廣場在柏林中心，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會址卡爾·李卜克內西大樓即在此。希特勒攫取政權後，卡爾·李卜克內西大樓改名為霍爾斯特·魏塞爾大樓。

我們背后的門驟然打開。我們轉過頭去。一個年輕的同志把他的自行車靠在櫥窗上之後，走了進來。

“找佛蘭茲同志，”他說。

佛蘭茲點了點頭：“對。”

“我是區委會的通訊員。”

那個青年在口袋里摸索了一陣，掏出了一張折迭好的紙條。門立即砰的一聲又在他背後關上了。談話停止了。所有的眼睛都注視着那張白紙條。

佛蘭茲向我和理查點頭示意。他擺動着他那寬闊的肩膀，從我們面前走過去。我們曾經給他起過個綽號叫“大力士”。

我們走進旁邊的房間。

佛蘭茲把紙條遞給我們。

“關於明天的指示。你已經知道你的護房隊該干什么了吧，理查？”

“是的，我現在也該走了。”理查和我們緊緊地握手。

佛蘭茲把同志們一個一個喊進來。周圍都是嚴肅的臉孔。他依次注視着每一個人，仿佛他要对每個人的可靠性進行一次考察似的。他用冷靜而沉重的語調說道：

“我不用多說了，同志們。我們不能不經一戰而把柏林拱手讓給法西斯黨徒。我過一會兒就把明天的集合地點告訴組長們。我們要以分散的小隊從各個街道出發。大家注意一切都得準時，誰也不能誤事。你們今天夜里最好三五個人在一起和衣而睡。工人們期待着我們的保護哩。明白了嗎？”

大家沉默地點了點頭。房間一下子空了。

我們——佛蘭茲、羅塔克爾、“現成貨”和我最後離去。我們的腳步聲在那冷清清的街道上發出了回聲。

各大樓得到了通知，守衛的崗哨加強戒備。如果明天發生流血的战斗，工厂星期一就要关门。当然，最优秀的人很久以前就已被解雇了——佛兰兹、罗塔克尔以及许多别的人。

我們走到了罗塔克尔的住所。他走上楼去。市政厅的大钟傳來报时的钟声，在牆垣之間漸漸消散。警車还在巡邏。車头灯的灯光充盈滿街有数秒钟之久，然后消失了。一輛汽車沒精打采地按着喇叭；卡車不时閃閃而過。褐衫队^①还在涌进城里來！

罗塔克尔下來了。他站在佛兰兹身旁。这个小職員在昏暗之中好象显得更加干癟了，只有他的鑲框眼鏡在臉上顯得更大。我們聽着他低声而有点吞吞吐吐地說：

“佛兰兹，如果明天我遇到什么不測，我是毫不畏懼的……”
他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你会照料艾爾絲和孩子的，是嗎？”

“別担忧，艾力希。不会那么严重。”

佛兰兹那样說。但是他自己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話。

“……好吧，万一出什么事，你可以放心！”

我看到罗塔克尔緊握着他的手。

* * *

我們在街上慢慢地走着。凱蒂——我的女友，挎着我的胳膊。她穿着深藍色的新衣服。佛兰兹——她的兄弟，走在我們前面。他臂上挽着海爾黛。我們几乎都穿着节日的衣服。

柏林一夜之間已成了一个兵營。警察巡邏队，六个到八个人一队，从我們旁边走过，肩头露出步枪，軍帽的皮带緊扣着下

^① 即冲锋队，以其制服为褐衫得名。納粹魁首以此名其恐怖組織，以示光荣。

頭。每隔兩家的門口都站着雙崗。

“出動了一萬五千名警察，”羅塔克爾低聲說。

我們來到了莫阿比特區。小動物園是沖鋒隊集合的地点。那廣場由兩層警戒綫包圍着；在他們后面站着沖鋒隊的队伍。从鄰近的街道走來了褐衫隊，旁邊有警察護送。騎着馬的警察把守着公園的入口。警察的卡車從我們身旁駛過，兩面的板都放了下來，以備隨時跳下車來。我們混雜在行人的潮流之中，让人们推着緩慢地前進。人行道上黑壓壓地擠滿了人。千萬不能失去联系！他們在那兒呢！佛蘭茲、恩斯特、保爾和“長毛”。

突然，从廣場那邊傳來了一片呼聲：“打倒褐衫隊殺人犯！打倒！打倒！打倒！”

騎着馬的警察掉轉馬頭；警察成散開隊形，向人行道上沖去。軍帽底下的臉孔严峻無情；手里拿着步槍。

“走！散開！散開！”

毆打聲中摻雜着一片“可耻！可耻！”的呼喊聲。

我望了凱蒂一眼。她的臉裹在皮領子里，顯得又小又蒼白。警察沖散了群眾。在我們左面，兩個警察把一個年輕的工人趕上一輛等在附近的卡車。他彎着身子走；他們把他的胳膊扭在背後。他們還在揍他！

“狗雜種！誰咱們制止他們！”羅塔克爾怒喝一聲。

我緊拉着他的胳膊。“別動！你這樣做他們正求之不得！”

在街的另一邊響起了“國際歌”的聲音。歌聲悠揚，在粗野的叫喊中結束。褐衫隊的队伍開始游行了。兩行警察護着他們。我注意到那些沖鋒隊的糾察隊員一個個都是長得很魁梧的家伙。他們的褲口袋很明顯的鼓出一塊。左輪手槍！

他們唱道：

把紅党砸个粉碎，
为前进的冲锋队清道！

呼喊声淹沒了歌声。“紅色陣綫！打倒褐衫队！”

一声警笛吹响。警察的步哨又向我们冲来。现在他们用枪把向我们冲击。我们被迫到一所房子的墙跟；许多人逃进門里去。那边，在右面！在混乱中一个劳动妇人冲破警察的糾察綫。她在褐衫队队伍的前面站了一会儿，在空中揮舞着双臂，尖叫道：

“一群胆小鬼！把警察打发回去！你们这些英雄們！”

一个巡警把她拖走。

慢慢地那队伍走近了城市的中心，人行道上的人们继续不断地增加。从房子的窗口纷纷喊出：“杀人犯！杀人犯！”一个花盆凌空飞过，正好落在褐衫队的队伍中。三个巡警冲进那所房子，其他的巡警把步枪的枪銃对着窗戶。

“把窗戶关上！把窗戶关上！”从那房子里发出尖锐的哨声，但是大部分窗戶却砰然一声关上了。突然，我们在人行道上的队伍停住了：就象一輛馬达失灵的汽車那样，往前挪了几下，最后停了下来。前面的那些人在揮手。后退！后退！我爬上一个低矮的栅栏。在我们前面五十碼的地方，整个的街道从这边到那边全是黑色的軍帽，褐色的队伍在这条街上前进。完了！被截断了！人行道上的群众左搖右摆。警察在清道！罗塔克尔激动地揮着手臂，他的两颊脹得通紅。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首先退回去，然后穿过胡同前进。我们一定得到比洛夫广场。把話傳过去！”

罗塔克尔冲出人群向佛兰兹和他的小组那边走去。

“拐进胡同！”人们一个个低声把话传过去。

警察在我们面前站住。他们用步枪对着人行道。褐衫队从他们背后走过去。

“凯蒂！”

她望着我。她的眼睛闪烁着小小的火花。“如果他们阻住咱们，咱们就得走地下道。你害怕吗？”

凯蒂摇摇头。我们走到十字路口。警察拦住了游行队伍，让车辆通过。我们跑到马路那边去，分批拐进了一条小胡同。佛兰兹、罗塔克尔和其他一些人在哪里呢？该死，交通指挥灯已经亮了：他们到达十字路口太迟了。我们必须坚持下去！这儿的街上静得出奇。人们从窗口探出身子来。一群群的人站在房子门前低声谈话。微弱的歌声从右面的胡同传来，一直传过去。突然，一队巡警拐过街角跑来，大喊：“关上窗户！关上正门！”

人们不见了。门窗砰然关上。可以听到急速上锁的声音。

“保持镇静！坚持下去！”我低声向凯蒂说。

她握紧我的手。从房屋的墙壁传来沉重的皮靴的回声。忽然一根橡皮警棍照着我们的脸打来。

“回去！去吧，赶快！”

我十分镇静地回答道：

“我们要到地下道去！”

那巡警凶狠地望着我们。他的脸胀得通红，汗水直流。凯蒂故作镇静的表情改变了局面。

“从右边走——可是得快——上电车。地下道已经关闭了！”

然后他就跑掉了。电车！为什么我没想到呢？乘电车到示威的地点。电车挤得满满。售票员挤在车子的中间，和其他人

一样，也从玻璃窗往外看。站台上的人喊叫着。

“前面还有地方！挤一挤吧！”

“现在下车啦！”有人叫喊道。

售票员响了两次铃。车上一下就空了。我们在街上慢慢地走着。我们有好几百人。奇怪的是在这里竟看不见什么戴军帽的人。“恩斯特·玛赫诺：自行车”。我从街的那边的一家店铺的门面看见这样的字样。那名字一直留在我脑中。街上显得非常荒凉。窗户外连个人影都不见。百叶窗在橱窗前落了下来。忽然听到齐声呼喊：“打倒法西斯主义！”然后是三声：“拥护红色阵线！”我喊了又喊。凯蒂拉着我的手臂。

“那儿！那儿！”

我听见附近店铺橱窗的玻璃在护窗板后面震得直响。一头灰色的怪物从街的尽头朝着我们奔来。一辆装甲车！我望望我周围的面孔。他们并无新的表情，都是毫不在乎的样子。一个留着一撮密密的小胡子的人站在路旁水沟上笑。他的手插在裤袋里。他周围的人也开始笑起来。尖锐的警笛声响彻云霄；那装甲车开了过去。炮塔上的机关枪筒左右移动着。

在炮眼后面露出一条条苍白的面孔。

前面的人忽然开始奔跑。是警察袭击吗？在哪里呢？不！他们在马路上摆阵势。我们快跑。一瞬间群众就排成四行，占满了整条街。我们唱起了“国际歌”。那窄小的街道发出回响。在凯蒂旁边是一个留着一把灰胡子的人，他的嘴巴张得大大的，身子随着歌声的节拍摆动。在他衣襟上发出闪闪的金光。三个箭头^①！我们的目光相遇。我们还在唱。那老同志回过头来点了

^① 三个箭头是社会党人的徽章。

一下又繼續前進。啊，我看見了！在行列中有更多的箭頭在發光！我的脈搏加快了，心中充滿了熱情。我輕輕推了一下凱蒂。她明白了，笑了笑。

我們已經走了多久？——有多少分鐘了？好像是已經有半個小時了。他們在前面的人轉入了格爾曼街。走錯了！那是一條死胡同。隊伍的前面傳來了尖叫和皮鞭的聲音。他們還開槍哩！我們被趕回來了。大家都衝向房子的門口。回去，無論如何要回去。凱蒂使勁地擰着我的手臂，她的嘴巴緊張地搖動着。我搖搖她。

“凱蒂！凱蒂！用不着驚慌！”

我們控制着自己，從容地走向一家門口。巡警的警戒綫相距只有五碼遠。手槍的槍筒對準了群眾。槍聲繼續不斷。那金屬的暗晦的閃光，那一縷縷的藍煙，我們伸手就可以摸得到。在我們旁邊，一個穿藍色短上衣的人忽然舉起雙手，慢慢地轉過身來，平臥在柏油地上。我們到達了一個大門，被擠了進去。凱蒂奔向樓梯。

“留在这里吧！”

如果他們從後面跟着來，我們就正好躲到樓上去。我們等着，等着。從前門的玻璃我們看見警察跑過。在我們旁邊站着一個女人，手里拖着個小女孩。她用另外一隻手想堵住小女孩的嘴，勸她別出聲，她的臉不安地搖動着。

“噢，上帝！噢，上帝！會怎麼樣呢——怎麼樣呢？”她一直在重復地說着。

槍聲漸漸遠了。我走了出去。街上空了。我們也離開這里。

一大隊巡警乘着頂上安設着機關槍的裝甲車，把守着比

洛夫广场四周的街道，那广场是准备好给褐衫队示威的。

*

*

*

第二天晚上。我们坐在佛兰兹·桑德尔家里的客厅中。海尔黛在说话。

“我母亲说，费列斯整天到处跑。他下午回到家里来躺在沙发上。跟着就有一个冲锋队的家伙拿着一张命令来找他说，他要立刻向突击队队部报告。新的指示已经到了，队长们都在听候命令。跟你们说吧，打昨天起他们简直不得了啦！”

佛兰兹在玩弄桌布的绳子。海尔黛已经把她家里的一切都告诉我们了，包括她的弟弟费列斯。突击队三十三支队称他做“电灯杆”，因为他长得那么高。他是一个队长。特勒丁夫妇就在我们附近，在柏林大街做看门的工作。海尔黛的父亲已经失业多年了。他不是个熟练工人，从不过问政治。“你得找饭吃，没别的”就是他的金科玉律。那个看门的职位甚至不能保证他有饭吃。他每星期有两次骑着自行车出去捉兔子和钓鱼。特勒丁太太就接替他的工作和照管他们五岁的女儿茵格。海尔黛是个打字员——全家中唯一能赚钱的人。当锁匠的费列斯也失业了。他在一年前参加了冲锋队。“因为我不愿老靠别人拖舍过活，不愿被人当作废物一般看待！”他有一次向海尔黛解释道，“我在家里也确实受够了。我宁可睡在我们的军营中，在那里总是吃得上两顿饭的。我以前是怎样也数不上的，但是穿上了制服，不管怎么样我总算个人物。”

“那个坏蛋干的好事，”特勒丁老头倒也无所谓。不过他时常向他咆哮，因为“那些穿制服的那群坏蛋只会在我家抖威风，什么好事也不干。”海尔黛同我们在一起已有六个月了。凯蒂是在一个商业夜校里和她认识的。海尔黛很爱慕佛兰兹。他们就

成了同志，而費列斯对此一无所知。

● 桑德爾大媽從廚房提着一壺咖啡走進來。她還往桌上放了一碟點心。她把椅子移往煤氣燈底下，打起毛絨來。我很想說些能夠逗她喜歡的話，但是卻想不出來。她有一雙和藹的褐色的眼睛，嘴巴的周圍和前額都有了深深的皺紋。它們是艱苦而真實的生活的起伏的印記。凱蒂曾經告訴我，當佛蘭茲因為在工廠里組織了一次罷工而被解雇的時候，桑德爾大媽說了些什麼。她沉默了一會兒；想了一想之後說出了她的看法：“我們總能想辦法。要是他父親的話，也會那樣干的。”

父親是個社會民主黨人，在法國戰死了。

“有時候保持沉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海爾黛繼續說道。“就在今天傍晚費列斯還大言不慚地說：‘昨天我們給了柏林點顏色看！我們的運動勇往直前；他們現在阻止不住了。昨天我們看到共產黨垮台了！他們只能從胡同里冷嘲熱諷，再也沒有別的法子。’”

佛蘭茲攪了攪他的杯子。他那清秀的眼眉鎖得緊緊的。

海爾黛繼續說下去：“他們一定以為我們……”

佛蘭茲嚴厲地瞪她一眼。我們什麼也沒說。好像沒有人能夠說話；那種抑鬱的氣氛一直保持到最後。

* * *

褐衫隊示威之後三天過去了。

今天遊行的是我們。我們是要遊行到比洛夫廣場的。天氣奇寒。房子、電車的窗戶都結了冰。我們口中噴出白白的呵氣。驟然而來的寒氣穿透單薄的舊衣。臉和手都麻木了。

隊伍拐了一個彎。我回頭望了一下。四個一排的無盡的行列，高舉着紅旗，一直延長到眼睛所能看得見的地方。

“这区从来没有这样出动过！”罗塔克尔說。他的鼻子通紅，衣領翻起；他显得比以往更加矮小和瘦削。他們在前面的人唱起歌来了。

正月的夜半，一个斯巴达克斯党员站在自己的崗位上……^①

歌声順着队伍往后傳下去，一下就越过了我們。左一左，踏着脚步。

人們的面孔是严肃而坚决的。看吧，这就是我們游行的模样！沒有坦克，沒有机关枪。我們就是柏林，劳动的柏林。

在我前面的一排，一个青年同志，汉茲·普勒斯举着我們的旗。他沒穿大衣，鞋子一边裂开了口，他的嘴唇有一道窄窄的藍色疤痕。汉茲已經失业多年了。在他旁边走着的是保罗·泰谢特，西門子工厂里的一个僱工。他帶着飯盒；藍色的咖啡罐从他的腋下露出来。一輛警車从我們的左边緩緩駛过。車上的人都穿着很厚的外衣，可是却象母鸡似的蜷縮地坐在一起。其他的一些人，沿着队伍旁边頻頻跑过。他們耳上帶着护耳套。我們唱着歌：

大炮在轟鳴，斯巴达克斯有的只是步兵……^②

一个巡警忽然沿着队伍跑来。他手里拿着一个筆記本，他停下来，翻翻本子的篇頁，抬起头来。“閉嘴！不准！”他嚷叫。歌声断了，但是前面的人还在唱着。

“呆在家里吧！我們用不着你們！”我們后面有人向着警車

①、② 摘自 1919 年 1 月斯巴达克斯战士们所唱的歌曲。

呼喊。

“星期天，冲锋队唱着说要砸碎我们。你们怎没制止他们？”
另外一个人喊道。

“新的歌子！新的歌子！”

我看见卡车上的军官下了一道命令。巡警们从车上跳了下来。

“呜！呜！”

……我们，世界上第一支红色的空军，保卫着苏维埃国家的上空……①

拿着笔记本的那个巡警又来了。我们已经到了市中心。人行道上站着密密的一排排的人；他们在挥手和举起拳头行共产党的敬礼：“红色阵线！红色阵线！”

人们站在店铺的门口。一张张的面孔透过玻璃窗上已经有点融化的冰霜向外凝视。

……高些，高些，再高些，我们往上升，虽然受到憎恨和轻蔑……②

那个巡警最后一定是从选句中听懂了我们的歌词，在他的本子上找到了它。

“闭嘴！不准！不准！”他的声音最后变成了尖叫。

我们服从了。但是前面的歌声并没有立即停下来。他们听不见这个命令。

一队成单行的警察从我们旁边跑过，他们手上握着橡皮棍

①、② 摘自苏联航空员之歌，这些歌曲在德国工人中很流行。

子。一声尖锐的哨子响。

……每一个推进器都唱出悦耳的歌声……①

前面的歌声一下停下了。一阵混乱和尖叫。

“可耻呀！可耻呀！”

他们正在用警棍来对付游行队伍！但是从最前面还传来微弱的歌声：

……我们在捍卫着苏联！②

再往前走一点，我们看见五个被捕的人坐在卡车上。快要走到我们的目的地时，我们走过人行道上挤得密密的人群。他们全都向我们挥手呼喊：“拥护红色阵线！”三天之前，有的是愤怒和厌恶。今天则是无限的团结！

冲锋队有金腰带，人民却饿着肚皮！③

在队伍的嘈杂中发出了一个嘹亮的声音，于是开始报数：“二！三！”语句被许多声音打乱了，而从房子的墙壁引起了回声。突然前进的脚步停止了，队伍左右摆动。

“他们把他捉去了！”

“谁！”

“不晓得！”

“长毛！长毛！”

队伍向前移动。两个巡警从我们身旁匆匆走过，在他们的

①、② 同15页注①、②。

③ 革命工人对抗冲锋队的口号。

中間是“长毛”，他是因為他的一頭密髮而得了這個名的。我看著他們把他推上車和其他已經被捕的人在一起。

數不盡的街道。我們唱起了“國際歌”，唱起了“太陽和自由的兄弟”^①，唱了足有十次，二十次以上。只有這些歌才沒有“不准”的呼喊聲陪伴著。

“停住！停住！站住！”

“出了什麼事？”

“別的一區的隊伍拐到我們前面來了。街上擠滿了！”

我們等著，等著。一股冰冷的寒風從史普里河吹來，使我的背脊打起寒戰。我看見普勒斯的牙齒在震顫。他還在舉著旗子。他不會放手的。在前面，另外一支隊伍在我們的右邊街拐角的地方擠向前去。我們頓著腳，擺動著手臂。我摩擦著凱蒂的手。她的臉凍僵了，顯得很小。我們的隊伍拐進了威廉大帝街。我們已經相當靠近比洛夫廣場了。兩支隊伍在那寬闊的街上並排站著。八個人一列。他們等著。我們在左面慢慢地向前移動。

“你們干嗎還站著？”

“慢點說吧。不多久你們也會站住的，”那邊有人笑道。“所有的街道都擠滿了。小伙子，他們在卡爾·李卜克內西大樓前走了好幾個鐘頭啦！”

又走了十碼。我們站住了。現在十二個人並列著。從街上的這一邊到那一邊都擠滿了人。都在唱著歌。天空上已經被城市的燈火反映出亮光。婦女們手中拿著熱氣騰騰的湯鍋和杯子從房子和鋪子裡跑出來。

“喂，喝吧，你們一定凍僵了！”

① 這是一首當時很流行的工人歌曲。

大家的手傳着面包。

“給那些失业的！他們准餓了！”

在我前面，普勒斯啃着面包，在杯子上暖着手。

“和上星期天褐衫队在这兒的时候多不一样呵！”凱蒂說。

警察到哪儿去了呢？哪里都看不見了。队伍向前移动。瞧！

比洛夫广场——党总部大楼！

大楼前面挂滿了紅旗。我們的拳头都举了起来敬礼；歌声止住了。台上站着台尔曼^①！身旁还有几个人。

在我的后面有人低声說：“中央委员会。”

台尔曼的拳头，鴨唇帽下的面孔，已經落在我們的后面了。

“他在这冰冷的天气中已在那里站了好几个钟头了，”罗塔克尔說道。他的眼睛在鑲框眼鏡后面閃閃发光。走！

我們的靴子发出喀吱喀吱的声响。我們不发一言地走过去。

* * *

两天之后，我漫无目的地在瓦尔街走着。这是清早。忽然有人从背后拍拍我的肩膀。

“喂，艾迪。”

艾迪轉过头来，这样他的右眼就可以看得見我。他的左眼那里是一个发亮的肉坑，从那里到耳朵是一道两指寬的紅色的疤痕。耳垂是一小块肉球。耳朵里塞着一团棉花。他的左臂套着表示是盲人的上面有三个黑点的黃带子。

“出来拍蒼蝇，呢？空閑嗎？”

① 台尔曼 (E. Thälmann, 1886—1944)，德共領袖。1933年3月在柏林被納粹匪徒逮捕。1944年8月在集中營被法西斯匪徒杀害。

“是的。干嗎？”

“我上救濟站去。照例又沒有錢了。去找那管事的碰碰運氣。我帶着許多法寶！”

“好的，我和你一道走。”

艾迪是老不停嘴的。他曾經因為房租的事情同房東吵過一架。他已經拖欠了兩個月房租了。肚皮最為要緊！我今天看見過佛蘭茲嗎？他一定得結清他的租單。艾力希·霍夫曼——我們稱他做“三點艾迪”——在戰爭期間曾參加過狙擊隊。他的眼睛和半只耳朵是被一顆手榴彈炸掉的。他得過鐵十字勳章、一級勳章以及因受傷而獲得的金質獎章。當我一看到那盲人的帶子，我確信他是帶着“許多法寶”——他的軍功章。他只有上衙門，或者和我們一同“工作”的時候才把它帶上。艾迪最拿手的是站在系在繩子一端搖擺不定的板子上把我們的口號塗在船塢的牆壁上和房子的側牆上。還有，他能在納粹攻擊我們的時候，給他們享以老拳。他用他的一只眼睛看得很准。艾迪上過法庭好幾十次了。當納粹的証人要指認他的時候，他們就會遲疑不決起來，這樣就救了他。這個只有一只眼睛和配着表明是在戰爭中失明的帶子的人並沒有在場！在法官的面前放着他的軍事証件，一切齊全。難于指認艾迪是不足為奇的。他經常安着他的玻璃眼睛，只有碰到了麻煩的時候，那顆玻璃眼睛就溜進口袋，而弄出來那盲人的帶子。

我坐在救濟站的接待室里。艾迪剛剛被召喚進去見管事的。靠着那骯髒的灰牆放置的板凳上都坐滿了人，房間的其他部分也很擁擠。所有的人都是形容枯槁，穿着补丁的衣服。在我右面有兩個婦女在談話。

“肉？我從來就沒有拿肉煮過菜！”

“那这样的话，你把白菜蒸着吃就成了，不必煮了，不然好处都失掉了。”

“蒸菜？那也是费钱的呀。那样要用更多油。”

空气很混浊，从屋角的炉子传来呛喉的干燥的热气。但是他们都向着炉子那里挤，因为他们需要温暖。一个苍白的女人坐在我的左边。她在摇着手臂中的婴儿。那孩子低声哭着，打着呢。

“卜一卜一卜一”，她在拍着孩子，使他宁静。

“‘它们还能用哩，我们不能给你新的。最多我们可以把它修理修理，’他在一个星期之前对我这样说！”

一个头发稀疏而灰白的人把他的靴子指给坐在他旁边的人看。鞋面和两旁都裂开了；灰色的袜子都可以看得见。

“可是我不管怎样也要和他们磨！他们以为对于象我们这样的人爱怎样就怎样，是不是？”他继续说道。

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小伙子轻蔑地笑了笑。

“阿道夫会给你一双新的。他已经在施厄德尔^①的公馆里同杜塞尔多夫银行谈交易哩！你以为他们没有谈到你的靴子的事吗？”他带着刻薄的揶揄的口吻问道。

“兄弟们！”另外一个说。“戈培尔老是在‘攻击报’^②上写文章反对他们！好人们都是享现成的，而巴本^③呢，却是个呆瓜——！”

办公室的门忽然打开。我可以听见艾迪的声音：

“想耻我挨饿，呢？是你们使我在战壕中失去健康的。我再

① 施厄德尔是德国大银行家之一，远在希特勒上台之前便支持他。

② 当时纳粹党用攻击有錢人的手法来取悦群众。

③ 巴本是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国总理。

一次对你說：要您破費，我現在就去吃。在阿申格尔^①。要您大破費！”

“我警告你！”从隔壁傳來一个动怒的声音。

艾迪把門砰然关上，朝着我們走来。

“你們这些傻瓜哪一个肚子餓？”

无人作声！他們凝視着他，感到困惑。

“你說餓是什么意思？我們大家都是肚子空得发痛了。”那个小伙子說道。

“来吧！你們当中的五个。吃頓飽飯。我請客。”艾迪說。

沒有人动。

但是几分鐘之后，我們已在路上。我們五个。我不認識的那個小伙子和我在房間里沒有注意到的另外两个同志。

“隨便点菜吧！”當我們在阿申格尔飯館坐下来以后，艾迪对大家說。“挑你們愛吃的。就当今天是禮拜天好了。”

我要了一份炸肉排。但是那两个人忽然有点不好意思起来。艾迪替他們告訴侍者：“火腿中段帶酸菜。都要大盤的！”

我們吃起来。艾迪在談話。我們点点头，神經質地微笑。我对这种事情并不太有兴致。

“現在每人來它个半品脫、一根雪茄，呢？”我們吃完了的時候，艾迪問道。我們聳聳肩。但是艾迪却向侍者要了。他自己用了两份。我們溫和但是堅決地謝絕了再來一份。酒喝干淨了，雪茄抽到了頭了。

“現在溜之大吉吧。我留在这儿。”艾迪說道。

我們沒等到他說第二回。侍者監視着我們。我感覺到他的

^① 阿申格尔，是柏林的一家平民化的餐厅，設有許多分店。

目光看着我的頸背。到了外面，我从窗戶的一角往回望。艾迪向那个侍者点头示意，茶房气喘喘地跑过去把經理找来。那个經理指手划脚；一張寬臉脹得通紅。所有桌子上的头都轉过去。干嗎我也……？我走到旁边的一个街角去等着。一会儿，两个巡警走过街去。他們在几秒鐘之后从飯鋪出来，中間挟着艾迪。他們是要把他帶到邻街的派出所去。我离开远远地跟着他們，在街角上等着。二十分分鐘过去了，半点鐘了。我冷得发抖。现在艾迪来了，他从那房子走出来。一个人！他向我作了个暗号，露齿微笑了一下。我在另一个街角上和他会合。

“好家伙！”

“怎么啦？”艾迪笑道。“我只是把那些玩艺儿都摆在警长的桌子上。我对他說：‘象我这样一个从前綫回来的士兵該餓死嗎？’”

“在阿申格尔呢？”

“那小侍者是我們自己人，”艾迪說。“我向那經理解釋；这不是他的过錯。‘給救济站打电话吧；那里的干事知道一切。’”

“他們会让你賠償的。”

艾迪推我一下。“他們能怎么样？八天或者十四天。我用半边屁股就可以坐滿期了！”

* * *

一月三十日正午，一桩謠言傳遍了华尔街所有的公寓：希特勒当了德国总理。希特勒当了——我必須亲自讀到这消息！中午版的報紙从街头报販的手中被搶購走。報紙的头条消息从房子里，从楼梯間反照着我，而現在在桌上摆在我的面前：

阿道夫·希特勒：德国总理！

我讀着下面的文字，讀了再讀。佛兰茲！我一定得見佛兰

茲！敲門的聲音。佛蘭茲！我讓他進來。他和我握手；他慢慢地走過過道，象是在尋找我的房間，象是他頭一次到這里來似的。然後，他脫下了帽子。他的頭髮滿是汗水，嘴唇閉成一道細綫。他顯得老多了。對於我，就象是已有許多年沒看見他似的。

“你和恩斯特·施維布斯一塊去，通知你的五人小組，”他說。“示威在七點鐘舉行。還是那老集合地點。注意一切要迅速！”

他的灰色的眼睛閃閃發亮，他說得很干脆，就好象是在復述一些很久以前就安排好的事情。他已經讀過了報紙的報道了；他現在想的是下一步。

“把事情辦好了——我得走了！”

我想說話，想把心里動蕩着的一切告訴他。但是佛蘭茲已經走到了門口，向我點了點頭，大步走下樓梯去了。

示威——再一次？就象是我們一心非要再來一次示威不可似的！我們的個人生活還有什麼呢？後天就是二月一日了，我到那天就要搬進桑德爾他們家。我們要結婚了，凱蒂和我，但是上個星期他們帶來了威利。他在逃亡。他是從中德逃出來的。他們在緝拿他。他曾經把小冊子偷運進一個國防軍^①的兵營。因此就一切如舊了。我們五個人不能住在兩間房子里。

傍晚來臨。我們三五成群地走在街上。就象是一個被干擾的螞蟻窩。在所有房子的門口都有人站在那裡激動地傾談。集合地點已聚集了一大群人，他們已經開始排成四個人一行。令人感到一種緊張的氣氛。我哪兒都看不見一面旗子。於是我明白此中道理了：它們會立即被沒收的！甚至示威也沒有發通告。

① 國防軍即德國的正規軍。

真是糊涂想法！怎么会这样呢？警察在哪儿？一个也看不见。

那边是我们的支部。

“晚安，”我匆匆地说。

凯蒂把她的手伸给我。她很愉快。

“威利也在这儿吗？”

她惊讶地望着我。

“不，他必需小心。”

“我将和护房队走在一起，”我赶快说。我有点懊恼。试想一下我竟然会问到关于威利的这样一个蠢问题！

“他们在前面。我就留在这里吧，”凯蒂回答道。

刚刚才过了几秒钟的光景。在前面，队伍已经开始移动了。我跑过去。一面红旗突然在游行的人们头上举起来，在左面——那边——又一面！警察来了！他们一小队一小队沿着我们的队伍跑着，帽带扣着下颌。一辆警车疾驶而来，上面载满了穿蓝制服的。队伍多长呵！一列一列结实的年轻小伙子现在向前走了——这是护房队，理查·许提希和佛兰兹·桑德尔走在最前面。当我走过去的时候，他们匆匆看我一眼。

“这一次以后他们不会再耻我们举行示威了！”我听见佛兰兹说。

他的声音有点辛酸的味道。

许提希的脸在抽动。

“是的——党就要被镇压了！”

……粉碎那旧世界的锁链，

奴隶们起来起来……

我们唱起来。这对于我们仿佛是一支新的歌曲，就象是我

們第一次唱它似的。使我无限激动；我的心跳得很急促。

……要爭取平等自由幸福……

歌声停止了。只听见我們的脚步声。沒有几个警察，他們都退縮了。他們知道他們所面对的不仅是示威的人們，而且是一批非常激昂的群众，这些群众意志坚决而满怀怨恨。街道狭窄而昏暗，人行道上站滿着密密的人层；他們得三思才能……

佛兰茲望望理查·許提希。

“今天准有罢工！小巷都挤滿了人。他們都在这儿了；也有許多社会民主党人。”

“但愿还不太晚！”

一个清晰而粗壯的声音喊道：

“打倒希特勒政府！打倒法西斯主义！”

“打倒！打倒！打倒！”千百个声音喊起来。

警車上的探照灯原来是照望着房子的窗戶的，現在轉向发出呼喊声的地方。一群一群巡警匆匆跑过。我看着他們准备好在那边扑向游行的队伍。但是他們很快地分散开；有一些到我們前面这边来，其他的一些跑到后面去，在那边队伍有如一条黑蛇正在拐弯。現在整个队伍都呼喊起来了。巡警們跑来跑去。但是我覺得他們不过是想吓唬我們，他們正在替他們自己担心。在別的时候，他們总是动不动就采用暴力的。警車緩慢地从队伍旁边駛过。探照灯向着队伍一列一列地照过去。他們在小心护卫着自己以防意外。

我們走过一所工厂。穿着制服的看門人站在入口的地方。厂房的窗戶已經有了灯火。

“佛兰茲！”

他望着我。

“明天早晨我們一定要到所有的工厂去。如果他們繼續在干活……”

“你以后跟我在一起，但是不要太公开。这已經安排好了，”他简单地說。

.....

一个鐘头之后。理查·許提希和佛兰茲·桑德尔在我前面十碼的地方走着。街上空了，死气沉沉的。他們走进了一家酒吧。我跟着他們。他們已經站在柜台边喝着啤酒。在这样一个时刻他們居然能安詳地喝啤酒！什么原故呢，什么也不管……？瞧，他們已經要走了。街道象是沒有尽头似的。怎么啦，我們已走出我們自己的区里了！他們又隱沒在一家酒吧里，我又看見他們站在柜台旁边。这种莫名其妙的举动是什么意思呢？我很想走上前去把我的想法告訴佛兰茲，但是你瞧，他們又走开了。當他們走过的时候甚至看也不看我一眼。他們的表情是那樣的令人难以亲近，我的話只好梗在喉嚨里。他們象是压根儿就不認識我似的！我再跟着他們后面跑。所有这一切都是这样的莫名其妙。他們瘋了——完全瘋了！第三家酒吧又出現，这一回我实在决定不再許我自己象一个傻子似地被拖着走。他們两个又要了啤酒。酒吧里除了在一張桌子上玩二十一点^①的一帮人外沒有什么人。紙牌拍拍地打在木头上。我看着佛兰茲和理查放下他們的空酒杯。要是他們打我面前走过的話就好了！但是不，他們慢慢地穿过那房間，消失在一道門后。这一个房間挤滿了人。我不声不响坐在一个屋角上。周圍的面孔对我都是陌生的。佛

① 二十一点是一种牌戏。

兰兹和理查坐在另外一边。一个高大、紅发的人站在一張斜放着的桌子前面。他挨次看一看每一个人，对每个人都吐出一个字。

“你？”

这是对每个人的全部問題。人們的回答也是一样的简单扼要。

“紅色互助社^①”——“二一七小組”——“国际劳动者互助社^②”——“二七四小組”。

佛兰兹說出了我們小組的號碼。

“护房队，”許提希說。

“你？”

那紅发的人眯着眼睛望着我。他的目光使得我手足失措。

“——我——我——”

“誰認得他？”我聽見他严厉地問道。

“我認得——沒关系！”佛兰兹从屋子的另一边說。在他旁边的理查举起他的食指，意思是說：“我也認得他。”理查認得我就成了！忽然他認識了我，我很高兴；是的，我甚至驕傲。实在的，我和他認識多久了？三年了。我看見他坐在那边，身体向前傾着。他的矮胖的个子現在显然更加矮小了。他臉上經常帶着这样一种严肃的神色，就象是他不断地被困难的問題所苦惱似的。嘴巴四周和在濃眉之上的前額上的皺紋比以往更深了。厚厚的头发紊乱地垂下来。他在这里会怎样講話呢？象經常一样，三言两語。粗粗魯魯地。他常常是半叫喊的樣子。理查！

我是最后被問到的一个。在前面的那个紅头发的人講話

① 紅色互助社是一个援助政治犯和他們的家屬的国际性非党派組織。

② 国际劳动者互助社是一个援助政治犯的国际性非党派組織，目的是加強工人的政治團結。

了。

“同志們！我們負責下面這些工廠：阿隆工廠、茲維士施工廠、瓦爾納工廠以及在西門子城的電力廠。小冊子今天晚上將會在你們曉得的住宅區印刷。明天一清早就去拿！”

他停了一下；目光環顧一周。

“一直到那個時候都準備好以防萬一。你們已經告訴你們的同志了。這樣就會……”

門開了。一個年輕的同志走到演說者的面前。他的面孔通紅；他看來是疲憊不堪了。他們靜悄悄地交談，然後那青年同志就走掉了。那個領導同志繼續說下去：

“這會兒柏林所有的沖鋒隊正在圍着政府機關舉行火炬遊行。他們遊行過後就將會杀气騰騰的——這是必須特別警惕的另外一個理由。都清楚嗎？有誰有什麼問題要問嗎？”

靜默無聲。

我們一個個地離開。街上一片荒涼。那種陰森森的靜寂使得我心神焦灼。我的頭發痛。

.....

市政廳的大鐘已經報過十點一刻了。我們站在羅塔克爾的客廳里。前門砰然关上。保爾·泰謝特。

“有什麼新情況？”

“沒有。火炬遊行還沒有結束哩！”

“也許只是我們猜想，三十三支隊今天晚上要干一番。他們一定是慶祝‘勝利’還忙不過來哩！”

“他們不讓我們嚐嚐他們的‘勝利’的滋味我才覺得奇怪哩。現在還有什麼能攔阻得住他們？警察嗎？他們在對付這些新國家的政治匪徒之前得再三考慮。這不過才十二個鐘頭——但是

這是他們的飯碗問題！誰要拿自己的差事或者養老金來冒險呢？”

佛蘭茲對着屋角那邊講話，那兒羅塔克爾的鑲框眼鏡閃閃發光。

“我剛才兜圈子的时候沒看到一頂鋼盔。他們已經想到這一點了——他們通常是每秒鐘都出來一羣的！”

保爾·泰謝特的外衣領子翻起到了耳跟。他低聲說：“就是這樣。如果我們不保卫自己，那就一切完蛋了。我們在布勞施維格和阿耳通納^①看到過的。阿耳通納的小伙子們真行。”

“已經通知了斯丹尼了沒有？”羅塔克爾問道。

斯丹尼是我們所有的工人防衛隊總部所在的酒吧的名字的簡稱。

“當然。他們甚至有自行車的崗哨。”

佛蘭茲清一清嗓子。

有一會兒大家一言不發。然後聽見羅塔克爾的聲音，——這好像是來自很遠的地方：

“我常常這樣想，佛蘭茲。我們這許多人已經經歷過多少事情了？我也是。在戰爭中四年沐血滾泥的生涯，一九一九年參加斯巴達克斯，然後是一九二三年^②……”

① 德國兩個市鎮的名字。國社黨的恐怖組織衝鋒隊和黨衛軍曾一度進入這兩個地方的工人區，企圖“征服”它們。他們使用手槍，並且用鋼棒毆打手無寸鐵的工人。工人進行抵抗，於是就在街上展開了惡戰，結果法西斯黨徒逃跑了。這些衝突事件是在希特勒上台以前很久發生的。在納粹政府組成以後，國社黨黨徒就以大規模屠殺來為他們一度被击败進行報復。曾經參加那兩次衝突的工人被逮捕、判死刑和處決。甚至沒有參加鬥爭但被認為是“共產黨爪牙”的工人，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

② 一九二三年，通貨膨脹和飢荒在整個德國引起了革命大風暴，在漢堡還發生了革命的街巷戰鬥。

外面一輛汽車駛過。我們向外張望。那是一輛出租汽車。

“……二三年。然後我們也就靜坐等待——動手。今天我們的生命又在危險之中了！”

“革命是有它的高潮和低潮的，”佛蘭茲從容地答道。

泰謝特伸了個懶腰，打了個呵欠。然後他說道：

“有時候使我感覺到一切都是這樣的沒有希望。成千成萬的人死去，死去。苦役的刑罰，連年不停的迫害。納粹總是喋喋不休地吹他們的‘老衛兵’。他媽的！他們口袋里老是放着左輪槍，逍遙法外——法庭跟他們是一伙的。好個‘老衛兵’！”

前門驕然開了。我們都吓了一跳。恩斯特·施維布斯！他一面揮手一面喘氣。

“納粹——一個騎自行車的人趕來了。他們正往這邊來！”

我們沖出去。

“他們將直奔這兒來，整個沖鋒隊，”騎自行車的人匆忙地報告。他是一個小伙子，戴着一頂鴨舌帽。

“通知理查和護房隊！”佛蘭茲命令說。

那個騎自行車的人飛快地跑掉了。法蘭茲回過頭來。

“給房客們發警報。每人和幾個同志一塊去。羅塔克爾和我留在這兒！”

同志們已經正從我們的酒店“凡爾納”飛跑出來。百葉窗紛紛放下。

我們推開那些建築物的大門，跑進院子裏去，向着那些黑色的牆壁齊聲呼喊：

“喂，听着呀！起來吧！納粹在進攻瓦爾街了！”

所有窗戶的燈光都亮了。人們從樓梯沖下來。朝街的窗戶都紛紛关上。一個穿着長睡衣的人從我身旁跑過；他里面只穿

了一件短衣。我們的街醒过来了！从街的轉弯的地方突然传来了歌声！

……給褐色的大軍清道！
給冲鋒隊員清道！……①

他們不是在唱。他們是在吼。下面的歌詞淹沒在震耳欲聾的口哨声和呼喊声中。

“打倒！打倒！紅色陣綫！紅色陣綫！”

我看着那黑黝黝的人群很快地走近來。

那里是游行！他們走得很急速，一大群一大群地向前推進。忽然正好在人群的中間發出一声沉重的巨响，花盆！人群中發出一陣粗野的咆哮，然后是一个很尖的声音。“关窗！清道！”他們要当警察！他們越走越近了。我看見他們肩章上的鈕子在灯光下发亮，看見他們皮帶上的扣子。

我抓住佛兰茲的手臂。

“瞧！瞧！一个巡警！”

“是的！”

唯一的一个巡警在队伍的前面跑着，他的鋼盔閃閃发光。一个褐衫隊員走在他的旁边。我看見那个巡警激动地和那褐衫隊員講話。但是那个褐衫隊員却扭轉头在喊叫，他的喊叫压倒那噪杂的声音：

“散开队伍！向窗戶开枪！”

罗塔克尔抓住佛兰茲的衣領。他的臉發白。

“畜牲！畜牲！畜牲！”

① 蘇斯特·韦塞耳所作的歌曲的歌詞。后来被希特勒选定为国歌。

穿制服的人群排成散开的队形。不停的枪声朝着房屋的墙壁而发；左轮枪发出的火光在昏暗的街道中更显得耀目。射程慢慢移到我們这边来了。飞彈仍旧从窗戶砸下来，声响超过了枪声，从街上所有的房子仍旧傳出呼声：“死畜牲！劊子手！”我的喉嚨象是堵了一块东西似的，我直哆嗦；不能控制自己。忽然我看見队伍前面的那个巡警停住脚步不跑了。他两臂前伸轉个身就跌倒了。那个在他旁边的冲锋隊員一下子跳开；他显然是要向其他的人們喊叫些什么。他的双臂在半空一挺，突然仆倒，他的两膝弯下。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究竟？我弄不清楚。人們现在一个一个跑进了附近的橫街。他們都跳到房子形成的隱蔽处。枪彈断断续续发射出来。

“现在……现在……”罗塔克尔喊叫道。

现在那些冲锋隊員咯登咯登地打我們旁边走过去。从轉角的那边傳來沉重的长統靴的声音。他們已經在稀疏的空气中消失。两个暗黑的尸体躺在柏油地上。

几分鐘后一輛警車的警号声响彻云霄。警車疾馳而过。它的車头灯扫过馬路。車閘尖叫一声。现在那灯光照射着馬路上的那两具尸体。两名斯丹尼隊員^①走到那巡警的旁边，巡警手中握着手枪。

我听到一个同志的沉着的聲音。

“納粹襲击瓦尔街！”

他指着那两具尸体。

“他們已經得到了报应了，警长！”

^① 斯丹尼是德国工人防卫队組織。

他們幫忙把兩具屍體搬上車。

“開往西區醫院！盡快！”

.....

同一天夜里，在西門子城的小房子里。我們是在納粹進行襲擊之後直接到這兒來的。佛蘭茲一下子關上複印器的彈簧蓋子，打起呵欠來。我用一塊破布揩抹染滿油墨的雙手。

“什麼時候了？”

“將近四點了，”斯特魯貝爾回答。他拿出他的懷表湊近油燈。

我伸直發痛的背脊。多冷呀！睡吧！要是我能睡一覺多好啊！我的嘴里有一點金屬的味道，使我的疲倦變成惡心。

“你也很累了吧，呃？”斯特魯貝爾問道。他的黑髮紊亂地蓋在臉上。這常常使得我想把它推回上去。

“好像我們都不累！”羅塔克爾替我回答。他半伸着身子趟在小屋子里的一張破沙發上。他臉色蒼白，眼鏡後面的一雙眼睛又紅又腫。

“沒關係，已經一千五百頁了，”佛蘭茲安慰大家說。

他又向斯特魯貝爾說，“其實你自己滾一下不就行了？”

“不成！”

那些傳單堆滿了一桌子。還沒有干。

“如果別的人也這麼干，西門子城就會滿了！”斯特魯貝爾樂了。

沒有人回答。我坐在那那破藤椅上打瞌睡。佛蘭茲坐在羅塔克爾旁邊。現在身體不動，睡意也就更濃了。我簡直很難睜開眼睛。

在我們四周的木頭牆上掛着剝制的兔皮。一張鋪着破紅氈

毛毯的行軍床架在左邊的牆角里。旁邊的小門後面，睡着斯特魯貝爾的老婆和三歲的漢尼。斯特魯貝爾原是住在我們的街上的。他已經失業三年了。房東將家具堆在人行道上，把他趕了出來。於是斯特魯貝爾就由同志們收容下來了。後來，我們幫他蓋了這所小木头房子。現在他是西門子木屋區我們小組的組長。西門子城是納粹的堡壘！都是中產階級。在選舉的時候，十家有八家的窗口都掛起卅字旗。

有人推我的肩膀。我畢竟睡着了。

“來吧，是時候了！”

斯特魯貝爾把掛在房門口的放馬鈴薯口袋放回去。

“當心點！別讓人逮住了！”

胡同里一股糞便和腐臭的氣味。什麼地方一只狗在吠。一層霧氣籠罩着那些小房子。剝骨地冷。我們向右急轉彎。高高的鐵道的路基就顯現在我們面前了。一長列貨車奔過那道橋，機車往空中噴出濃濃的白煙。車站的掛鐘差幾分鐘到五點。售票處空無一人。收票員懶倦地坐在他的小房間里。他好奇地望望我們。

“我們在外面等吧，”佛蘭茲低聲說。

弧光燈的燈光照得車站軌道後面的運河水閃閃發光。我靠在欄杆上。

“他們來了！”

恩斯特·施維布斯、“現成貨”、漢茲·普勒斯和艾迪在那兒。艾迪安上了他的假眼。我們握手。

“瓦爾街今天晚上受襲擊了嗎？”施維布斯問。“他們兩點鐘佔據了橫街。保爾·泰謝特沒到開會的地方。許是跑不出來，呢？”

这一个“呃”經常出現在施維布斯一句話的末尾，這是他的習慣。

“你知道更詳細的情形嗎？抓人了嗎？”佛蘭茲問道。

“沒有。但也有可能，呃？”

“我們必須商量好今晚我們都在什麼地方！”佛蘭茲向我和羅塔克爾點頭。

我們趕忙分傳單。每人把口袋塞得滿滿的。一列燈火通明的火車從我們前面的橋上馳過。佛蘭茲催我們快些。

他說：“你告訴你們的小組，施維布斯，我會照管我們的小組。在火車的前頭開始；我們管后面的客車。我們可以來回坐，坐空車回到這裡來。如果一個人失蹤，其他的人最好離開火車站。在火車站上注意是否一切都正常，去吧，趕快！”

“我只能呆到七點鐘，呃？我的送貨自行車在等著我。”施維布斯匆匆地說。他是在一家香水工廠里當送貨員的。

“我們會在這個時候以前辦完的。”

我們分手了。我的神經異常興奮。倦意全消了。只是頭上隱隱作痛，兩眼發燒。車站站滿了人。電氣火車一輛跟着一輛開進了站。西門子工廠的早班工人要去上工了。數以千計。在希特勒當了總理后的第一個早晨！

車廂里淨是汗臭和壞煙草的氣味。工人們帶着睏倦的面容坐在座位上。有幾個低垂著頭。他們利用火車的旅程繼續他們的睡眠。我們往每個人的手上塞了一張傳單。我頭都暈了。這和我所預期的大不一樣。沒有議論，沒有激動。他們木然地從我們手中拿過去。有幾個人在看；大多數馬上把它們放進口袋里去。佛蘭茲站在車廂的中間。他大聲地說道：

“工人們！希特勒昨天成為德國總理了。德國的資本主義

任命他的。他們找不到比加強剝削工人階級更好的擺脫危機的出路。希特勒要把德國變成一個雇傭的大牢獄。一切反抗都要遭到恐怖統治的鎮壓。昨天晚上衝鋒隊已經開始攻擊工人階級區了。同志們！此刻全世界的工人都注視着你們。法西斯主義是否能夠實現它的血腥的目的，就決定於你們工廠的人們了。”

車廂窗外依然還是荒涼的鄉間和帶顏色的訊號燈光。

佛蘭茲往兩邊掃了一眼，急促地講道：“我們共產黨員、失業者和工廠工人們來到你們面前，向你們建議一同并肩戰鬥。我們向你們說：今天不要用手去碰任何一個開關。不要使一台機器轉動！討論一下局勢吧。成立你們的行動委員會吧。對希特勒的獨裁只有一個回答：在全德國展開廣泛的政治罷工！你們的生活和你們孩子的前途都在危險之中，要記住！”

佛蘭茲熱情地演講。我在觀察那一張張的臉。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但是直到現在車廂里依然是一片啞寂。他們必須了解我們，他們必須醒悟。現在，就在這個時刻！

“開始討論吧！”佛蘭茲向我們低聲說。

火車拐了一個陡彎，向一邊稍稍傾斜。我走進一列座位中去。兩個青年工人，一個老年的和一個女人坐在那里。那個女人把傳單迭成一個小方塊，用手指搓弄着。那老工人在讀，其他兩個准是已經把它放進口袋里去了。所以他們並沒有讀過。

“工人們！我們一定不能這樣互相隔膜。你們也一定和我們一樣的感到一定要發生事情了。而且就在今天！工人們必須保衛自己。立刻對你們車間其他人講吧！”

我身子向前傾斜地站着，擺動的火車使我站不穩。那個女人用她那雙細小而困惑的眼睛瞧着我。她的嘴唇緊閉。“罷工！你是個狡猾的家伙，我的小伙子！”她的目光仿佛這樣說。那個

青年工人聳聳肩膀。“很对——是的，”他緩慢地說。坐在他旁边的那个人侷促不安地撫弄着他的飯盒。車廂外面，田野上复盖着一层灰脏的霜。

“我們什么都干不了。我們得等待着工会决定做什么，”那老头子說。

我直望着他。他的褐色的眼睛是安詳的。

“別等待，同志。不管怎么样，总是要开个头的。其他的人将要跟隨我們。”

那老头子搖搖頭。

“沒有工会的命令？沒有罢工的工錢？就乱干起来？”

左边那个年輕人点点头表示同意。“不可能！”

“那样做我們只会丢掉我們的飯碗！”那个女人尖刻地插嘴說。

“他們不能对整个工人阶级干出什么来的。”

車閘嗞嗞作响，火車放慢而最后停下来了。所有的人都挤向門口。外面一块搪瓷的牌子大字写着“瓦尔納工厂”。一股冷风颼颼地刮过那露天的車站。正好在我們前面矗立着那座工厂。发亮的方格窗子一直高入天际。那寬闊的楼梯透过那些玻璃窗，有如骨架一样。那些小点点，——那是人們成群成群地走过。一行一行的工人，紧紧地挤在一起，走过左面的那个院子。一瞬間，好几千人都看不見了。如果他們通通……

“瞧那边！在車站外面，工厂进門的地方——有人在散发傳单！”罗塔克尔說。

“他們是木屋区小組的。”

在另外一个月台上，一列空火車到达。施維布斯和他小組的人跳下来。

“干什么，呢？”

“呆在这儿；我們要去菲尔斯滕布龙车站，”佛兰兹答道。

我們沿着工厂厂房构成的窄街道上跑。在一片草地和鐵栏杆前面是些肮脏的灰墙。艾迪赶上我們了。“我也要来，”他曾經坚持說。工人們圍上了我們。罗塔克尔开始分发。看不到有警察。

“把剩下的留到桥上去发，”佛兰兹命令說。

人行道上散滿了傳单，是那些怕事的家伙剛剛扔下的。我們走过了最后一家工厂；菲尔斯滕布龙桥就出現在我們的右边了。菲尔斯滕布龙车站，联系各工厂的第二个铁路联络站，在桥的后面扶起一个驼峰。这儿白天是清靜而荒涼的。但是現在好几千人来到了。工人們四个一排地走过那窄桥。我們分发給他們傳单，简单地說上两句。在这儿沒有时间来討論了，他們都是匆忙得很。我的一些傳单一下就派光了。罗塔克尔也是空着手走来。

“連警察的影子都沒有！”

佛兰兹目不轉睛地凝視着那些人群匆匆走过。

“这儿本应有更多的人，多得多！希特勒当总理的头一个早晨，在柏林最大的工业区！一支百人的卫队，中心是一个党的領袖。两三分鐘的談話。那将是对全德国的信号！”

我們一直站到工人的洪流中断了为止。几个迟到的人跑过。汽笛声撕破一片靜默，渐渐升高为一个清晰悅耳的声音，然后低沉地消沉下去。佛兰兹点点头。

“我們走吧！”

我們的靴子咯登作响。大家不发一言。我被一种毫无办法的情緒征服了。在左边，西門子廣場的塔樓明顯地聳立在汪洋

似的一片房子之上。屋頂上升起縷縷輕烟。那是烟囪和鐘樓，西門子城的標志。鐘樓四面都有一碼長的夜明指針；四周是明亮的方格——這是時辰的記號。老遠就可以讀出時刻來。指針好象在嘲弄地朝我靈眼說：“你想攪亂常規步調嗎？在這裡？他們全都準時來到。難道你沒有聽到車間里的嗡嗡聲嗎？哈——哈——哈！一切如常！”

佛蘭茲忽然粗暴地說：“我們全都在現場。我們攻打工業的堡壘。從外部攻打！內部的反應如何呢？”

他的雙頰塌了下去；看來是倦了。他的便帽垂在頸后。他的寬闊肩膀無力地下垂。艾迪和羅塔克爾的臉孔也是一付痛苦神情。佛蘭茲的話里揭露了可怕的真實。我的腳沉重地拖動着。生理上的緊張已達到頂點。睡覺！只要我能睡的話！

左邊開始了木屋區。這是我們的木屋居地。在這裡，它們被稱作“小莫斯科”。幾個下層的窗戶里閃耀着發黃的燈光。從一個洋鐵烟囪里直升起一縷輕烟。一只雄鷄在啼。

羅塔克爾說：“我們幾乎全都是失業的，為什麼？因為鬥爭的人總是被工廠開除的。你是在这儿被趕出來的，是不是？從外面進行工作——那可就不一樣了！”

佛蘭茲轉過頭來。他心不在焉地瞧着羅塔克爾。

“我們在工會方面的工作……”

他深深吸了口氣。

“今天你聽到答案了！等着瞧——工會領袖。”

艾迪大聲地吐口痰，拍打着手臂。“真够冷的了，是嗎？”然後，好象剛剛才聽到佛蘭茲的話似的：“等着瞧，等着瞧。我對你們說，這后頭隱藏着東西的。比方我們隔壁的那個漢尼·克萊耳，你曉得他，外號‘肉團漢尼’。他是在这儿工作的，在鑄機

車間。累死人的活，他對我說，那些濕沙子以及其它一切。工錢少得可憐——一個禮拜大約三十馬克。可是他還擔心丟掉這份討厭的差事嗎？他怕的！而且他還為他的女朋友在省錢。她想要一架小型唱機！”他不屑地笑起來。“外號是我給他起的！一個愛人，唱機，星期日和她在海濱——再沒有別的教他更感興趣的了。這類紅色傢伙可多得很。這使得一切全都他媽的不同了。”

我們來到了云格弗恩海德車站。塞滿乘客的電車一輛接一輛地駛過。列車隆隆地越過鐵路橋，儘管天光大白，車燈還是亮着。職員們到西門子廠上班去了。

佛蘭茲停住腳。

“我們分手吧。到了瓦爾街小心點。”

* * *

報紙上長篇累牘地報道在希特勒當總理的那天晚上我們街上所出的事。在射擊中倒在沖鋒隊面前的巡警叫藻里茲，那個沖鋒隊員是三十三支隊隊長邁科斯基。他們都死了。

三十三支隊殺了一名警察，並且在他們的愚笨的恐懼中，甚至殺了他們的隊長。我們親眼看到的——而我們現在在報紙上看到，他們全都是共產黨人的犧牲者。報紙上一字未提三十三支隊在我們街上游行，那天晚上他們打算在我們街上搗亂。納粹的報紙發表一些破口謾罵的文章。他們把邁科斯基說成是最近受到共產黨人迫害的。看來邁科斯基的死要成為對我們“紅色”的街加緊恐怖措施的借口，我們這條街他們已恨之入骨；報紙這種煽火行動昨夜已產生了如期的作用。柏林沖鋒隊西虎尾團全團在我們街上示威。這是對邁科斯基的“謀殺”的報復示威。在示威開始前，警察老早就到我們的酒吧“華爾納”，命令店主關門。

之后他們占据了所有的角落，停止街上的交通。一辆警車不断地駛來駛去，用探照灯照亮房子的窗戶。連屋頂上也遭警察搜查，以防可能藏有“保卫者”。临街的窗戶没有一个灯亮着。簡直就如一条死街。然后揚衫隊員列隊而過，打着火炬。他們的報復喊聲，他們的吵雜的聲聲，冲破了墓地般的寂靜。

然而我們的沉默成了胜利。

*

*

*

連日來的神經緊張使我十分渴望生活和休息。我过去从来没有这样强烈的感觉。我必须去找凱蒂。我要去看她，听听她的声音。

桑德爾大媽坐在厨房里縫衣机跟前。

“弗兰茲在家嗎？”

我忽然害羞得不敢直接問到凱蒂。

“不在。不过你进去吧。凱蒂在那里。”

她坐在沙发上。身旁摆着一大堆袜子。她并没有听到我进来。

“晚上好，凱蒂。”

“揚！”她的眼睛閃亮。“坐下吧。”

她穿着一身酒紅色衣服，系着一條編織的腰帶。衣服裁剪合身。十分漂亮。当她俯下头来补袜子的时候，一絡秀发垂到臉上。她把它吹了回去。

“你怎么那么安靜呢？”她詢問地望着我。

“一个人不能老是說个不停呀。”

縫衣机在厨房里轧轧作响。停下来，接着又响起来。

“我来找你来啦。我們出去走一会儿吧。”

她点点头。“还有一个窟窿。”

街灯已点上。天气寒而燥。我深深吸了口气。一年里就数这个时候的空气最清新，跟通常城市的空气不一样。凯蒂的手插在我的大衣袋里。它是这样纤细，我的手把它全包住了。我学凯蒂的样子，小步走着。她的脖子上围了一条鲜艳的方格围巾。它是这样地鲜艳夺目。这一切多么令人愉快。一时什么都不想，光是走路，并肩走着。我们不想说话。

小小的咖啡店没有几个顾客。我们俩都很高兴。滚烫的咖啡使我们恢复温暖。凯蒂脸庞转红；她的眼发亮。我拿过邻桌上带图画报纸。第二页上是一幅前进中的巡警队伍的图片。

打着卅字旗的警察在莱茵桥上！

原来是官方报纸！我把它放下。

“威利已经走了，”凯蒂说。

她也看到了那张图片。

“是吗？”

“那次袭击后，对他未免太危险了。”

突然地，一切又回到现实里来了。当真。不然我在公寓里应该见到他的。

“来吧，凯蒂，到我那里去。”

*

*

*

我打开前门。凯蒂在我身旁。我们默默地沿着黑暗的楼梯摸索上去。

“别响——女房东！”

*

*

*

几天前报上宣布，被打死的冲锋队三十三支队队长迈科斯基和巡警藻里兹将举行公葬。今天他们由灵车送到柏林大教

堂；在那里举行追悼会。希特勒，他的内閣以及冲锋队和党卫军的大官們都出席。三十三支队和一队警察在大教堂前行进。晚报在第一版上刊登了长篇报道，附有照片。又一次重复那些谎言，說他們都是被共产党人杀害的。

佛兰兹告訴我說，这次葬仪由各个电台广播了。当时他正拜訪一个同志，听到广播員（照片上显示出他正站在教堂石阶上的扩音器前）欢迎冲锋队說：“现在走过来的是人人害怕的‘杀人的’三十三突击队。”

“他們公开贊揚三十三支队多年来的恐怖活动，”佛兰兹忧郁地說。“这只能意味着鼓励他們在我們街上更厉害地行凶。这桩迈科斯基事件确是弄得对我們很不利；納粹政府不会无目的地制造这些借口的。我們必須說服同志們，现在須要加倍地小心。”

佛兰兹从来没有这样担心过。

“德国不是意大利，”許多同志爭論說。

我們想发动一个反对希特勒政府的总罢工的第一次努力失败了。

佛兰兹說得对嗎？我們真个是处在一个恐怖的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时代嗎？

* * *

街道爬上一座小山头。

“倫琴大街。他們的狩猎場！”佛兰兹指着街道对过的那家酒吧，它被用来作三十三支队的活动场所。看不见一个穿制服的。他們在搞什么名堂呢？

我們走上了街道最高的地方。一道大桥横跨史普里河。左面，船塢牆上的弧光灯晃动着。一架巨型起重机无声地来回摆

动着，把它的臂肘探进货船里。它的后面，是一排排的有亮光的厂房。从它们当中一根巨大的烟突聳入夜空。运煤的吊斗在头顶上的轨道上隆隆驰过。它们是史普里河岸上的夏洛登堡发电厂的煤車。

佛兰茲突然站定。风从史普里河那边吹过来响声。我們靜听。現在，又响了，第三声、第四声、第五声！

“象是枪声！”

我从側耳靜听的緊張状态中緩和下来。

“是的，希望它不是在威尔曼那里。”

威尔曼是我們护房队集会的酒吧。它座落在史普里河附近的一条小街上。

“突击队的房子看来这样荒凉呵，”佛兰茲緩慢地說。

他說出了我的想法。

我們走过汽車房的牆，然后向左轉。佛兰茲把門上的鈴捺了三下。这儿我以前沒有来过。前厅里，看門人从小孔里往外看。一个灰发戴眼鏡的矮个子。

“我們想看看空着两間房的那层楼。”

“可以。右边第一个門，”矮个子細声地說。

一道长长的过道，然后是一間大的不太亮的房間。三个人和我們握手。我只認識其中一人；他是邻区的人。其他两人，一个有大而秃的脑袋、一付精干的臉孔，另一个是个矮胖子，留着一把胡須。矮小的看門人訛門半开着。他穿着拖鞋从过道里慢慢走回来。

“我們还不能开始，”秃头的人对佛兰茲說。“护房队队长們还没有来到。”

“好吧。”

直立地上的大时钟滴滴嗒嗒地响着。沙发上头挂了一个鸟籠。上面盖着块黑布。我們在雕刻的椅子上坐下。外头，門鈴声响。老头的拖鞋沿着过道拖过去。我們望着大門。一个深沉的声音。“我們想看看察看两間房的那层楼。”

老头細声回答。之后沉重的皮靴声沿着过道傳过来。理查·許提希。另一个人是誰？我不認識他。許提希一臉愁容。嘴边現出皺紋。

“我們給拦住了。三十三支队在半点鐘前武装进攻威尔曼。”

死一般的沉寂。許提希越过我們向前望。

“……一个同志被打中肚子，——另一个伤了肩膀。”

他的臉抽动。他的一双大手不安地摸着他的腰带。秃脑袋終于开口說：“那可以等以后再說。首先……”

他把手放在額头上。

“你們曉得，有几个同志因为一月三十晚上的事件被捕。他們大部分是斯丹尼防卫队的。所有报纸都就那天晚上的事件煽风点火——这是秉承官方的指令。看来要把迈科斯基的死造成第二个赫斯特·韦塞耳^①。同志們，我們必須向公众揭发真正的凶手。通过报纸和传单！”

好一陣只听到时钟的嗒嗒声。

① 赫斯特·韦塞耳是一个小康的中等阶级家庭的不成材的子弟，讀書不成，做事也从未做长，最后依靠妓女的补贴为生。早在希特勒上台前参加了冲锋队。后因爭风吃醋被同伙打死。戈培尔却利用这个机会掀起一个巨大的宣傳运动，把韦塞耳說成是“共产党謀杀”的“牺牲者”，是“德意志民族的英雄”和“殉道者”。这种宣傳一直繼續了若干年。一首被認為是他写的歌成了国社党的党歌。希特勒上台后，即被宣布成为納粹德国的国歌。

“我們必須提出這些問題：當天晚上全付裝備的沖鋒隊為什麼到瓦爾街來？他們的道路在另一個方向。為什麼不對屍體進行應有的檢驗？因為它將證明槍彈是從近處發射出來的。因為它將證明邁科斯基和巡警藻里茲是被他們背後游行的沖鋒隊開槍打死的。”禿頭逐個地看遍我們。

“首先要記住：根據我們聽說的，這個巡警並不是仇視我們的。現在他的老婆被迫參加那煽動起來反對我們的運動。否則她就會失去她的撫恤金，可是她還有一個嬰孩。納粹的報紙說，他們要把那條街更名為邁科斯基大街。在他們遇害的地方要修起一座銅碑。你們看，他們會想盡辦法把我們說成是‘行凶的共產黨人。’”

理查·許提希抬起頭；他要說話。

“等一等。還有一點：我們要在藻里茲遭難的地方獻上一個纏上紅絲帶的花圈。以表示我們的同情，表明我們不是他致死的根源。最重要的，不要對這件事說出一個字去。不要對任何人說！”

理查·許提希把他的一雙大手放在桌上。他望着它們，然後說：“我們護房隊將支持你，跟往常一樣。因為我們對夏洛登堡的無產階級負責。你知道我們已犧牲了多少同志……”他放低聲音。“也許現在又有一個同志犧牲了。”

他握緊拳頭，抬起頭。

“但我必須代表我們的人告訴你們，我們再不會讓我們自己無抵抗地被消滅掉。當然，不採取個人的暴力行為。但是我們必須能夠保衛我們自己。沖鋒隊如今已開始下手了！我們已遭受取締！”

許提希沉默下來。我感到異常激動。然後他旁邊的一個同

志說：“很对。除此之外，我們沒有别的办法。”

秃脑袋鎮定地看着他們。“誰也不能反对你們保卫自己。但是不得挑畔，記住。往后，我們會很需要象你們这样的小伙子。”

他站起来。

“還沒一点！自行車哨还要繼續工作。”

* * *

我去找佛兰茲和女孩子們。我們想去看电影。海尔黛和凱蒂走在我們前头，手挽着手。

一种想法閃过我的脑海：“佛兰茲是我的朋友和同志。我們都在談恋爱。我們的女伴也是要好的朋友。”

女孩子們在街角的广告牌前停下来。

“恋爱，間諜——老是那一套，”海尔黛說。

“这是一部瑞內·克拉尔的片子，”凱蒂說。

“更是那一套了。”

佛兰茲轉到广告牌的那一边。

“喂，看这儿！”

“他的声音激动得很。怎么一回事？”

广告牌上从上到下貼滿了納粹宣傳三月五日国会选举的標語。在一張宣傳画上出現一些飢餓的形象，有男的、女的和兒童的。下面写着大字：

我們底最后希望

希特勒

頂上貼着一幅有希特勒象的傳單。

德意志人民，給我四年的時間！

然后你們再看！

“只有他們的！廣告商都奉命不得張貼任何其他廣告，”佛蘭茲說。

“廣播里整天都是這些東西。他們不斷重復：‘投希特勒的票。投希特勒的票，’”海爾黛跟着說。

“但是他們已揚言不管是否得到多数的票，都要上台的，并且要拒絕我們的人。”

我們慢慢地往前走。

“我們的上司，那個已經在事多年的老女秘書，”凱蒂說，“一貫投德意志國家黨^①的票，始終支持胡根堡^②。‘如今我們需要一個具有鐵腕的人，’她解釋說。‘而上帝就給我們派來阿道夫·希特勒！’”

和平常一樣，動物園車站上人山人海。佛蘭茲突然用臂肘觸我。報攤上喊出報紙的標題：

卡爾·李卜克內西大樓又遭搜索！

有暗窖！

武裝起義的指令！

我們默默地彼此望着。一周前他們占領了黨總部大廈，幾年來搜查過數十次。如今發現了“暗窖”，“武裝起義的指令”。

我們前面的人轉過頭去。一名巡警，帽帶緊扣在額下，和一名沖鋒隊，頭上戴着頂褐色的帽子，向我們走過來。在他的褐色沖鋒隊制服外，罩着一件藍色的警察大衣，腰帶上挂着一根股棍和一支手槍。

① 德意志國家黨，是一個保皇的反動的貴族政黨。

② 胡根堡，德意志國家黨黨魁，大力協助希特勒奪取政權，希特勒上台後，曾被任命為內閣部長，旋即被撤換，其黨亦被解散。

“冲鋒队的特別警察。”佛兰茲輕輕地說。

我們站在電影院門外。我完全失去看电影的兴趣。但是我不想教女孩子們失望。佛兰茲显然有同样的感觉。他一言不发；眉头紧皺着。

电影院里的电影音乐，交头接耳的人声；一切突然变得教人无法忍受。我无法集中注意力去看电影。报纸的标题和冲鋒队的特別警察在我的眼前閃动。

我們走在回家的路上。报童們大声喊出“晚报”最后版的标题：

在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有新发现！

秘密的活板門：地下室！

“他們这一手太厉害了，”佛兰茲說。“他們正在为大选打基础。看来是如此。墨索里尼也用同样手法。不是也有人想杀死他嗎？呀！”

从胡同里傳出嘹亮的扩音器的音乐。一辆德国广播公司的車。車身上貼滿夺目的納粹招貼。音乐突然停下来，

“三月五号。投票支持希特勒！”扩音器叫喊。它使得我发狂。

我們停在瓦尔街口。一路走来我們一言不发。海尔黛看着街角上卖香腸的比尔。他坐在他那蘑菇形的帳篷下，盖着毯子。他面前的銀鍋蒸气騰騰。

“我請你們每人吃一根香腸。以結束我們的节目，”海尔黛說。

卖香腸的比尔見到我們很高兴。他跟我們很熟悉。我知道佛兰茲不时卖給他一份报纸，并且把他列入捐款的名单中。

“你們要点面包嗎？”

我們謝絕了。

“天气不好，是嗎？”

“是这样。”

“那就該快点回去，孩子們！”

“我們曉得當心的，晚安，”佛蘭茲答道。

“晚安。祝你們成功。”

*

*

*

两天后。佛蘭茲叫我到欣里希那里去。他給我們的報紙圖
圖。

我爬上樓梯。銅牌上写着“奧古斯都·欣里希教師”。我按
按鈴。一会儿，了望孔上的盖子抬起来，然后欣里希站在我面
前——一个身材高大圓臉孔的人。他的黑发梳向脑后。发油閃
閃亮。

“是你，揚？”

他不自然地招招手。“請吧。”

他出了什么事呢？看来这样忧愁；行动这样奇怪。

甬道里糊着洁淨鮮艳的壁紙，挂着紅漆的衣鈎，放着一張同
样顏色的小桌子，桌子上头挂着一面鏡子。我把大衣挂在衣鈎
上。

“对不起，这儿一切都是乱糟糟的；我們到会客室去吧。”

衬衣、領帶和卷起来的袜子乱七八糟地堆在有皮椅墊的鋼
椅子上。屋角的躺椅上有两套衣服。欣里希清出一張椅子来。

“請坐。”

他走向房間中央的桌子，把一張硬硬的繪圖紙卷起来。他
要离开这里嗎？一般說来，新公寓看来总是非常漂亮的。欣里

希把紙卷打開，拿到我面前來。

“你定必看過了——我自己畫的，”他慢慢地說，帶着我想是相當不安的心情。那是一幅煤礦的鋼筆畫。鋼管和鋼架交雜在一起。坑井起重機上飄揚着一面鐵錘和鐮刀的紅旗。

“它一貫是掛在隔壁房間的，是嗎？”

欣里希點點頭。他把圖畫卷起來，捆上一道繩子。

“我來有事。你得給我們報紙畫個新報頭。我把蠟版帶來了。”

欣里希猝然地抬起頭來；他的臉發抖。怎麼，出了什麼事？他的行動就象我要他干什么只有天曉的事似的！

“……我不行。我今天就要離開這層樓——從此離開這一區。”

“這對我來說可是個新聞。”

他把卷起來的畫扔到桌上。

“怎麼啦，難道你還不曉得出了什麼事嗎？”他歇斯底里地叫嚷道。

他瘋了嗎？我也生起氣來。

“會出什麼事呢？”我極力控制自己。欣里希走近我；一綹頭髮垂到臉上。

“國會在燃燒着——國會失火了！”

我瞪大眼睛看着他。

“國會！”他重復說。“廣播里宣布過了。他們一直在發表最後的新聞。”

現在我終於弄清楚他說的什麼了。國會——他們放火燒國會。

“那是他們走運的時候了！”我對他喊道。“目的却在對付我

們！這是他們爭取議會選舉的一個花招！”

欣里希神經質地走來走去，絞扭著手中的紙卷。

“我必須離開——我太出名了——如今他們將全力來對付我們……”他結結巴巴地說。他避開我的目光，“無論如何——我再不能參加工作了。”

我站起來。這裡的一切都教我不舒服。四散的衣服；欣里希的面孔。

“那麼再見吧，”我嘲諷地說。

* * *

時間已不早了，但人們還站在各處談論著。從報販手裡攬走報紙。

國會大火！

我跳上公共汽車。回去——找佛蘭茲去。

在瓦爾街人們一羣羣地站在門外，爭論著。他們站在煤汽燈下，讀著最初的報紙消息。佛蘭茲在那邊，站在他的房子外頭。他周圍圍著一羣人。我認得羅塔克爾、泰謝特、施維布斯、艾迪。我跑過來。

“佛蘭茲！佛蘭茲！”

他把我拉到一旁。恩斯特·泰謝特跟過來。

“真他媽的太下流了，”他說，沒等我說出關於大火的事。“他們這次污陷共產黨人使公共財產遭到莫大的損失。”

他站在我面前，和平常一樣。他象往常一樣安詳地說著，而我卻激動得不得了。他的清明的眼睛望著我，手插在褲袋裡。

“如今我們怎能……但是我們必須……”

“幾天內我們必然會曉得詳細內容的，”佛蘭茲打斷我說，

“然后我們再予以反击。印些簡短的小册子，把事实扼要說出来。”

他說得对。我对我原来的那种冲动情緒深深感到慚愧。冒冒失失是于事无补的呀。

恩斯特·泰謝特若有所思地吐了口唾沫。

“他們的手法是新的，但主意是老的，”他說。“只要想想一九一九年的斯巴达克斯。那时他們捏造了在利希登堡打死五十名偵探的事实^①。”

我又激动起来了。

“但是今天他們在虛构事实呀！而他們已掌握了一切宣傳手段——广播、电影、报纸。我們怎能对付得了他們的騙人宣傳呢？”

“我們一貫是处境艰难的，”佛兰茲毅然地說。我們回到其他人的身边来。我几乎把欣里希的事給忘了！

“欣里希吓坏了；再不肯参加工作了。”

佛兰茲聳聳眼眉。

“他不会是唯一的一个吧，”他回答說，好象早就預料到似的。

我們和別的人在一起呆了好一会儿。

“我回屋里去了，”佛兰茲說。

我陪着他 and 泰謝特直到后院。

“如果出了什么事，就敲窗門，”佛兰茲对泰謝特說。他們住在同一层楼上：佛兰茲住在側樓，泰謝特住正樓。他們的窗戶正

① 一九一九年一月，德國政府和反动軍隊曾大事宣傳斯巴达克斯团槍斃了被監禁的五十名偵探的謊言，以延緩战斗的革命工人。

好在牆角上彼此相对。

我慢慢地走过瓦尔街。发电厂的高大窗戶后面灯光如昼，机器嗡嗡地响。我們最新印出来的招贴贴在厂房的木栅栏上，这是艾迪一个人搞的！孤零零的三角牆上的黑纹。孤单单的平房或两层的楼房，夹在高大的公寓中間，在街灯照耀下，显得更渺小更萎縮。它們是夏洛登堡初期的遺物，已渡过多少个世代了。屋檐都是經過风吹雨打，长满了青苔。楼下一层的窗戶前面吊着沉重的木百叶窗。这是瓦尔街。过去城墙就在这儿。它的后面过去必定是片草地，綠树成行。如今街上看不到一枝半叶。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喜欢它。它是我們的街，我的街；我属于这个地方。

我的眼睛发烫。我累坏了。

* * *

翌日。楼房里的人全都沒起来，泰謝特就来按我的門鈴，我費了好大的勁才教我的女房东安定下来。他为了工作必須立即离开。佛兰茲在夜間就已逃走了。泰謝特警告我別上他家里去。

我仔細地进行調查。夜来警察和冲锋队曾搜查过瓦尔街。我必須警告海尔黛。

那个卖香腸的告訴我这次搜查是怎样开始的。当时他正好坐在他的蘑菇帳下，两輛敞蓬卡車，减弱灯光放慢馬达开到街上来。警察和冲锋队成排地坐在上面。車子在街的拐角地方停住。冲锋队员跳下車来。一个領子上带星的冲锋队员压低嗓門发号施令。

“三楼右手——桑德尔。”

一小队人走开了。

“八十八号——費席尔。八十五号——卡托瑞克！”

“是，长官！”

我必須从桑德尔和泰謝特那里探听其他的詳情。桑德尔大媽睡覺非常警醒，屋里稍許有点動靜她都听得見。沉重的脚步声傳到樓上。她走向鄰室的門。

“佛兰茲！”

他跳起來。凱蒂也醒了；她直直地坐在床上。

“有人上樓來了！”

佛兰茲趕忙穿褲、穿靴、披上短外衣。現在他自己也聽到那聲音了；現在必然走上到樓梯來了。凱蒂把她的錢夾子塞到她兄弟的手里。然後她走到他的床那兒，把它弄平整了。佛兰茲把窗門推開，向下面院子里望望。那里還沒有人！他爬到窗台上，敲敲泰謝特的窗戶。在身後，他們已在捶打房門了。

“開門！警察！開門！”

凱蒂裝出一付沒睡醒的聲音：“請等一等，我們總得穿上衣服呀。”

泰謝特出現在對面的窗戶後面，只穿着睡衣。他推開窗戶，悄悄地伸出手。一陣兒佛兰茲跨過院子，然後站在泰謝特身旁。後者把窗戶关上；佛兰茲看到凱蒂在那邊也是這樣做。

在桑德尔家，他們已在用腳踢門了。踢聲驚醒了整幢房子。他們到處在听着。

凱蒂開開門。她媽媽站在她身後。她們已經披上外衣。她們在電棒的刺目白光下向後縮。手槍筒的亮光閃了一下。第一個人用腳把門踢得大開；它碰着凱蒂的胳膊。他們到廚房裏去了，——四個特別警察和兩名巡警。一個衝鋒隊員，寬肩膀的彪形大漢，把手槍對着老媽媽的胸口。

“你是桑德尔太太嗎？”

凱蒂看到她媽媽緊抓著外衣的手突然停止發抖。

“是的。你想幹什麼？”她很鎮定地問。

那個寬肩膀的漢子不回答。用電棒把廚房照了一遍，把房門推開。其他的人擠在他後面。

空空的房間招怒了沖鋒隊。他猛然轉過身來，註燈光射在站在門口的婦人的身上。

“你兒子佛蘭茲在哪裡？”他叫道。

“我不知道，”媽媽說。

“你不知道？”

現在該凱蒂說話了。

“那你呢？你也不知道，是嗎？”

“不知道！”

那些傢伙都把電棒照著凱蒂。她把大衣拉攏一點，把前襟翻起來。

“把燈打開！”他們向媽媽喊道。

她到廚房里去，一個沖鋒隊員跟著她。當她在角落的帳篷下面摸索的時候，他疑心地問她：“你在那兒幹嗎？”

“把煤氣開關擰開。”

“呵！”

“搜查房間！”

那個高大的沖鋒隊員顯然是個頭目，或則裝作是個頭目；不管怎樣，兩名巡警立即服從他的命令。他們把鋪蓋扔到地上，把草墊抬得好高，註它們砰然落在地板上。兩名沖鋒隊員到廚房里去。婦女們聽到碗碟相碰的聲音。他們在翻廚房里的櫃子呢。一個沖鋒隊員站在書架前。他仔細地檢查每本書；把一些書扔在地上，把另一些放在身旁的桌子上。凱蒂猜到其中有高

尔基和列宁的著作。那个宽肩膀的人把衣柜门打开。他搜遍了所有衣服的口袋，甚至连衣服缝边都摸到。他把检查过的东西扔到凯蒂的床上。然后把相片取下来，扣打墙壁。他把列宁的照片在桌边上捣碎。凯蒂注意到，巡警们是迫不得已地搜查着。他们光是瞄一瞄床底下，摸摸沙发的罩套。那彪形大汉爬上桌子，好看看炉灶顶。

“你只会弄坏我的桌子。在那上头你最多只会找到尘土罢了，”妈妈镇定地说。

那个冲锋队员跳下来。

“你少管闲事吧，好吗？我们这次来主要是为了你的好儿子。不过，你当然是不晓得他在那儿的！”

他突然走到妈妈跟前。“他今天整天没在家吗？”

老妇人沉默了一阵，看着凯蒂。

“没有！”她坚定地說。

那个冲锋队员紧紧地盯着她，她转过头去。

“他没有在家——说真的！”凯蒂說，打破沉默。

那头目转向她。

“那末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他！”

“我們要灯吗？”其他人中的一个問道。

“不要。我們不能給他一点警告。过后有电棒就行！”

他装模作样地转向妇女们。

“請吧，女士們！打搅你們，請繼續睡覺吧——在隔壁房間里，不用說。”

* * *

泰謝特給了佛兰茲一頂帽和一件大衣。

“星期一，选举之后，三點鐘。揚知道那个地方，”佛兰茲只

願得站住說这几句。然后他跑下主楼的楼梯，翻过院墙，从发电厂旁边跑掉了。

* * *

說不定他們也在跟踪着我呢？他們拿到了一份名單。昨天的搜捕肯定是早就準備好的。他們為什麼去找佛蘭茲呢？不然的話，怎麼可能光是逮捕費席爾和卡托瑞克呢？他們倆都是護房隊隊長啊。我不禁想起在總理提名那天晚上隨着理查·許提希和佛蘭茲串酒吧的事。那時，我心里在咒罵那種愚蠢的陰謀氣氛。幾個星期使我們轉變得多厲害呵。理查·許提希。他可平安嗎？今天整天我都在設法和他聯繫。沒有聯繫上。

我來到一個荒涼的停車站，一直等到街車開動了，才跳上車。車里擠滿人。大部分人的面孔埋在報紙中。這兒在車廂里有一種不安的氣氛；每個人都忙着看國會大火的新聞。我從鄰座的肩上窺望他的報紙。

德國總統的命令

最後一段的報紙。在一個車站上，我從站台上叫喚報童過來。

“……叛國、縱火和陰謀反對政府者處死刑，限制個人自由，取消通信秘密，實行日夜隨時搜查……”

海爾黛已站在車站上。這是我事前用電話約好了的。她不安地望着我。

“你的聲音那麼奇怪。出了什麼事嗎？是佛蘭茲嗎？”

我挽住她的臂膀。

“是的，是佛蘭茲。他不得不連夜逃走。”

海爾黛抓住我的臂。她站住。

“走吧！要鎖定。不然我們會惹人注意的。”

“是呀——是呀，”她哽噎着說。“逃走——但是為什麼？”

她沉重地靠在我臂上。

“昨夜他們搜查了我們那條街。到處都一樣。他在最后一刻逃掉的，通過泰謝特的窗戶。”

她還是驚訝地望着我。我捉緊她的手。

“你可知道——他現在在哪兒呢？”

“下星期一我會見到他。”

“我能不能……就在今天……？”

“你必須理智一點，海爾黛。過些日子我會告訴你怎樣和他聯繫。我們必須小心；我們其他人可能被跟蹤。這就是我所以到這裡來的原因！”

海爾黛直望着前面好一會。

“唔……唔……”

可憐的女孩。我望着她。過去我從未這樣同她手挽手走過；她稍為比凱蒂高一點。

“對我說來，她跟凱蒂一樣。為了安全我們不得不停止跟她來往。無論如何，佛蘭茲並沒有失蹤。”

海爾黛沉默了一陣。

“對，你說得對，揚。剛才我心太亂了。”說來象是在道歉。

“沒有什麼。我會保持跟你的聯繫。我們將在這裡再見面。”

海爾黛點頭。

“你在我們那區見到我或凱蒂的時候，你必須裝作跟我們不認識。我們裝作誰也不認識誰！”

“好的，我曉得，”她安靜地說。

我們默默地走了幾步。

“原来这就是我那个好兄弟为何昨夜整夜不在家的原因！”
她突然发作说。“他直到早上才回来。他一定也有一份！”

我没有回答。可怜的女孩子，对她来说是加倍的痛苦。

“来吧，我送你上车。我们分开走。”

在车站上，海尔黛在手提包里找钱夹子。她给我五个马克。

“给佛兰兹的。他会需要的。我再也没有了。”

到这时，她已恢复过来了。

* * *

当罗塔克尔来到时，我正好回到家。

“我们必须设法跟佛兰兹取得联系，马上！”

我的胸膛上感到一阵重压。

“为什么，有什么事？”

“我刚从失业登记所来——去领我的救济金。他们会逮捕他的！”

罗塔克尔紧紧地捉住我的短外衣的衣襟。他的手在颤抖；他激动地喘气。他的眼镜满是水汽。我听不出来他的话跟佛兰兹有什么关系。我把一张椅子推给他。

“坐下，艾力希。把一切告诉我。我不怎么明白！”

他的激动也感染了我。一定有些意外的事发生。罗塔克尔无力地坐下，活象一个受了什么沉重打击失去知觉的人。他取下眼镜，用手帕揩揩，他的近视眼神神经质地震动着。

“呃，出了什么事？”我催问他。

罗塔克尔戴上眼镜，吸一口大气。

“今天该我去领救济金。我们排着长长的队，一次往前挪几步。前面的人忽然都把脑袋伸向前。都在出纳柜台那儿停住了。‘诺伊曼先生吗？’我听出出纳员高声问道……”

“你是說工人防衛隊的那個嗎？”我可以猜想到要說的是什麼。

羅塔克爾點點頭。“不錯，諾伊曼。我立刻認出他來。‘等一等，’出納員對他說，我們看到有兩個人同時跳起來。他們原先坐在一旁。其中一個跳過木欄杆；捉住諾伊曼的手臂。”羅塔克爾放低了聲音。“他甚至連自衛的時間都沒有。這事來得太突然了。”他不安地用一只手指抹着眼鏡。“之後他們夾着他走出去；兩個人都把一只手放在口袋里。”

羅塔克爾靜下來。我趕忙考慮一切。今天是星期六。在星期一以前我見不到佛蘭茲。我們將在那個區的一條街上碰頭。我們早就安排下這個地點，以防萬一有什麼事使我們分開了。我急急忙忙地思索，但想不出一點辦法來。對羅塔克爾的更詳細的敘述，我只聽進了一半。失業工人們曾熱烈地爭論過。他們搜索他已好久了；那末他為什麼還上這兒來，他既然知道他們在追捕他？他不來又怎能生活下去呢？

“你可知道佛蘭茲什麼時候去領救濟金？”

羅塔克爾想了一下。

“他的卡片打的是星期四的戳子——星期三領救濟金，”他說。

“那麼到星期三之前他不會再上那兒去了？你能肯定嗎？”

他肯定地點點頭。“敢保沒錯！”

“在星期一之前我見不着他，艾力希。那就夠時間了，是嗎？”

“是的，那就行了，揚！”

我們靜默下來。我又把問題重新考慮一次。我的女房東的吸塵器在外頭過道里嘈嘈地響起來。

“如果你能来就太好了，艾力希。他打算在他的新地区另租一間房間，作为我們的联系中心，不会被人怀疑的。那样你会知道它在那里……万一……”

罗塔克尔点点头。“好的。”

“别忘了！星期一，三点鐘。佛兰茲将站在唐金大街卡特威百貨公司前面，望着櫥窗。远远地跟着我們。我也不会跟他說話；我也只是跟着他走。全明白了嗎？”

“明白了。我会来的。”

* * *

昨天艾迪拿着一份晚报来找我。

恩斯特·台尔曼，共产党領袖

被捕！

我把报纸看了又看，一句話都說不出来。台尔曼——被捕了！

“我的天，揚！这不会是真的！你为什么不說話呀？”

艾迪說了又說，搖撼着我的肩膀。

我曾經向他保證过。保證那是个假消息。我告訴他，那只不过是納粹的花招，他們用尽一切办法来使我們惊慌失措。昨夜我才向艾迪保證过那是个假消息，今天我們却知道报纸的消息是确实的。台尔曼，党的領袖，被捕了。在夏洛登堡，在我們这个区。今天罗塔克尔已証实了这件事。他没有說出他怎样和在哪里听到更詳細的情况。他只說到他老早就曉得了台尔曼被捕的那栋房子。

同志們来找我，神情沮丧不堪。他們問的都是同样的問題。这事怎会发生的呢？难道沒給台迪^① 找个安全的地方嗎？但是

① 台迪是台尔曼的爱称。

我曉得的并不比他們多。

* * *

我慢慢地从佛兰兹身边走过，在下一个橱窗前站定。我見到他轉过头来。他已經看見我。他从人堆里挤出去，霎霎眼。我託他先走几步，然后慢慢地跟着。在街角上我俯下身来，装出要系鞋带，朝后面飞了一眼。沒問題了！罗塔克尔在我們后面。佛兰兹很快轉入一条小胡同里。我託我們之間隔得更远些；这儿人不多。佛兰兹！我可以从成千人中找出他来，那怕就是象現在这样他把背朝着我。根据他那寬肩膀和那特有的摆来摆去的姿态，我随时能認出他来。根据他的手臂的猛烈动作，一头又厚又乱的秀发，我也能認出他来。他走得象一头熊那样难看，好象在試探着每一步。那些不得和脚底下晃来晃去的甲板斗争的水手，就是那样行走的。胡扯！佛兰兹从未到过海上。我对他过去的生涯很了解。他曾經流浪过很久。特别是在战争的后几年里，那时他在許多省、鎮里做过工。常常为了取得“流动資本”好几个月找不到工作。战后的最初几个月他滞留在汉堡。之后他参加新成立的人民軍^①，帮助維持“治安和秩序”。他常常把那个时候的經歷告訴我。当时他对政治懂得个啥？那里头吃得又好，薪俸又高。当时他才十八岁。我还知道他是如何轉向政治的。那是一九二三年。他在一家工具工厂里当机械工。之后通货膨胀来临。工人們不知道他們一个礼拜的工資是否够买一磅猪油。罢工一次跟着一次。佛兰兹头一遭被捕。他已經是个工会会员，但还絕不是一个有政治覺悟的积极的工人。他被判入獄四个

① 人民軍——一九一九年由政府建立，以对付斯巴达克斯党。名字是騙人的，因为它是由人民的敌人組成的。

月。这四个月改变了佛兰兹对世界的整个看法。他的同房难友勃兰纳特，一个斯巴达克斯老战士，在这方面起了作用。佛兰兹后来念了许多书，参加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他逐渐成为一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和战士。

我吃了一惊。佛兰兹停在一所房子跟前。他装着在看门牌，然后又往前走。我在第一层楼梯的平台上跟他碰头。我们握手。他的灰色眼睛放光。

“喂，老伙计！”他说。

“罗塔克尔也来了，他应该知道这个地方；日后一定会有用的，”我匆忙地说。

“好的。”他的声音有点半惊讶的味道。“在三楼右手边，马尔克。你们都可以来。”

佛兰兹把门打开。我们走过一道楼梯。左手的一道关闭的门后一个婴孩在啼哭。另一道门半开着。那是厨房。但是没有人里头。之后我们进到一间小房里。一张矮床，一张小桌，两把椅子。透过窗户可以看见一堵结实的山墙。我们一语不发坐下来。我觉得非常丧气。我们光有坏消息。

“你看来不太好，艾力希，病了吗？”佛兰兹问。

罗塔克尔微笑。眼镜后眼底下现出黑圈。他的脸庞比以往愈发显得瘦削。

“几天来我们睡得很少；此外，全都是不好的消息，”他回答。

佛兰兹望着我。

“他们逮走了家里什么人吗——凯蒂？”

“没有，不过……”

“星期三你要去领救济金，是吗？”罗塔克尔插进来。

“是的，为什么？”佛兰兹问。

“星期六在登記所他們逮走了一個工人防衛隊隊員，”羅塔克爾帶着沉重的聲音說。

靜默。佛蘭茲沉思地絞弄着台布的角。

“只好不靠救濟金生活了，”他回答說。“我將把這件事告訴旁的人。不管怎樣，在這個區他們只是利用我。”

外頭，碗碟叮噹響，嘶嘶的水壺開了。

“現在你們必須緊密團結在一起，”佛蘭茲又開口說。“託泰謝特和施維布斯出把力；他們都是可靠的。”停了一會：“你們還必須安排領導各小組繼續工作的事；我們會遭受更多的損失。我正想到漢茲·普勒斯和艾迪。”

羅塔克爾默默地点頭。

佛蘭茲只想到黨的工作必須進行下去。他一字也未談到自己的困難。

“和斯特魯貝爾保持聯繫。你們曉得，除了泰謝特，他是我們跟工廠的唯一聯繫。”

斯特魯貝爾。我轉眼望着窗外的牆。

“斯特魯貝爾已不在木屋區了，”羅塔克爾慢慢地說，似乎在估量每個字的輕重。

“斯特魯貝爾不在……他被捕了嗎？”

羅塔克爾把手重重地支在桌上。“他也許比這還糟。他也得逃開。我們只好把他藏在同志家里；他的老婆和男孩躲到別人家里。”

“怎么搞的呢？警察嗎？”

“不。沖鋒隊。他們顯然想好好收拾他一下。你曉得的，過去幾個星期來他們朝木屋區安插了二十名沖鋒隊員。被人知道是共產黨員的同志稍微動一動都要受到監視。”

“唔。那……”

“他們是在大火那天晚上來的，大約跟上你那儿去的时间一樣。斯特魯貝爾驚醒起來。槍聲大作。他見到黑壓壓一群人向木屋區走來；他們踢倒他的柵欄。他叫醒他的老婆，從床上抱起孩子。只穿着睡衣，他們爬過鄰舍的鐵絲網，就躲在人家的土廁所里。”

佛蘭茲雙手捧著頭，望著桌子。

“他們坐在那兒，冷得發抖。斯特魯貝爾把孩子放在膝上；靜悄悄地哄著他。兩碼外，衝鋒隊打着電棒在屋裡屋外搜尋他。由於沒有找到他而發怒了，他們把一切到手的東西打個粉碎。在屋裡牆上有二十多個槍彈孔。”

敲門聲。一個身高、好看的女人捧進來一茶盤咖啡。她朝我們點點頭。

“喝點咖啡吧，”她友好地說。

佛蘭茲接過茶盤。“謝謝您，愛迪特。”

那個婦女才走出去，我隨即輕輕地說：“不只是那樣……理查·許提希被逮起來了！”

佛蘭茲正在攪拌著咖啡，忽然把茶匙扔掉。他緊閉上雙唇，越過我們往前看。房裡的沉默咄咄逼人。

接著，羅塔克爾說：“他們在‘攻擊報’上寫道，‘夏洛登堡的恐怖分子被捕。’”

佛蘭茲還是不說話。

“他們將把他卷進邁科斯基事件中。他們早就認定他應對二月十七日與黨衛軍格鬥的事負責。一個黨衛軍于次日因槍傷而身故。我們的人自然是沒有槍械的。衝突發生在我們的人和黨衛軍之間。衝鋒隊過來並且立即開槍。他們跟往常一樣是有

武装的。”

我的思潮轉向保尔·舒耳次。他年仅二十岁。当我跟他解釋他的难题时，他是如何慣于用感激的眼光看我呵。几星期前三十三支队在大街上用刀子刺杀他。

佛兰茲站起来，望着窗外的牆壁。

我的朋友奥图·格呂內堡。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早晨，当我们离开“国际劳动者互助社”半夜里的一次会议的时候。大約是两点鐘光景。“我收到三十三支队更多的恫吓信，”他告訴我。“当我沒有枪的时候，我怎能保卫自己呢？”我要送他到家，但是他不答应。“你住在另一个地方，揚，”他說。“这两个同志跟我同路。”

半小时后，奥图·格呂內堡滿身枪彈。因为他的头发，被人叫作胡蘿卜汉因的三十三支队突击队长，在奥图住的地方的每个街角都布上了人。他們让他一直走到光亮的人行横道的中央，然后四下里一齐放枪。身中七彈，奥图还能掙扎到家門口，然后倒下来，死去。他是我們最优秀、最英勇的同志之一。夏洛登堡紅色青年陣綫的領袖。六万名柏林工人参加了他的殯礼。

佛兰茲轉过身来。

“你們在哪里印那些关于国会大火の傳单？”

“在‘現成貨’那里，和往常一样。”

佛兰茲踱来踱去。

“你們現在都处于最大的危險之中。我們在这儿有几处复印的安全地方，有时你們可以利用一个。”

“那样很好，”罗塔克尔說。

“那末我将和揚安排这件事，你曉得，艾力希，只許你們中的一个人上这里来。这就是紀律。最可靠的同志不該让他知道

任何和他工作无关的事情。”

罗塔克尔点点头。

“再一件事，”佛兰兹说，“你们全都必须找个可以睡上几晚上的地方，以备一旦之需。那个地方，如果你必须消失踪迹时，可以隐藏起来。”他朝我点头。“因为我们的工作关系，我可以在这里给你安排个地方。你必须事先在那个地区呆上一两个晚上，以免引起怀疑。”

罗塔克尔走了。我把海尔黛的五个马克交给佛兰兹。他很高兴。他说出一个我可以告诉她会面的地点。

我绕着道回家。在一家报馆分店外面围上了一群人。我挤进去。登着议会选举最后结果的晚报刚摆出来。看过了的便站到一旁走开了。没有人发表议论。读报的人的脸上毫无表情。新政府封上了他们的嘴巴，给他们戴上面具。在过去选举的时候，他们在这儿是多么兴奋呵！

我慢慢地走着。纳粹已开始了前所未闻的对舆论的压制。好多个星期来他们一直在使用一切的国家的力量来为他们宣传。可是劳工党派还得到一千一百万张选票。甚至自称为“凶猛的燃烧弹”的五百万人也投了共产党的票。就这样他们都贡献出作为真正的燃烧弹的本色。

一条条的街不时引起了我的注意。黑、白、红三色的旗和卐字旗并排悬挂着。在旁的街道上，旗子不多。唯有饭馆全无例外地挂上了旗。许多其他买卖家也挂上了。表示“忠诚”的竞赛已经开始了。

*

*

*

我们经常在那里会面的凡尔纳酒吧，已被警局封闭了。但是今天冲锋队过来，用黑漆涂掉我们写在建筑工地木栅上、发电

厂附近的牆上的標語，艾迪在孤立的山牆上用紅漆寫的標語也被抹掉。他們甚至不惜氣力把我們的殘缺招貼傳單刮掉。

次日，就邁科斯基事件進行了新的逮捕。一種陰郁的沮喪情緒影響了我們大家。他們還會逮捕誰？下一個會是誰？突然而來的互不信任和猜疑，加重了我們的煩惱。現在我只跟我認識多年的同志談話，即使是這樣，也只是含沙射影地談。連羅塔克爾也認為這些逮捕不是隨便亂來的。頭一批被捕的人必定供出了一些名字，或者是在我們的街上必然有幾個奸細。我們很難以第三者的身份來看問題。幾乎每天都有新逮捕，而全都是秘密審訊。我們只得暫時停止一切宣傳活動，只保持着我們自己之間的聯繫。

我們的瓦爾街已變得不成樣了。再沒有人站到門外來談天了。天剛交黑，街上就空蕩蕩的。人們要是三兩成羣地走，立刻會使他們自己遭受猜疑。

兩天後，衝鋒隊三十三突擊隊自行駐扎到瓦爾街附近來。他們占領了夏洛登堡“人民之家”。這棟房子離我們的房子不過百碼開外，是魯西寧大街上第四棟建築物。羅塔克爾警告我別打那兒經過。好象有一塊無形的牌子突然挂在那條街上：“注意！禁區。”行人都避開魯西寧大街。每到黃昏，附近的房子好象都是空的。幾乎看不見一點燈光。衝鋒隊盤查過路人，他們就得說出他們是住在那兒的。但是無論如何明早我準備闖過去。一個人的日常職業定必可以使得在大白天里走得過去的。

我慢慢地轉出瓦爾街的拐角。對過發電廠的機器嗡嗡響着。在佛蘭茲·桑德爾家的外面看不見一個人。幾個小孩在人行道上嬉戲。凱蒂！一個美麗的日子；陽光燦爛。幾星期內，我們將能夠到外面去，可以安全地會面、談心。當然，凱蒂已經通

知我，虽然她一直在留心察看，到如今她还沒有发现任何被監視的痕迹。在河边上玩上一天会給我們許多新的机会。沒有人会在—群穿游泳衣的人当中辨别出一个党的工作人員在开会。

不一会我来到了柏林大街。它和瓦尔街、魯西宁大街交叉，交通拥挤。魯西宁大街是瓦尔街隔着柏林大街的延續。一月二十一日当冲锋队的卡車开进城来的时候，我就站在这儿街角上。和理查·許提希、佛兰茲—道。理查被捕了；佛兰茲逃走了。我們的街变了。在我看来，从那时到现在好象过了好多年似的。

我小心地四面环顧，慢慢地跨过去，沿着魯西宁大街走着。走了几步。那儿，在街对过，是“人民之家”。—道冲锋队的双崗哨站在寬大的大門前。他們的帽帶扣在顎下。

左手边，我的前面，是一家香烟店。

“来—包天后牌，”我說。

我装作在看櫥窗，但我迅速地向路对面看了一眼。房子前面停着—长列的汽車和摩托車。鏤和油漆在阳光下閃閃发亮。—切是嶄新的。現在他們已經掌握了国家基金。从入口处可以看到—部分院子。那里也停有車輛。隔壁，左手边，是一家合作社商店。見不着—个主顧。我笨拙地点着香烟。

那座灰色大厦的长排窗戶都关闭上。有几个窗戶前挂上厚帷幕。那边，在二楼，原是社会民主党青年組織的办公室。人們經常可以看到墙上的紅字。那些現在全不見了。—輛大轎車开过来。—面用結实鉄紗鑲起来的虎尾团旗牢牢地装在水箱的鏤蓋上。—个滿身勳章的穿制服的人跳出来。冲锋队哨兵拼攏后跟，立正站着。

我走出香烟店。在門外我不安地抽着烟。如果他們盘查我呢？胡鬧。現在还只看到哨兵。“人民之家”座落在街角上，在—

条短短的死胡同的那一头。区健康保險委员会的房間在大樓的底下一层，不然的話，整栋房子只有社会民主党的同志住了。大樓左面正对着小胡同的山墙上的标語，已被冲鋒队涂掉了。

我慢慢地走着。夏洛登堡“人民之家”——冲鋒队的营房！“这个馬克思主义者的猪窩将首先清除掉，”納粹党人常常說。他們把它更名为迈科斯基大厦。院子里带栏栅的地窖据說已經关滿了犯人。“人民之家”在它的一生里目睹了多少变化呵！远在战前在这里举行社会民主党的集会。在一九一八年，归来的軍隊駐扎在那里。在革命的日子里，共和国的人民自卫軍的武器堆滿院子——来对付斯巴达克斯党人。

如今“人民之家”成了三十三支队的营房，“杀人的突击队”的营房。

“人民之家”——迈科斯基营房！

現在我們的生命全都受到威胁！

* * *

今天罗塔克尔險些儿被捕。

“也許你要把这个記下来吧，揚，”他說。他知道我把一切事件都記下来了。

罗塔克尔騎着自行車到云格弗恩海德車站。他必須去会見一个新同志，一个代替斯特魯貝尔保持我們跟西門子城木屋区的联系的人。我們把会面時間安排在西門子工厂下班的时间。在那个時間車站上到处是人。

街車一輛輛开过。它們都挤滿了乘客。“也許泰謝特在其中一輛上面，”他想道。泰謝特是西門子厂的一个鑄工。快到車站前，罗塔克尔摸摸他的內衣口袋。秩序很好。剪得参差不齐的剪报在里边。另一个人也有这样一張；它們放在一起必須是

拼得起来的。罗塔克尔再回忆一次那个同志的标帜。一頂圓頂帽，剛修过的臉，一撮小黑須，左手拿着一份“德意志群众报”。

“劳駕，你能告訴我到特格尔的小路嗎？”他会問他。

“很抱歉，我也是初到柏林的，”回答必須是这样。

罗塔克尔把自行車靠在車站的牆上，使停車場在視線內。車站上的大鐘指着差兩分鐘到約定的時刻，那個同志還未來到。電車載來不盡的人流，他們擠進車站。時鐘的長針走到時辰上了。那個同志在哪儿呢？他不可能沒有看見他的！

五分鐘過去了。還是蹤迹毫無。羅塔克爾走來走去。“再等五分鐘，不來我就走了。”他小心地往四下里張望。在對面，靠近出租汽車停車處停着兩輛車。司機們在聊天。拐角上停着一個流動報亭。報販從那小瞭望孔里往外看望。羅塔克爾不安起來，因為只有他一個人在這兒站了那麼久。在最後一輛出租汽車後頭，他突然看見一輛摩托車，兩個沖鋒隊員站着談天。他們是在裝假嗎？胡鬧！“你發現情況了。如果你有一種‘有罪的感覺’，並且設想自己被監視了的話，那你就犯下第一個錯誤。如果你的行動和平常不一樣的話，那你肯定會引起警察的注意——這是老生常談了。”

十分鐘過去了。羅塔克爾把自行車推到小溝里，騎走了。他忐忑不安。那個同志不守約。在這樣的時候，一個人還能容忍這樣的粗心大意！那他不是死就是被捕；沒有別的理由可說的。他甘心樂意把自己的心交給他，除非有什麼真正重要事情耽誤了他。他向左拐，越過鐵路基，折入一條靜靜的小街。在下一個人行橫道上，他聽到身後的馬達響聲。坐着兩名沖鋒隊的摩托車馳過。司機突然把車慢下來，輪子在瀝青路上滑動。車子橫轉，然後橫停在街上。這樣說來，他並沒有想錯！坐在後座

的人跳下来。

“站住！”他喊叫。

另一个把车子开到一旁。他身高肩阔，坐在后面的那个身矮，年纪很轻。罗塔克尔镇静地看着他俩。他们的闪亮的衣襟上缀着金光闪闪的“三十三”字样。“该死！‘我们的’突击队。但愿他们不认得我。”

“搜身！”高个子命令道。

“举起手来！”年轻的咆哮道。

罗塔克尔把自行车放倒街上，举起手来。街上除了前头不远有一个男人和一个挽着他的膀子的女人外，杳无一人。他们不安地往回偷看。“在这儿我只得听任他们摆布了，”罗塔克尔想道。

那个年轻的冲锋队员开始搜他外面的口袋。当他搜到后面的裤袋时，猛地缩回去。

“口袋里的是什么？”

“一个装钥匙的皮夹子！”

“你自己拿出来！”

英雄！它可能是一个打开了保险机的手枪。他把皮夹子掏出来，拉开拉鍊。

“瞧吧！”

“不许开口！”冲锋队喊。

“你有身份证吗？”

“有的。我的兵役证。”

那两个人交换目光。

“你到过前线吗？”

“到过。”

“这你可未料到吧，”他想道。

“把它們交出来！”

罗塔克尔掏出另一个皮夹子，把所要的証明拣出来。冲锋队轉过身去，就着街灯光看。罗塔克尔看到那个高个子用肘撞撞那个年輕的。

“你受过伤嗎？”

“是的。三次呢，一次重伤。”

高个子把証明交还他。停了一会。

“那末，你在車站上等誰呀？”

“等一个老伙計。是西門子厂的。他答应給我想法子找个工作。”

两个人又互看了一眼。高个子点点头。

“不要紧。如今事情就是这个样，所以无辜的人得准备碰到这些事。”他耸耸肩。“无论如何，我們只是执行任务罢了！”

“希特勒万岁！”

“希特勒万岁！”

* * *

次日。斯特魯貝尔来到我的住处。他不停地把垂到臉上的头发攏回去，攏得比往常更勤了。

“罗塔克尔全都跟你說过了嗎？”

“說了。”

斯特魯貝尔靜默了好一会儿，把头靠手上。几絡黑发垂到前面来。它們常常盖过眼眉。难道他从不用梳子的嗎？我等待着，看看他就知道他想說話，正在跟自己斗争着。

“天很快就黑下来了。我要到木屋区去；我們必須保持跟那里的联系。”字句艰难地从他的唇間吐出来。“爱迪特和孩子也

需要衣服。打字机和复印机都还在那里。你来嗎？”

冲锋队在木屋区驻有一个“警备团”。两个星期前他才侥幸逃掉他們的枪子。现在他又要……简直是疯了！

“告訴我們另一个同志的名字。我們將設法和他取得联系。明天你可以收到衣服。以后我們會弄回那些机器。是我們，不是你，斯特魯貝尔！”

斯特魯貝尔摇摇头。他用手指反复攏着头发。說了又說。有一陣子他后悔“放弃了他的崗位”。在若干年后……木屋区的人們对他会怎样看呢？也許他的情况特殊一些嗎？任何其他同志会留下来的。不管怎样，他必須繼續負責那儿的工作。是的，不錯。至于那些机器，他已經叫一个住戶藏起来。一个矮个儿的跛子。他在那边被認為是个无用的傻瓜。他过去从未跟他发生什么关系。他要去找他；他住在森林的边緣。但是他只把东西交給斯特魯貝尔本人；不相信任何人。

我再次想劝阻他。他的行为違反了地下工作的首要規則。我甚至威胁說要报告他不守紀律。

斯特魯貝尔立起来。

“我去了。”他打断我的話說。

我犹豫起来。我能託他独自去嗎？我所講的也都适用于我自己。我是一个党的干部，不允許冒失从事。但是他会以为我是个胆小鬼。我从衣架上拿下帽子来。

……我們穿过一条泥濘的田徑。每走一步，我們的脚都陷下去。我們保持十碼的間隔。斯特魯貝尔常常停下来聆听。我們来到林子里。我发现在这些树和矮树丛中很难看到他。斯特魯貝尔突然扑倒地上。我也伏倒在一丛黑莓子树后。两个冲锋队騎着自行車經過林子的边緣。步枪斜挂在他們的肩上。

“……然后，一下子，她……”

現在他們已經過去；只聽到他們的笑聲傳回來。

然後我們來到殘舊的柵欄圍起來的小路。低矮的、盒子似的木屋座落在柵欄後。斯特魯貝爾四下環顧，走了幾大步。一道門的絞搭吱吱響。

煤油燈在桌面上投下一輪黃光，使得房間余下部分顯得半黑半暗。屋裡有一股子糞肥味和酸味。那個遲鈍的跛子坐在我對面。他的頭深藏在兩肩之間；雙耳聳立象兩扇大門。他的手放在桌上。它們出奇地長。手背上毛茸茸的。

“全在這兒了，”他說。“我等了有兩天了。”

他生就一付孩子般的尖細嗓音。

“昨天我們要見木屋區的一個人，但是他沒有來，”斯特魯貝爾說。

“誰？”

“鄧克。”

“三天前被抓走了。”

靜默。

“是衝鋒隊……？”

“還在施溫克。二十人。那個爛臭貨陪着他們逐屋查。他們抓走了艾伯爾。兩天後他轉回來。打得遍體傷痕。同志們說，他們把他留在这儿做餌子。要看看誰跟他有關係。

“還有什麼？”

“未發現什麼特殊情況。他們到处在追查你。”

外頭腳步響。狹小的窗戶是半開的。我們側耳細聽。我們什麼也看不出來，只見到是三個人。他們走過去了。跛子在一個屋角里摸索。轉回桌子來。

“捐給你的。”

在斯特魯貝爾面前擺着一張廿馬克的鈔票。他遲疑地拿起來，想說些什麼——車頭燈的眩目光突然洒滿了房間——又消逝了。屋外一輛摩托車嘈鬧地駛過。

“在木屋區沒有人有摩托車，”跛子說。

沖鋒隊！

“目下你能和我們聯繫嗎？”

“行。”

我說出一個地方，約好時間。

“現在，走吧！”

我們挨個繞着木屋走，然後站在牲口圍里。母雞蹲在長竿上，啄着毛。我們的電棒的光驚動了一頭山羊。她瞪着我們，輕聲地吡叫，她底腹大的奶房前後擺動。跛子打開一個破箱子。內中盛着半箱子的黃色飼料玉米。他把手插進去，拿出兩個大口袋：打字機和復印機。我們把它們塞進背包里，衣服放在上面。

我們回來經過醋栗樹叢，經過矮小的廁所，最後來到柵欄跟前。那後面就是林子。跛子把柵欄的鐵絲撐起來。

* * *

兩星期後，斯特魯貝爾和妻子遷居到克尼希斯符斯特豪森區。他在一個農民家裏找到工作。他在我們區找不到任何工作。

國會大火後頭幾個星期裏，我們和黨中央失去聯繫。整個組織好象已經四分五裂。此外，一股恐怖和逮捕的浪潮特別集中在我們區。我們不能就國會大火的事出報紙，只能散傳單。由於得不到上級的指示和情報，我們只能把最可靠的同志團結在一起。通過斯特魯貝爾的木屋區和秦謝特，我們還能保持和兩

个工厂的联系。

但是一个星期前我們区成立了党委会。我們第一次得到報紙和中央机关报“紅旗报”。佛兰茲提出在他那区印下一期我們自己的報紙的建議，得到我們党委会的批准，对我們邻区是特別危險的。今天我們的新党委甚至問我們，能不能找到一个可靠的同志，騎摩托車給外省送材料去。恩斯特·施維布斯用摩托車代替三輪貨車給他的公司送急貨。但是由于他的工作，他不在考慮之列。艾迪成嗎？罗塔克尔建議說，他虽然沒有執照，但是开得很好。他有一次跟他一起去开摩托車。那不是艾迪的車子；天曉得他从那儿弄来的。艾迪就是艾迪。

我在下午跟艾迪碰头。他遵照罗塔克尔的劝告；穿上他的星期天的衣服，一套藍色衣服和一頂軟帽。玻璃眼也装上了。他爽快地握手。

“那个艾力希真会找麻煩。我不得不穿上全套星期日的服装。”

我禁不住大笑起来。“怎么，你看来是最高貴的人。”

“我也有这种感觉，揚，”他保證說。

我們走向一条两旁綠树成行的街道。

“这是那一路貨色？”

艾迪轉过头来，直到他的右眼望着我。他看来很兴奋；显然是对騎摩托車一事感到高兴。

“他們沒有說。那个地方是在五十哩开外；你至晚要在三个小时內回来。”

他拉长嘴巴，搖頭。

“它至少是一部五百立方厘米的。”他笑着說。“三个钟头——如果輪胎爆了呢？”五百立方厘米。我还不太明白。我扯

扯他的手臂。

“你是个细心的司机吗？这不是兜风玩的呀。你会带着一批危险货色呢，老伙计。”

“哟，你真个是疯了。你早就认识我的呀。”艾迪谴责地摇摇头。“我开得不细心吗？在军队里我当过一年多的摩托车驾驶员。”

不错，他还是个机械士呢。但是当他每次找到工作时，总是干不长的。由于眼睛的关系，他再不能做出任何合乎标准的细巧工作来。

我们慢慢地往回走。

“我要告诉你——库尔格耳在我那儿。”

“唔，那么……？”

库尔格耳是红色退伍军人团^①的一个同志，他跟我们联系。

“他要见佛兰兹。他怎么会不晓得佛兰兹在哪儿呢？”

“谁都不该知道；你也不该知道。安排我跟库尔格耳见面，然后把会面地点告诉我。”

“好的，”艾迪说，停了一会，“他还问到我们可知道达梅默尔特的消息？”

“没有确切消息。他大概是在迈科斯基大厦里。”

达梅尔特是在两周前被捕的——我们相信是与迈科斯基事件有关。

我们默默地走了一会。艾迪突然暗笑起来。我疑问地望着他。

“库尔格尔，他告诉我一个故事。吹笛手鲁迪——不过你也

^① 红色退伍军人团是革命工人的群众性军事组织。

認得他，是嗎？”

我点点头。他也是紅色退伍軍人团的。过去在軍乐队里吹笛子。

“他不是跟其他同志一道被派參加鋼盔团青年組織，好不让人曉得他的身份嗎？”

“就是那样。呃，大約在一周前，他和一个鋼盔团的家伙一道从新兵酒吧回家。他們都穿着藍衬衣，臂上纏着卍字臂章。一路上那个家伙嘮嘮叨叨地教訓魯迪。問他愿不愿逮住一个真正的有血有肉的共产党人。他会让他吃苦头。他会打掉他的脑袋，他会，諸如此类的談話。他說來說去沒个完。魯迪开始生气了。一下子他发作了，給那个‘同志’好一頓排头。他結实地教訓了他一頓。”

艾迪捧着腰呵呵大笑。

“你以为那样做聪明嗎？”

艾迪是个好同志，但他就是那种脾气。而且在同样情况下他自己也会那样行动的。我还剛好安排了和他一道坐摩托車呢！我能負得起这个責任嗎？

“那当然是胡来，”他回答。“他被捕，这是唯一可以預料得到的。”

他有节拍地叩打着胸膛。“不过我体会到那个小伙子的心情。我自己也会发怒的！”

他住了口，沉思地搖頭。

“我甚至不能向那血腥的旗子行礼，”他又說起来了。“当我看到队伍打着旗走过来时，我就跑进屋里去。”

我看看他。連那只玻璃眼都好象在表达出他的厌恶神情。

不久前頒布过一道命令，游行队伍打着的卍字旗，所有“人

民的同志”^①見到了都得敬禮，不然就当馬克思主义分子办。

“有一天我来不及进到房屋里，”艾迪繼續說，“于是我把背轉过去对着他們！”

“你真是瘋了！你真想在老虎头上打蒼蠅嗎？”

“別忙。你以为我真想被他們逮住，是嗎？我不过是轉过身来，就是这样。”

現在輪到我大笑了。

“怎么啦？怎么啦？”艾迪追問。

“你想他們会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嗎？”

“我知道；那对我來說已足够了，”艾迪帶着委屈的口气說。

* * *

近几星期来流傳着許多关于迈科斯基大厦的謠言。有的說被捕的同志受到严刑拷打。但是我們从来听不到詳細情况。甚至不能肯定哪些被捕的同志在那里。

不过昨天我跟X談話了。他曾請求恩斯特·施維布斯安排和我見面。我曾經考虑了一个时期是否應該見他，但最后終于去了。施維布斯向我保證說，他的印象是X是可靠的。X原是我們的一个群众組織成員之一。在三月五日的議會选举后，我們看見他穿着冲鋒队制服到处走。于是我們避开了他，并且警告所有其他同志。

他昨天告訴我，他是被他的老板逼迫着参加冲鋒队的，他的上司对他說往后只能雇用冲鋒队的人。X是个面包师傅。他在这家面包房已工作了好多年，而且觉得他不能拖累家庭。他的老婆有病，他还有两个孩子。

^① “人民的同志”，是納粹头子們騙人的对人民的称呼。

“我不在三十三支队，只是虎尾团的，”他解釋說。（他还在他的褐衫上帶上不同的突击队番号，为了証实他的話他把他的冲锋队的証件拿給我看。）“我是冲锋队的后备队，已經过了三十五岁。我不常去迈科斯基营房，但是那天晚上他們命令我到那里去。我去接替原来的出納員。”X停下来。我不催促他，因为很明显，他說得很費勁。“我們坐下来；許多人在玩紙牌，少数几个人在看报。突然之間門戶大开。

“‘队长，’有人叫。

“于是所有人都跳起来。几个三十三支队的人和他一道进来，夹着两个老百姓。一个冲锋队喊道，‘左面的是卡尔，紅色退伍軍人团的笛手。’我看到被捕的人中有一个抽动嘴唇。”說到这儿X說不下去了。他自己也在不安地抽动着。

他又說：“所有的人都挤到房子中心去。队长坐在一張桌子上，把他的长統靴踩在椅子上。‘現在我們来好好談一下吧，’他对那个他們叫他做卡尔的說。一个黑头发的小伙子。他接着指着其他一个人。

“‘耻他站到角落去。我們剛逮住他，就在前門外。他可以看看我們的事：用不着給他穿几条干褲子。同时他就会忘了到处打探的习惯了。’

“冲锋队员全笑起来了。那个人，生得又矮又胖，可怜地发抖。他有一頂硬的圓呢帽，拿在手里轉来轉去。看来他很快就要哭出来了。

“‘队长先生……先生……我只要回家……我……’他喃喃地說。

“‘住口！’队长大声喊。

“一个冲锋队把那个胖小子推到一旁。然后他們又来对付

那个黑发的汉子。队长喊道：‘你是那些杀死我们汉内的胆小凶手之一——你是红匪俱乐部的人！拿点精神出来；把名字说出来。’后者安定地回答：‘库尔格耳。’然后他说：‘不错我参加过红色退伍军人团，但我跟迈科斯基事件无关。当时我根本就不在柏林。’”

（听到那个名字我大吃一惊，但压抑自己不耻半点流露出来。又不需要知道我认识库尔格耳。我们早就晓得库尔格耳被捕了。在我们那次谈话之后艾迪一直没有跟他联系上。另一个住户告诉他半夜里冲锋队来把库尔格耳抓走了。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逮捕的原因对我们还是个谜。）

“听到迈科斯基的名字，所有的冲锋队都逼近他来。但是队长直接走到他面前。

“‘桑德尔在哪里？弗兰兹·桑德尔？’他突然问道。”

（原来他们为了弗兰兹而逮他的。我掩盖了我的激动。）

“库尔格耳望着他，但一语不发。队长威胁他说：‘你回答不回答？还是要我们来帮你忙？’库尔格耳的唯一回答是：‘我不认识什么弗兰兹·桑德尔。’但是现在完全是另一种调子，一种含糊的声音。我可以看得出来，很快他就要下决心了。队长的脸怒得通红。他举起手来，向库尔格耳的脸上打了一拳。鲜血从他的鼻孔大滴往下滴，流到他的衬衣上。

“队长完全失去控制了：‘你不认识那一个桑德尔？你撒谎，你这个狗……’”

“‘不认识！’库尔格耳再说一遍。

“‘他真有种，’我身后有一个人悄声地说。

“‘把达梅尔特从地窖里带来！’队长命令。”

（听到这儿我打断X的话：“你确实听清楚了吗——达梅尔

特?”)

“不錯。达梅尔特!”

(原来是达梅尔特供出了他! 而两天前这个庫尔格耳还向艾迪打听他是否知道达梅尔特在哪儿呢。)

“两个冲锋队员跑出去。队长冲动地走来走去。随后冲锋队员带着达梅尔特回来。他们半拖半拉地拖他进来。他的样子怕人得很。他的整个脸肿起来，上面全是干血疤。衣服上满是土，撕裂了。队长喊道：‘让他们面对面!’ 他们把达梅尔特拖到房中间来。队长站在他俩面前。他打了达梅尔特下颚一拳。‘赫! 醒来! 这儿站着的是庫尔格耳吗? 桑德尔的助手吗?’ 他问。”

“达梅尔特费劲地抬起头来。他的眼光好象在说：‘原谅我——我受不了啦。’ 达梅尔特忧心地点点头。队长呵呵大笑。‘那剂药好象是对他有好处，是吗?’ 他转向庫尔格耳。‘你还不回答吗，你这个蠢猪? 说出来。桑德尔躲在哪里?’”

(X问我认得桑德尔吗? 我当然说不认识。)

“‘是的，我认识桑德尔，但是不晓得他在什么地方，’ 庫尔格耳蔑视地说。他很明白，要是有一次装作不认识他，他们以后再不会信他的话了。队长在庫尔格耳眼前乱挥拳头，简直是气疯了。其他的冲锋队也激动起来。‘让他尝尝吧——用皮带揍他，’ 有几个人喊。‘他妈的! 那小子真有胆量，’ 我身后一个人说。他长得很高，有一付浓浓的眉毛。他们叫他‘电灯柱’。但是庫尔格耳只望着前面。血还淌着。”

“队长说：‘那么你认识他了，但是你还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吗?’ 他慢慢地解开手枪套，把手枪拉出来。他把保险机扳开，把枪对准庫尔格耳。他向他大声喊：‘只给你两分钟去想想!’”

“庫尔格尔一动不动地站着，一言不发。”

(我不得不咬紧牙关以免让X发现我认识所有这些同志。庫尔格耳——他真是不知道佛兰兹在哪里。)

“把他拉到墙跟前去站住!”队长咆哮說。

“他們把庫尔格耳拖轉过去。他很鎮定地站在那里,望着牆壁。队长开了两枪。墙灰崩落。我和其他冲锋队员不得不退后站。他胡乱开枪。他們又把庫尔格耳拖轉身来。队长对他大叫大喊:‘你还不回心轉意嗎?不然的話,你会后悔的!桑德尔藏在哪里?’庫尔格耳只是正眼望着他的臉。队长把我身后的人叫出来,‘把生牛皮条拿来,“电灯柱”。’

“‘你已准备好快乐一番了嗎?’然后他問道。其他人听了大笑起来。

“但是那个冲锋队‘电灯柱’沒有笑。他說,‘最好让他们自己作对吧。’队长贊成他的意見。

“我相信‘电灯柱’不想动手打他們,”X說。“他就是不想动手。在他們当中有少数人不喜欢折磨那些有勇气的犯人的差使。

“两个冲锋队拿着結实的生皮鞭过来。达梅尔特被按倒凳子上,他的衬衣拉上头。他的背上滿是皮开肉綻的鞭痕。队长遞給庫尔格耳一根皮鞭說:‘那么你不肯說了?这里,你可以对付你的“同志”。直到你改变主意为止!’他向他揚揚拳头。”

X从椅子上站起来,做了一个握拳头的手势。

“‘要是你不打他,那就該你挨打了。动手吧!’”他接着說。“他們把庫尔格耳推到凳子跟前。他站着——一动不动。

“房間一下子靜下来。

“队长走向他跟前。‘怎么啦?’

“而我,”X說,“我一直在担心,生怕別人一定会听到我的心

跳得多响。但是庫尔格耳纹风不动。所有的人在一片死寂中看着。达梅尔特呻吟一声打破了沉默。‘打我吧……你一定得打我……’庫尔格耳把头垂到胸前。然后他突然跳轉身来，把皮鞭扔在队长脚下。接着他們抓住他，把他捺倒凳子上。队长开始揍他。庫尔格耳喊得那么响，以致我不得不咬着舌头以防发出声音来。然后从他的唇間傳來喋喋声，于是一动不动，昏过去了……”

我們好一会儿坐着一言不发。X然后恳求我不要利用他对我所說的一切；他害怕会因此吃大苦头。他拒絕經常跟我們接触。他只不过是冲鋒队的后备队员，沒有多少机会听到很多事情。但是我終于說服他同意不定期地向香水公司的施維布斯汇报。

我知道要是納粹拿到我所写的东西时我会出什么事。上星期我一个字也沒有写下来。我甚至几乎要把它全部烧掉。障碍似乎是太大了。我曾试图找到另一間写作用的房間。但是那只能是在同志的家里。但是他們也担任了跟我一样多的非法工作。夜間很可能在他們家里来一次突击搜查，因此他們必然会牵涉到我。

我收藏手稿的地方也不是保险的。但是上个星期当我沒有写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还是一点都放不下心来。在我心上好似有一个重重的压力在迫使我繼續写下去。我必須把这一切全写下来！我們必須設法把这份手稿弄到国外去。我們必須設法喚醒人类的良心。

* * *

昨天我在新区里見到佛兰茲，并且立即把X的报告告訴他。他靜靜地听着。

然后他領我去見晚上和我同住的同志。我們要在清晨里會面，印我們的報紙。

昨天我想起了打電話到凱蒂的辦公室去找她。在這個區我敢想法和她見面嗎？我覺得分別了這樣久之後必須見見她。她一直不斷地通知我說，她沒有發現有被釘梢的絲毫痕迹。但是我敢叫她來嗎？到這間成為我的政治工作活動基地的寓所來嗎？我猶豫了很長時間，找出了一連串似是而非的理由：只一次可以敢保沒有問題；她說她沒有發現一點被監視的痕迹。但是我在政治上的顧慮不允許它們通過。但是我今天終於打了電話給她。

我沿着街道漫無目的地走着。天氣暖和，太陽從一排排房屋的窗戶上反照過來。白晝長了。唐金大街上行人照樣擁擠。女人們穿上了新的春裝。飯店里顧客如雲，其中不少是黨衛軍的軍官。玻璃窗後貼着招貼：

德意志商店！

德國貨：完全德國製造！

希特勒的照片鑲在厚厚地塗上金粉或銀粉的相框里，有的還圍上綠花環，掛在招貼的上頭。許多店主為了對付“大眾的競爭”，他們的招貼特別大：

老牌國社黨商店從……

在一個窗戶里，希特勒交叉雙臂，呆呆地望着圍着他的珍貴的花朵。在他後面，一個大玻璃缸，里面浮沉着熱帶魚和金魚，在紅色燈光下閃耀着。這家鋪子在它的招貼上還聲稱它的鮮花和魚一貫都是忠於德意志的。

凱蒂已在咖啡店里。她的臉上容光煥發。她因喜悅而臉紅。

“給你留座真不容易。”她這只是为了找話說。我自己也只能說句通常見面的話。我們互相不見面這樣久，現在反倒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我只是握着她的手。女招待戴着白小帽跑來跑去。我感到心滿意足。只要我們的時光不是那麼短促就好了！一個報童穿過一張張桌子。

“報紙”。

关于文取人員的新法令

我忍不住開始讀起報來。甚至放下了凱蒂的手。

“新政权在施舍差事呢，”我評論說。

我們離開。凱蒂挽着我的臂膀。她穿着一身鮮色春裝，圍着一條彩色三角頭巾。我很高興。

“走路當心點，揚。我們老撞着旁人呢。”

“今天是沒有法子的了——我幾乎不認識你了。”

“我們上哪里去呀，說真的？”

“等着瞧。”

我們默默地走了一會。我轉入一條小胡同。

“揚？”

我驚起來。我的災星又回來了。胡扯！我們沒有被釘梢。我曾經留心觀察過，特別是最後幾分鐘。

階級寬闊但破爛不堪。灰漿大塊地剝落。這兒有股炒洋蔥的味道。在每一層樓上過道的四道門形成個半圓形。我擦擦鈴。拉姆普累赫特同志，一個矮矮的黑婦人開門。

“我們來了。”

“快进来，”她和善地说，敞开了大门。

我們走下那在古老的柏林房屋里常見的长长的走廊。在起居室的敞开的門檻上站着她的小女孩，灯光明亮地洒落在她的秀发上。

“卡尔叔叔——卡尔叔叔。”

“这是我在这儿用的名字，”我悄声向凱蒂說。

拉姆普累赫特一家人正在吃晚飯。男的坐在桌边，穿着一件藍方格衬衣，袖子高高卷起。他长得身高体壮，看上去很年輕。我們握握手。

“这是凱蒂。”

“庫尔特—艾尔娜，”他們回答。艾尔娜有一双軟而无力的手。

“今天我出外洗衣服了，”她說。

“我去拉煤了，”庫尔特笑着說，“所以我也有不少可洗的。”

我們坐下。

“你可愿意同我們一道喝杯咖啡嗎？”

“不啦，謝謝您，真的不用了。”

小女孩站在媽媽身旁，但是望着凱蒂。

“你叫什么名字呀？”凱蒂問。

她含羞地走近前來。凱蒂把她抱在膝上。

我們希望我們自己將來有一栋房。一間象这样欢乐的房間，我們可以在那里面吃飯。

“有什么消息嗎，庫尔特？”

“船塢里嗎？沒有。魯迪在你來之前還在这里，他把背包和衣服拿來了。你應該准時；三點鐘。”

“沒有別的事嗎？”

“沒啦。”

“那么一切都好。多聰明的一群人，你們這一伙。”

庫爾特終於說起船塢里的事來了。他把報紙分給他所有的工友們。司機們把它們送到史普里河的駁船上。我們談了很久。我向庫爾特問這問那，但很少聽到他的回答。

“我就領你去看看我的私室，”我終於向凱蒂說。它在过道的那一頭。我拿下門栓，點着油燈。五屈櫃上有一個洗臉盆，另外還有一張小桌子和一把椅子。近門處，右手邊放着一張行軍床。床頭上圖釘按着從畫報上剪下來的褪了色的畫片。我橫倒在床中央，雙手墊在腦後。凱蒂快步走向窗口，向外探望。

“房子小了一點，不是嗎？”

凱蒂點點頭，坐在我身旁。我伸出手摟着她。她指指椅子，上面放着一件藍工作服，還有一個背包。

“你要那個干嗎？”

我雙手環抱起她的頸項，把她拖過來。她的秀髮垂在我的臉頰上，我們的呼吸混成一片。

不管我怎樣努力，但是還排除不了她不應在這間房里的想法。

* * *

街上連鬼影就沒有一個。在清晨里，懸挂在高高的鐵柱上的路燈，活象發紅的火球。我打着顫，大踏步走着。街角上停着一長列一長列的出租汽車。司機們把大衣領子翻起來；大多數向后靠着打盹。他們在等待着晚歸的乘客。在柏林的西頭有許多跳舞場和酒吧間。它們的五彩繽紛的霓虹招牌還在發亮。它們的大門都裝璜得很漂亮，有的裝上小而密的牛眼玻璃窗。外頭貼着海報：“今晚某某樂隊登台。”

佛兰茲跟魯迪和布魯諾已在街角上等着。他們都穿上藍工作服。魯迪的肩上扛着一個大的皮工具袋。其他兩人都背着背包。我們握手。

“早哇，卡爾。”

“走吧，”布魯諾說，“我們一分鐘都不能浪費掉。”

街角上站着兩個巡警。他們看着我們走開。

“要是他們曉得我們要做什么——赫！”魯迪悄悄地說。

布魯諾笑起來。他的獅子鼻大張開。佛蘭茲曾告訴我，他常常打拳，這是他得到這樣一個鼻子的原故。

魯迪走近我身旁。

“我們是比洛夫大街三號沙伊德勒公司的機械工人。我們去為一個舞台裝飾干些鎖匠活。明白嗎？”

“懂了。”

“我們這次有多少？”

“六百。”

“打掃的女工過一會兒就來。到那時我們完得了嗎？”

“一定；不難。”

沉默下來。魯迪的工具袋里傳出金屬的叮當聲。

“那邊是所妓院，”布魯諾說。

入口處吊着藍光的“西班牙玫瑰”字樣招牌。入口處左旁有一道小鐵門，邊上有一個小銅鈕——“夜”鈴。

“現在別吵了，”魯迪說。門扇在自動開關操縱下微微響了一下就打開了。我們穿過一個狹長的過道。天花板上垂下一盞暗淡的燈。再遠處有個小窗戶——敞開着。魯迪把頭伸進去。“希特勒萬歲。”房間很小。一盞有綠燈罩的燈放在寫字台上。一個胖子卷起衫袖站在洗臉盆前。他穿着一條鑲着寬寬金繩帶的黑

褲子。湊成套的那件背心，挂在一張椅子上。他拿着一條毛巾，面上有紅斑。他的鼻子上有一道淡藍印。

“希特勒万岁，”他用深沉的聲音回答。“已經回來啦？我剛收拾好。”

他用毛巾擦干他的禿腦袋，他的大肚子一動一動地。

“加了一個人，”魯迪回答。“我們要在今天干完它。”

“好，好。你知道路的，”胖子喃喃說。

我們穿過廚房。擦得晶亮的電爐灶上反照出白鐵蓋子；冰箱和碗櫃裝在牆上。我們穿過一道閃光的玻璃門，來到一間有霉煙味的長形房間。沿着牆分隔成許多小間。它們都藏在厚厚的紅絨帷幕後。有一道帷幕沒有拉攏來；它透露出兩張大安樂椅和一張矮圓桌。半根雪茄，上面有一道闊紙環，放在發亮的煙灰缸上。桌布上酒痕斑駁。再遠處是酒吧。高腳凳沿着雕刻的櫃台擺着。鍍制瓶蓋閃閃發光。一瓶瓶酒成排地反映在鏡子上。有的還放在拉菲亞樹皮做的籃子里。

“為了……！”布魯諾說，又停住了。

“走吧，到表演廳去，”魯迪催促說。“我們沒有時間浪費啦。”

房子中央有一片打擦得很光亮的跳舞地板。右邊是個高台，放着一架鋼琴和兩排椅子，椅子前面放着樂譜架。銀色漆桌子和彎柄椅子挨着牆跟前擺放。帶水晶罩的燈按在牆上。它們跟天藍色布幕相衬，顏色分外鮮明。

布魯諾把幾張桌子拼起來，在近旁的椅子上放上一幅布。

“來吧，耽我們動手裝機器吧。如果有誰來，把布蓋上去。

“那個有金總帶的胖子是這兒最後走的一個了，”魯迪說。

布魯諾透過牙縫打個唿哨。

“最後一個。我媽也常這樣說——可是我還是生下來了。”

魯迪指着近旁的小舞台。

“你要弄多响就弄多响；我們要弄出足够的机械工的嘈杂声。”

他跟布魯諾走到那边厢去。佛兰茲和我打开复印机，从背包里拿出蜡紙来。我們把蜡紙夹在紙板間，因此它們还是平滑得很。小伙子們胆子都不小，因为如果我們被发现了，每个人都会被判苦役多年的。

佛兰茲用油墨筒在鉄紗网上打墨。然后我們用图釘把蜡紙紧紧地紮在印机上。

“你从边上放下来，卡尔。我橫着滾过去。看着，象这样，”佛兰茲說。“那是最快的方法。”

他把一張紙放正；橡胶轆滾过去。他記名字的記憶力多强呀！我在这里被喊作“卡尔”似乎是很自然的。

“必須是不間断的工作。紙放好，紙拿走，紙放好，紙拿走。”

我們审查第一張紙。“紅旗报”。

“油墨多了一点，它滲了，”我指出。

“下一張就会……”話被其他两个人在前头敲敲打打的响声淹沒了。我点点头。

印过十多張之后，我就熟練自如了。紙放好——佛兰茲潤湿胶轆——滾动它——举起鉄紗网——紙拿走——紙放好。印好的紙放在旁边桌子上。

紅旗报——紅——紅——。

在舞台上他們正敲打着一一些鉄器。厅里蕩漾着回音。

右手拿走紙——左手放新紙——鋪平它——放下鉄紗网——佛兰茲——右手取紙——我的手自动地前后工作。近来柏林的报纸說些什么来着？“根据秘密警察的一个秘密报告。‘我

們在監視和逮捕上必須更加迅速和更加準確。到目前為止，我們沒有跟上共產黨人的不停變換的手法……”兩個鐘頭前一隊爵士樂隊在這兒演奏過。高級的衝鋒隊、黨衛軍官吏們大部分喜歡坐在另一個房間里用屏風隔起來的小單間里。現在我們在這兒工作。此刻，很可能有幾十架複印機在全市各地以最大的速度在工作着。戈林正下令逮捕和“企圖逃跑者格殺勿論”。但是象我們這樣的宣傳品和報紙不斷重新出現。

右手——左手。

布魯諾從舞台上跳下來。他站近我們，揮舞着他的錘子。肢體滾來滾去，我的手也隨之而動。布魯諾滿臉是汗。他的拳師的鼻子張得大大的。

“很順當吧，呃？我看，現在印了大約三分之一。”他朝印好的紙堆點點頭，回到魯迪那兒去了。我們默默地工作着。沒有印的那堆紙愈來愈少了。錘子叮當響。不時地他們倆互相大聲招呼。但是我聽不清說些什麼。也許只不過是虛張聲勢。他們真是優秀的工人！當我們印好最後一張時，我看看我的表。七點才過幾分鐘。我的眼刺痛，我的雙臂僵硬不靈。每一個動作引起肩胛骨一陣刺痛。

“全在這兒了，”佛蘭茲說。他抹抹額頭，使自己抹上了油墨。他伸伸腰。

“你最好現在就裁好它，卡爾。”

“好的。”

我們收拾起來。外頭一記響亮敲門聲。我們跳轉身來。前面的錘聲繼續響着；他們沒有聽見。佛蘭茲望着我，吓呆了。他彎下身子，似在準備跳。我把布擦在桌子上。我們望着右手的門，好象凍僵了似的。他們還在前邊敲打著！那扇門突然打開。

一个妇人拿着一个板刷和水桶站在門口。

“早安，”她說，向我們点点头。

佛兰兹深深地松了口气。他的背松开来，好象背上的重压刚刚卸掉似的。

“早安，”他回答，放下了心。我只能点点头。恐慌使得我的神經振蕩不已。

打扫女工走出去。我捆好背包。

“喂，那边！喂，那边！”佛兰兹叫道。

敲打声停下来；其他俩人跑下舞台来，他們的靴声大作。

“卡尔要走了。”

“好呵，‘副填充手’，”鲁迪說。他的紅发湿漉漉，他的雀斑臉上汗珠点点。

“祝大家好，”佛兰兹說。

“謝謝。”

我躲过不看他的臉。忙着整理自己的背包带。我没有把跟凱蒂会面的事告訴他。无论如何他会从拉姆普累赫特那里听到的；但那时他已生不起气来了。

我坐公共汽車走。仔細地观察同来的每張臉孔。一个高个子，戴着金絲眼鏡，和一个年輕女郎。車前头的窄坐位，背靠着司机的坐位，空着。我坐在那里。从这里我可以看到全車。可以不让那两个人溜出視綫外。这一切手法这时看来是多么自然。“在旅途上要注意别让入釘梢，是最重要的，揚。”一个冲锋队员坐在我右边对面。他为什么那样地望着我呢？无聊。他不过在打盹。他都快睡着了；他的眼睛小得很。戴眼鏡的高个子很快就下車了。女孩子过几个站也下去了。沿着街道走，我非常得

意这次的路利-普利^①这样成功。其他的人也会象我一样的快乐。

* * *

我們当中誰也沒有能够跟社会民主党的同志們建立正常联系。我們小組的两个人，泰謝特和施維布斯認為，如果大家認識到我們过去反对两害相权取其輕的政策是对的，我們才能有力量。我認为事情太严重了，不宜在这种分歧上进行斗争。我們必須強調我們在辯論中已同意的各点。納粹之所以能够夺取到‘权柄，是因为工人們不能以統一的战綫来反对他們。

我們在从前的會議上認識几个社会民主党同志。有的被吓得連政治都不敢談了。至于其他的人，我們不知道他們是否已經变了心。但是他們也同样看我們。在两党内都出現过叛徒。

我們的同志，“現成貨”，白兰涅克梅耶現成服装公司的推銷員，又和他的两个工会同伴接触。他們对他說，現在非法的地下工作已毫无用处。彼此熟悉的同志必須团結一起，只能如此而已。他只能向其中的一个卖掉一分報紙；另一个害怕得太厉害了。

两天前，我向区党委的約金汇报我們的团結工作。他答应安排我跟阿力克斯見面，他还告訴我，阿力克斯已跟我們区的几个社会民主党同志联系上。我从未跟阿力克斯一道工作过，但早就听說过他了。他曾是我們的一个話劇組的领导人。

今天我見到了阿力克斯。不錯，他跟对方联系上了，他說。但是他未能跟他們作进一步的交談。社会民主党的同志疑心特

^① 路利-普利(roly-poly)是一种滾球游戏，借以比方这次的油印工作。

別大。我必須要有耐心；也許要过好多个星期他才能把他們介紹給我。这些同志断然拒絕跟任何他們不太熟悉的人打交道。是的，他卖報紙給他們，但只此而已。于是我們安排每周一次的碰头，总是在同一个日子里，但每次的具体時間都不相同。阿力克斯于是告訴我下面的故事：

“我站在失业登記所門口，在长长的行列里。我后面是一个矮个子秃头的人。我发现他一直在看着我，怀疑他是不是認得我。突然之間他悄声說，‘喂，梅耶先生，如今那些講演和會議的事全完了吧，不是嗎？’他边說边微笑，我一点都笑不起来，你可以相信。

“‘演講？’我笑問道。‘你認錯了人吧，我是个鎖匠。’

“那个人只是一味笑，甚至狡猾地霎霎眼。

“‘你現在不能走开去，’我决定。‘那只会叫他怀疑。’这真是难以应付的局面。然后他又說起来了。‘你真的不認得我了嗎？’

“‘不認得，’我回答。‘我从来没有見過你。’

“‘再想想看；那还是不久以前的事。’

“我根本不能想。我唯一想的是，他曉得了我不少情况。还有，說真的，他的臉孔似乎也有点熟。他定然猜到了我想的什么，因为他接着压低声音說，‘你用不着怕我。’我想最好是不吱声，託他來說。他俯向前，湊到我的耳朵跟下悄声說，‘我原是警局的，一处一科的。你到那里向我呈报你們的集会的！’不錯。現在我認出他來了。但是我仍不吱声。他一定是被清洗出来，託位給‘納粹卫士’。然后，用剛剛高过鼻息的声音說，‘你的档案都沒有了。正在选举前我們銷燬了一大批档案。’”

* * *

恩斯特·施維布斯已經和一个女人在指定的街角上等着。

好家伙，她全身都打扮起来了。蛮漂亮。我惯于在晚上看到施維布斯穿上他的最好的衣着。那样就没有人会认出他是个送货员。他看来活象个“有钱阶级”的年轻人。他穿着上等的衣服和洁净的衬衣，他的蜷曲的头发梳理整齐，而且他常常把脸刮得光溜溜的。

“晚安。”

施維布斯的同伴说话有些咬舌。也许因为门牙突出来之故。她是个犹太人，充其量不过二十岁上下。我从不相信施維布斯会这样的。她是这样的机灵。他从来用不着为他自己说一句话。

“往头里走，”施維布斯说。“我还得等泰谢特，呢？”

“那末海尔黛呢？”

“我安排了晚一点跟她碰头，在另一个街角上。你走吧。我会带她来的，呢？”

他说话后头总捎带着这个“呢”。这是个好笑的习惯。街道座落在繁华的西头上。闪耀着电光招牌。我们小步走；必须从拥挤的行人丛中往前挤。”

“我叫露特，”女孩子忽然说。

原先的想法一点不错。一个犹太女郎。她很勇敢。让我们用她的房子。如果出了什么差错，她定必受到加倍的迫害。

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足够的这种不被怀疑的房间。我们进行油印的房间全都是在监视严密的“红”区中。这就是我们讨论印带胶的标语时施維布斯提出这个地方的原因。过去他从来未跟我们谈起过这个女孩子，这就是我之所以详细盘查他的原因。他早就认识她——在香水部——慢慢地从政治上“教育”她。她是个好女孩，那个地方绝对安全，否则他就不提议了。她

在西头的一家寄宿舍里有一間房。但是我們必須再帶一个女的去；男人太多了就会太显眼了。

如果不是我知道施維布斯绝对可靠的話——露特看来好象对香水很在行，对政治却一无所知。

进口处閃亮着一个电光招牌“宾遜·里特尔。”

“我們从后楼梯上去，”露特說。

一个黑暗的天井和一道狭窄的螺旋梯。

“其他人来了怎么办呢？”

“他們不会注意的。这儿整天人来人往，而且恩斯特有把钥匙。”

长过道两旁有許多扇門。看不见一个人。房間里全是紅的。一張躺椅，一張床，两把椅子，一个大衣橱，一套化妆用具。露特拉上窗幕。

“請坐下。”

我想不出說些什么来打破冰冷的气氛。她是多么友好，然而在这个房間里她还是显得太突出了。露胸的晚服，項圈。她的指甲涂得紅紅的；一双眼眉又細又长。一头短短的黑发燙上很整齐的波紋。

恩斯特·施維布斯和保尔·泰謝特、海尔黛进来了。

“我們必須作出寻欢作乐的样子，”露特說。“我要裝出在举行一个晚会。”她按按鈴。“我們得要点咖啡。”

当女工进房来的时候，我們又笑又鬧。当送咖啡进来时，露特放起唱片来，跟施維布斯跳舞。至少她干得很漂亮。泰謝特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包。

“带胶水的傳单。五百張。貼起来很方便。这次連胶水都涂上了；只要湿一湿就行。”

我們檢查了一下，覺得很滿意。施維布斯松开那套小印刷用具。

“佛蘭茲怎麼樣？”

我們知道海爾黛常見到他。

“他問大家好。我昨天見他來着。他很高興報紙沒有一點不清楚的地方。”

“誰能來一首順口溜？”

“我不行，”海爾黛說。

我們最喜歡泰謝特的快板。

“人造黃油貴又貴，奶油更要貴；

全體人民，武裝起來！”

“你們常常奇怪這些笑話和快板從哪兒來的。這就是工人在工廠里常說的，”泰謝特解釋說。

我瞄了泰謝特一眼。他很滿意他的口號的成功，不好意思地把手攏攏那頭蓬亂的秀髮。他那付牙可不怎麼樣！當他張大嘴時看起來真丑，前面露出兩條大縫和兩個大洞。“治治嗎？太貴了！”當我跟他提起時，他回答說。

“那個很好，呃？全體人民武裝起來！自從廣播電台把歌中這句拿來作為它們的間歇訊號之後，大家全都知道了。”

露特把唱機發條上緊。海爾黛用鑷子從小印刷用具箱里取出需要的膠字來，把它們裝進印模的鋼槽里。

“這一回我一點都不能拿；必須再等個時期。不然他們會搜出我們的工廠小組來的，”泰謝特說。頭一回他曾經拿了我們一些宣傳品到他的工廠里去。西門子工廠的機器上和衣帽間都貼上了共產黨的標語。八個工人被抓走了。他們是在納粹們不知如何弄到手的捐款名單上。但工廠核心小組的同志一個也沒有

被捕。

“……尼南又向我微笑……”——一个男高音的声音。露特放上了新唱片。

“不錯，他們都怕開口，”泰謝特往下說，“但是彼此熟悉的人却有許多可說的。‘多少年来他們在驅逐我們，因為我們要紀念五一節；現在他們追逐我們，因為我們不愿把它當作納粹的一個節日來慶祝，’伙伴們說。”

留聲機在房間里响滿了爵士音樂，我們把椅子更挪近到一起。

“他們很清楚工人們對五一是怎么想的。”

海爾黛已經把字裝好。我們試印了一張。

“不夠清楚。”

“字排得太密了。”

“對，那就好多了。”

施維布斯動手印。我遞給他紙。女孩子們坐在我們對面；她們突然大聲假笑起來。

“這是為了隔壁，”露特說。“這樣他們會以為我們很快樂呢。”

“那末五一節的遊行呢，呢？”泰謝特把印好的標語迭成堆。

他慢慢地回答，“我們當然要去的。納粹頭子們點名單看看我們是不是全來了。但許多人中途就溜掉了。有的去‘買煙’。其他要‘上廁所’，更多的人在天波爾荷夫爾廣場的混亂中消失了。余下的當中不少人開始抱怨。因為我們得在酷熱和塵土中站上幾個鐘頭。罵那些在看台上的上流人：‘他們坐在二十五馬克的位子上多舒服的——清楚地看到檢閱，考究的制服和閃亮的大禮帽，如果你對這有興趣的話，’他們說。一個工人第二天

告訴我他是多么的失望，他說：‘我以為希特勒會跟我們說他的征服失業現象的計劃。’‘你聽到他說了吧，’我回答。‘“你的責任，你們大家的責任，就是購買，購買，購買。別等待；你們愈多多的買，貨幣流通就愈多，你們就過得更美好！”’”

我們全都笑起來。

“他有什么表示呢？”

“他似乎弄糊塗了。‘我嗎？’他問：‘怎么啦？’”

施維布斯放下印模，擦着手。雙手又紅又腫。

我們沉默地工作了一會。女孩子們把印好的股傳單用紙包起來，每三十份一小包。留聲機里傳出一個男高音的歌聲：“……你是我的唯一的陽光……，”泰謝特繼續說，“但是第二天更為有趣。工會的強迫加入運動^①使其他的人全都認識到，工人被剝奪了他們的最后一点權利，社會民主黨的同志弄得不知所措，我可以告訴你。

“工會領袖要求我們支持五一節示威遊行，現在你們可以看到他們的害怕的結果如何：敵人掌握了工會的房子！這是工人在他們自己當中談論開的事情。”

“我們必須充分利用這種心情，使他們更接近我們的看法！”

“不錯。但你想不到那有多么大的困難。對工會的打擊使得許多人糊塗起來了。而我們不得不這樣地小心。每個有工做的同志如今抵上兩個失業的同志。我們不能……”

泰謝特突然住口。門外過道里傳來響聲。腳步聲。我放下印模，望着門口。

“沒什麼，”施維布斯說，“這兒來往的人老是不斷。幾乎跟

① 這是納粹黨強迫各工會、人民團體接受其路線的運動。

妓院一样，呢？”

“这就是我住到这里来的原因。这儿誰也不管旁人的事，”露特解釋。听来好象是在道歉。

我們丟开話題，繼續工作，比任何時刻更意識到我們的危險。

这些日子以来我是多么渴望快乐一陣子——尽情地享乐一番——一个念头老在纏着我不放，即总有一天会一切都成过去。也許就是明天——西韦特，諾伊曼，里特，以及其他許多人。我全認識他們。他們全都被牽涉到迈科斯基事件中。庫尔格耳。理查·許提希！他知道我們所有人的名字。所有我們坐在这个房間印这些帶胶紙片的人的名字。他們一定把他折磨得不得了。如果他坚持不住了，我們此刻就不能在这里印这些东西了。

她是一个水手的情人……

这种該死的爵士乐忽然令我受不了。秦謝特从我手中把印模接过去。

“他們对迈科斯基那桩事怎么看的？”

秦謝特已經开始印傳单，沒有抬起眼来看。

“要形成一种看法很困难，而且你又不能接近有关的家庭。但是前天，当我替他們征收捐款时，我曾跟房子里其他的住戶談論过。他們認為一定是有人露了口风，或是因为捱不住苦刑，或是为了免除自己的皮肉苦痛。我們也弄不清楚。”

“那么你認為这是新逮捕的理由了，呢？”

“也許是。”

“前天他們沒收了一些房子里的摩托車。”

“这跟其他一桩事毫不相干。那只是为了‘保證他們自己防

备一支共产党机动纵队。’你认得保尔·理兹豪普特嗎？”

“认得。他怎么啦？”

“他原在斐希特摩托車俱乐部。他們沒收了他們的全部車輛。他到亚历山大廣場的派出所去。在那里已有上百人的控告。‘所有过道的两头都站有警察的双崗，’他說，‘每个进去的人都被搜过身。’他們必然是沒收了好多！”

“但是要到那里去搞点名堂簡直是发疯了，”海尔黛插进来。

我注意到她今天晚上一直沒說过一句話，除了偶尔湊着露特耳边說点什么。她們很快就交成了朋友。海尔黛穿着她的一身短袖的朴素的短外褂，跟露特相衬之下是何等鮮明的对照！她显得更活潑更自然。但是露特呀！外貌是多么会騙人呀！

然后施維布斯評論开了。“当然是发疯了。人們常常可以碰到一些說要行刺希特勒的人。他們似乎并未認識到另一个納粹魁首就会代替他干下去，呢？而且他們会对千百被关在監獄里的人进行怎样的报复呵！”

泰謝特很快就印到最后一張。

“現在这些东西藏到哪儿去呢？”

他望着我。

“我把它們帶到一所我認識的房子去。明早我們再上那儿去取走它們。但必須赶快貼出去。”

“艾迪真个把它們粘在納粹头子們的房子上去嗎，呢？”

“当然是真的。”

我們一个个地离开了。但是施維布斯留下来。那么說来他跟露特是真要好了？那不是我份内的事了。

傳单已分发给同志們，只是沒有发到汉兹·普勒斯和他的

小組。我和其他人一起上約定的地点。他在那儿。他站在一个报摊前，讀着报。老远我就認出他来了。他的黑白方格短褲！他的藍色短袖网球衫！他的一头长长的秀发！汉茲·普勒斯是个老爱走路的人。在周末永远不能在家里找到他；他常常到外面远足去了。

他看来是这样黑而又健康。我們开他玩笑并且叫他做“长头发的自由人。”

我挨着他站了一秒鐘，然后走进邻近的一栋房子里。过了一会普勒斯跟进来。我們在一楼的楼梯上碰头。

“給我們多少？”

我松开了灯籠褲的褲管。

“七十張。全在这儿了。”

“不少。今天只有艾米耳和我两人。”

我弄好我的褲子。現在爭也沒有用；我們必須赶快。

“你从靠这边的小胡同走！”

我們头上一道門砰然作响。我們靜听，但是沒有人下楼来。

“当心。”

“你放心我会当心的。”

我走了，普勒斯留在后头。

* * *

“新鮮的青魚……德国青魚……你要买点什么，先生……？”

那个女魚販把右手按在腰肋上；另一只手揮舞着魚刀。她的圍裙上沾滿了鱗片和魚血。挽着菜籃子和提包的妇人在貨攤中挤来挤去。

小販叫喊貨色的声音，卖肉的沉浊的切肉声，不知什么地方一只馬在嘶鳴。每周的市集从瓦尔街一直伸延到威廉广场，在

夏洛登堡市政府前面。突然間在拥挤的妇女丛中让出一条路来。連那些正在看貨攤上的貨色的妇女也轉头望着街中心。那里一个男人单独走着，用一支拐棍摸着道。在他的短外衣的袖臂上，戴着一个黄臂章，上头印着三道黑紋。他看来还很年輕，身材适度。在他的左眼那儿有一个难看的紅色眼窩。右眼直瞪着前头。

那个男人离开人群，带着緩慢迟疑的脚步往前走，然后沿着一排排房屋摸索着向威廉广场走去。他的拐棍每隔一定間歇敲在房屋的墙上，避开障碍。艾迪于是敲打上夏洛登堡市政府的宏大建筑物上。

“就是在那里才把我气疯了，”后来他告訴我，“烏尔斯坦公司^①的报販，坐在街角上的那个，不停地喊叫：‘政府保証不过問买卖的事。一切企图制造經濟危机的阴谋定予制止！’他們要压制我們的罢工呢，你看。这样老板們就能够平安无事地享用他們的利潤了！”

一个戴着納粹徽章的胖子向艾迪走来。

“我能帮点忙嗎？”

“不用了，我自己能行，”艾迪回答。

胖子举手行了一个納粹敬礼，就走开了。

“他甚至不曉得我全看得見的，”艾迪笑着說。在地上一层通向四面八方的走道上人来人往。每条过道的两旁有許多道門，有些門外放有板凳，來訪的人坐在上面等候着。他們大声談論，摆动手来加强他們的語气，每个人都在向別人講起自己的

① 烏尔斯坦公司是当时一家犹太人开的大出版发行公司，但它兼营報紙发行和零售工作。

“案件”。艾迪想他最好从更上面处着手。他爬上轉圈的樓梯。樓上安靜得多。只有一些人偶尔从自动电梯那儿走出来。官員們挾着大堆文件，匆忙地走过。有几个穿着冲鋒队制服。

艾迪摸着过道前进。他站在第三道門前。白門牌上写着“萊曼行政官”。他把手放进口袋里，潤湿招貼，迅速地把它粘在名牌上。

人造黃油貴又貴，奶油更要貴，
全体人民，武装起来！

不上十分鐘，他把这首快板詩貼遍了这层樓的各道門上和牆上。然后他坐上电梯到下一层樓去。这儿一切也順利。但是再下一层樓就有点困难了。小官員們經常跑来跑去，所以他得等到沒有人走过。他正好轉过一个角落，經過一群候見的人之后，他突然听到身后的激动声音。

“看这儿！还有这儿……它們一定是剛才才貼上去的……”

“萊曼工程官剛跑过。上头每层樓都貼滿了傳单！”

“立即通知門房……他得通知警察……如果我們赶快，也許逮住他們一些人！”

“突击队把守住所有出口，誰都不許出去！”

門砰砰响；人們不断在过道上奔跑。等候着的人激动地从座位上跳起来。

“出了什么事？怎么啦？”一个穿着一身老式衣服的人問。他不安地扯着他的一把尖尖的白胡須。他身旁一个穿着絲罩衫的胖妇女抖顫地回答：

“他們貼起煽动標語来了……不久以前！在牆上呢！”

艾迪看到他們当中有的在交头接耳，交換着互相了解的眼

光。

剛才說話的婦人又叫開了。

“你看！他們把門關上了……我們全都犯了嫌疑啦……噢，那些強盜，殺人犯！”

那個長胡須的老頭又問起來。

“出了什麼事？……是強盜貼了標語嗎？”

“不是。是共產黨！你還不明白？這回我們會夠麻煩的啦！”

那個婦女朝他尖聲叫道。

老頭的嘴巴拉下來，他的稀疏尖胡子怕得顫動起來。

“是走的時候了，”艾迪想。他沿着牆撲向樓梯去。電梯旁站着一個官吏。

“你現在不能走，”他對那些被他拦住的人說，他們站在他面前，爭吵着。

“我必須回家去……我的男人要回家吃飯的呀！”

“我接到法庭傳票要出庭……我要叫你对我的缺席負責的！”

艾迪用拐棍叩打着，穿過他們當中。他們給他趾出道來，連那個站在電梯旁的官吏也趾了路。艾迪慢騰騰地走下樓，繼續無阻攔地走到大街上。他的拐棍的有規律的嗒嗒聲在遠處消失。

* * *

我來到羅塔克爾的家。那是剛交黃昏的時分。我要把艾迪最近一次的把戲告訴他。

“進來，”羅塔克爾叫道。

他的左手插在一隻小孩的鞋子里。他穿上一條藍圍裙。四歲的茵格抓着他的褲管；她帶着一頭蓬鬆的秀髮從她父親的腿

縫中忸怩地偷着往外看。原来他在补鞋。他老婆在洗擦厨房的炉灶。她抬抬胳膊表示欢迎。她形容憔悴。茵格活象她的翻版。但是媽媽瘦得可怜；她的胸脯好象萎縮了。那头秀发使她格外显得苍白，然而使她的美貌具有一种几乎是天仙的气息。罗塔克尔在工具袋里找着，并没有看我。他们两口子吵架来着吗？我晓得常常是錢的問題惹起来的。我来是要把艾迪的把戏告诉他们，但是我感觉到我不能說。我一点儿都不知道該說些什么好。

“我的生命是浪費掉了。永远是煩惱和担忧，”罗塔克尔的老婆常跟我抱怨說。他年紀比她大得将近一倍。在他们結婚的时候，她还不滿二十岁。很快孩子就誕生了。妇人还很年輕，她要求“生活。”她深深地感觉到他們的年齡上的差別。

“你沒有見艾米耳·施密特嗎？”罗塔克尔問道。

“沒有！”

“他剛才还在这里。他說要去找你。”

罗塔克尔望着我。他把孩子的鞋放下。这个动作是机械的，好象是他完全沒意識到似的。鑲边眼鏡后面的眼睛流露出一种空虛的神情……我大吃一惊。

“出了什么事嗎？”

罗塔克尔慢吞吞地回答，拣字摘句的。

“在貼过傳单后。普勒斯未在約定的地方跟艾米耳会面。”

靜默。罗塔克尔大嫂停止擦拭，張大眼睛望着我們。孩子在玩弄着准备釘到鞋子上的胶跟。

“艾米耳于是到普勒斯家去。沒有一个人在家。”

一种沉重的感觉回到我的心头上来。

“他的媽媽現在該回家了……她在地下道工作。”

罗塔克尔望着手中的錘子。他好象在跟自己說話。

“你的意思是說有人應該去找她？問一下嗎？”

“不錯。用某种借口。必須立即去。他們还不会就在她家里。”

我不得不說“有人”。当我說的时候那个妇人是这样奇怪地望着我。我必須去；不能指望他了。他也許是对的。但是如果他們已經在媽媽的家里呢？

“那末我們就可以弄确实了。可以警告其他所有人，”罗塔克尔說。他轉动着手中的补鞋匠用的錘子。

“你什么时候跟他分手的？”

“今天下午。”

“你的房間是‘清白的’，不是嗎？”

“是的。”

原来他不愿在他女人面前承担工作。他很有理由。他們有一个孩子呵。

我沒有象他那种負担。

“你想好了你們两人是怎么認識的嗎？”

“当然啦。”

我們曉得秘密警察常常是分別审訊他們的受难者的。首先問的几乎总是：“你們初次見面是在那里？”回答的一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們事先就安排好。汉兹·普勒斯知道，他是在格吕恩瓦尔德徒步旅行时“認識”我的。

“我要去了。我們必須弄清楚那是怎么一回事。”

* * *

普勒斯大媽象是要垮了似的。她的眼睛，在那瘦骨的低窩的臉上，表現出她的全部焦慮。

“我想見普勒斯先生。是关于他的采集蝴蝶的事。”我利用他的嗜好作为來訪的借口。

普勒斯大媽慢慢地領我走進狹窄的過道。一進到房間，她就給我推來一把雕得很难看的椅子。如果她已被“拜訪”過，她就會更心煩意亂了。因此到目前為止一切都好。過去在白天里我常來找普勒斯，但是他媽媽不認得我。在那種時候她常常是在上班。我知道我們是坐在“最好的”房間里。一幅鑲在塗有厚金漆的鏡框里的水彩印畫挂在壁架上。“基督登山訓眾”圖。右角上一個大木牌，上面寫道：“貧窮的人有福，因為他們登上天堂，”四邊用火燙過。我照例坐下。普勒斯常對我說起他和媽媽之間經常意見分歧，對人生各持己見。

“她出身于牧師家庭；而且她已年老，再也改不過來。我不打擾她，可是她卻不肯放過我，”他有一次對我說。

我還曉得他是多么的痛苦，因為他一個年輕人失業了，而他的年老母親不得不辛勤工作來維持兩人的生活。忍受極大的艱難，犧牲她自己的享受，她終於使他學會制造工具。他的父親在戰爭中死亡了。

普勒斯大媽打斷了我的思潮。她站在我面前絞扭着自己的手。

“你要見漢茲……他能上哪兒去呢？……我剛下班回來。什么事還沒有做呢，什么都沒買呢！”

我不舒服地在椅子上動來動去。她終於找到可以傾吐她的心事的人了。但是我又怎能告訴她呢？我覺得很沮喪。

“也許他出了什么事吧？”我暗示說。

“他能出什么事呀！他又不是個小孩。”

她用手打手勢，突然又訕手無力地落在膝蓋上。

“你怎么会認識他的？你是不是那些人当中的……？”

“不是。”我赶忙打断她。

我必須防止露出絲毫可疑的痕迹。誰知道一个激动的女人会发作到何种程度的？要是她晓得……

她痛哭流涕。“我什么沒跟那孩子說过呀？‘你正墮落到反对上帝呢。’我每天都恳求他，‘把那一切扔掉吧；这終归对你沒有好处的。’”她輕輕地哭泣，身子前后搖晃。我很同情她。这两个人彼此从来互不了解；他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她永远不能学会去了解她的儿子。但是她是一个母亲，他的母亲。普勒斯大媽从臉上放下手来。

“那是为了他好……我常想帶他到救世軍去……他唱得多好听呀……”

她瞪大眼睛望着我，好象她已发现了我有罪似的。

“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从来沒想过他的年老的媽。他全被他的‘政治’給迷住啦。”

“你为什么不上警察局去一下呢，普勒斯太太？”

“找警察？”

她更是笑得不可开交。

“想不到我这把年紀还得受这些灾难……，我这一輩人从未跟警察打过什么交道，可是如今呀，……呵，說来好不羞煞人……！”

“你應該去打听打听。你甚至可以登个寻人启事，看看有点效沒有吧！”我有力地說。我必須使她从昏睡状态中清醒过来。普勒斯大媽呆呆地望着她对面的墙。作为一个不速之客，我不敢再多劝她。她也許想到我不过是来打探消息的。“再見，普勒斯太太。”

她漠然地点点头，伸出手来。手上的血管又硬又起结。

回家的路上，穿过瓦尔街的时候我着实地思索起来。我们能给她做什么？捐点钱？但是她有工做。汉兹还不能给她做点工作呢。再打听时我们必须份外当心才行。最好向其他住户那里探听一下。

* * *

汉兹·普勒斯也是在事情发生过后好久才能跟我们说清楚。他跟艾密耳·施密特来到一条幽静的街道，看了看传单上的口号，认为这些话是何等的适合这个区。小公务员和文书之流聚居于此。他们过去投纳粹的票，但是现在他们会反对希特勒政权不满了，因为生活费的不断上涨，从他们的薪水中抽去的税款愈来愈重。

“总是从最顶一层下手，别忘了地上的那层，”他在分手前跟艾密耳·施密特说。普勒斯把传单贴在最低一层的窗户外，信箱上和静静的看门人的小房上。一切顺利，未发生什么意外；他在楼梯上很少碰到人。他带的传单愈来愈少了。“再有十分钟，”他想到。他已经贴完了一栋楼房的上两层了，这时候他听到上头有人匆忙地走下来。他把润湿了的传单放回口袋里，逍遥地走下楼。一个身高脸白黑头发的汉子走过去，那样猜疑地瞪了他一眼，使得普勒斯着慌起来。“最好马上离开这栋房子，”他想到。但是当他来到大街上的时候，他的惊慌没有了。那个人不知上哪儿去了。“你准是搞错了，”他心里想。“真好笑为了那就抛掉工作！最后几张传单必须贴出去。”他进入隔壁的楼房。但是在楼梯上他又担心起来了。几张剩下的传单不该给他带来任何危险。何况，不管怎样，他应该到下一条街去而不是进隔壁的楼房去。他开始失去了主宰，又跑下来了。当他离开房子的时

候，他小心地往四下里張望。几个孩子伙成一堆在人行道上游戏。一辆卖青菜的小車在街上走过。小販把手圈在嘴边高声叫卖：

“西紅柿哩……西紅柿哩……鮮紅西紅柿哩……”

街对过停着一輛牛奶車。赶車的戴着一頂藍帽，圍着圍裙，正在倒奶。普勒斯觉得有一股电流奔过他的身体。这一切……！在那些挤着买牛奶的妇女后边站着那个汉子！他只看到黑头发和上半部臉孔。他在等待他的回轉身来不让他躲开！“不要緊張过度和奔跑，”普勒斯想道。他估量了一下到下一个街角的距离。三十碼。他强叫自己用正常的步子走往街角去。

他被釘上梢了嗎？“要是你轉过头来只会让你更叫人怀疑，”他警告自己說。他試从左手边路对面的一家商店櫥窗上看影子。但是沒有成功。直到走到拐角为止，在普勒斯看来好象是永远沒有个完似的；他的脚好象粘在人行道的石头上。“真象一場恶梦，”他想道。“当你被釘上了梢而又不能……不能向前挪一步？”

他終于来到了街角，赶忙往回看，但是他看到的把他吓呆了。那个黑汉子距他約二十碼开外；一定是沿路跟着他的。他現在直奔过馬路，叫喚和招呼两个剛从路对过一栋房子里走出来的冲锋队。街上的人都回轉头来惊奇地望着他。普勒斯僵住了一会，然后他大步走入下一条横街去。現在怎么办？他走到这里沒有多大用处。前头的街道在右手有个小拐弯。那也許——但是他来不及躲开他們了。他們很快就会来到街角的，会看到他跑往什么方向的。他的心狂烈地跳动。

前头正好出現一家奶品店。店門敞开。透过玻璃窗，他看到店里站着一群妇女。普勒斯一下子閃进店里。另一个妇女跟

在他身后进来。一个女店员正用木奶油刀調弄一块奶油，同时点头打招呼。她面前的妇女不停嘴地聊着天：“……尤其是这儿，在右边……正在变天气之前……你說什么？……照X光……？”

普勒斯站在妇女們后头，在两个桶和柜台中央玻璃柜台之間，玻璃柜台里放滿了各种干奶酪。他迅速地思索着。当他們跑过的时候，他可以从这儿望到大街，等几秒鐘之后，跑出去，朝来时的方向跑开去。

他縮回身子。冲锋队和那个黑汉正好走过去。后者激动地向那两个讲着話，用手在空中划出个圓圈。

“他不能跑那么远的！我們必須……”

他們从視綫中消失。現在該怎么办？留在这儿；首先，爭取点時間。让外头那三个人走远点再說。要是他現在走出去准会落在他們手上。有人向他說話了。

“您要点什么呢，先生？”

普勒斯轉过来看。鋪子里已不那么挤了。半边身痛的女人已經买完了，但是还站在那儿。她好象是在等机会繼續摆她的龙门陣。另一个店員在招呼另一个妇女——靠近他站着那个隨着他进来的妇女。

“噢，——呃——請先給这位太太——我不忙……”他呐呐地說。

“四两伊頓干酪——切薄片，”他听到身旁的女人說。

那三个人走了有多远呢？他現在該冒个險嗎？他向櫥窗挪前一步，小心地往外看。該死的！他們在街对面走来走去，寻找着他。只要他們进一栋房子去就好了！他身后一个女店員又說了：

“現在，先生？”

“……呢……呢……給我……給我四兩伊頓干酪，切薄片！”

普勒斯望着刀口上切下來的薄片。他旁邊的一個婦人在菜籃里忙亂地摸索；話匣子在那邊又開起來了。

突然間從店門口傳來一個男子的聲音。

“小姐，你可曾見到過……？”

它兀地停住了，然後上升成一聲尖叫。

“快！……快！……那邊是他……他在那兒呢！”

普勒斯忙轉過身。那個黑髮漢子站在門口。恐慌好像攔住了他的心，之後他反覺得心定下來。“完了，”他想。“不值得從這個人面前跑開；其他兩個人會很快趕上來的。”他們來啦！普勒斯站着象個石頭人似的。店員的口張得大大的。她站在那兒，一雙驚訝張大的眼睛，刀子在右手，奶酪在左手。一個沖鋒隊捉住普勒斯的胳膊。他是個魁梧闊肩的漢子。他的眼在濃濃的眉毛下發光。另一個，矮小清秀，站在普勒斯面前，手放在手槍套上。黑髮的漢子咕嚕說：

“就是他！他好認得很！因為他有長頭髮！這就是那個貼傳單的家伙——我從門上的了望孔看着他干的！”

“把他帶走！”小個的沖鋒隊說。

大個子把普勒斯的一個胳膊擰到身後來。一陣劇痛傳遍他的全身。

婦女們向門口擠去。街上的人停下來，轉過頭看。一群小孩隨着這群人走。

* * *

昨夜里我很久睡不着。我想着，我要對自己所寫的東西特別當心。萬一秘密警察不知從哪里弄到了這份手稿，它絕對不

能暴露我們的一點秘密。今天我把所寫的一切從收藏的地方找出來，全部仔細地讀過一遍。必須刪掉許多地方，有時整頁都刪掉。那就占了很多寶貴的時間。

時間，也許可以說，缺少時間！

我不得不減少寫作的時間，因為我有我的政治工作要做。同志們會很快發現我沒有“把心放在事”上。除了佛蘭茲和羅塔克爾之外，他們誰也不曉得我正在寫書呢。

但是如今我必須寫下去。否則，以前的一切煩擾和危險局面全都白白過去了。

* * *

今天要在瓦爾街舉行邁科斯基紀念碑的揭幕典禮。我跟羅塔克爾一道走上街。從我上他家把他找出來之後，我們一直沒談過話。羅塔克爾的藏在眼鏡後的双目攢在一起，兩眉間現出一道深折痕。他的目光從一個窗戶掃到另一個窗戶。

“小鳥，不是吃就是死，”^①他說。

我沒有回答——只點點頭。

卅字旗在瓦爾街上飄揚！

我們的街一貫有自己的旗子，但那是紅旗。從未有過什麼旗子壓倒它們的紅色。

一些市政府所屬的公寓的看門人昨天接到命令，要他們掛出最近收到的旗子。隨後沖鋒隊來到那些房間朝街的住戶那里，向他們推銷旗子。

“但是我們沒得錢買呀，”許多人回答。

“那就讓你們免費使用吧；完了我們會來收回去的！”沖鋒隊

^① 這是一句德國俗語，意思是除此以外別無其他選擇。

回答。

照他們的語氣，住戶們認識到，“免費給旗子，”就是說他們或者接受下來，不然的話……從那時候起就要受到監視。有的甚至付錢把旗子買下來。在那邊——梅亞家——拉德里家——都把旗子掛出來了。從前他們是同情我們的，至少是跟我們友好的。恐怖的日月，大街上的許多逮捕，把他們吓住了。他們害怕集中營。但是馬特克也掛了！他一定是擔心他的差事。而那個——那個——他們誰都不願註“警察記上名！”他們滿臉慚愧地向鄰居解釋說，這是不想“惹起注意”。這當中有的是確實如此的，但也有的是為了配合新的政治面貌。

我們來到街道拐彎的地方。發電廠在路那邊。機器嗡嗡響。在結實的山牆上，沖鋒隊用來蓋掉艾迪的標語的油漆，在陽光曝曬下，已多少褪了點色。我可以毫不費力地看出那下面的字句；但是，那個，全都背得出來。

“他也干了！”羅塔克爾輕聲說，向近旁的一家啤酒店點點頭。

玻璃窗上大字寫着“亞非利加”。一支卍字旗橫倒在門上。街的对过是我們過去聚會的酒吧。空空的櫥窗好比是眼睛。安在以大街為臉的眼睛。我們知道怎樣來觀察這張臉……我們不會被表面上的冷淡所欺騙。

我們交換目光，跟站在屋外的人們點頭招呼。一字不談旗子的事，儘管我們互相問好和聊天。我們全都是朋友，但誰也不曉得另一個人是否還是我們的成員。

再往前從窗戶里可以看到更多的臉孔。即將來臨的事情似乎使得氣氛緊張起來。羅塔克爾默默地看着我。

② 他在瓦爾街和克魯姆大街之間的人行道上站定；點點頭，咧

了咧嘴巴。

在街角上用藍色粗黑体写着：

迈科斯基大街

人們带着梯子一大早就来过。他們把老街牌“瓦尔街”拿掉，挂上新的“迈科斯基大街”！那些字象在嘲笑我：“制止它吧，只要你做得到！罢了，你一点也改变不了事的！”

在街道的那边一道寬闊入口附近，站着两个冲锋队哨兵。左边的一家自行車舖里，鍍制的零件在阳光中閃光；另一面是一家藥房。冲锋队一动不动立正站着，他們的闊檐帽子的皮帶緊扣在顎下。他們身后的墻壁一大部分蓋上黑布。人行道上放着綴有鮮色双結的花圈。哨兵的两旁各立着一棵丹桂树。車輛迅速駛过。交通仍然正常。但是我注意到，行人都走街的另一边，跟我們一样。他們大步走过；誰都不敬禮。

一月三十日的晚上的情景又回到我的目前。我們站在另一面的門戶里。大叫大喊的暴众从那边后面过来。迈科斯基之后发出他的开枪的命令，枪彈在黑暗中火一般地射出。就是在这里，那个巡警走到人群前面，迈科斯基在他身旁。巡警是怎样突然伸出双手，然后倒下来。迈科斯基怎样咆哮着发出一道命令，在嘈杂中使我們听不清，然后他的膝盖怎样弯倒了。就在这儿，他們两人并排躺在柏油路上。冲锋队逃开了。就是这个当儿，我們的同志从斯丹尼酒吧才来到了現場。工人防卫队沒开枪打那两个人。如果他們打了，那么当警車开来时他們还会迎上去嗎？

凶手是不会帮助警察把尸身抬进車里去的。他們会在警察到来之前跑掉了的。但是他們留下来，明知他們是无罪的。伙

伴們甚至找不到个律師為他們辯護。然後是許提希的案件。我能够描画出我最后一次見到他的形象。他坐在沙發上，他的大手放在腰帶上。他怎樣告訴我們對惠爾曼進行攻擊。他用一種粗啞的憤憤不平的聲調說話。

“他真他媽的够勇敢——他全知道我們的名字，”羅塔克爾安詳地說。

我們來到了第二個拐彎的地方。我們在這兒站住。轉角上的那棟房子有一長列顏色暗淡的窗戶。入門處在轉角几碼外的一條小胡同里。木門不停地發出乒乒聲。面容憔悴、衣着襤褸的男女進進出出。

補習學校

很早以前關於“就業的幸福與好處”一課就是在這里講的。現在夏洛登堡救濟站設在這座房屋內。當門打開時，我們看到長長的行列在等候着，凌亂地延伸過庭院直入底下一層的房間里。它直伸到救濟站的出納櫃前。

“我們可以在這里等着。這不會引起注意的，”羅塔克爾說。

紀念碑就在不到五十碼以外的地方。

羅塔克爾不寧地擺弄着他的眼鏡。

“我已欠下了房租。他們每次給錢都給得很少。我們全用來買吃的了。”他沉思地把烟灰揮掉。“此外我們還能做什麼？”

我想不出什麼有幫助的話來。老婆和孩子？還有他自己。他瘦得這樣可憐；他的衣服活象挂在一根竹竿上。他的臉又蒼白又長。他不知道向何處寄托他的愁苦——但他常常準備犧牲自己成全別人。他這樣生活過來已有許多年了。

“如果他們發現了，並且少給我錢……”

但是現在有許多人在前後挪動。一羣羣人站在紀念碑旁。

“我們再走一點！”

那些人全都衣着華麗。他們看來好象是很會照顧自己，而且他們還有能力來照顧自己。當中有不少婦女。

“……一批惡棍……為什麼他們不死個精光呢？……應該活活燒死……”

原來他們還相信他們在這兒是置身於“敵國”中。我仔細看清楚剛才說話的那個人。他長得又高又瘦。很可能是個校長。一條沉重的金鏈條從他的背心上垂吊出來。“你看來不象個那些動手燒人的‘老衛隊’，老東西，”我私下里想。站在他身旁的婦人使勁點頭。她的帽子上的羽毛直擺到她的臉上。她的外衣上別着一枚大納粹黨徽。羅塔克爾用肘觸觸我。他悄悄地說：

“我們如果呆在這兒，我們就得向卐旗敬禮的啦。”

“唔，那怎麼樣呢？”我低聲回答。

“但是我們可能被上頭窗戶里的人認出來呀。”

“的確不錯。我們不如站到汽車房的門口那兒去吧。”

不一會兒警察和沖鋒隊過來，把街道封鎖了。他們把人群往回推，註紀念碑周圍空出一個大圓圈。突然間所有的頭都轉向右方。聽到一支歌。愈來愈近。現在我們可以听重唱部分，每一段完了之后就重復着：

……我們是三十三支隊……

槍舉起了。對過的房子里只看見人頭，但沒有武器。但是還有！有少數人散在各處。但是他們只是更顯出了其它窗戶的無聲的抗議。幾個工人穿着木屐從我們身後庭院里的修理店嗚嗚嗚嗚地走出來。兩個人舉起了他們的油粘粘的手。第三個雙手插在

口袋里站立一旁。整齐的行进步伐声从外边传来。我們只見到人群头上上下下跳动的褐色帽。一声尖厉的口令猝然停止住歌声。

“师团——立定！向右——轉！”

靜默。

地下室的烏鋪老板帶了把椅子出来，站在上头。他高出人头之上。然后有人开始演說。

“要記牢血的牺牲……光荣和自由的国家……被赤色分子杀害……忠于元首……”

演講的好象要說个沒完似的。然后又一个人站起来。

又靜默下来。

接着他們高声唱：

“……同志們……被人打死的……”

耻他們走过看看吧，我們的同志們！被你們深夜里枪杀，在你們的監牢里受刑而死。一长列的灰色的人。但是到处活着，你們看不見。他們时刻都在監視着你們。

我死抓住罗塔克尔的手臂，忘了四周全是人。我們互相瞪大眼睛望着。罗塔克尔的臉綳得紧紧的。簡直叫人难以相信，这是不可能的——然而，当群众的最后一声“万岁”的回音消逝开去的时候，一个尖亮的妇女声音喊道：“打倒法西斯！紅色陣綫万岁！”

現在——又一个喊声；好象是从街的对面发出来的。

“打倒！打倒！紅色陣綫万岁！”

我們几乎在同时奔出了汽車房入口。我們忘記了在这种危險情况中我們很易被人認出来。我們四周是一張張气愤得变了样的面孔！拳头威胁地揚起。人們一群群地在爭論开——互相

爭論，但不是叫罵。

我們見到冲鋒隊跑作一團，然後分成兩隊，冲进街道兩旁的房屋里去。其中一隊很快就轉回來。他們帶來一個女人，緊緊捉住她的臂肘。一瞬間我可以見到一條藍圍裙，一付蒼白的臉孔和一头亂蓬蓬的黑髮。人群往前擠。我們夾在激動的人群中被擠前擠後。我的神經緊張已極。其他的人幾乎要从窗口掉下去。他們跟我們同樣的激動。從他們的姿態、他們的緊張的臉孔，我們可以看出來。他們的街說話了。命令發出。幾秒鐘之後冲鋒隊在行進。嚴峻的、板着的面孔，因氣憤和無能為力而抖動。在這樣的時刻，這樣的場合里出現這個叫聲，當然是一記狠狠的打擊。

人群散開了，我們到對過的五十二號去。

樓房的牆壁上挂着一個銅牌。兩邊鑲有鮮綠葉，頂上是一個卍字。下面是：

在這裡，一九三三年的一月三十日，
民族覺醒的日子，
冲鋒三十三支隊長漢茲·艾伯赫特·邁科斯基倒下了。
他是為德意志犧牲的。

再走了一小會，羅塔克爾平靜地說：“牌子上寫的是‘這兒倒下’而不是‘在這兒被共產黨人殺害……’”

他望着我。

“他們常常在他們的紀念碑上這樣寫的。在運河那邊也有一個這樣的東西。甚至連他們自己都不相信——我們的小伙子打死他。”

漢茲·普勒斯第二天還未回家，他母親決定听从我的勸告。

她去找警察。警察局門上挂着一块大牌子：“此地的德国礼节是：‘希特勒万岁！’”

普勒斯大媽推开門，猶豫地站住在明亮的过道里。到处都是門戶。她沿着过道走下去，讀着每道門上的号数和名字。她應該上哪儿去打听汉茲的事呢？“这里他們應該全都曉得的；警察是无事不知的，”她想。

三个警官坐在房里，埋下头写着。中間一个胖胖的，生就一付温和相的人喊道：

“上这边来吧，老大媽。你想干嗎呢？”

普勒斯大媽慢慢地走向把房間分隔开来的木栅栏去。

“晚安，”她懦怯地說。

“你是說，‘希特勒万岁！’”胖子高声說。“好吧，你有什么事？”

“希特勒万岁！”普勒斯大媽回答，吓怕了。“我想打听点事。我在找我的孩子！”

她好象萎縮下去，变得更瘦小了。穿藍制服的人是当权的人。“聖經”上說人們應該服从和尊敬他們。

胖巡警大笑。

“你的孩子？他一定是个大小子了。他多大啦？”

“二十二了，”普勒斯大媽輕輕說。

“唔，那……？”

“他沒有回家来——打前天起，”普勒斯大媽不安地回答。

“象他那样年紀的人那是常有的事。”他笑着說。“他会在他的心上人那儿。”

“不会的。他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啦。”

想必是老妇人声調中的忧虑打动了那个警官。

“是嗎？你住在哪儿？”他問。

“瓦尔街八十二号。”

“迈科斯基大街！”胖子大声改正她。

他站起来。

“跟我来。你的登記卡片在这边。”

他們通过便門走进邻室。

“你叫什么？”

“普勒斯——阿尔温·普勒斯。”

胖子抽开桌子上的一个卡片抽屉。翻着卡片。

“阿尔温·普勒斯——汉兹·普勒斯——一九一一年四月八日出生。是这个嗎？”

“不錯，”普勒斯大媽耳語般說，好象他剛念完一連串以往的过失似的。

胖子拿起綠卡片在空中摆动。

“呃，那——你現在要怎么样？”

“我以为你們曉得的——我这样的担心——他一定是出了事了——”普勒斯大媽忧愁地說。

“但是你不能指望我們曉得每个人的下落呀！你要不要报告他失踪呢？而且已是停止办公的时间了！”他不耐烦地回答。

“你能不能給打听打听？我是这样的担心——”

普勒斯大媽哭起来了。胖子看了她一会。

“好啦，好啦，”他說。“現在坐下吧。我来試試看！”

普勒斯大媽听見他打电话給各个办公室。

他每次都提到她的孩子的名字和生日。

“不知道？謝謝。希特勒万岁！”有几次他反复說。

他兀地提起高嗓門。

“普勒斯。是的——汉兹·普勒斯。怎么？巴比將軍大街？不，真的嗎？謝謝您。希特勒万岁！”

他吵鬧地推开椅子，立起来。

“你的儿子被捕了！”他截然地說。

“被捕啦？为什么——？”普勒斯大媽呐呐說。

胖子把卡片放回抽屉里。

“他自己最清楚了！”他生硬地回答。

“我能見見他嗎——跟他說句話嗎？你能不能——？”普勒斯大媽又哭起来了。

“那我們可管不着了。而且我們也做不了主。政府警察把他逮去的！”他敷衍地說。

普勒斯大媽只好回家去，哭着。

* * *

从普勒斯第一天沒回家，我們就警告过所有的同志。他知道几处我們收藏政治材料的地方。这些地方必須立刻換掉。我們曉得汉兹·普勒斯是一个最誠实可靠的同志。但是我們已定为每个人必須牢牢記住的原則，却是每个被捕的同志都可能泄露秘密。虽然我們跟他們說过，所有向秘密警察作的招供只会証实他們自己也参加过非法工作，但我們不能保証每个人都能夠禁得住肉体上的折磨。

达梅尔特这时已从迈科斯基营房里釋放出来。我們已通知其他所有人关于他的出卖行为。我們很能体会他所以供出庫尔格耳来的原因；他禁不起刑罰。他也許还想起了他的老婆和两个孩子。但是我們的政治判決必須是严格和毫不含糊的。它对我們全都是一样。

* * *

我慢慢走到大街上。太陽明亮地照射着。人們全都穿上了鮮明的夏裝。我很喜歡這種色彩的混合。

昨天我打電話給海爾黛。

“星期天能到哈斐爾河去嗎？”

“是的。我早就等着去了。”

我們每次換個問題。她的“是的”等於說，佛蘭茲已把我們的新會面地點告訴她。然後我到黃昏時候在海爾黛的辦公室附近和她見面。佛蘭茲這次說出了一棟會面的房子。他們在自己的區里有較好的工作條件。

“為了國外德國人協會！”^①

希特勒青年團^②一個團員在我面前搖響一個捐款箱。另一個手里挽着一個小籃子。籃內插着藍白旗。我搖搖頭。他們接二連三不斷地過來。在這裡他們多得象蝗蟲一樣！希特勒青年團，希特勒兒童團^③的小男孩、小女孩，小學生一個個戴上臂章，勸人捐款。每個過路人都被攔住。我見到不少的人老遠就向孩子們亮出他們的小旗來。他們為什麼不插在襟頭呢？他們寧願犧牲掉十個芬尼克，避開這群蝗蟲似的募捐者的糾纏，而不願戴上它們給納粹當宣傳員。我觀察着每個被勸捐款的人的臉孔。他們絲毫沒有樂捐的神情；有的一語不發地走過伸過來的捐款箱。他們的臉上，除了好象在說“不”之外，沒有半點表情。

這一切要搞多久呢？每個星期都有一次新“捐獻”。宣傳部

① 納粹強迫德國僑民參加的一個組織。凡是僑居國外的德國人都得參加。其組織遍及全世界，是在各國開展國社黨宣傳的出發點，同時又是納粹特務的培育場所。

② 納粹強迫青年參加的御用組織。

③ 納粹強迫兒童參加的御用組織。

在盘剥方面从不缺乏新主意。纳粹妇女组织、冲锋队、党卫队、希特勒青年团、希特勒儿童团，纳粹党。捐款箱咯咯声未尝稍歇。

那些只看事物表面的人，不由不做出结论，认为德国人已归顺纳粹了。到处是黑色和褐色制服。旗帜、元首的照片，遍布每家商店的各个橱窗。列队行进的冲锋队、党卫队、希特勒青年团、希特勒儿童团全都高唱着排外好战的歌曲。在摩托车上，制服！在新车里，制服！

我前头的人们回过头来。一个人一瘸一瘸地走过马路。他的两鬓灰白；起皱的脸上有一只玻璃眼。他穿着一套旧的轻骑兵军装，白总带在胸前飘荡。那是凯撒·威廉大帝时代的遗物，现在被虫咬了。

我开始想到我的两个亲戚，都是冲锋队员。他们经历过四年战争的时日。现在骄傲地在褐衫上挂起他们的勋章。其中一人是个小文书，另一个是理发匠。他们常常觉得他们天生下来就已是“优等材料”。军营里的操练和战壕里的泥水日子已成往事了。但是制服已经回来了。制服。

把库尔格耳的事告诉我的那个X，只有参加了冲锋队才能继续烤面包。这几天来，我们的街道上出现了褐色制服。有一个是给某经理开汽车的。他告诉我，老板坚持只用冲锋队员给他开车。另一个给一个五金商人做工，老板也是只雇用冲锋队员，尽管他出的工资低于公认的最低水平。那种人常常找出千百种理由来掩饰他们所以不能冒失业之险的原故。他们会没钱带女朋友上电影院啦。他们将不得不戒烟啦。他们不愿靠他们母亲的好心吃饭啦。

这里，在大街上，可以毫不担心地摇摇头把捐款人打发走。

但是在他們自己的家里，他們完全落在捐款人和納粹頭目們的手掌中。每個人在家中都不得不表現是個同族人。兩個星期前，一個鄰居向秘密警察告發一個中立的工人，因為她恨那個男子。“他住在隔我几座房子外的地方。他每天晚上都帶着一大袋東西回家，”那婦人說。那棟房子被搜查了。男人被逮走了兩天。之後弄明白了，他不過每天下班時用口袋裝木柴回家罷了。那個賣菜給我的女人最近說過些什麼？她只知道我不是個納粹黨人，其他就不知道了。“我們應該怎麼辦呢？如果只是为了平安無事，你只好參加他們的組織之一。我們選擇了收費最少的一個組織。”

而我們鄰居的女兒呢？她在市里的一家工廠里做工。職工們第二次收到了必須簽名的表格。“人們一再保證說，公民在私生活里不用行德意志敬禮……我很明白不執行這道命令就會使我不適宜在廠里繼續工作。”

他們曾強迫公眾接受“德意志敬禮”，威脅“每個不向卐字旗敬禮的公民，將被視為馬克思主義者”。

地下電車從隧道里隆隆奔來，直奔上山頂停車站。努蘭杜爾夫廣場。那邊有一個電話間。內里無人。我翻開電話號碼本。阿爾伯來赫——卡雷姆爾——納丹——在這兒！在“N”字的第一頁上有一個小小的用鉛笔画的十字。那麼那套房間依舊是安全的。佛蘭茲一定是在不到半小時前照原先約定的，做下這個記號。這真是個好主意。它防止我們撞進一套不“安全”的房間。羅塔克爾在指定的街角上。我慢慢走過他身旁，經商店櫺窗上窺視，見到他跟上來。

“威·舍恩貝克大夫”，門牌上寫着。我按按鈴。一個苗條的年輕婦人開門。

“我們想見見斯提克尔特先生。”

妇人点点头。

“請进，”她愉快地說。

一道寬闊的甬道，一对鹿角，一个高大的名片盘，一面斜挂的玻璃鏡。我們通过两道白珉瑯門。其中一道上写着“候診室”。那个妇人敲敲一道装有无光玻璃的門。

“进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应道。但那不是佛兰茲的声音！

一个身材高大头发灰白的男人向我們走来。出了什么事嗎？但是訊号在那边呢！

“卡尔先生嗎？”

那个男子詢問地望着我們。

“是的，就是我。”

“請坐一会儿。佛兰茲馬上就会来的。”

那个男子走出房去。

“真有趣，”罗塔克尔悄声說，一面搖頭。

卡尔——他只能从佛兰茲那里听到这个名字。但是我还是照样感到緊張。我們坐下来等了有一会儿。听不到一点响声。罗塔克尔的手指不安地在桌上摆弄。然后佛兰茲终于进来了。

“佛兰茲，我們以为……”

“……你們落入陷穽了！”佛兰茲笑道。

他的灰色眼睛閃亮；他把手摟着我們的肩膀。

“我在另一个房間里跟別人談着話。沒有必要让他見到你們。”

我們圍着桌子坐下来。

“你們都怎么样？”

“我們全都很好，”罗塔克尔回答。

“家里呢，揚？”

“他們問你好。一切都很好。前天我还見到凱蒂來着。”

“代我問她好。你們的工作進行得怎麼樣？”

“工作照常進行。只是——”羅塔克爾猶疑不定。

佛蘭茲把手放在桌上。他沒看我們。

“普勒斯被抓走了——海爾黛跟我說啦——”他輕輕地說。

沉靜。

“在貼傳單的時候，海爾黛說。”

“是的。”

“他在巴比大街——政治警察營房，”羅塔克爾說。

他望着地板。他的聲音顯得多么疲憊呵！他很需要休息一下了。

“他們一定也在找你呢，”羅塔克爾說。

佛蘭茲聳聳寬大的肩膀。

“那很可能。你們沒告訴海爾黛關於庫爾格爾的事很好。不然只會叫她担惊受怕。”

“他們放了達梅爾特。”

“他們放了嗎？”

“當真，我們已警告過所有的同志。他跟其他人沒有聯繫；好象很頹喪。他們曾狠狠地打他。而且他也丟掉了差事，當然。”

又沉默下來。羅塔克爾摩弄着台布的邊。

“你們照顧了被捕的人的家屬沒有？”

“我們給他們捐了兩次款。”

“也向買賣人那兒捐嗎？”

“是的。向兩個我們很熟悉的捐了款。”

“沒有食物嗎？”

“食物？沒有。”

“这方面你們也必須試試。”佛兰茲用食指叩打着桌子。“我們在这个区搜集到不少食物。”

罗塔克尔和我同时轉头望着門口。外头甬道里有脚步响声；那套房間的門开了好几次。

“沒有什么，”佛兰茲說。“医生在应診。那是我們最好的掩护。”

他抓抓头。

“我还想問你們一些事——跟木屋区的联系。你們找到了代替斯特魯貝尔的人沒有？”

木屋区。我們說不出話来。佛兰茲疑惑地望着我。罗塔克尔猛然地說：

“你認得赫伯特·茲梅克，不是嗎？”

“从斯特魯貝尔的地方来的——被納粹网入倫琴大街案里去的那个？”

“死了，”罗塔克尔木然地說。“才二十一岁——”

房間里現在靜下来了。佛兰茲用手捧着头。罗塔克尔脫下眼鏡，用手捂着眼。他看来憔悴不堪。

“冲鋒队用摩托車包围起木屋区。茲梅克从他的小屋里逃出来，翻过栅栏，沿着小道往前跑，吓疯了。那是过午不久的时候。整个木屋区在瞧着这场逐猎，人追逐人——”

佛兰茲坐在那儿，沒有露出听进一点痕迹。

“他們开枪打他。子彈打中背后。于是一輛摩托車开过来，突然停住。他們把他拖进車斗里。他的母亲追在他們后面，发狂地呼叫。他企图在大街上，在夏洛登堡区法庭附近实行自卫。

他把司机的手推开把手。車子翻了个。司机摔断了几条肋骨；他还在医院里。”

罗塔克尔望着桌子；只見他的嘴唇在动。

“在迈科斯基营房里，他們把他打得稀碎。他是納粹案件中他們不得不釋放的八個小伙子中第二個死去的。……他的媽媽发了狂……逢人訴說她的兒子被謀害了……”

佛兰兹还是坐着一动不动。

“汉堡的國會議員，乔治·斯托尔特，前几天才埋的……另一个迈科斯基营房的……”

外头鈴声大作。我們絲毫沒有理会。

迈科斯基巢穴——今天在德國有多少象那樣的地獄呵？

几天前戈林頒布一道新命令。

“凡是侵犯冲锋队、党卫队和鋼盔团的將处以死刑。”

侵犯？凡是自衛的都成了侵犯者！

佛兰兹终于抬起头来。

“看来似乎他們——”他沒有說完這句話，但从我們身上移开他的視線。

我回答。

“看来似乎一切都在准备来对付我們的。他們逮走了我們的派报人。他是另一条街的一个同志，原是为了以防万一的，因为我們全都太出名了。我們不明白他怎会被捕的。那是我們头一趟想到我們当中出了奸細。現在我們正在監視和考查所有其他的同志。他还有五份報紙。他們逮捕了五个买報紙的人。他告訴他們那些人的名字；他們敲打他直到……”

“难道我不知道——？”

“乔治·克吕培尔。三年徒刑。他們在判決书中說，由于他

曾是一个党的工作人员，不考虑予以宽大处理。”

佛兰兹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罗塔克尔说，“你每次都在考虑你是否应该回家。可是，一旦你在那里，那你就象坐在火砖上。我在战壕里也有这种感觉。你奇怪怎么还活着。”

他举起双手，让它们无望地落下。

“我有一个家——又没有钱，”——他的声音坚定起来——“但是我们不愿离开！除非到情况最坏的时候。”

“在那次揭幕礼中大声疾呼的两个妇女——”

佛兰兹转过身，询问地瞪着我。

“——一个被判徒刑一个月。他们没逮捕另一个；她有了八个月的身子。”

静默。

然后佛兰兹说：

“现在我们已弄出点新东西。一道来，我给你们看看。”

我们穿过接连邻室的门。地板上铺着厚厚的地毯，围着一张抽烟的桌子放有靠椅。在一架大钢琴上头挂着一幅油画。我曾有一次展览会上见到过象这样的一幅麦迪亚^①。佛兰兹向过道里瞄一瞄。没有人。我们向左拐个弯。身后一道门打开。一个女人低声地说话；一个男子的声音回答。佛兰兹领我们走进一间小房子。墙上装有橱柜。上面放满玻璃瓶，锡盒和木夹。房间的左角上放着一张小桌。

“这儿就是了，”佛兰兹说。

桌子上放有一块木板。板一端用铁丝捆着一个小洋铁桶，

① 希腊神话中的女神。

另一端一块硬紙板卷成一个圓錐。薄紙卷起来放在紙板筒里。佛兰茲从洋鉄桶里抓了一把东西。紙板筒向下墜。

“沙子，普通的沙子，”他說，摊开手心，露出手中的东西。他指指洋鉄桶。

“在这儿桶底上有个小窟窿。小洞里塞着紙。整套东西装在一栋临着繁华街道的房子的屋檐下。”他微笑。“怎么啦，你們两个高兴得象小学生似的？”

“怎么不是呢！”罗塔克尔回答。

我很喜欢这个玩意儿，罗塔克尔看来年輕了好几岁。

“紙栓在最后才拿掉，”佛兰茲解說道，“沙子慢慢漏出鉄桶，于是紙筒和鉄筒再不平衡了，紙筒愈来愈重，向街上沉下去。

“好得很，好得很。”

“我們已經試过两回了。要过几分鐘紙才会从紙筒里掉下去。此外我們还用很薄的紙，这样它們可以慢慢地飄下来，有时可以被风吹走。当然，开始装时要平衡些。”

“我們也可以来試試。当情况安定下来一点的时候，”我說。

罗塔克尔点点头。

“它既簡單又安全。让海尔黛告訴我們它工作得怎么样，可以嗎？”

“那是一定的。”

* * *

在回家的道上，我在烏尔斯坦公司报摊前停下来。我們一个个地走开。罗塔克尔先走。

警察搜查的結果

“昨天中午十二时在各列火車、汽車上进行一次非常突然的搜查，取得了具体成績。发现煽动性傳单……共产党的信件……”

还有六个人在看这条消息。我私下看看他們的臉。他們表現出一付非常冷淡的樣子。如果他們是納粹黨徒的話，他們就不会这样毫无表情了。而且他們会发表一些滿意的言論。

* * *

昨天我碰上了危急情况。我騎着自行車上邻区找一个同志。我必須从他那儿为我們的報紙搜集一些关于冲锋队的第一手情况。我去到时，他正跟老婆在一块吃晚飯。他們拚命的劝我，直到我坐下来和他們一道吃飯为止。我們互相介紹彼此在非法工作中的經驗。长久地談論了即将开庭的国会縱火案。那个同志对我說，他們已組織起定期的收听广播夜。他們有許多五、六个人的小組，收听莫斯科电台广播的德国新聞，特别是关于即将开庭的审訊。在国外已掀起了强烈的反应。知名的外国律师共同組成一个委员会，决定在英国举行一次反审訊。正在准备一本包括文献性証明材料的书。其內容将十分清楚地証明縱火的就是納粹黨徒。他还告訴我，两个社会民主党的同志已建議使用他們的住宅和收音机。我告訴他，我們不能組織广播收听夜；我們目下的危險境地已很够瞧的了。

我从他那儿学习到許多新东西，但当我最后看看表时，早已过了十点鐘。我犹豫不定。这样晚，还帶有非法的东西？但最后我放掉自行車的前輪的气，把外胎卸下来，把材料裹在里胎上，再打足气，騎走了。

夏夜一片宁靜。不久我轉入一条寬闊荒涼的街道。自行車

好象自动地在水泥的自行車道上滚动。还有好一段路。街道两旁是贫苦工人的木屋区。在几家木屋前吊着五彩的中国灯笼；不知什么地方在弹着曼多林。街中心耸立着两行树，树旁是自行車道。当中是孤零零的长椅。苍綠的树叶在街灯光下看来象是假的。这儿是多么的安静。在城市的中心。我本該和凱蒂一起出来騎車。我們或去游泳，或在附近游玩。那將是多美好呀。輪子轉得好快。我底脚机械地蹬着踏板。椅子上坐着几对恋人。匆忙的瞧一眼发现右边在人行道上有黑压压的一团。此外，就活象在沙漠里。但終有一天会大变的。一陣恐惧打断了我的思潮。两声、三声、四声，一个突然的爆炸。是車胎炸了嗎？那就是最后坏事的因素了。我的脚依然踏着踏板。我往下瞧瞧輪胎；它很好！我头顶上有什么东西嗖地飞过。那儿有人在喊。我轉过头来。身后的人行道上有黑影在奔上来。他們喊的是我吗？突然間我听懂了那些話！“站住！站住！站住！”我捏住手閘，跳下車来。“冲锋队！他們逮住你了！”我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現在他們走过来。五、六、七个人，我数着。这个意外使我腦子完全失去作用。前头两人拿手枪对着我。我的双手紧握在手閘把上。

“为什么叫你，你不馬上站住，你这个混蛋？”一个冲锋队朝我吼道。

他的手枪仍然对着我。金属发出阴沉的閃光。

“……我不知道……你們是在喊我……”

“当一个冲锋队叫你的时候，你就得停下来，混蛋！”

“給他下巴来一拳——給他下巴来一拳！”他身旁的一个冲锋队高声叫，他把手枪筒插向我的胸膛。

“先搜他一下，”头一个人粗暴地說。又对着我，“把車子放

倒，你这个混蛋！把手举起来！”

我服从了。“把車子放倒。”他們会不会想到——我的心在狂跳，但是我已鎮定下来。他們摸遍我的馬褲，特別是靠近膝盖的加厚的地方。

“把口袋翻过来！”

我照做。街上連个人影都沒有——如果他們真要……？如果他們問我住在哪里呢？我在这个区干嗎？我的腦子拚命地思索。他們允許我把鑰匙、梳子和两条手帕放回去。我能藏了些什么？我只穿了条馬褲和一件网球衫！“最好裝作害怕的样子；那末他們自以為是大人物，就滿意了，”我不安地想着。同时他們也忘了打我下巴一拳了。但是手枪还在那里——他們站成半圓形圍着我。难道他們以为我要逃跑嗎？胡扯。前头，左手边的那个，好象是个带头的。啊哈，他的制服領上有顆星——是个队长！

他把手枪把搥一下我的肩胛。

“你上什么地方来着？”

“……我上朋友家来着……过生日……”我呐呐地說。

他威胁地瞪了我一会儿。其他的人呢？他們是在听候命令嗎？

“好吧，走吧！”队长喊。“現在你总知道了！当一个冲锋队叫你的时候，你必須立即停下来。你明白了嗎？”

“明白了，”我忐忑地說。

队长看看其他的人，微笑了一下。“他怕得要死了，”目光似乎說。其他人也笑了笑。

註他們笑吧，我不在乎。我一言不发。

“滾吧！快！”他又朝我喊道。

我推着自行車走了几步，然后騎上去。一定不要蹬得太快了。保持鎮靜。他們肯定是在搜索我——車胎里的材料。

*

*

*

罗塔克尔来找我。我們將一起上失业登記所給他領失业救济金。他說，如果我和他一起去就会安全得多了。登記处象往常一样地拥挤，办公的職員們忙得顧不上跟人們打招呼。最近几星期来，他常常告訴我們，失业者已不象开头那样害怕納粹恐怖了，他們已經开始，虽然还是小心翼翼地，批評起希特勒的独裁統治政治来了。我們把这一点写在我們的地下報紙上。

在我們走过发电厂时，罗塔克尔用臂肘輕輕碰我一下。在发电厂和木屋区之間的狭街上，佛兰茲曾沿着这条街道跑走的，豎立着一根街灯柱，上面釘了一块写着“藻里茲街”的路牌。这个新街名不久以前还没有的。大概是納粹头子們后来才想起了，對他們所大事吹噓的关于藻里茲和迈科斯基之間的同志愛，應該有一个公共的标志。藻里茲是在“胜利夜”被打死的。于是他們便在紀念迈科斯基的牌坊下，为藻里茲立了一个銅碑。在立碑典禮的那天，举行了一次由三十三支队和警察师的閱兵游行。

我們折入柏林大街。罗塔克尔往周圍一瞧。

“怎么，那不是……”

果然是艾迪！他已經見到我們，并且向我們走过来。

“好呀，弟兄們，”他說着，握起手来了。

“穿得这样漂亮是去吃大菜嗎？”

艾迪身上穿着一件藍衬衣，戴着一頂淺色的呢帽。方格的衬衣上打着一條彩色的領帶。他还安上玻璃假眼。

“你們不全看出来了吗？”他笑吟吟地說。

他的那只好眼向我霎霎。

“有什么特殊‘任务’給我們嗎？”罗塔克尔問道。

艾迪側过头不好意思地看着他。

“不，今天沒有。我正往小妇人那儿去。今天是她休息的日子……”

“原来是这样，”我回答。我真想笑出来了。有一次他把女孩的事告訴过我。她給人家当厨娘。他开玩笑地叫她做“三明治机器”。

“也应该經常去玩玩了，”艾迪点头道。他用他的手帕抹着他的玻璃眼珠。

“它刺痛得象刀割一样——但是我不敢不戴上它，”他解釋說。他接着說，“好呀，伙伴們。不該让女孩子等着呀！”

我們繼續走下去。走过了夏洛登堡市政大厅。从厅頂的角楼的窗戶里，两幅卅字大旗垂挂出来。左面，是一幅黑白紅的三色旗。人們从寬大的石阶上走上走下。人行道上挤滿了人。誰也沒有朝上看一眼旗子。我們是唯一的那些一看到这种旗就怒火冲天的人。难道別的人就甘心忍受这些事情嗎？难道它已成了他們的生活的一部分，成了似乎是无法改变的事了嗎？

在我們前面，一小群失业者正站在紧挨着市政大厅后面的威廉廣場上晒太阳。只要看一眼他們身上穿的磨破的衣裳、破旧的鞋子，准能把他們認出来。这幅景象喚起了快乐的回忆。我們那一群慣常也是在这个时候站在这儿，并且互相进行爭論。

失业登記所是在下一條街上。上百的失业者在廣場周圍走着。在希特勒政府剛上台的头几个月里，誰都不敢在这儿逗留。因为那样会引起許多的怀疑。我們靠着人群中的一群停下来。我看得很清楚，不少人正在參加談話。現在他們双手插在口袋

里站在那儿，倾听着一个身材瘦弱、一头黑发的小伙子的議論。他不絕地講下去，其他的人給他的鬼話打气。

“……而当我拉起釣竿的时候，”——他用右手在他的左臂上量了一下——“一条这样长的梭子魚，千真万确的。”旁的人呵呵大笑起来。在我听来笑得很勉强。他們当中似乎誰都不注意我們，但是他們显然是在估量我們。

“想来偷听嗎，”他們的眼光里透露出这种意思。

我們离开他們。

“他們已經从起初的駭怕中恢复过来了，不是嗎？”罗塔克尔說。

在通往失业登記所的那条短街上，小攤和手車一个挨一个地摆在路旁。貨主們向长列的失业者队伍介紹自己的貨色。在少数攤子周圍挤滿了密麻麻的人丛。那里陈列着“日用品的新发明”。在这儿买卖都是用小角子成交的；因为必須迎合顧客的购买力。五片剃刀片值十个芬尼克，“上等小牛肉腸子”也是十个芬尼克。“新专利”領帶別針卖十五个芬尼克。这当中还有几輛水果車，甚至还有一个驕傲地竖着一面牌子的小攤，牌子上面写着：“修鞋即时可取”。人造橡皮鞋跟每个只要一个馬克。修理起来一釘就得。“还有不少傻瓜在逛来逛去呢，”罗塔克尔說，指着一个站在布帳篷下的算命的。密麻麻的人群包围着他，大部分是妇女。他头上纏着一条彩色的头巾，身上穿着一件粘滿了銀光紙做的星星的长袍。一对长长的黄色耳环在耳朵下晃蕩着。他不停地扯动着一条鍊条，使得玻璃球上的小人形上下跳动。

阿姆斯特丹的小人儿，
聰明又智慧，他能知一切。

在一块大木牌上写着：“預見未来——只收十个芬尼克。”旁边放有一匣星相图。

算命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繁华的庫尔菲尔斯坦达姆，他們特別多。在这儿他們自命为“預知未来的科学家”，他們的相金是相当高的。在新第三帝国^①有成数十种星相家的报纸出版。哈努森已在倡导一种新的精神学說。

失业登記所設在一家倒閉的工厂里。我們穿过了第一个鋪鹅卵石的院子。在地上一层的右边的房子里閃亮着一盞明亮的灯光，这是試驗蒸汽发动机的實驗室。一长排一长排的人挨着實驗室站着。他們的臉上还没有印上那些多年沒有工做的人的絕望的表情。他們的衣裳还算不坏。这是那些失业还不久的人。再过几个星期他們将要依賴救济所了。罗塔克尔必須走到第二个院落去，那是非熟練工人登記的地方。他有意在这儿給自己登記上名字，免得他为了謀得一个熟練工人的位置而等得太久。在出納室的对面立着一所飽受风吹雨打的小木房：这是为那些承受救济所恩賜的人而設的大厨房。失业者把它叫做“湯匙賑济”。門上挂着一幅卍字旗。透过玻璃窗可以見到冲锋队制服。不到一个鐘头这儿就会挤滿了失业者。救济所分发食品卡片，拿到卡片的人可以用几个銅板买一碗食物。在領卡片的人当中有不少人是那些害羞的中产階級下层人物；他們用双耳鍋把食物盛回家去。在早先的日子里，失业者經常把食物捧到市政大厅里的議員們面前表示抗議。食物往往是一碗深褐色的液汁，上面飄浮着几块土豆和其它蔬菜。液汁里一点肉都沒有，而且是半生不熟的。到市政大厅去的抗議游行已經停止了，

① 指希特勒統治下的納粹德國。

但是吃的东西还是那样坏。

“如果你容忍这种情况的话，你就只是一根通管罢了。”艾迪有一次发表意见说。

登记室里挤满了人。这是一间肮脏黑暗的房间。墙上有用大字写的格言：“诚实是最好的政策，”和“一块滚动的石头上长不起青苔来。”

房间中央排着一行矮条凳。上面全坐满了人。人们坐着，一堆堆一撮撮地争论着。其他的人就在凳子上用破旧的纸牌玩开了。几百个声音汇成朦朦眊眊的低音，充满了房间。空气里弥漫了烟气和烟草、汗臭的气味。办事员们坐在木栏杆的后面。内中一人穿着冲锋队的制服。他们隔一会就大叫一次名字。人们在两旁排成长行，等候着给自己的卡片打印。罗塔克尔加入他们的行列。

“我在这边等你。”

“好的。”他点点头。

这儿看来好象一个可疑的叛乱者集会。在矮凳上，人们几乎是跪伏其上。烟雾缭绕，交头接耳地谈话使得空气中充满了单调的嘈嘈声。只有少数人身上的穿着较合时宜，绝大部分人的衣裳都已发旧了，并且满是补丁。年轻的脸庞、年老的脸庞、不修的面容，全都带着同样的愁苦的神情。我认出几个同志。其中一个对我微笑。他还戴着我们的防卫组织的蓝鸭舌帽。帽檐正中有一处深蓝色的印迹，这儿的蓝布尚未脱色。一枚反法西斯帽花曾别在那上头。少数人在交头接耳；他们的表情和姿势都告诉我他们谈的什么事情。政治。难道冲锋队头子们准许举行这种集会吗？他们的特务会密告这些谈话吗？但是人们分明已小心掩饰了他们的谈话。在一张桌子上挂了一块牌子。用

粉笔写的大字：“招募农业工人”。

沒有人到那張桌子跟前去。

一只手搭落在我的肩膀上。我猝然轉过身来。

“你在这儿呢，揚！”

“你也在这儿嗎，庫尔特？”

庫尔特握过手，把我拖往一張凳子上。已經有三个人坐在那上面。他們停止談話。有一个偏促地裝他的烟斗。他狐疑地看着庫尔特。

“繼續談吧，”庫尔特說。“这位朋友沒問題。”

三人又把头聚攏在一起。

“‘事情’怎样了，揚？这些日子来我們听不到一点关于你的消息。”

“你能听到什么呢？今天好，明天坏。我又不是大人物；不能知道一切事情。”

庫尔特把帽子往后腦一推。他同情地笑起来。他有一付多漂亮的牙呵。他看来还是跟过去一样的健壮。

“是的，确是那样。”他說。

庫尔特是斯特魯貝尔的木屋区中的一位年輕的同志。往时我們常常一起貼标語和在墙上写标語。但是打最后一次見過他以后已有好久了。現在我們跟木屋区的联系，是通过那个过去跟我一道去拜訪斯特魯貝尔的瘸子进行的。可是，庫尔特对于这一点是什么也不知道。如今这是一个紀律。我們只在我們那条街上两个、三个地碰头，安排事情，和印刷我們的材料。其他的同志，五人一小组，負責分发我們的材料。

“你听到过关于斯特魯貝尔的什么消息嗎？”庫尔特問。

“沒有。什么也沒有。”

“但是我知道。”

“你知道嗎？”

“他在克尼希斯符斯特豪森。他給自己蓋了一間泥屋。他仅是勉强維持下來——但是他再不受‘蟲子’^①之累了。”

“你見過他嗎？”

“見過。我騎自行車去的。”庫爾特干笑了一陣。“他們給他‘麵包和工資’！幫助農場。強迫勞動。但是他不能不干。還有那工資！一星期十三個馬克，有一個老婆和一個孩子。他所得的和這兒所救濟的差不多。”

他更靠攏來。

“他們四出找尋工作，我敢對你說。他們弄干了農村里的池塘，把濕泥運走。用田里挖出來的石頭鋪路！”他捶了一下膝蓋。“而這就是所謂支援農民。你真應該听听他們是怎樣地在咒罵呢；他們簡直氣瘋了，我可以說！因為他們必須給這一切付錢。即使池塘底有泥，鴨子還不是一樣的游水嗎？而對農民們來說，道路原來就蠻好的嗎？”他冷淡地補上几句。

“但是我們不明白那是怎麼回事。那是提供就業呀！”我反口答道。

但愿他知道更詳細的情形；我們可以把它們用在我們的報紙上。庫爾特的鄰人定必已听到了最後一句話。他轉過頭來。他長得一头火紅的頭髮，一臉雀斑。

“他們是從這兒把他弄走的嗎？”

“他自己去的。不得不去。在這兒覺得不‘太好’，”庫爾特回答說。

① 蟲子暗示納粹秘密警察。

紅头发指着面前的木牌。“招募农业工人，”他說。“听来很好，不是嗎？他們已弄走了好几千人。假如你不肯去，他們就停掉你的可怜的救济金。混賬的家伙！而且終有一日你会发现自己在柏林的戶籍簿上被除了名；你再不是柏林市的人了！”

“什么？連熟練工人也一样嗎？”

“当然。訓練一个农业工人不需要多长的時間。你只不过照他們所想的做，之后你便被禁止回到柏林来。”

庫尔特摆出一付演說的姿勢。“把新移居的东方犹太猪赶出城去！这是他們慣常說的。現在他們把柏林生长的人赶出去！那些家庭会怎么样呢？”

我小心翼翼地朝四下里看。他們两人說得太响了一点。犯不着冒这个險——但是誰也不来注意我們。

“他們为什么要关心——那些家庭呢？”紅头发回答說。“我認識一些这些家庭，他們彼此都遭其难。他們不得不把孩子留在家中，把女人送到田里去。其中絕大部分一开始就把家庭一起搬去。这样納粹才确实認為他們永远除掉。”

“熟練工人，”庫尔特若有所思地說。“但是这簡直是瘋了——把一个高度工业化国家的技术人員送——”

“就是发瘋嘛，”紅头发打断說。他轉过来直向着我們。“我的孩子在劳动服务^①。前几天休假回家来了。他們在开垦野地。他說地里全都是砂子和石块。請問，这上头能长出什么来呢？”

他把脑袋朝前探，似乎在等待別人給他一个答复。

① 劳动服务是希特勒奴役青年的一种强迫劳动。凡年在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都要被征服务。其目的是想用人為方法縮小失业統計数字

“他們用鏟子把砂子裝到卡車里去。請注意，那是山。把山挖成洞。鏟不動的地方，他們就用掘齒機。但是不是用機器直接把砂土裝到卡車上——噢，不是的；那樣會使工作完得太快了。小伙子只好用鏟子把它們裝上車。”

他用手指叩打庫爾特的胸脯。

“他們盡量把工作拖長來做。他們不知道如何給小伙子們找到工作做。小伙子們不值幾個大，他們就只喝點湯水，那種湯水只不過是帶味的水罷了。而且睡在板床上。到處看來都是他媽的一模一樣。只要失業的人數一天還沒有多到出亂子的地步，就會是這樣。”

“得空你可以找機會去看看他們的真實情況。”庫爾特說。

“現在你打算怎麼樣呢？”紅頭髮苦笑着說。

我四處張望找羅塔克爾。他似乎還未登記完。這些時刻以來我一直注意着他的那排行列。

“听着，揚。”

“說下去吧。我听着呢。”

“我的鄰居有一個表兄弟在兩天前提從東普魯士來看他。他是個機械士。想在這兒找份工作。他說他一直就渴望在柏林工作，看看柏林的風光。他的親戚被他這份樂觀勁驚倒了。‘但是，保爾，難道說你不知道柏林已經有多少失業的人嗎？’一開始他還不會明白過來。然後他從口袋裡摸出一份東普魯士當地的報紙來，開始念道：‘在阿道夫·希特勒的繁榮政府上台後幾個月內，柏林的金屬工業現在正僱用着柏林的全部金屬工人，現在正從其他地區吸收金屬工業的熟練工人……’”

紅頭髮用力拍着膝蓋，哈哈大笑。

可是現在這樣未免太鬧了一點。羅塔克爾在哪兒呢？

“我得走了，庫尔特！”

“好吧。打起精神来，揚。”

“一定。”

罗塔克尔现在快接近小窗口了。在他前面只有三个人。我站在一旁。

“你是犹太人嗎？”小窗口內的一个冲锋队员問一个戴着一頂尖頂便帽的蒼白少年道，他剛看罢他的證件。

“怎么？难道我看来象一个犹太人嗎？”少年反問。

那冲锋队员把臉孔貼近小窗口。

“我問你是不是一个犹太人，”他大叫。他把那小伙子的保險卡片在空中揮舞。“它和农場工作有关系。不派犹太人去的。”

“哦，原来如此——好的，不是。真可惜我不是。”那少年回道。

“你最好当心点你說的什么，”冲锋队员怒冲冲地說。“一樓二号房間，到交通室去。你的卡片留在这儿！”

小伙子走开，喃喃地說了几句，我听不清楚。在这场對話中，我注意着行列里的人。他們互相用肘撞撞，湊着耳朵說上几句。几个坐在凳子上的站起来，吵鬧的声音引起了他們的注意。他們的臉十分清楚地流露出对那小伙子的同情。那个冲锋队员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点的！罗塔克尔微笑着向我点头，好象在說：

“你奇怪了吧，是嗎？”

在那之后他的卡片馬上就驗印完了。

“那是个吹牛的家伙。奇怪他們不把他抓起来，”我悄声說道。

“他們一天就得抓上好几十，如果他們根据这种綫索动手的話，”罗塔克尔答道。

我們向出口慢慢地走去。我把和庫爾特的談話告訴他。羅塔克爾細心地听着。

“他沒有什麼問題，”當我說完了以後他說。“但是他一點兒都不知道我們跟木屋區的新聯繫。”

“這正是我所想到的。我是根據這一點而對付他的。”

當我們走下門外的石階時，羅塔克爾突然捉住我的手臂。

“揚，這兒有點不對頭！”他喘息說。

他放开了我的手臂，大步跳下石階。

什麼事？什麼事？危險。它象一記突然的打擊似地觸動我。於是我看見羅塔克爾跑過院落，向一個婦女跑去，她正從來來往往的人群中擠向出口。她不斷地轉過頭來，好象在找某一個人似的。現在她看到了羅塔克爾；向他跑過去，握着他兩隻手。我可以看到她激動地告訴他一些事情。羅塔克爾把她拉到一旁。

留在這兒。如果出了什麼錯的話——我們倆都脫不開——但是我曾在哪儿見過這個女人呢？那個圓圓的臉孔、一頭黑髮？我費力地想，但始終想不起來。她一定是在工作當中直接就來了；她還穿着她的藍帷裙。她說下去。羅塔克爾緊站在她跟前，他的嘴半張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一定是和他有關係的。我小心地朝四下里張望。沒有人注意他們。失業者川流不息地來來往往。我等了又等。

那個女人終於走開了。羅塔克爾四下里看了一看，然後向我走來。一定是發生了一些可怕的事。他的臉蒼白得象死人一樣；眼鏡後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然而沒有一點神。他默默握着我的臂膀，把我拖到大街上。他的雙唇抖動着。我想問他出了什麼事，但是說不出話來。我的喉嚨里有一種窒息的感覺。羅塔

克尔终于断断续续地、几乎听不见地说起来了。

“我们的邻居——艾尔丝派她来——到这儿找我——”

一阵间歇的停顿。我紧握他的臂膀。

“冲锋队在我們家里——他們走开了一会儿——艾尔丝才能告诉邻居。她要和孩子一道到警察局去——两个冲锋队员在門洞捉住她——他們正坐在屋里——在等着。”

罗塔克尔沉默下来，直瞪着前面。冲锋队！冲锋队在罗塔克尔的家里！为什么正好就在他的家里？我領他离开熱鬧的摊市轉入旁街。他让他自己象小孩似地被人領着；似乎一点都没发现到。

“艾尔丝向警察要拘票看。他們只对她发笑。冲锋队亲自出馬。三十三支队！連特別警察都不用！”他看着我。“你想得到嗎——沒有我們知道的任何理由——？”

“一定是又一个告密者的事件，”我嘆息地說。

罗塔克尔默默地点点头。一个告密者！我没有办法不这样想。那个没有人認識的傳送报纸的小伙子，两个礼拜以前被捕了——而現在临到罗塔克尔！我想到每一个同志。能够是誰呢——但是現在沒有用了；首先必須照顧罗塔克尔。

“你当然不能回家了，艾力希。騎車子到佛兰茲的新区去。你可以在他在这种情况下为你安排的地方呆下来。在拉姆普累赫特。”

很久罗塔克尔沒有答話。

然后他說：“在我不象佛兰茲那样簡單。艾尔丝和孩子会遇到什么事呢？家里呢！救济所不会再发給救济的了！”

“艾力希，你知道我們会照顧她們的。我們現在不能說以后会发生什么事。第一件事是，你必須立刻离开！”

罗塔克尔猛然轉过头来，直望着我的眼。

“如果他們把艾爾絲捉去呢？因為他們找不到我呢？”

我用胳膊摟着他的肩膀。

“我不相信那回事，艾力希。”

他沉默了一会。我們轉過街角。这儿街道上空空無人。

“只有冲鋒隊——沒有警察局的拘票！”罗塔克尔說。“我必須探明警局方面是不是知道這回事；一切全都看這一着了！”

“但是你不能夠……”

“為什麼不能夠？我上我們那儿的派出所去。我的身分是‘清白的’；不可能有什麼特別原因——不管怎樣，那會出什麼事呢？”

我極力想使他接受我的意見。但是罗塔克尔很頑固。

“那末好吧。我送你到拐角那儿。我在那儿等你。”

罗塔克尔越過街道走入派出所。我慢慢地踱來踱去。警察！比起冲鋒隊來，他們成了為害不大的敵人。我知道在一些場合中，那些被冲鋒隊追索的同志在最后一刻向警察局投案。至少警察局監牢常常可以使他們避免了“逃跑途中射殺”。

在派出所里罗塔克尔要求見警長。值班的警官狐疑地看着他。

“關於什麼問題？”他問道。

“我參加過戰爭，而我要求給我特別照顧，這我只能告訴警長。”

那警官想了一会。“請稍等一下。”他說。

几秒鐘之后他轉回來，趾旁邊房間的門开着。

“到这边來！”

警長是一個灰頭髮的人。他坐在一張寫字檯前，上面挂着

一幅希特勒的相片。这使得罗塔克尔不那么自信了。

警长厌倦地指一指写字枱旁边的椅子。

“請坐”；然后：“我能帮你什么忙呢？”

罗塔克尔說出了自己的姓名和地址，然后把事情告訴他。在整个談話中他看着对方的臉。它一点表情也沒有。那个人一語不发地听着，他的手里玩弄着一把裁紙刀。罗塔克尔又一次談起他的战争活动，叙述他受的伤，最后說，“我一点都不明白。想要問清楚你們这儿是不是掌握什么不利于我的材料，要是有的話，是什么？”

警长瞪着他。他有一双藏在粗濃的白眼眉下的清晰的眼睛。

“你还没有回过家吧！”他問。

“沒有。我是在路上听說的。”

“这点不該說，”話剛出口罗塔克尔就想到。“但是要是沒說的話，我怎么听說的呢？”这个問題提得很巧妙。警长站起来，在房間里踱来踱去，然后在罗塔克尔跟前站下来。

“我們这儿没有什么要控訴你的，罗塔克尔先生，”他說。

然后，經過一陣短促的沉默：

“我們无力改变事态！”

他又开始在房里走起来，回到罗塔克尔跟前，放低了声音說，好不叫門外听得見：

“我再說一遍——我不能給你什么忠告，罗塔克尔先生。”

“他是那种老派人物，”罗塔克尔滿意地想道。他知道警察方面对冲鋒队是毫无办法的。但是他确实曉得警察方面沒有參預那桩事，这就是說他們对他的非法活动一点都不知情。他有禮地謝过警长。后者甚至把他送到門外……

当罗塔克尔把經過的情形告訴了我，我又跟他爭辯說，現在他唯一可做的事是到拉姆普累赫特那儿去。最后他同意了。我看得出来，他主要担心他的老婆和孩子会遭到什么事故。我答应尽我一切去做。

形势絲毫沒有改变。的确，冲锋队离开了罗塔克尔的家，但是他們每天都轉回来，我們也肯定那栋房子是繼續被監視着。在邻居的帮助下，我們搬走了一切拿得动的东西。在約定的时刻，艾爾絲和她的孩子也失踪了。屋里其它的物件被房主沒收來抵房租。

几天后，从西里西亞边境上的一个村子里寄來一封預先約好的信。一个亲戚叙述今年的好收成。她写道大家都健康快乐，然后在信的末尾告訴我們关于村子里的老牧羊人的死亡。我們确是很記得他；他現在在天堂快乐无比。

罗塔克尔和他一家人已逃亡出国了。

經区委会同意后，我們停止了一切报纸和小册子的宣傳。（只有通过区委会的中心組織我們才能那么快送走罗塔克尔和他的家人。）委员会的同志們，还有弗兰茲，都相信我們最近的失手不是偶然的。現在我們完全肯定了，當我們在我們的派报人被捕时怀疑一个奸細是正确的。不然的話，冲锋队怎么会找到罗塔克尔——小組委员会委員的身上来呢？还有，自从罗塔克尔失踪之后，其他两个同志被捕了。他們只不过是訂閱我們的报纸的同情者。从他們那儿找不到什么。

我同施維布斯和泰謝特一起，十分彻底地把事情研究一番。在討論过程中，我們判断从最近的事变中来看，有两个同志不太象样。暂时得和他們断掉关系，不让他们知道，而且我們还得繼續考察他們。然后我們找到所有可靠的同志，告訴他們目前只

作口头的宣傳。我們給他們安排新的会面地点，还有委员会接头的地方，我們甚至把这些工作分派給其他同志。我們警告他們每个人不要留下任何紙片。接头的電話號碼，日子和時間，必須熟記在心头。不得已时，可以用能够很快吞得下去的薄紗般的小紙片。我們給同志們提出了許多可供討論的題目。物价仍然在上漲着。不滿的情緒正在傳播到中产階級中去。現在許多过去一貫投希特勒的票的人也埋怨起来了。那些还有工可做的人，經過苛捐杂稅和不断的“志愿”征收，工資損失了四分之一。这使得东西更加貴了。但是独身的人更是怨声载道。他們繳納的苛捐杂稅因独身稅而加重了。最近在鋪子里买东西的时候，曾經听到了两个典型的关于新局势的意見。一个衣着考究的妇人，戴了一个納粹的徽章，問伙計要一磅燒肉滴下来的杂油。

“燒肉油？”伙計照問了一句，他似乎是很熟悉她的，显得很驚訝。

“是的。如今有誰买得起黄油呀？”那妇人回答說。

“可是你才得到了一套很好的新房間呀。”

“是呀，那倒是真的，”那妇人說，接着便不往下談了。她必定認識到她已經說走了嘴了。

另一个例子是，一个中年的男子向水果商抱怨說，他每个月光是独身稅就繳了九个馬克。

“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快結婚，”那妇女回答他。

“那真是个好主意！”男子大叫道。“难道你不曉得嗎，两口子加上一个小孩的每月工資已經規定为一百二十个馬克？如果老婆找到工作，而他們两人的进項加在一起超过了規定的數額，就被算成双倍的收入。”

“你說对了，”女水果商回答說：“那样他們就不愿結婚了。”

我觉得奇怪。买卖人一惯是最难得露口风的。他们确实是很怕把买卖给弄掉。

在希特勒上台以前，纳粹的报纸经常把这些捐税叫做“黑人税”。

是的，同志们有许多问题可以讨论。迈科斯基案的审讯正要来到。不久以前他们在我们的街道上举行了一次审讯。察警围起一个大圈，这样我们没有法子认出被控诉的同志来。但是依然发生了一些事，使得公众的注意力忘却了即将开庭的迈科斯基起诉书；它深深打动了每个同志的心弦。国会纵火案的审讯开始了！起初我们除了季米特洛夫的名字之外，再听不到什么了。但是这个名字忽然之间变成一种鼓舞的力量，一种思想的标志。季米特洛夫的无畏的锋利的词句传遍了整个德国——传遍全世界。我们从外国报纸上、从国外的广播中获得这一切。每一句话给我们增加新勇气。他的话通过人们的口辗转相传；沿着街道传达，传入家庭中；从侷促的工人房舍中得到迴响。不只是这样：一些难以叫人相信的事情发生了。被千方百计地箝制住的舆论，一夜之间突然复活过来了。我第一次看到人们在电车里、在广场上、在商店里，随时随地谈论着政治。

“今天季米特洛夫说了些什么？”到处可以听到这句问话。刊登了最新的关于审讯的报道的报纸，人们抢着买。我们反法西斯者晓得，一个被禁锢了好久的共产党人，现在站到第三帝国的最高法庭上来。一个共产党人用超人的精力学习这个异国的语言、甚至它的法律，为的是用斩钉截铁的论据去驳斥“钦定”法庭的“证据”和起诉。但是还不只是如此。季米特洛夫转入了进攻。他反过来审讯，迫使传讯证人，撕下纳粹纵火者的假面具。

多么大的变化呀！他给千万德国工人带来新的力量，恢复

了他們對他們的階級的力量有信心。海爾黛告訴我們，季米特洛夫的話甚至打動了最死硬的納粹分子。在偶然聽到了她的兄弟跟他的沖鋒隊伙伴之間的談話之後，她確信不少納粹分子正在開始懷疑國會縱火案的真相。她說，這些沖鋒隊員，在政治觀點上跟季米特洛夫是死敵，公開表露了對他的同情。他們稱贊他的勇敢。“我們沒有一個人能象他那樣——能及得上他的幾分之一，”他們是這樣地談論他。現在我們可以定期地聽到廣播中重播的關於審訊的錄音片。每次那個播音員總想用粗野和惡毒的評語來破壞季米特洛夫的已被切割過的話的影響。但是他抹殺不了這幾句不完整的話的印象！他的謾罵和咒詛，恰恰得到了相反的效果。每一次我們都能聽得出季米特洛夫在他的條理分明的言詞里說了些什么。今天，絕大部分德國人民認得清誰是真正的縱火犯。納粹部長們和魁首們站到被告席上。他們很清楚這一點，如今正在竭力掩藏還可以掩藏的東西。有一個時期，報紙不敢再摘登訊詞。它們只刊登了關於審訊的一般報道。在廣播節目里，審訊的錄音片也很少播送。

事實上，最後的兩天報紙上什麼也沒有。有的時候一個人可以干出多少事來！

一個星期日的早晨，天高氣爽。我正扶着我的自行車，站在柏林郊區的一條街道的轉角上。在我的小背包里只有夠一天的食糧。但是這次到鄉下去的自行車旅行不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我在等候布魯諾，一個有着扁平鼻子的過時的琴師。我不由得想起了在跳舞廳那天的早晨，那時佛蘭茲和我，充當魯迪和布魯諾的“助理機械士”，在印我們的報紙。佛蘭茲告訴我，滿臉雀斑、一頭紅發的魯迪和布魯諾，除了是共同工作的伙計外，還是一對不可分離的朋友，是區里最勇敢的同志，他們兩人也配合得

很好。魯迪对每种情况的小心判断，正好补足布魯諾的“柏林嘴”和遇事冒失的习惯。

当我在周初和佛兰茲研究新的形势的时候，我們便安排了这次的自行車旅行。同志們將要和仍旧留在那儿的“社会主义劳动青年”^①的人发生接触。

这些年輕同志中有一个在夏洛登堡的一家工厂里工作。今天的戶外旅行只不过是給我們一个机会去認識他們，好开始工作。到目前为止布魯諾和魯迪只跟他們当中的两个人談过話。他們很愿意和我們一道工作，而且提議举行这次野餐的正是他們，但是他們提出我們不要一开始就急着跟其他同志接触；他們还是怕得很厉害。魯迪的工作使他到处走动，由于战术上的原因，佛兰茲不愿在第一次接触中跟“社会主义劳动青年”的同志碰头，所以他們要求我跟他們一起去。佛兰茲認為我能够跟小伙子們更合得来，因为我过去曾当过一个青年小組的領袖。

“您早呀，卡尔。”

我猝然回过头来。布魯諾来到了。他騎着車子一声不响地来到，現在把一只脚支在人行道上休息；另一只脚还踏在脚踏上。卡尔——对我似乎还是很陌生，但是他們只曉得我这个名字。他騎的一輛很漂亮的自行車，一輛輕型的賽車。車身和上面的噴漆在阳光下閃閃发亮。

“我以为你会从那条路来的！”

我朝着預期他会从那儿来的方向点头。布魯諾热烈地跟我握手。

“通常是那条路——但是今天”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青年組織，相当于劳动青年联盟。

“我得先去取烟火。”

“你已經带来了嗎？”

“我当然带来了，我既这样說的話。”他拍拍車座后面的皮包。“它們都裝好了呢。”

我們騎上車子出发。他竟把“烟火”帶上了——那本排印得緊密的小冊子——关于国会縱火案和希特勒恐怖的非法的棕皮書。我們早就听說过了。在国会縱火案的審訊中，法庭庭长不断地攻击这本“臭名昭彰”的棕皮書。有好一陣子，我們的那些被箝制的報紙曾对关于逃亡者的“可卑的撒謊的印刷品”暴跳如雷。

每次我們都乐得象小学生似的。我們經常从它們当中讀到別的东西。那本书对希特勒的独裁統治是多大的一个打击！同志們从莫斯科的广播听到更詳細的情况，听說了这本书以它的不容置辯的事实获得了多大的成功。我从邻区的同志那儿听見了关于这本书和在倫敦的反審訊的消息。它对我們是最好的鼓勵。我們觉得我們不是单枪匹馬了。国外的同志們正在动员全世界的輿論来支持我們！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我們当中有些人把逃出国外的同志叫成“躲懶的同志”。但是自从听見了这些同志們的反对希特勒德国的工作成績时，他們便放弃了这种錯誤的觀念。在佛兰茲那儿第一次看到这本书。在他那区一切事情都很順当！他們甚至定期收到布拉格的带图片的工人自己的報紙。而且他們还拥有更热心的訂戶。佛兰茲很得意，当他看到我惊奇得張大眼睛的时候。只要我們能把这些材料帶到我們的街道去，那該多好呀！但是不可能——在現在。

我的两只脚机械地蹬着踏板。我望着布魯諾。他点点头，微笑。我們騎得相当快。还是在郊区的街道上。他竟把它带来

了！在佛兰茲那儿我反对过这种念头。报纸怎么说来着呢？如果发现有这样一本书就判十五年的苦役。至于传播消息呢？把它带去给“社会主义劳动青年”的同志们呢？向他们诵读呢？我不同意佛兰茲的想法。佛兰茲解释说，布鲁諾和鲁迪認識他們多年了。他們全都是绝对可靠的。这对他們将是一个新的经历。当他們看見我們在干些什么，和我們有些什么材料的时候，他們将会更加愿意和我們合作。好吧，今天我們就可以看到是真是假了。佛兰茲常常是那种承担责任的人，如果他这样看的话，那就一定不会出差的。

我們向左拐。一条大道。现在布鲁諾騎到前面，領着路。他騎得很好。我不断地朝他的車后的皮包上看。十五年。今年我多大了？胡鬧！布鲁諾看着他的手表。他稍稍轉回头来，他的脚还在蹬着。

“我們正好赶到——必須准时会到他們，”他喊着說。路旁的树飞一般地閃过。叶儿正在开始变色。秋天了。太阳还很猛烈——抑或是騎得快的緣故呢？我在出汗。一輛卡車向我們駛来。冲鋒队！敞蓬的車厢里挤滿了褐衫队。其中一人坐在駕駛台的車頂上，双手握着一面飄动的卅字旗。我們举起手敬礼！繼續上路。左面，右面，到处是广闊的田野。在公路旁不时見到新种的小树。我讀着里程碑上的数字。

还得走好一段路。一所教堂的钟樓出現了。在那之后很快我們便来到村上。布鲁諾从車子上跳下来。

“在左面，教堂后面，他們有一个人在等着。”他用手背擦擦前額和一头短短的黑发。

“只有一个人？”

“是的，他会把我們領到其他的人那儿去。他們正坐在湖边

上。”

我們慢慢地推着車子沿路走去。一个老农民坐在他的茅屋門前晒太阳，吸着烟斗。在左面小酒店的附近，站着几个冲锋队。身体结实的小伙子。“共产党人要没收你的土地，羊厩里的最后一只山羊要被分掉——分掉，分掉！”

佛兰茲告訴过我同志們曾經怎样在北方的农业工人当中开始进行工作。我們的同志們在村庄里、在小小的市鎮上曾經真正受到何等的折磨。人們全都知道他們！

在一根色彩鮮明的柱子上釘着一块木牌：“阿道夫·希特勒廣場”。

廣場上杂草丛生，正中央有一个混浊的池塘，鴨子們在塘里嬉戏着。池塘四周圍着一道木柵栏，上面都是卐字，大約是想把柵栏弄得宏偉一点。柵栏中央长着一棵瘦弱的树。柵栏上的一个牌子写着：“希特勒池”。

但是教堂已在望了。

“他在这儿呢，”布魯諾說，当我们来到教堂前的时候。

一个小伙子坐在路旁刷白灰的标石上。他跳起来向我们走来。他穿着一条扎口的短褲和一件藍色圓領衬衣。在左肩膀上吊着一个旧的軍用背包。一付嫩嫩的老实的臉龐，长长的棕色的头发。頂多不过二十岁。属于徒步旅行者之流。跟汉茲·普勒斯一样。他們看起来活象一个人。現在汉茲到哪里了呢——在集中营嗎？

“哎咳，”小伙子說，一面握手。

“哎咳，”布魯諾向他笑着說。

（哎咳是无精打采地喊希特勒万岁的声音。）

“你等了很久嗎，阿弗烈德？”

“剛來到。”

“到別人那兒遠嗎？”

“十分鐘的路。”

不一會兒我們便離開大道向右轉，通過兩旁夾樹的小道。沿着湖邊。那里支着帳篷，船靠湖邊停着。這里很可能是那些划手露宿的地方。

“還得走一會。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帳篷，”阿弗烈德說。

“我希望是這樣，”布魯諾回答說。

阿弗烈德驚訝地轉過頭來。

“你把它帶來了嗎？”

“自然。”

“真了不起，”阿弗烈德高興地說。“但是你們必須當心；別的人全都受赫伯特的影響。”

“我們會注意的，”布魯諾說。他朝着我點點頭。“卡爾是從夏洛登堡來的。你在夏洛登堡的工廠里做工，不是嗎，阿弗烈德？”

“是的。”

“以後你們兩人必須談談。”

“好的。”

原來佛蘭茲建議我們可以一起工作的就是阿弗烈德。他象是一個正派的人。應該還有另外一個願意跟我們一道工作的人。“別的人全都受赫伯特的影響。”那大概是那群人的頭領。

我們把自行車推過林中的空地。靠近叢草支着一個帳篷。他們躺在帳篷附近湖邊上的一小片草地上，晒着太陽。兩個、三個——六個男子和兩名女郎。我們把自行車靠在一棵樹上。同志們伸出手來，只說出了他們的小名。我們也一樣。年輕，嬌嫩

的臉孔。女孩子們，從她們的短打扮看來，近乎是屬於某個青年運動的成員。其中一個把一頭秀髮扎成粗粗的辮子。

“你們找到了好地方，”布魯諾讚賞說。

他跟我一樣，還受着陌生的影響，想努力把談話弄得親切些。

“我們常能找到，”阿弗烈德說。

那就是赫伯特。他半耳語地說出他的名字來。他是一個高瘦個子。在蒼白的面頰上戴着一付眼鏡。似乎是這群人當中年紀最大的了。他的黑髮從中央整齊地分向兩邊。他穿一條燈籠褲，其他人穿的都是短褲。

我坐下來。布魯諾跟赫伯特咬了一陣耳朵，然後向我走來，拍拍我的肩膀。

“去拿我們的東西吧；不能把它們留在那兒。”

我們走到樹林的邊緣。

“我們將把我們的東西放到另外一邊去。如果出了什麼事，其他人不會被牽連進去。”

“你跟赫伯特說了那本書了嗎？”

“說了。阿弗烈德也準備他會大吃一驚的。那個赫伯特永遠也不會對任何事情激動起來的。其他的人倒是相當驚訝，但是他一點兒也不。‘等以後我們再讀吧，’這就是他所說的一切。”

奇怪，當我剛看見赫伯特的时候就有一種感覺。他不可能是那麼容易對付的。

我們把自行車和皮包放在左岸，藏在蘆葦叢中。

“那個穿着浴衣的是那個願意跟我們一道工作的小伙子——阿弗烈德的朋友，”布魯諾悄聲地說。

我朝湖的方向望过去，一个矮胖小伙子正在奔跳着，他的脚几乎没有触着沙滩，他的头发随风飘动。

我們跟他們又会合一起。布魯諾告訴他們，我們騎了差不多一个半钟头的自行車来到这儿。他是头一次到这儿来。他們可知道地方上有些什么动静，乡下人当中有些什么想法呢？我也問了几个問題。我們两人都试图把談話的局面打开。但是失败了。同志們回答了問題，但是我觉得他們之中誰也不是十分感兴趣的。我們还是陌生人。

在我們之間有一道鴻沟。他們曾經到过湖的那边，但是誰也从来沒有跟农民呆在一起过，他們之中的一人回答說。布魯諾的跑車真不錯；他正在攢錢买一輛自行車呢，另外一个人說。之后又沉默下来了。赫伯特仰面躺着，两眼望着天。到現在他还未說过一句話。阿弗烈德的踢足球的提議大受欢迎。吵吵嚷嚷地分成了两队。但是赫伯特申說他愿意繼續晒太阳。我帮助阿弗烈德在两棵树之間系上一根繩子。

“你們必須先和他們接触接触；他們只习惯于自己之間的来往，”他湊着耳朵說。

“我們可以在別的地方会面，把問題研究清楚。你在哪儿工作？”我抓住这个机会說。

他說出一家大金属工厂。把繩子牢牢地系好，还是一語不发。莫非是他已經后悔同意我們到这儿来的主意？之后他慢吞吞地說：

“我不能丢掉我的差事。我母亲老了而我父亲也死了。”然后，“在工厂里我必須十分小心——希望你从开始就明白这一点。”

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我們明白，阿弗烈德。只要你能告訴我們在廠里人們是怎麼想的，那對我們就很重要。但是我們可以在下一次再談這些。星期四下工以後你有空嗎？”

“星期四？好的，那我有空。”

他告訴我每天黃昏他回家所坐的火車和車站。我應該在街角上靠近麵包房那兒等着。我們踢了好一陣子。時光已近日中，太陽晒下來還是毒辣辣的。我們大吵大鬧地奔向湖中。我們排成一行，把女郎們傳過去浸水。她們又叫又笑。

“別把我掉下去，卡爾！”“舉起我，卡爾！”叫聲和她們臉上的神情都表明了，現在我們算是他們那一群中的人了。我們是他們的朋友。可是赫伯特仍然給我們一個冷面孔。他站在湖岸上，瞪着我們。他還是那一臉的一本正經的表情。布魯諾靠近我站着。他在笑。他的鼻孔張大；水珠順着他的頭髮往下淌。

“稍過一會我們就開始，”他耳語說。

我點點頭。

我們把吃的全準備好。兩個女孩在兩個酒精爐上煮咖啡。我看着她們。上星期日我和凱蒂在哈佛爾呆了一天。那天黃昏我們不得不在車站上分手。難道在這些日子裡人們還能有心情找伴侶嗎？我不能上她那兒去；她不能到我這兒來。

“讓我們混在一起吃吧；這樣可以吃到更多種的食品，而且也會更有味道，”布魯諾說。

在我們的青年組織裡我們經常是集體進食的。布魯諾只習慣這種方式。從他們欣然同意的表情，我相信他們一致接受他的建議就是承認我們的同志關係的新證據。我們大家都忙着吃，嘴裡塞滿了食物。我朝布魯諾眨眨眼。他很輕地點了點頭。

“我們應該更經常見面，伙伴們，”他說。“不只是在野餐中

会面；在城里也要会面。我們年輕人應該常在一起；終有一天我們將需要每一個人！”

“是呀，他說得對。”

“那可太好了。”

“光是到野外走走是不夠的，”阿弗烈德插進來說，“我們應該談點正經事，要讀一些有價值的事情……”

我仔細地看着這些面孔。他們似乎全都贊成這些意見。然而赫伯特呢？他一句話也沒說；他的臉孔好似戴上了一层面罩，只有眼鏡後面的一雙眼睛，在巡視着那群人，好象在竭力判斷布魯諾的話的效果。

“我可以找到一些值得讀的東西，”布魯諾說。“如果我們今天就約好，那可就最好不過了。我們也許可以跟你們當中的一個碰頭。如果我們不成的話，我可以……”

“我反對！”赫伯特打斷說。他把杯子放下來。他們全都看着他。“我們將被拖入你們的宣傳鼓動的活動中去。這就是你們的建議的全部意思！”

“你所說的‘拖入’是什麼意思？”布魯諾平靜地問。“那有時可能會發生的，但這全看你們了；如果你們願意參加進來工作的話，我們當然是無限地歡迎。”

“我們要保持我們的社會黨小組，不要象你們那樣冒無謂之險！”赫伯特回答說。

我看見有兩個青年贊同地點點頭。如果我們現在不能夠說服他們，我們就永遠不會爭取到他們了。

“我認為我們不應該象你那樣，把你們跟我們分開來談，同志們。納粹每一天都以他們的恐怖來証實他們是把我們看成為一個敵人的。我們必須聯合起來。特別是我們青年人。記得卡

尔·李卜克内西嗎，他也号召青年們起来反对战争呢。我还可以这样告訴你們：在我們对任何事情作出决定之前，我們考慮到每一个步驟。我們沒有哪一个人会託一个同志去冒不必要的危險。”

沉默下来。

因为誰都沒有說一句話，我又打开話头。

“难道你們真个以为法西斯主义将会自动垮台嗎？难道你們只愿意会面是为了証实你还保留原来的意見嗎？工人階級青年們一貫站在队伍的最前列。今天更应是如此。我們必須共同作战！”

又沉默下去。靜默使得我想起了可能的危險。我朝四下里張望。周圍連个人影都沒有。湖水平靜如鏡。阳光在水面上跳跃。赫伯特打破沉默。

“你們倒的确是經常‘作战’的。但是經常是反对我們的領袖的。”

我看着他的緊閉的嘴。其他的人为什么不說話呢？他們是不是都同意赫伯特的意見呢？

“赫伯特同志，这种說法不会使我們得出什么結果来的，”布魯諾恳求地說。“关于在希特勒上台以前的年月里的事情，我們已經爭論够了。还有你們的領袖如何投票支持希特勒的初次竞选。他們如何号召工人們支持他的五一节庆祝。但是我跟你們說，我們不再去談这一切了。那是属于过去的事；現在我們要安排未来的事情。”

又靜默下来。

“这也是我的看法，”阿弗烈德說。他詢問地轉过头来望着其他人。“你們大家以为如何？”

他到底找到了他的舌头了。

“你說得对，”威利支持他說。“小組能保存下来是多亏得赫伯特——但再不能光是这样下去。”

“我也是这样說，”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同志說。

“还有我。”

那个梳长辮子的女孩！

“我会跟赫伯特和阿弗烈德安排一切，”布魯諾赶忙說。“他們会让你們知道我們决定怎样做。”他看着赫伯特。“但是現在让我們来讀点东西吧。天已不早了。”

他做得很漂亮。他把赫伯特看作小組的領導是对的。我注意到赫伯特正在强作精神。

“繼續象你們現在那样吃东西吧；我們必須裝出是完全无事的样子来。那位同志們带来了一份很重要的文件——棕皮书，”他說。

在我身旁的一个同志从毯子上跳起来。对过的一个女孩驚訝地張开了嘴。他們的眼睛发亮；他們互相用肘輕輕推了一推。

“原本的棕皮书嗎？”

“就是那一本……？”

“別吵了！你們曉得那對我們意味着些什么！”赫伯特粗暴地說。

他是很对的。他有許多优点。

現在他們全都靜下来。每只眼睛都跟随着布魯諾的身影，他走开去取我們的東西。当他轉回来的时候，大家都轉过头来。他們都想看看这本小书。

“必須派人守望着后面的那条小路；我們必須保卫自己不遭到突然的事故，”我說。

誰也不願意去。他們全都急着要听布魯諾的誦讀。我站起来。

“那末我們輪着来吧。当你們看見我坐在那儿的时候，你們可以讀。”

湖就在我下面，是一个平靜发亮的平面。一絲风也沒有。林蔭下的綠毡給人一种快意的涼爽的感覺。在那儿，他們看来只不过是一群欢度周末的游人。布魯諾俯臥着，兩肘有力地撑着地面，头靠在手上。我聚精会神地听。在我这儿什么也听不見；他一定是讀得很輕。他們是何等的快乐啊！佛兰茲說对了；我們將能够鼓励他們參加到我們的工作里来。是誰在叫喊呢？我看不見什么人。它来自前头的帳篷那儿。跳舞音乐之声迸发。他們甚至带来了留声机……第三个守望者已到小路上去了。布魯諾正在輕声地誦讀着。这些年輕同志的臉上一股子严肃的神情。他們彼此不看一眼。少数人仰躺着，合上了眼睛。突然一块大石头滚落到我們前面的叢丛中。布魯諾停下来。我猛地轉过头去。那个年輕同志从斜坡上跳下。

出了什么事？危險？他还在跑呢？这只有使得我們大家更被怀疑了。

“坐下！坐下！”赫伯特命令。他还是保持冷靜。那本书已消失在布魯諾的运动衣里。那个同志現在来到了我們跟前。

“在后面那儿……两个冲鋒队员……”他喘着說。

几秒鐘过去，我們瘫坐在地上。布魯諾第一个恢复过来。

“赫伯特！开始踢球。但是要鎮靜，你們大家！我們去安置我們的東西。”

赫伯特点点头。

我們等了又等。布魯諾把自行車翻轉来，在輪子上忙来忙

去。其他的人站成一个圓圈，互相傳球。

“你怎么不接住呀？快点——快点！”那是赫伯特的声音。他完全能控制住自己。如果冲锋队上我們这里来，青年人会有什么反应呢？他們实在太年輕了。他們从未经历过这样一个紧急的局面。我們不該帶——我所讀到的：“有名的共产党营地的襲击”。它会使得警察更加怀疑远足者——棕皮书来——十五年徒刑。

“鍊条上沾滿了倒霉的沙子！”

布魯諾！他那样說时是多么地鎮靜呀！难道他已經注意到我嗎——他是不是想用那样簡單的語句来使我回复常态呢？我真感到非常羞耻。他們来了！两名警察和两名冲锋队员。这可真是一次襲击了！他們慢慢地走下斜坡来，然后直接向青年們走过去。一个冲锋队员在帳篷附近停下来，向帳篷里面窺探。我望着布魯諾。他正用右手机械地轉动着踏板，同时望着其他的人。他的上下唇合成一条縫。血液在我的脑袋里奔流。我們可以听到每一句話。

“这个帳篷是誰的？”一个警察問。

我們只能看到他的闊背和綠盔下的粗短頸脖。

“那是我的，”赫伯特回答說。

“你有露營証嗎？”

“有的。馬上拿来。”

他跑向帳篷，爬进去。男女孩子們圍着那四个穿制服的一动不动地站着，他們的手垂在身旁。其中一人把球紧抱在怀里。他們應該繼續打球呀！打呀！我可以看到一个冲锋队员怀疑地往四下里瞧，然后用肘碰一下那个警察，附着耳朵說了些什么。那个警察猛地轉过头来，向我們望过来。万一他們过来找我們

呢——可是他們并未搜查別人。這當兒赫伯特轉回來了，把證件交給警察。

“你沒有看過規則嗎？難道你不曉得帳篷只能支在指定的地點嗎？”他凌厲地說。

“我以為這兒全都是公有林地呢，”赫伯特回答說。

“你說什麼，公有林地？馬上給我把帳篷收起來！”

“好的。”

那警察交還了證件轉向我們。

“你們是跟他們一路的嗎？”他大聲喊過來。

布魯諾站起來，但是赫伯特卻占了先。

“是的，我們全都是一伙的。”

他的動機很好——不願意讓我們落在困難中。但是這全都一樣，他不應該這樣做。

布魯諾的嘴半張着。我的手在發抖。我必須做些什麼才好。自行車的后輪還在轉着。我把它停住。

“現在你總該曉得了！如果我再發現你的帳篷支錯了地點，那我就傳訊你的！”這些話在我聽來好象在很遠的地方傳來似的，然後：

“希特勒萬歲！”

“希特勒萬歲！”

我的右手舉得直直的，活象有人用綫把它扯起來似的。

四個穿制服的身影在樹後消失了。我感到非常熱；口干舌燥。布魯諾長久地望了我一眼。他大口地吸了一口氣。我們稍許等了一會，然後向其他的人走去。兩個女孩子緊靠着站着，好象互相支撐着似的。那個男孩仍然把球緊緊地抱在胸前。他是阿弗烈德。他的臉白如紙。一句話也沒說。布魯諾向赫伯特伸

出手。

“謝謝，赫伯特。但还是一樣地做錯了。我們本來應該是陌生人。”

赫伯特不作聲。但是雙目從眼鏡下發出光，一絲笑意閃過他的臉龐。

這兒是有着一付粗糙面孔、被打破的鼻子、一臉倔強表情的布魯諾，和蒼白瘦弱的赫伯特——道地的書呆子。

“我們現在得趕快走開，”布魯諾說。“好的，這個星期內我們還會再見面的。現在我知道上哪兒去找你們了。”

“好吧，”赫伯特只說了一句。

我們輪流握過手。推着自行車沿着林中小道慢慢走。布魯諾在我們前面的營地後面停下來。

“註我們分手吧，卡爾。那樣更好些，”他說。“現在你認識路了吧？”

“認得了。”

“見到佛蘭茲和魯迪替我問好。”

“當然啦。”

我站定看着他，直到他消失到樹叢中為止。

* * *

幾個星期以來，我們一直在監視那兩個我們懷疑他們出賣我們的人。其中一人，羅伯特，是個年輕的鎖匠。他是在法西斯上台前不久從青年團轉入到黨里來的。他經常請求分配給他危險的任務。我們還以為這不過是出於他的青年熱情。但是當我們的派報人和還沒有收到報紙的五個訂戶被捕，和我們第一次懷疑這當中有出賣行為的時候，我們對羅伯特的奇怪行為覺得出奇。儘管我們已警告過同志們現在必須特別小心，可他还是

跟从前一样地鲁莽。一天夜里，他骑着车子绕过大街上的一道宽壕，那儿工人们在工作着，闪电般的散出一迭传单。但是罗伯特对非法工作的热心引起了我们的怀疑，因为冲锋队曾经企图捉住罗塔克尔。而且还有他所交往的人。他跟许多冲锋队员交谈。我们的同志证实他还在跟这些家伙来往。的确，我们经常都知道这些接触。罗伯特对这些谈话全都汇报上来的，而且有的时候还能供给我们一些关于冲锋队的思想情况的重要的内幕新闻。从他的学徒时代和他后来的学生时代起，他认识许多冲锋队员。他们甚至知道他一度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老交情胜过一切，而且，除此之外，罗伯特告诉他们，政治事件已向他证明了，他为公社所做的工作是何等的空虚和徒劳。罗伯特告诉我们说，这在他们看来是说得通的。难道他们不是说过元首曾经宣称，对每一个误入歧途的同胞他将伸出谅解的手吗？他之趋向共产主义，只是出于对理想的倾慕，而象他这样的小伙子是可以发展成为有用的同胞的。

但是如今我们却用不同的眼光来看罗伯特跟冲锋队员的交往。的确，我们还没有掌握到他的确凿证据，但我们还是切断了和他的联系。上两周，我碰见过他两次。我就是没有法子排除这种感觉，那就是我们冤枉了他。他丝毫不知道我的工作；只知道我是一个可靠的同志，或者曾经是一个可靠的同志。因为在头一次会面的时候，我告诉他，我对这一切已完全没有兴趣了，我再也不想搞什么政治了。（他首先问到的，他为什么再也收不到报纸了，还有我们什么时候再给他另一个‘任务’？）

我对他说，我后悔过去的年代。我应该为自己的打算多花些精力；要是那样，今天的境遇就会好得多了。而且，无论如何，反对一个稳固的现政权绝对是一种徒然而又疯狂的妄想。罗伯

特流露出一付担心的面孔，在大街上一把抓住我的肩膀，搖晃我。难道說我不明白我說些什么嗎！他憤怒地詰問。我不得不极力控制自己保持冷漠。我自然很懂得，但是已成為历史的事实已經推翻了我們全部的玄妙的理論學說。罗伯特看来大惑不解，并且繼續在試圖說服我。但是我固執着我自己的見解。每一句話都象把刀子一样扎痛我，但是我强迫自己保持冷漠态度。这当中要冒的險确实太大了。

昨天我又遇見了罗伯特。我重新感覺到我們是錯了。两个星期来，罗伯特的年輕的臉孔变得憔悴不堪。“你還有其他的同志們，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問道。他一点都不明白。其他的同志也說得和我一样的顛三倒四，不愿再干任何的工作。他紧抓住我的胳膊，一面說一面是这样失望地看住我，使得我完全把持不定。“这会是刺探情报的一手高招吧？”在混乱的思潮中闪过这样的念头。但是他装不出那种样子来。在最近几个月的地下工作中，我培养了一种判断人的特殊感觉。它从未欺騙过我。这个汉子不是矯裝的。

但是我克制了我的感触，保持我的态度。“这一切全都过去了，”我又一次解釋說。罗伯特艰难地吞咽了几次。我曾經是最优秀的同志之一；一定是很沉重的事情才使得他們当中最优秀的都失望，他用木然的声音說道。然后，他又是很激动地說开了，我搞工人运动已經有十二年；我怎能突然地就喪失了我的理智呢。这样之后，我赶忙离开他。这样做似乎是荒唐的，但是罗伯特在大街上表现出这样激动，可能对我会有危險。在我來說，是誰对他漠不关心！昨天我几乎向他和盘托出。然而它使我想到了，一个奸細会裝得象罗伯特那样地激动的。此外，那样做是違犯了我們的紀律的。我一定不能向我的感情屈服。这种想

法鎖定了我。

又过了三天。

同志們还在監視着罗伯特。他孤单地上班、下班。在夜里他很少离开自己的屋子。事情总得設法弄个清楚。

我們所怀疑的另一个同志是克兰茲。他是一个磚瓦工；曾經很长一个时期沒有工做，还有一个家。因为他入党多年了，他能够很准确地判断哪些同志是担任重要工作的。自从我們被迫轉入地下以来，他只被分配担当派报的工作，但是最近两个月来我們連这个工作都給他停了。克兰茲已变得很不可靠了。他經常不来取报，而当他来的时候，又总是迟到，因此对那些跟他联系的同志來說，这是太危險了。當我們一发生了怀疑的时候，这些同志就被解除了全部工作。直到今天还没有出什么事。但是我們知道这不說明什么问题。因为，如果克兰茲真是一名奸細，秘密警察不会逮捕那些介乎他和我們之間的人。那样做只会向我們暴露克兰茲。被捕的同志在秘密警察的“审問”中几乎是都坚持自己的立場的，所以他們沒有兴趣立刻对个别同志进行逮捕。他們已經养成一种习惯，整星期有时整个月地監視着有嫌疑的人。他們希望这样可以通过个人的綫索，从而找出整个組織。所以我們坚持这样的工作方式：即使是最可靠的同志也只許他們認識跟他一道工作的同志。此外他什么也不須知道。我不断地制止自己不去知道那些并非絕對必要的事情。我們知道并非每个人都能忍受得了肉体上的折磨。这样我們就可以防止个別人作出全面的招供。克兰茲只能从我們在合法的日子里的活动作出关于我們的結論。

我們的同志十分严密地監視着克兰茲：在他常光顧的啤酒店、失业登記所以及一切場合里。这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如

果我們的懷疑不錯，我們不能讓他發現。

克蘭茲繼續他的酗酒。他再不打算和我們恢復聯繫。他似乎真是個胆小鬼，他已經對一切事情喪失了興趣。

* * *

昨天黃昏時，我遇見了阿弗烈德。那是在星期日跟他談過話的“社會主義勞動青年”的同志。我原不能肯定他到底會守約不會。他也可能為了躲開我而答應了來的。他已經說到他害怕丟了工作。（但是我可以理解這一點。）然而他終於來了，並未食言。他對跟我們一道工作這件事，看得很嚴肅。我們在古老的街道上走着。我安排跟他下一次會面的時間，但是要隔得長一些；向他暗示在這個時間當中我們正經歷着“暴風雨”。他告訴我說，除了我們約定的時間以外，我可以每天在同一的黃昏時候，在上車站的道上見到他。

他还告訴我一些關於他們廠子裡的工人的情緒和生產情況。我要把這些消息報告我們的區委會，並且要請示他們，在那個工廠裡我們有沒有其他同志，可以把阿弗烈德吸收進去。我很想把這些消息登在我們的街報上，但是我們不能在我們的街道上出版一份報紙，我們也不能散發任何的資料。

* * *

今天發生了可怕的事。羅伯特的媽媽到處哭哭啼啼，逢人便哭訴他的兒子被逮捕了，關在亞歷山大廣場派出所。昨天早上他跟經常一樣地去上工，但是沒有回來。黃昏後很久她只好跑到工廠去，擔心得要死。夜班的看門人記不起他看到羅伯特離開工廠沒有。警局把事情告訴了她。羅伯特是在昨天傍晚時分被捕的。是當他在牆上寫共產黨標語的時候當場被捕的。

我們都大為感動。我們已經錯誤地懷疑了一個忠心耿耿的

工人。罗伯特是再也忍受不了无所事事的生活。他只好自己单独行动，没有人给他了望放哨。他既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他这几个星期来定必是受了很大的折磨。他定然知道，他一个人来干的话，不被捉住的机会是多么的小。

我不断地自责自怨。在那一次当我内心的感触告诉我他不是装假的时候，本应就把一切都告诉他。不错，断绝对他的联系的决定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做出来的。我们到底都是人，都免不了要犯错误的。这种混乱的时代就是祸根；我们到处被追逐；我们不知道自己下一刻是否还是安然无事。我不停地跟自己重复这些话。但是我的良心一点也不让我安宁。罗伯特已经被捕了——这是不容更改的事实。至少是现在无可更改的。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在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德国奋斗着。褐衫徒们曾经宣称对德意志的热爱只容他们独占。他们说他们是为德国人民而斗争着——而他们却在摧残着最优秀的德国儿女！

我们怎能不热爱德意志呢——我们，德国的工人！

是我们给她修建了铁路、城镇，耕耘她的土地，而仍然赤贫如洗，一点也享受不到她的美好。罗伯特。他的被捕一定使他受到加倍的打击。

你正坐在黑暗的牢房里，想到我们全都成了懦夫。想到没有一个人起来填补你的岗位。想到你的牺牲是枉然的。

你的憔悴绝望的脸孔将经常出现在我面前。你的话语将不停地振荡着我的耳鼓：“你可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吗，扬？怎么一回事呢，你是我们最好的同志之一，扬。那就足以使任何人陷于失望……”

不。我们不失望；即使在现在也不失望，罗伯特。

* * *

阿力克斯道过了再見，跟我們分手了。

阿力克斯是經常領導我們的一個戲劇小組的同志。幾個星期前區分會把他派到我們這兒來。他終於跟我們區里的一些前社會民主黨支部的黨員接上了頭。他想把我們這兩派團結起來。自他來了以後，我定期的見到他，但是常常發生一些障礙。每一次他都告訴我社會民主黨同志們是多麼害怕跟陌生人接近。要說服他們跟我們建立關係可不容易。我必須忍耐，再多等一些時候。

而現在，兩天前亞力克斯給我送來一個信，說他終於成功了，提出了會面的地點。

那個社會民主黨同志和我並排走着。我們向動物園走去。點綴在馬路兩旁的大樹已卸下盛裝。枯葉在我們腳底嚓嚓作響。我必須打開話頭。我知道他的害羞乃是我們之間的障礙。

“我們必須首先想好我們是怎樣認識的。”

“呀！為什麼？”

“萬一發生了事。那經常是他們的第一句問話。我們的回答必須一致的。”

那同志望着我。

“那我可不知道，”他平靜地說。

我們想出了幾種認識的可能，但全都否定了。我們的初次相識必須使人聽來入情入理。于是我提出了一個我們雙方都認為合適的建議。

我告訴他，我叫卡爾。（只許我們自己人曉得我叫揚就成了。）他叫艾瓦爾特。然後我們同意彼此只用客氣稱呼“您”來互相稱呼，萬一我們被捕的話。親密稱呼的“你”，會立刻使納粹分

子想到“赤党分子”的，我告訴他。

这会不会太过分了一点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談到这一切可怖的危險？但是他依然十分沉着，于是我不再有所顧慮了。这些預防性措施是很必要的。

我們一边談，我一边偷看着艾瓦尔特。我不是老早就認識他了嗎？那付紅紅的臉，腫腫的下眼皮，左頰上的刀痕。但是兩鬢的灰白髮絲呢？艾瓦尔特在我一旁沉默地走着。我還在極力回想是在哪儿見過他。然後我想起來了。

“你不是常到我們的會議上來的嗎，艾瓦尔特？在土耳其小店^①。你不是住在——？”

“住在魯西寧大街，在‘人民之家’里，”他插進來說，“我也一直在奇怪好象在什麼地方見過面呢。不錯，就是在那兒。我們常常爭個不休，卡爾。”

艾瓦尔特微笑，我也感覺到高興，我注意到他已經去掉了他的害羞和不信任的情緒。他友好地看着我。在“人民之家”——現在是邁科斯基營房！

“但是你變得很厲害呢——看起來跟過去不一樣了——”

艾瓦尔特把帽子摘下，摸摸頭髮。

“我已滿頭灰白了，”他說。若有所思地瞪着前方。

“在魯西寧大街——”

沉默。

之後艾瓦尔特帶着恐怖的聲調說下去。

“我們的窗戶正對着院子。他們嚴密監視着窗口，但是我們還是可以从窗簾里看到衝鋒隊的牢房。每天夜里几乎都有同志在号叫。我的老婆只有塞住了耳朵才能入睡。”

^① 土耳其小店，是一家咖啡店，夏洛登堡的革命工人常在這兒集會。

我們轉到一條小路上。隱約可以聽到從遠處夏洛登大道上傳來的汽車喇叭聲。在左邊的池塘里，幾只鴨子懶散地浮蕩着。

“自從沖鋒隊的特別警庭取消之後，事情更糟了。當車子開進來的時候，他們須得把同志們拖出來。”

艾瓦爾特把臉貼近來。他的手指緊扣我的臂膀，緊到可以辨別出每只手指來。他的聲音由於抑制的憤怒而顯得啞啞。

“但是這些沖鋒隊傢伙們的面孔已深印在我的記憶里。當有朝一日來到時，……”

我們每一個同志都特別記住這一個或那一個惡漢，但是艾瓦爾特呢……？

他接着說下去。

“我們曾經渴望用和平的方法取得政權；但是他們把這些幻想連根拔掉。”

“最初我整日價在想這一切，”他告訴我。“其他同志莫不如此。我們感覺到孤獨，而且慢慢地變得對一切都失掉了興趣，在我們的支部里只剩了七個同志還忠誠不渝。我們從來沒有得到過黨中央的任何幫助。整個組織垮台了，瓦解了。只有我們七個人繼續團結在一起。然後其中一個人跟亞力克斯接上頭。他告訴我們關於你的事情。說我們應該和你們小組聯系上。我猶豫了好長一個時期。”

“我曉得，他告訴過我了。”

“是呀，卡爾。我們不斷地自問值不值得為這樣一些沒有信義的人冒生命的危險。所有那些充斥在我們的集會上的人們，常常在發議論，光說不做。現在他們掛起了卍字旗，跟着納粹分子遊行。這就足以使我們失掉對人類的信心。儘管我們警告過，他們還是投希特勒的票。‘那就讓他們自食其果吧，’這就是

我們的想法。”

艾瓦尔特沉重地呼吸着。我保持沉默。他望着我。

“你們的人也有許多投靠了冲鋒队。其中一个我很熟悉。当我看見他的秃头进入迈科斯基营房时……”

秃头？秃头？难道是……我抓住艾瓦尔特的臂。

“你說秃头嗎？他是怎么一付模样？”

“怎么啦？他到底怎么啦？”

“他长得怎么样？詳細描述他一下；告訴我他的模样！”

“他走路时駝背。有一个秃秃的尖脑袋，一双可笑的卷耳朵。”

毫无疑问——那就是克兰兹！我觉得很激动。

“那么他怎么样了呢？”

“好多次我看到他和冲鋒队的家伙們走过院子，”艾瓦尔特回答說。“难道你不曉得那个嗎？”

“不知道。他是个叛徒——出卖了我們的同志。”

那些話在我耳朵里反复响蕩。这就是他从哪儿来的灌黄湯的錢。

克兰兹！那个混賬东西！

这个情报扰乱了我們两人的平靜。使我們都噤不作声。

“我們必須警告所有的同志，”我終於說。“你看，我們今天的会面对我們是多么的重要呵，艾瓦尔特？”

“是呀，”他只說了一句。

現在艾瓦尔特会不会因怀疑而担忧呢？因为我們被出卖而担忧呢？我知道社会民主党同志常常会認為我們的人是不可靠的。

打破了沉默的是艾瓦尔特。

“那末关于我們小組怎么办呢？”

那么他并没有退却。我很高兴，他說的时候就象理所当然似的。

“开始我們將送給你們報紙。”

沉默。

“以后你們当中的一人可以參加我們的委员会會議。你將是最合适的人，艾瓦尔特。”

“好的。我将告訴其他的人。”

我們安排下一次的会面。地点将在另一区。我告訴艾瓦尔特，如果第一次我因故不能来的話，他應該在每个星期的同一天同一时刻到达約定地点。我們紧紧地握过手，然后各奔西东。

* * *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七日。

迈科斯基审讯案今天开始。昨天傍晚，恩斯特·施維布斯一語不发地把戈培尔的“攻击报”給我看。他在关于审讯案的那篇文章里作了些記号。这些地方是这样說的：

“在这次审讯过后，天平将重新平衡。血債必須血还。”

我們在街上走来走去地走了約摸半个鐘头，但是我們一字未談到审讯問題。我們只是安排了发出关于克兰茲的事情的通知傳单。如今我們的头上似乎悬着一付千斤担。那些被控訴的同志会受到什么遭遇呢？“血債必須血还”。他們对迈科斯基的死亡不担絲毫干系。我知道那一夜我是在那儿的大街上！

* * *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我們小組里的一个人要到法庭旁听，但是只許有限的人进去，而且必須留下姓名和住址，这就是說，我們的同志誰都不可

在我們的要求下，邻区暂时負起了把报纸和材料傳送給德国社会党同志的任务。

* * *

到现在为止，克兰兹的暴露并未引起冲锋队在我們街上采取行动。这也許是一个战术上的平靜，企图松懈我們的警惕性，再不然就是冲锋队在布置他們党最近的一些活动，忙不过来。一个新的宣傳运动正在席卷全国。

十一月十二日全民投票

德国退出了国联。将举行一个“全民投票”来批准这个行动，并給予希特勒在內政外交政策上的无任权限。我在街上踱来踱去。大旗橫挂在街道上。他們在廣場上豎起了高高的木旗杆。旗杆頂下的旗子迎风飄揚。

我們不愿当一个弱小的民族！
为了荣誉和独立！贊成十一月十二日投票！
每个殘廢退伍者都投贊成票吧！

六呎高的标語粘貼在房屋的牆壁上和广告牌上。

劳埃德·乔治論德意志！

紧接着是引証这位英国政治家的談話，他把德国的处境說成是“被剝夺了荣誉和武装”。最后，是一些可怕的字句：

如果德国人不要求一个英国人①所說的那些东西，那末每个德国人都是混蛋！
投贊成票！

① 指劳埃德·乔治。

我又把这段話重讀了一遍。它說明了主要的部分。过去还不到二十年：炸彈的呼嘯声，大炮的吼叫声，可以在一夜之間重新听到。

这儿，是另一幅标語：

元首希特勒就是世界和平！

大炮、飞机、坦克——这是为了和平！我听到了他們又在重复那时候所說的：“我們不要战争。这个战争是人家强加在我們身上的。我們只不过是保卫祖国。”

又一个标語：

退伍伤兵們……

战争殘廢者又要被命令拿起新的杀人工具！殘廢者还在街头跛行着，求乞着，为的是不致因光靠他們的菲薄的撫恤金——为祖国效劳的犒賞而挨餓。我曾看到过一些军队的殘廢人之家的照顾。半个臉孔被削平了，无手无足，一团团活的肉。他們依然躺在守卫森严的收容所里，希望死神来解救他們。他們被活埋了。現在的男女們如果見到这些人，他們就会很好地思索了。

我本能地窺望那匆匆走过的人們。无动于衷，每日的求生的掙扎——这就是他們的臉孔上所表明的一切。而那儿的两个呢？他悄声地說了些什么；她撒嬌地朝他微笑。一两年内他也许就被埋葬在某个地方，而她将会打开一封公文信：“光荣地牺牲……”

我茫然地往回走，两只脚好象是在自动地动作着。难道常常是只有一千几百人才認識到在发生些什么事情嗎？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面前的长列的游行队伍，这好象只是几个月以前的

事，而不是战后最初几年里的事。

我們永远不再拿武器。

让老爷们为了自己的争执去打吧，

当时他们这样唱道。

歌曲，光是歌曲。他们不想去认识，首先他们必须赶走那些“老爷”——制造战争的人。相反地，他们却把那些要想把改良派的革命转变为一个真正的革命的人，看作是谋杀犯。

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

成千的这种人！

斯巴达克斯们！

当时风行披靡的所有法西斯党徒们，他们是现代的褐色德意志的统治者。他们一贯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什么！

在全民投票前两天。报纸纷纷写道，希特勒将在今天跟“他的”工人们谈话。地点是在西門子—舒赫特工厂。那是柏林最大的企业工厂。现在希特勒晓得真正的力量是在那儿了。我还记得弗兰兹在提名德国总理后第一天所说的话：“现在一个党的领袖，应该在这儿，西門子这儿发言。”

在靠近中午时分，我向西門子城走去。从我们街上走去只有三刻钟的路程。路过云格弗恩海德车站。在提名总理的次日我们在哪儿聚会。曾经试图在火车上发动辩论；散发传单。就是在这儿罗塔克尔险些儿被抓起来。罗塔克尔。我们两度听到过关于他的音信。他和他一家都在布拉格。生活过得还不错。他们得到逃亡者委员会的支持，他的老婆在街头卖报，她卖得不少，因为她长得实在漂亮。

这就是一个同志所告诉我们的。他们两口子到后来相处得

不太和諧。不斷地為短錢而发愁——然後又是她要求一些生活的樂趣。此外，羅塔克爾的年齡幾乎比她大一倍。逃亡的生活對婦女來說是要難熬一些。而且還有小孩，四歲的茵格……

努南達姆是一條又長又寬敞的大道。在這兒，也掛起了跨越馬路的標語。兩旁是木屋區。只掛起了幾面十字旗。它們是因為今天的閱兵才不得不掛的。兩者之中只有一種是真的。這兒是斯特魯貝爾的地區。我們一貫把它稱做“小莫斯科”。在那個時候，我們在晨光曦微的時光到殘廢人那兒去。打字機和快速印刷機——藏在種籽箱里。斯特魯貝爾病去了。殘廢人填補了他的位置，繼續為我們工作。

就是在這兒，衝鋒隊失去了自制力。他們在大白天騎着摩托車追捉赫伯特·茲梅克。把他拖到馬科斯基營房——他的尸首。他才廿一歲。

興登堡曾經說過：“給每個從前綫回來的戰士一間小屋”。許多“歸來的戰士”住在這兒，在他們的小屋里。他們自己蓋造了這些房屋。用木板和油毯瓦蓋成。幾乎絕大多數人都出外做工，跟斯特魯貝爾一樣。在冬日里他住在他的屋里。不用付租金。其他的人幾乎都是一樣。

西門子的一座電氣鐵路橋在這兒拱跨過路面。西門子廠從路的對過的左方開始。新的辦公樓有十三層高。一座滿是玻璃和水泥的匣子似的巨物。從那兒往下走五分鐘，在另一邊，是舊辦公樓。這是另一座大建築。煙囪上的大鐘的成碼長的指針指向十一點四十分。元首很快就要來的。阿道夫要在十二點開始演說。新辦公樓是近几年才蓋起來的。是公司的剩餘資本的投資。我望了一眼一排排的窗戶。泰謝特說，現在那兒許多車間是空着的，這是“國民經濟改組”的結果。他在那兒工作。他和

他的伙伴們會听希特勒的演說嗎？在路的左边开始出现一长排的白色房屋。全都是新建的、现代化的实用的东西。老的西門子城住宅区住的都是職員和下級管理人員。工人們曉得他們把雇用的人安頓在这儿为的是什麼。工厂的黑影遮蔽着他們的自由時間，从来不許他們过一过宁靜的生活。每个人都認識其他每一个人。这些新房子几乎全都是西門子修建的，而居民也增加了一倍。不可避免地，这个中下阶层的郊区成了一个納粹的据点。

失业者的木屋就在这些白屋的对面，他們一貫是何等的互相憎恨！很少有一个市鎮的政治和經濟反对派是这样互相的接近。在大道两旁的第一所房屋旁边，豎起了两根大柱子。上面裝飾着翠綠花环，橫張起一幅大标語：

西門子城欢迎元首光临！

人們站在人行道上。有两层，三层或者更多的人。可是，在这里我原先預期人数比这还要多一些。一长列冲锋隊員临街道站着。他們解下了皮腰帶，互相接連起来。在一家无綫电鋪子外边站着一群人。我加入这个人群里。在門上装了一个巨型的喇叭。人群中百分之八十是妇女，其余的主要是由教师陪伴着的小學生們。他們也許因此而放假一天。那些妇女，无一例外地，全都打扮得漂亮整齐。无论如何薪水可以維持到月底，最后几天吃的是人造黄油。作一些牺牲才能打扮起一副“标致”的模样来，

“他会經過的，离我們很近，就在我們身旁过去，”一个一头秀发的胖女人带着得意洋洋的預言口气跟她的邻人說。

后者激动地微笑着。她們的行为活象这个时刻是她們一生中最偉大的时刻似的。

一家肉鋪的老板帶着他的女伙計們出來了。他們都穿着白工作服，戴上印有鋪子的字號的帽子。老板身材粗壯。

“我們关上鋪子直到這事過去為止。這樣的事不是每天都有的，”他大聲大氣地跟一個女伙計說，一面搖擺着他那香腸似的短粗指頭。

註他們都听着；這就是你所需要的，好伙伴，是嗎？一刻鐘的愛國主義，不要更多的，隨後會加倍償還的，不是嗎？

前面突然動起來了。

“他們來了……他們來了！”一個傳一個。沖鋒隊員更加牽牢他們的皮腰帶，把人群往回推。大聲喊“萬歲”。只來了一部車子。戈培爾。他木然地舉起手——過去了。幾分鐘之後，喇叭里傳出了他的聲音。開場白說明今天在“他的德意志工人”住宅區的“元首的演說”的重大意義。當他還在說着，人群涌到人行道的邊沿上去。空氣中充滿了發狂般的“萬歲”喊聲；手筆直地舉起；我也一樣。希特勒。他站在車上，回着禮。我和他之間相距只有三碼。希特勒的面孔被風吹得發紅。又肥又胖。他看來比“元首玉照”還要“精神”得多。其他兩輛車緊跟在後面。黨衛隊隊員站在踏板上，時刻準備着撲向人群，他們的那只空着的手攔在手槍套上。過去了！瘋狂般的叫喊聲沿着街道一陣陣地傳下去。相隔三碼！這就是為什麼有些人在談到謀刺。簡直是發瘋了！希特勒的死亡不會改變任何事物。戈林、戈培爾或其他人會起來接替他的。而且就在同一個夜晚里，會有上千的人在集中營里送終……。

貼近我的一個婦女的尖銳狂喜的聲音打斷了我的思路。她興高采烈地拍着雙手。

“元首的樣子不是挺可愛的嗎？噢，難道他不是很好看嗎？”

有誰能不喜歡他呢？”

人群又擠向喇叭跟前來。人愈來愈多，向前擠着要聽個清楚。一個沖鋒隊員就站在我身旁。他把鋼盔上的皮帶扣在下顎上。那樣看起來更神氣。他自以為了不起。喇叭里還在傳出來“萬歲”的喊聲。然後靜下來，終於是希特勒的聲音。

“十四年的鬥爭……。

“馬克思主義者利用混亂……

老是那一套！而現在：

“我打算向所有現在圍聚在各個工廠的擴音機旁的德國工人們說幾句話。我們願意向每一個準備為德意志的榮譽而奮鬥的反對者伸出友誼的手。……”聲音變得發尖，尖到幾乎到了不成聲音的地步。“我知道你們只得到微薄的工資。這個我是曉得的！”

下面的幾句話我一點都未聽進去。“每一個反對派。”他可以這樣去跟“他的”工人們說！“我曉得的——”那不會使薪俸袋滿起來的——但是他看到這是把“社會主義者”這張牌再拿出來的時機。要表明他是多么的同情“小人物的煩惱”。我突然惊醒過來。喇叭里的聲音消失下去。只聽到了嘈嘈聲和卡叭聲。難道已經演說完了？但是為什麼別的人都在激動地轉來轉去，揮着手呢？

“打斷了……破壞……那是一個陰謀——”幾個人在大聲喊道。兩名沖鋒隊員向店的門口跑過去。店主出現在門口。舉起雙手，然後絕望地垂下來，無可奈何地聳聳肩膀。“到處都是一樣——不光是我的喇叭這樣，”他為自己辯護。

廣播中斷了已好幾分鐘。挨我站着的那個沖鋒隊員神經質地扯他的鋼盔帶。他的臉孔氣得走了樣。

“又是破坏——那些該死的赤色分子!”

我带着不相信的神情博問他。

“但是那是不可能的——目前不是不可能的嗎? 扩大器肯定是保卫好的呀!”

“不是破坏又能是什么?”他怒气冲冲地說。“但是他們会被捉到的, 敢保証一定会抓到他們的!”

情緒愈来愈激动。然后元首的声音突然又响起来了:“……被剝夺了荣誉和尊敬的日子已忍受够了……”

我慢慢地走回家。那个冲锋队员首先想到的是“赤色分子”。到处, 他們时刻都被这样情緒折磨着: 四周仿佛有一个看不见的敌人, 在等着扑上来扼杀他們。

那天傍晚, 我跟泰謝特談了一次話。把我关于元首見聞告訴他。

“你也見到了阿道夫了嗎, 你这位西門子的鑛工? 他有沒有象征性地跟一个工人握握手呢?”

“我以为不是那样的,”泰謝特回答說。“听着叔叔告訴你一切吧。”他輕視地大笑起来。笑得露出了黑黑的牙根。

“我們的人一个也不在場。他們仔細地从各个車間挑选代表。全都是工长, 而且全是靠得住的納粹分子。我們車間的人也在那儿, 但是他們当然得站在后排。至于那些喇叭呢, 它們都安装在高高的动力車間頂上, 你可以猜得到! 他們在它的周圍豎起一把特別的梯子。党卫軍守着梯子! 現在你总該明白元首是怎样跟‘他的’工人們說話了吧, 是不是?”

*

*

*

选举的星期日。

成群的希特勒青年团和冲锋队从清早就圍着人家的院子游

行，用号角吹奏起进行曲，然后齐声大喊竞选口号。广播电台每半小时一次中断广播节目，并且每次都重复这样的问话：“德意志男女们！你可曾尽了职责吗？你已经投票拥护阿道夫·希特勒的政府吗？如果没有的话，马上去投一票！”这样延续了好多个星期。广播、报刊、电影——戈培尔把他的竞选演说百万遍地向整个德国灌注。在今天早晨，他们送给每一个家庭一张纸条：“这所房子已在看屋人梅亚的监视下，三十八号住宅投‘赞成’票。然后把这张纸片投入票箱去。你就可以不必担心我们会在今天晚些时候来盘问你。”

泰谢特那儿的选举站情况和我这里的一样。我们曾经打算一起上选举站；想要看看到底什么地方是一样的。最初我们打算在别的区那里碰头。泰谢特说，由于克兰兹那桩事，让人看见我们俩在一起不大好。但是我们的住所是“干净”的；我们应该大胆一点；那是最好的掩护，我争辩说。如果我们在同一条街上相处了那么久之后却忽然变成“素不相识的人”，那才真会惹人猜疑。克兰兹的暴露不会再有什么作用。我们知道，如今他已不是老泡在啤酒里了。没有酒钱了。我们依然在戒备着，但是我们晓得，暴露了的好细对纳粹们来说已失去了价值。他们内心里对好细们的鄙弃，不下于他们对我们的同志们的勇敢气概的害怕。海尔黛曾经谈到过她的兄弟跟他的冲锋队伙伴们之间的这种谈话。那些家伙他们自己就是胆小鬼，而且绝大部分是这种人（他们从来不单独来跟我们打交道），经常觉得别人是加倍的勇敢。所以我坚持要泰谢特和我一道去。

于是现在我们满不在乎地荡到我们的街上来。

旗帜愈发多了。它们悬在百年老屋的阁楼窗外，挂在苔痕斑驳的房檐下。

我們来到了拐角的地方，安息日的寧靜籠罩着街道。這使得發電廠里的機器的嗡嗡聲顯得格外響亮、清晰。在一所高高的紅磚房的一個高大凹槽的窗口外，垂挂着一幅卐字旗。圍着垃圾堆的木柵欄上貼着關於勞埃德·喬治的標貼。

“每個不要求……的德國人都是混蛋。”

“我們將會有不少的‘混蛋’。你大可不必懷疑這一點。”

泰謝特微笑。他的上唇底下露出了黑黑的牙根。他朝着兩個窗戶那邊微微點點頭。

“工人同伴——特別版，”他嘲弄地說。

我朝他所說的那兩個窗戶望了一眼。兩個同志住在那裏面，我們曾經勸告他們把旗挂起來。我們必須防止在當前的局勢下惹起對我們任何一個同志的最輕微的猜疑。

“它有它的好處，保爾，我們的房子是朝後院的。”

“我也是這樣說，我們誰都不想出風頭。”

我們已經臨到了每一個面向街道的窗戶都在沖鋒隊的監視下的局面。特別是在我們這條街上。今早，沖鋒隊跑到旗子挂得不多的房子里來，盤詰那些窗口不挂旗的臨街的住戶是不是猶太人。幸亏艾迪不住在臨街的房間。他已惹下了不少的麻煩。

“好戰術？你這是什麼意思，好戰術？我們的同志現在竟替納粹捧起場來了！”這就是他的氣憤憤的回答，當我們告訴他有兩個同志挂旗的事的時候。

我們來到了柏林大街。海爾黛住在这儿，必須儘快在那一天打電話到她的辦公室找她。她比我更常見到佛蘭茲。在这儿，旗子一面挨一面地挂着。住在这儿的全是中下层人家。

文書、低級公務人員、小商販。這確是個嚴重情況，我們工

人区就是这样被圍起来。只有几条街道。

夏洛登堡是一个公務人員区。在市議會里，甚至在工人的組織內部，工人階級的代表不得不經常跟中產階級多數派作斗争。在战前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何夏洛登堡的工人如此的富有革命性，时刻都在准备着进攻的原因。我望着泰谢特。綑在高高的額骨上的蒼白的皮膚、一头厚厚的黑髮在两鬢上長成方形。一个工人的臉孔。没有什么特別的地方；跟我們所有人的面孔一样，它們全都是一个模子里鑄出来的。

“你的老婆怎么样，保尔？”

“你要知道她干嗎？她对我們的事知道得不多。象过去一样。”

他說得好像他自己对难免的事已經习以为常了。他的老婆是一个矮小、精力充沛的妇女。当然不年輕了。她对政治自来就没有兴趣。她的家就是她的天下。假如她曉得了他的非法活动的話，敢肯定說，她会求他不要“冒險給她帶來这种不幸”。我对一个同志的婚姻却有不同的看法。泰谢特从口袋里掏出一張紙片。

那是管房人的管制卡片。

“靠了这个，他們得到了所要的結果。把它拿走吧。”他用一只拳头打在另一只手掌上。“他們要在选民名册上找出那些不曾投票的人来，而且同时几乎是每个人都相信他們会发现他們投誰的票！”

我唯有点点头。在一个每个人都知曉另一个人的国家里，事情还能怎么样呢？甚至是在这里鎮上，我們的宣傳也必然被納粹所掌握的強力手段所限制。

我們在我們的区里散发了小傳单，上面只印有一个鐮刀、一

把錘子和一個“不”字。在柏林各个区都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和經常一样，戈迪担任了最困难的工作。拿下了他的假眼珠，在臂上纏着一條盲人的符号帶，拿着拐棍輕輕地敲着往前走。但是我們在我們那條街道上沒有散傳單，只是跟几个住戶討論了全民投票的事。我們不想在克蘭茲那樁事发生后，那樣快就讓冲鋒隊來找上我們。尽管恐怖鎮壓，這些傳單將不只是号召投“反对”票：它們对每个反对希特勒的人將起着鼓舞作用。會向他証明我們是不能被壓服的。

泰謝特用臂肘搗了我一下。他想要跟我說話，但是不能說，因為我們前面站着两个冲鋒隊員。

“希特勒万岁！”

“希特勒万岁！”

“你們拿到了投票証章嗎？”

“投票証章？沒有，”泰謝特回答說。

“這樣說你們還不曾去投票了？”

“不曾？”

“你們最好還是立刻去投票吧。不然的話，不論你們到哪裡都要被截住的！”

“你們可以在那邊拿到投票証章，”另一個冲鋒隊員解釋說。他扶正一下他的眼鏡。“把它們別起來！它証明你們已經投過了票。”

他們舉舉手，繼續往前走。

“走吧，揚，”泰謝特怒冲冲地說，當我們走開了一點以後。“他們可以馬上得到我們的答复！”

我們路過一個電車站。冲鋒隊正在盤詰那些在候車的人。一個胖婦人激動地說着話。

“但是我一定得到史潘道去——去看我的亲戚去！”

“先到你的选举站上去。在史潘道你还是一样受到查問的，而且到那时就来不及了！”我們听到一个冲锋队员說。

“但是他們在等着我去吃午饭呢……”那个妇人又分辯說。

“你是聾了，还是什么呢？今天沒有投票証章你哪儿也去不成！”那个冲锋队员冲着她咆哮起来。

那个女人愤怒地拿起了一口箱子走开了。現在我們才看見原来有一个矮小的男人和她一道。他拿着另一口箱子。我們跟在他们后面。

“我早跟你說过了。我不是說要坐火車去嗎？”那妇人布責罵那个小男人。

“当然啦！坐火車去！你好象沒有听见佛立茲說那里是什么样呢。他們不許任何一个‘沒有拿到’証章的人入栅栏里去呢！”小男人在替自己辯护說：“在那儿他們看得更紧！”选举站設在一家啤酒店里。人們在門外站成一长列，它一直繞过柜台到相連的一个房間里。當我們来到門口的時候，我們可以望見这个房間。在房子的另一头的桌子后面坐着官員。他們全都戴着国家社会党的徽章。紧靠着左边，在洞开的折頁的門后，三張桌子上放着三个票箱。綠帷幕把它們分隔开来。門的两旁都站着一个人冲锋队员；其中一个手里拿着一个信箱，另一个拿着一个盛着投票証章的紙板盘。在一張桌子上一个人翻人名册。他大声地喊名字，有时还核对一下出生年月。挨他坐着一个納粹官員，每喊一次名，他就在他自己的名册上勾掉那个名字。

他們有一份区选民名册副本。所以他們就能查實誰沒有來投票。然后他們就去找這些人。

“这所房子是在看房人梅亚的監督下——”

选民们拿着装有选票的信封走向门后的票箱去。他们在帷幕后写下自己的选票。有的人是这样的激动，以致忘了把帷幕完全拉拢来。在他们背后两码开外就站着两名冲锋队员。他们目不转睛地瞪着票箱，好象生怕它们被偷去似的。选举规则是被遵守着的。冲锋队员并没有在投票房内——只是在房门口上。

泰谢特向我霎霎眼。他想的跟我想的一样。这种布置对一些犹豫不定的“反对”票起一种恫吓作用。我不知不觉地环顾了一下我们身后的人们。是劳动男女。他们的服饰、粗糙的双手都说明了这一点。他们满脸严肃神情，绷得紧紧的。

当我们走出票房时，那个拿着纸板盘的冲锋队员拿给我们証章。另一个冲锋队员把信箱伸出来。

“我们是沒有工作的，”泰谢特回答說。

他们便白给我们証章。它们是锡做的。上面压印着“赞成”两个字。

走到外面，泰谢特轉过来向着我。

“他们的令人讨厌的面容教我作呕！他们用来检查我们的証章，我们还要給錢！下一步怎样呢？我不戴他们的血腥的徽章。”

* * *

两天后。

海尔黛告訴我們說，她的兄弟和他的冲锋队伙伴们曾展开过激烈的爭論。他们对夺得政权已近一年之后还发现了将近五百万“反对的”选民这件事，大为吃惊。

“在这种情况下，而且是根据他们的数字，”泰谢特說。

“可是沒有誰能核對它們。”

“夏洛登堡的成績是最好的成績之一，”我告訴他們說。“我們得到了三萬八千個‘反對’選民。為什麼，甚至在更大的工人區，象弗雷德烈希許因區和魏登區，只有四萬張反對票。”

“由於三十三支隊。也許是由於在夏洛登堡，工人們在第三帝國過着最艱難的日子吧。”

* * *

我已經有一個時期不能繼續寫我這本書了。再不可能在我的房間里寫作了。我的鄰居——她的房間跟我的房間只是一板之隔——已經向房東提出來說，她聽到屋裡有一台打字機。老女居停把我告訴她的飾詞轉達給我的鄰人。當然，她絲毫也沒有想到經常在打字的就是我。在她看來，我是一個按時交房租的住客，又是一個好商量的“好人”。

在前不久，還發生過類似的情況。好幾次正當我在寫作的時候，官吏們來光顧我們的住宅。我只來得及趕忙地把寫好的紙片收藏起來，但是他們看到了打字機。我們知道，納粹曾經嚴格指令那些負責看管私人住宅的官吏們，要他們詳細紀錄住戶的閑談——事實上，就是要他們記下全部所見所聞。一個“普通的”老百姓——而且是一個住在工人區的人——擁有一台打字機，確是惹人注意的。

這便是我所以要尋找另一間房子來工作的原故。一個在本市的另一區住的同情我們運動的人，現在願意租給我一間房子。我向他暗示我正在寫一些“犯禁的”東西。我必須這樣做，為的是要對得起他。

現在我一次到那裏去幾小時。我發明了一種機件，使我能夠在必要時立即把手稿和我的札記收藏得無影無蹤。

* * *

两天前佛兰兹不得不搬家了。打击落在拉姆普累赫特的头上。那是从前我跟凯蒂在那儿互相认识的那一家人家。佛兰兹把事情告诉我。

昨天早晨，他正站在拉姆普累赫特的厨房里剃胡子。拉姆普累赫特要和他一起上一个秘密印刷所去取报纸。鲁迪，那个长着一头秀发和一脸雀斑的钳工，和另外一个同志在那儿印报纸。（当时，我们跟鲁迪和他的朋友“拳师布鲁诺”一起在一家夜总会里印我们的报纸。）

佛兰兹正在往脸上抹胰子，让她等他“刮完了”胡子一起去。

“我还是先去好，”艾尔娜·拉姆普累赫特回答说。“小孩睡着了，不到一个钟头库尔特便会从煤场上回来了。不然的话，他就来不及吃完晚饭了。我将替他把报纸送到分发站去。这就省得库尔特跑一趟了。在傍晚时他总是累得要死。”

我很清楚这个印刷地点。曾经常和佛兰兹一块上那里去。它只是一家很小的铺子。电器装备挂在窗口上，还有煤气开关、水龙头和电灯泡。在这之上，在柜窗里挂着一幅希特勒象，四周装饰着花草。玻璃窗上写着：

承包煤气和电气工程

下面用大字写着：

德国店！

店主施万特同志，是个老年人。他常年穿着一身褪色的工装，戴着一付镍边的老式眼镜。他的眼近视得很厉害，有一付棕色面孔，满面皱纹，好象用旧了的皮子似的。每星期六他到乡下去钓鱼。这是那个老单身汉的一种爱好。店里四壁放着长长的货架，

摆着銅綫，各种尺寸和顏色的鉗子，鉛管和其它器材乱堆在一起。老施万特从来不整理。也許是他沒有時間來收拾；他只靠作些小修理活，勉强維持生活。“老施万特供应了区上的同志們的糧食，也养活自己，”佛兰茲有一次玩笑地跟我說，他指的是印刷机。

它放在后院工作間的长桌上。是一台大的新式机器。它自动地把紙張送进去，又自动地把印出来的紙堆在滾筒后面，甚至还有这样的装置，教人能一下子就看到了已經印了多少份。并且工作得很快。它的响声当然比其他三台来得大，但这无关重要。这家鋪子，你一定想到会有乱嘈嘈的修理工作在进行。佛兰茲在艾尔娜走后十分鐘也跟着上施万特的鋪子去。在他离鋪子不远的地方看到的一切使他吓了一跳。在对过人行道上圍着一堆人。施万特那里出了什么事嗎？佛兰茲怕极了。他站到人群的背后去。好在在这个区里沒有人認得他！于是他看到了。停在施万特鋪子外面人行道上的是一輛囚車！

他打顫了；他的膝盖支持不住了。

他們被捉到了。他們脫不了身了。一定不能許任何人注意到什么事情；即使你被捕也还是无补于事的。艾尔娜是不是已經在那里面了？現在怎么样了？他飞快地思索着。

后来佛兰茲告訴我說，那时他的头象在打轉。接着店門大开。身穿淺綠色制服胸前挂着閃亮的銀徽章的人走出来。戈林的宪兵！他們圍着三个平民，推他們到車里去。艾尔娜·拉姆普累赫特——老施万特——和一个高高瘦瘦的同志。佛兰茲只認得他的面孔；他曾經和魯迪一起遇見過他一次。但是魯迪在哪儿呢？在其他人当中看不見他的紅头发。可是他一定帮他們搞过印刷。难道他早走了一会？在那儿的另一个人——第四个平民——难道不是——当然是——賽法尔特！他在跟宪兵們談

話——他們沒有推他上車！佛蘭茲覺得不會動了。對面的警車開走了。人群四散，低聲地談論着。佛蘭茲竭力控制自己；他必須走路。他迫使自己平靜地走——直到下一個拐角的地方，於是他開始跑起來。突然之間他曉得了他必須做什麼！他又跑了十多分鐘，氣都喘不過來。到煤場上去！警告艾爾娜的丈夫！

太晚了。他聽說，二十分鐘後，庫爾特正好落在憲兵手中。當他回家的時候，他們正在他家裡等着他。拉姆普累赫特的鄰居想照顧那個小女孩。憲兵不答應。唯一的結果是他們自己的地方馬上被搜查了。

同一天的晚上，佛蘭茲去找布魯諾。對布魯諾來說，魯迪是他的最好的朋友。當他一推開門，他從布魯諾的陰沉的臉孔上知道他已經曉得了一切。但是他一點也沒有想到他自己還不是全都曉得呢。布魯諾默默地把他領到自己的房裡去，然後倒在一張椅子上，把臉藏到雙手里。佛蘭茲看到布魯諾的肩膀因為不成聲的飲泣而抖動。布魯諾，斐希特派拳師！一個堅強的漢子，甚至在最困難的環境中，也從未喪失過他的幽默感的人。當衝鋒隊在我們正讀着棕皮書的時候來到時，他依然是那樣的鎮靜和自制。我們之所以能夠和“社會主義勞動青年”的同志們聯繫上，也全是他的功勞。房間裡的靜默使得佛蘭茲感到難以忍受。

最後他不得不設法打破靜默。

“賽法爾特——那個混蛋——那個叛徒！”

布魯諾這時抬起頭來，瞪大眼睛望着佛蘭茲。他的臉扭得變了樣。

“他這是怎麼啦——難道他還不曉得嗎？”佛蘭茲想道。

“他跟憲兵走在一起——跟他們談話。但是魯迪在哪兒呢？”

他問道。“他沒有跟其他的人在一起嗎？”

布魯諾突然跳起來，一下子把椅子踢翻了。

他高聲叫喊，放開了嗓門地喊——好象是在這些日子裡每堵牆都不是隔牆有耳似的。

“賽法爾特？賽法爾特？原來賽法爾特就是謀殺他的凶手！”——又倒回到一張椅子上。

歇了一會兒他平靜地說：

“魯迪——魯迪——他跟其他人一起——被槍殺了——”

現在佛蘭茲跟布魯諾住在一起。他說布魯諾已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了。他變得瘦得怕人。在吃飯的時候，當別人在熱烈談話時，他光是坐在那裡一言不發。他食而不知其味。最糟的是，再不能讓他擔任要求嚴格的工作。象一头不知疲倦的野獸一樣，整日價二十四小時，他只有有一個念頭：魯迪的死必須報復！他經常外出，深夜才回來。事變後不幾天，區委員會發出傳單。布魯諾一直纏着別人要傳單，直到他把傳單全部拿到手為止。別的同志告訴佛蘭茲說，不論賽法爾特到哪裡，傳單就跟着他到哪裡。布魯諾就象一個影子似地追蹤着他。賽法爾特搬了家。現在他只有在沖鋒隊的陪伴下才出外。儘管採取了這一切預防手段，但是在一天黃昏的時候，賽法爾特還是被人重重地打傷在門檻上。那天夜里，布魯諾臉上帶着一道傷痕回家來。

他甚至不許賽法爾特在醫院裡有一點點安寧。在牆上出現了揭發他的背叛行為的傳單。從醫院出來以後他搬到另一條街上去。沖鋒隊同時還進行經常的監視。他們驚擾進入他的住宅的人們，搜查他們的口袋。但是布魯諾並沒有被吓住。幾天之後在賽法爾特的房子的牆上出現了刻得深深的字：

注意！謀杀工人的凶手賽法尔特住在这儿！

这就是布魯諾，時刻出現的控訴人，如何在全市鎮上追逐着他的猎物。这就是他如何使得賽法尔特今后不可能再进行任何奸細活动的原因。賽法尔特就好比一头被追逐的野兽，它从来不曉得敌人可能躲在什么地方伺候着它。

賽法尔特不認識布魯諾。

布魯諾的复仇活动給同志們带来了對他們的階級力量的新信心。

他向他們显示出，尽管有冲锋队、警察的恐怖镇压，但是他們对叛徒們不是无能为力的。

賽法尔特最后敗退了。有一天他悄悄地从那个区上消失了。連布魯諾也找不到他的踪影。

“但是我們总有一天会找到他的——到那时候任凭誰也拯救不了他，”他对佛兰茲說。

* * *

我在威登堡廣場地下鐵道車站附近等候着。在等凱蒂！我打了一个電話到她的办公室。我上次見到她是在多久以前呢？如今我們的私生活已經沒有了。不只是我們的；所有的同志們无不如此。其他的人是不是也和我有同感呢？这些日子来，愈来愈想跟凱蒂見面。我知道到底还有这样一个人，她懂事理，可以跟她談一切的事情——无保留地談一切事情。不錯，有同志們在一起可真有意义。这意味着，在一个任何人和任何事情似乎都已变成一部騙人的机器的国家里，还有一些头脑保持清醒的人。层出不穷的瘋狂事件，对下一天的猜疑不定，已大大加强了我們个人之間的友誼。真的。今天我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認

識到，如果我們弄得孤單一人，那將是多麼大的損失！

橫跨街道上的電光廣告刺目地閃耀着。整條唐金大街閃耀着紅紅綠綠的霓虹燈光。在大街盡頭處隱約現出古色古香的教堂，顯得又大又臃腫。行人們沿着人行道慢慢走着；一群群一堆堆地，在窗口下擠過去。離我不遠，兩個巡警揮動着套上白袖套的手臂，指揮着廣場四面八方的汽車行列。

一群人涌出車站來。凱蒂！她的棕色眼睛閃出火花。

我捉住她的手。她把臂膀牢牢地插入我的臂彎里。我們慢慢地穿過人群。我們渴望見面已有多時了，大家都有滿腔的話要說。可是現在我們卻連一個字也沒說出來。只是兩雙眼睛對望，四只手緊緊地互相捏住。不，現在不要說——晚一點再談。我們想找个地方坐下來。凱蒂的步子小；我放慢了腳步等她。她的手心的溫暖——使我覺得在大街上只有我們兩個人似的。她臉色蒼白，身裁瘦下來了。她的臉愈發瘦削了。是她的那頭秀髮給人這樣的印象呢，還是這兒的朗朗陽光造成這種印象呢？

我在想我能跟她說些什麼呢。有些是令人高興的。但是我所能想到的是：

“應該打開小店主的眼睛。最初他們抵制猶太人——‘打倒大百貨店！’而現在，‘禁止任何納粹分子干擾大商店的事務’。”

“我一直在奇怪。難道人們真個是那麼健忘的，或者他們就是對事物那樣熟視無睹呢？”凱蒂回答說。

在拐角的地方站着一隊救世軍，歌唱着。一個婦人伸出一個募捐箱子。她的藏在大邊帽下的多肉紅潤的臉孔，堆着裝出來的微笑。

“你還記得在我們那兒拐角的那個老洗衣婦嗎？他們已經在她的門上貼上抵制的標語。”

我点点头。

“不久前，店員們都站在一家大鞋鋪的外邊。我問其中一人这是为了什么。他們要强迫开除一个犹太学徒。那里的納粹分子强迫他們提出抗議，她告訴我。可是他們誰也不忍心让她失业。”

“到处都是一样，”凱蒂說。“在我們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同事，过去我常跟他长談。我知道他一貫投左派的票。但是現在已有好一陣子他完全避开了我；見到我总是大叫一声‘希特勒万岁’。”

在一家咖啡館里，我們挑了一張靠窗戶的桌子。窗子外过路行人不停脚地涌过去。街上交通的嘈杂声傳到我們耳膜上来时，好象背后傳来的不停的沉闷的嗡嗡声。凱蒂坐过来貼近我。我觉得到她的温暖气息。她默默地攪动着她的咖啡，投过来带笑意的目光。

我点着了一根香烟，深深吸了一口。妙极了。

凱蒂又用带笑的眼神看了我一眼。

“媽媽病了。她已躺倒床上有些日子了。”

“病了嗎？我希望不会太严重吧？”

“没有什么。就是老毛病。但是她一直在問佛兰茲的情况。我还没有告訴他說她病了。他一定会放心不下的。”

“你最后一次見他是在什么时候？”

“昨天。海尔黛也在那儿。”

“上星期我見到过他。他們那里一切都好嗎？”

“是的。他看来很好。”

我的呼吸更舒暢了。看来他还没有把魯迪的事告訴她。他也不想使她心煩。

共产党的謀杀行为，因此共产党謀杀者的想法便打入公众的心灵中。沒有哪一家报纸曾經提起过冲锋队在瓦尔街上横冲直撞的事，可是在那一天他們曾經在街的对过举行完了火炬游行后回到他們的巢穴。在通过我們这条街道的时候，冲锋队首先制造冲突的机会。我們很清楚，他們想要在最初的胜利浪潮中“一下子夺下我們的街道”。被起訴的同志們在审讯中定必已提起这回事；因为报纸暗示过对罪名的否認和反駁，它們把这些說成是“当然是蓄意的撒謊和歪曲”。这场审讯对同志們來說必然是一种惊人的精神苦刑，除了他們在几个月的偵訊中所必然受到的以外。在报纸上出現的关于审讯的报道里，常常用一种冷漠无情的口气写出这样的句子来：“审讯不得不停止，因为被告之一突然尖銳喊叫……因为一名被告，象审讯中所常有的那样，在一陣突如其来的癲癇发作中昏倒了……”

事实上，国社党的报纸把迈科斯基捧成为“民族英雄”。他們經常把三十三冲锋支队描述成为德国的光荣，是德国老战士，这是一个贈給那些在希特勒上台前就加入了国社党的納粹分子的荣誉称号。戈培尔不久前曾在一个授旗仪式上吻了染上迈科斯基的血液的旗子。报纸上的图片显示出，三十三支队站在讲坛前充当仪仗队。直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的血旗^①——他們在慕尼黑暴动中打出来的那面旗子。当时只有一个“民族英雄”——赫斯特·韦塞尔。現在，他們的第二名“殉道者”却是迈科斯基，被他自己的冲锋队同伴枪杀！这一切更加使

^① 这是指希特勒当时在慕尼黑暴动时所用的卐字旗，在十一月九日暴动的前一天，希特勒曾大叫道：“明天将見到国民革命的成功，或是見到我的死亡！”第二天警察向暴动者开枪，打死了十六个人。希特勒立即坐上汽車跑掉了。

我們為被控訴的同志們擔心不安。我們之所以特別擔心，是因為納粹的報刊在大喊要判處主要被告人。然而，儘管如此，邁科斯基審訊案並非是公眾的注意中心。國會縱火案日益展現其重要性。在戈培爾和戈林出庭作證之後，等候審訊結果的焦急心情在各階層人民當中已經達到頂點。難道戈林沒有對季米特洛夫很機智地向他所提出的問題暴怒地回答說：“在我看來你是一個無賴；老早就應該上斷頭台的！”而且在另一個場合，他暴跳如雷地向他喊道：“滾出去，你這個無賴！”

德國報紙對戈林的恫嚇避而不談，這種沉默現在已是不難理解。但是我敢保證，討論這些威脅的並非只有我們，而是範圍廣泛得多。人們從外國的報紙上獲得了消息。現在對外國報紙的要求達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到處，無論是在咖啡館里、火車上、公園里，人們坐下來讀着外國的報紙。在咖啡店里，它們從這隻手飛到那隻手；每個人都在焦急地等候着別人看完了傳過來。因為我們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買外國報紙的錢。

但是甚至德國報紙也不得不暴露了獨裁者戈林的狼狽相。當戈林談到罪惡的共產主義哲學時，而又當季米特洛夫公開質問他是否知道這種罪惡哲學目前正治理着地球的六分之一，也就是說蘇聯的時候，戈林又暴跳起來。他說他很清楚俄國人是用信用支票還債的，但是他不知道這些支票後來都兌現了。第二天在德國的報紙上刊出了官方的一項否認聲明，它承認了“迄今為止蘇聯政府一直是按時結清其對德國的債務的”。這個聲明在所有的報紙上只占很小的地位，而且是在極不顯著的地方。但是我們同志們卻笑吟吟地一個傳一個把它傳開去。而且重視這樁事的絕不只是我們。我听到了人們在雜貨店里的談話，暗示出納粹黨不付錢強买东西的手段。

大家的注意集中在季米特洛夫身上。可以在全德国找出成千上百个季米特洛夫来，如果他們的审讯记录能够发表的话。

任何的官方否认和新聞封鎖都阻止不住关于真正的纵火犯的真相的广泛傳布。在秘密的小册子和报纸所达不到的地方，莫斯科广播电台从收音机里傳來消息。到处都組織起傍晚的广播收听。現在我們这条街也組織了。每天傍晚我們都在收听审讯的报道。然后同志們再通过口头把它傳出去。海尔黛告訴我們說，甚至那些来看她的兄弟的冲锋隊員們也談到莫斯科的新聞：他們当中有的人这样做是出于老羞成恼，而有的人则是为了炫耀自己“有新聞”。戈林很清楚这种收听已达到多么广泛的范围。他因此下令：“企图用收音机来收听国外电台将被认为是敌視国家的行为，因而将予以惩处。”在我們看来，这道命令只是一紙公文而已。在这方面戈培尔帮了我們最大的忙。遵照他的命令，德国的无綫电工业制造出一种便宜的所謂“人民牌”收音机。只要花上几个馬克按月繳納就可以买到这种收音机。但是它只能收到德国国内的广播，这就是它本来的目的。可是，我們的业余无綫电爱好者很快就发现，只要再花上两个馬克装上一个小小的附件，就可以大大扩大它的收听范围。現在我們許多出不起錢买昂貴的收音机的同志，都可以听上了莫斯科的广播了。

* * *

在圣诞节的前夜。我和艾迪約好了。他想到“冬季救济工作”分配站去。到国社党的人民福利站去。

“你可以跟我一道来。他們都是在大街上排的队。当輪到我的时候，你只要呆在你站的地方就行了。誰也不会来注意的。”艾迪說，在設法消除我的疑慮。“那样，你就有很好的机会去听听別的人对事物有怎样的看法了。”

这是我考虑跟他去的唯一理由。但是我们只准在办公室附近相遇后一起去。办公室离我们的大街不上十分钟的路程。

冬季救济工作。泰谢特告诉我，他们厂里的每个工人每星期都不得不“牺牲”五十个芬尼克。这是各种各样的“自愿”赋税之一。在发薪的那一天，纳粹官员们传下一份名册，交款的数目就写在每人的名字的旁边，因此没有哪一个敢交得比前面一个人少。自愿捐献者收到一枚冬季救济章。上面有图画和印着“我们帮助了”字样的圆纸花朵，就钉在每个人家的门上。我家的门上也有一朵。这些花朵每月的颜色不同。于是在一些人家的门上蔚集成一个展览会。这是标志，等于告诉那些摇晃着捐款箱子在人们的家中穿来穿去的征集人，这一家住户已经“牺牲过了”。泰谢特说，工人们虽然签名捐出了五十芬尼克，可是没有拿到纸花朵。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义务捐款。为了这些纸花朵他们还得另外拿出五十芬尼克来。在他看来，大部分工人所以这样做，只是为了图得家庭的平安无事。

希特勒在克罗尔大剧院为冬季救济工作举行了盛大的开幕式。他向克虏伯、西门子、戴森、金融巨头们以及身穿华贵制服的党魁们大谈其这种“实践的社会主义”。他把戈培尔吹捧成“历史上最伟大事业”的组织者。我们的失业的同志们告诉我，他们从国社党人民福利会所得到的只是几十磅马铃薯，百十磅煤和一两磅人造黄油——他们就得仗着这些过一个月！而且那一磅人造黄油还不是免费的。是按“减价”出售的。马铃薯和煤也要付一定的钱。“在往日我可以从社会救济机关得到那些东西，而且比这还要多，”艾迪补上一句说。

农民们必须“贡献”马铃薯，煤商献煤，小商贩捐杂货。他们把这个叫做“一磅的捐献”。没有哪一个商人敢抗拒捐献。纳粹

党把能够从小商人那里敲榨到的东西分给穷人，把这叫做“社会主义”。那么所收集的现款的下落呢？它们每个月至少也上百万马克！

看来戈培尔已认识到一般的捐献箱已失去作用了。现在装上扩音器的卡车在大街上开来开去。牵着骆驼、猴子以及其他怪兽的宣传队，一队队的穿街过市。在柏林最热闹的唐金大街上，募捐的冲锋队骑在马上。他们把捐款箱吊在马颈上，横站着截断人行道。我们在我们的街上也发动了两次捐款。捐来了三数张二十马克的钞票。我们把这些钱送去给卡尔·库尔格耳和汉兹·普勒斯两人的母亲，好让她们准备送给他们的圣诞节包裹。普勒斯被关在勃兰登堡集中营，库尔格耳在奥伦堡集中营。他们无缘无故就把库尔格耳投入集中营。三十三支队所以逮捕库尔格耳，只是想从他那儿打听出佛兰兹在什么地方。这是冲锋队的一个后备队员告诉我的。几个月来千方百计打听的结果，我们只能打听出他们被关在那里。此外什么也打听不到了。我停下来。艾迪——艾迪在哪里呢？可是这不是那个拐角的地方；我们约好是在另一个拐角那儿！

一道菜星期日^①。没有哪一家主妇做一顿超过五十芬尼克的午饭。募捐人进入人家的时候就查碗查碟。

“元首也只吃一道菜的饭，把节省下来的钱捐给冬季救济工作，”他们宣布说。

但是他们的查碗查碟使得他们到处遭白眼。我从来没见过同屋的蔡施克老大嫂象这一个星期天那样的烦恼。她领我到她

① 一道菜星期日，系纳粹德国用法律规定德国人民每个月必须有一个星期天只吃一盆连汤带菜的饭。

的厨房里，揭开菜盘盖，开始大罵。

“我把那募捐人大罵了一頓。我告訴他，我只有很小一笔撫恤金。‘我的午餐超不过五十芬尼克，’我对他說。‘是那样嗎？元首吃得一样嗎？那么，假如我在圣诞节那天可以吃上一頓五十芬尼克的飯，那我可真是高兴了，’我对他說。”

蔡施克老大嫂連損帶罵地說下去，可是我在問自己，她为什么把我拉进来呢？她对我毫不了解。然后，她很突然地問我会不会唱“一道菜星期日”的歌。

“不会。”

她開始用蒼老微弱的嗓音唱起来。

在一个星期日的早上德国总理說，
一道菜的飯，一道菜的飯，卷心菜，
胖子戈林苦起了臉孔，
一道菜的飯，一道菜的飯，卷心菜。

这个老妇人用她的老迈的尖声按着德国民歌的調子唱起来。她的左手还拿着碟盖。样子看来是这样好笑，我禁不住大笑起来。我当然会唱那首歌；我們全都早就学会了。

但是我的老天爷，蔡施克老大嫂从那儿听来的？

艾迪来了！他仍和往常一样热情地握着手。

“喂，揚。現在我們走吧。看看我能从他們身上剝下些什么来。”

他清了清喉嚨，吐了一口痰。

“我还带来了那些东西。要是他們那些大亨們少給了的話，我会对付他們的牛皮！”

“現在，先听着：我們倆誰也不認識誰。要当心你所說的。我

們必須特別小心!”

“那还用說。难道我还不曉得那个!”

冬季救济的杂品分配中心設在一所空店舖內。門前站着四排长长的行列。我們站到排尾后头;不一会又接成一条长龙。新人陸續来到。我观察了其他的人。他們絕大部分是劳动妇女和失业的男人。从少数人的服飾上,我看得出他們过过富裕的日子。我敢說,那边那个戴呢帽、穿黑大衣的矮个儿,要是在别的場合下碰見他,准把他当做有固定收入的人。那件大衣有一条上等天鵝絨領子,而且还是蛮新的。左边那个身穿短皮袄的老妇人呢?她有一付多么傲慢的臉孔!即使在这里也标志着她是中产階級。要她站在这儿肯定是“痛苦的和有失身分的”。一定是多么紧迫的需要才使她来到这儿。我們在頓脚。天气又冷又刮风。

这跟战时的日子一样。为了几公分的人造牛油、蕪菁醬,我就得去排队。父亲那时在前綫,媽媽在軍火工厂做工。她每天傍晚回家时又累又餓。臉上常常是黄色的。那是硫磺粉末。

一个冲鋒隊員打开了店門,放进了一群人。我們全都往前挤。

“往前去呀,你們在头里的人!”

“我們还得在这儿挨着冻等到什么时候?”

店門已关上。艾迪朝我霎霎眼。現在他站在我的左边,在行列的最前头。他是对的。我站在这里相当保險。誰也不会来管我进去了沒有。不管怎样,他們一旦有机会就全都往前挤。我仔細地看了看那两个在大喊的男人。其中一人戴着劳工陣綫的徽章!那些站在前头的人必定是至少已站了一个钟头。在我們前面約莫有六十人。那个冲鋒隊員一次只許十二个人进去。

鞭子在人行道上响过去。开始下雪了。一股弱风，半雨半雪。还有什么呢？我们后头还有多少人？我数了数行列，七个，八个……三十多人。还得等多久才轮到他们呢？我们已经等了二十分钟了！头一批放进去后，我们只往前挪了两步。

一个年轻人从行列后头走过来。我只看到他的脑袋和他所戴的毡帽。

“喂，艾力希，”他喊道。

站在我前两排的那个戴呢帽的矮个子，抬起头来。

“喂，这儿呢！”

“出来一下！”

矮个子从人堆里挤出去。我看不到他们两人，但是可以听到他们说的什么。行列里的人都转过头瞧着他们俩。

“他们发给你了吗？”

“发了。”

“那么，我们拿到些什么啦！”

“一只手就可以拿完了。一磅洋葱，半磅罐头干奶酪，价值一马克的杂货店购物证。”

啪的一声响。那个小伙子准是拍了一下那个包裹。

“我要洋葱有什么用呢，我问你？”

他们继续谈下去，但是我听不清。

在我前头，左边，一个身材高大、面容憔悴的妇女开始喃喃自语。她双手叉在腰上。

“一磅洋葱——半磅干奶酪！这就是一直在这儿等着的东西吗？”

她开始挥动手臂。旁人不自觉地往后退。

“他们到底在干些什么？……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呢？……他

們从我的屠夫那儿搶走了好多的猪油，还有那么大的香腸！”

她把手臂弯过来比拟香腸的大小，一直弯着好让旁人看見。她挨个地向大家看过去，好象在要求給她一个回答。

“他們也想庆祝圣诞节哩，”一个胡須雪白的老汉辛辣的說道。

“这完全跟在战时的情况一样可恶。在血流成河的战壕里沒有东西吃——而司令部里的人却是吃得噎住了！”

艾迪！难道他不能不說話嗎？而且，无论如何，他不應該作这样尖刻的批評。我愠怒地朝他看。他微笑，輕輕地搖搖頭。他甚至以为他的話說得特別有技巧。

“还是那家老鋪。只是換了个新店东就是了！”我背后有一个声音說。

那个戴呢帽的矮个子又挤回到他的位置上来。他不是在大衣上別着一枚党的徽章嗎？他一定听到了最后的这句话，因为他把帽子朝脑后一推，激动地說：

“我将报告这件事，你們可以相信我！要报告关于呂佐这里的分配站的事！……向柏林冬季救济工作的負責人报告……向斯皮渥克本人报告！”

“还有知道羞耻的人……”长着白胡子的老汉說了半句就止住了。他想要說的半句是“在盜賊当中”。但是他已經看到納粹党徽，所以忍住了。我注意到，他的半句話警告了其他的人。他們先是莫名其妙地看住他，但是現在他們也想到了这个矮个子了。我看看艾迪又看看那个矮个子。踮起脚站着好教艾迪可以看到我。我把食指屈成圓圈放在衣襟上。艾迪瞪了我好一会儿，好啦！他点头了。他終于懂得我的意思了。現在至少他会少說几句了。那个矮个子也許是被派来偷听的。現在他会說什么呢？

“可耻呀，他們在这里这样来分配东西！我一定要打个报告！我要求調查！”

想到他将要得到的微薄的“份額”，他着实烦恼起来。但是他的腔調里还帶有驕傲的成分！他自以为比起我們来，他自己就是个“半官方的”人士了。我的看法也許不对。其他的人臉上又露出放心的神情。前面的店門打开了。拥挤現象又出現。一名冲鋒隊員站在門洞里，搜索地看着人群。

“不要再让任何人接着排队了！”他大声叫喊。“一小时内我們就关門了！”

他的話引起了一陣子的叫罵和議論。

“你以为我們站在这儿是为了找快乐嗎？……一小时我們不能全都輪到进去的……要是你干不来的話，那就让別人来干吧！”

四人橫排的队伍突然队形大乱，向左轉过去。人們一齐涌向門口去。手里高高举着失业登記卡片。

“如果你們不馬上靜下来，我們就立刻关門！”那个冲鋒隊員喊道。

“好哇……这簡直是跟我們开玩笑！……但是你不能这样对待我們——不能这样，你不敢！”

店門砰一声关上了。钥匙在鎖孔里吱吱响地轉动。我紧紧地靠在店鋪的窗櫺上。窗里貼着一張大幅的告白。

要成为一个实际的社会主义者！参加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会。

下面有一行小字写道：

征购

一个取暖用圓鉄炉。

一輛好的嬰孩車。

那个冲鋒隊員大概是从后門出來的。他从街的那頭轉過來，站在激动的群眾面前，開始把人們推開。他們全都擠回到自己的老位置上，吵吵嚷嚷地。那个高高瘦瘦的婦女現在站在我前邊，在她前面的是那个戴着納粹黨徽的矮個子。艾迪在更前面。他比原來擠前了兩行。

“這就是當他們搜括了這樣多的錢以後所能給我們的一切，”那个高個子的婦女又說話了。“在我的兄弟工作的廠里；他們在發工資以前就先扣下冬季救濟工作捐款！”

“就是那樣，”她旁邊的一個年輕婦女點頭說。“當一切捐稅扣光扣淨了，工資已少掉了四分之一！”

她把頭巾扯得更緊一些。她用頭巾纏着頭，免得給雨水淋着。

几天前，泰謝特念給我聽在他們工廠里流行的一首詩。那是仿照飯前的禱告詩編成的一首諷刺詩。

來吧，希特勒先生，來做我們的客人，
並且將你曾經向我們許下的諾言兌現一半吧。

“是呀，而且還有那些間接的捐款！”高個子的婦女又講起來。

“間接的！你這是什麼意思？”年輕婦女問道。

對方深深地吸了口氣，向四面環視，看看大家是不是在听着。

“几天前在一家雜貨鋪里。一個婦女要買一小盒奶酪——那種有錫紙包的——”大家都留心地听着，連那个矮個子也在听

着“拿到奶酪之后，她看了一眼价钱，便发出怨言，因为又涨了价。价钱一直老是在上涨，这是不公道的。伙计说并没有涨价。当然是涨了，那妇人争辩说，生起气来了；她还不致呆到这样的地步！十二个芬尼克，可是一向只卖十个芬尼克呀！”

身材高大的妇女神气十足地看了看我们大家留心听的神情。

“‘买一盒吧，’伙计说，‘然后我会跟你说明白。’你们想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加价的两个芬尼克原来是作冬季救济工作的经费的！”

周围的人意味深长地点点头。那个长着一把白胡子的老人干笑几声。矮个子烦恼地摆弄着帽子。他显然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试想一下，他们居然敢这样来谈论这个问题——有这个戴着党徽的矮个子在旁不加阻拦地听着！在铺子里，在星期日市场上，我常常听到妇女们谈论着物价上涨——但是这次却是在这里，就在纳粹党人的办公室的门外！

“有时你可以看到是怎么一回事，”那个披着头巾的年轻妇女说。“我们申请一笔结婚贷款。他们曾大事宣传过的。他们先让我们检查体格，以确定我们是否有可能生出健康的婴儿来，”——她耸耸肩膀——“然后，为了满足他们的种族理想，我的男人必须交出我们家乡那儿所发的关于我们的家谱的证件。这得等上好几个月，花费之多几乎让我们破了产。”

“是吗，然后又怎样呢？”那年老一点的妇女插嘴进来问道。年轻妇女回头来看了她一眼。她有一付小孩似的尖削的面庞。还有一双黑褐色的眼睛。

“然后他们说，‘啊，你们是失业了吗？那么你们贷不了一千马克，只能贷五百马克。但是首先你们必须找到一个能够担保

你們還款的人來’。”

她帶着嘲弄的神氣笑起來了。

“自然，事情就此結束了。如果我們家中還有這樣的人，那我們就不需要那筆貸款了。”

人們听了不禁哈哈大笑。我可以察覺出他們發笑時的情緒。

“可是如今失業者即使有擔保人也得不到貸款了！”年輕婦女着重說。“不少人就是因此而不敢結婚——我們也是這樣。”所有的人都朝前面轉過頭去。那個沖鋒隊隊員正從窗口往外看。我向艾迪點點頭。他微笑一下，也回點一下頭。他已經擠得相當靠前面了，確實在下一批就可以進去。這是時候了。

鋪子裡的沖鋒隊隊員轉動鑰匙，打開店門。人群一齊往前涌。我悄悄地從隊伍中溜走。艾迪進去就夠了。

我在街角上踱來踱去。天氣很冷。又過了五分鐘，而且如果艾迪不出來的話——但是人們正從店裡的旁門走出來。其中沒有艾迪。好啦，他在这儿呢。最後一個出來。他四面找我，然後慢慢走上街來。我註他在頭里走了一會。幾秒鐘後趕上他，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他跳轉來，吓了一跳，奇怪起來。

“我以為你早就走了，揚。”

“我正想走。真他媽的冷。但是你的‘份額’呢？”

“他們把我的份額寫在紙上。瞧这儿！”

他從口袋裡掏出幾張紙片。我讀着。

“持券人可得一磅糖，一磅米，半磅可可。”最後是此券價值一個馬克等字。

“你怎能……？”

“那是策略！”艾迪笑說。“我聽見主持分配的头子告訴大家說，只剩下了一馬克的分配券了；其他的都已經分光了。人們吵

了一通，但是他們还是很高兴能够拿到分配券。好吧，我把东西都拿出来，就这样。于是当他又跟我說那一套鬼話的时候，我就把一个一級鉄十字勋章、受伤紀念的金章和失明証明书放在他面前的桌上。‘看看这些东西吧，’我对他說。‘我在战壕里呆了四年，我呆过。我为祖国而成了一个跛子，我做到了。而現在我却得不到一点好东西来庆祝圣诞节。哼，不，不能那样，那是不行的。你的話只能跟那些新手們去說去，跟我可不行，’我說。‘他們向我的两个叔父收冬季救济工作捐款，他們是收了的，而且还收了我妹妹的。昨天他們跟我說，他們要把捐款分給我，所以我应该得到点东西！’我告訴你說，揚，这些話我都不是悄悄地說的，我沒有。在我还未来得及說杰克·魯宾遜以前，其他人全都圍攆过来。”

我們轉了一个弯。

“別那么大声，艾迪……”

但是艾迪正是兴高采烈的時候。

“怕什么呢？这我都可以告訴你的，不可以嗎？好啦，人群激动起来了，我敢跟你說。‘你不能让他们未經我們許可就把錢給你的，’他說。‘如果你那样做，那你就是破坏冬季救济工作！’然后他想了一下，便說我可以得到一棵聖誕樹。‘你要把那棵樹怎么办呢？我不能把它立在茶盤上，’我直截地跟他說。然后他站起来，把柜台上的門打开，叫我跟他一道到另一个房間里去。于是在那里他給我写了紙片。但是我不能向任何人走漏一点风声，他警告我……”艾迪高声笑起来。“我沒有跟別人說过什么。但是当我出来的时候，我手里拿着那些紙片。鋪子里的人都跟着我。‘你得到点东西嗎？’他們都在問。我沒有告訴他們；我所做的就是把紙片在他們面前摆弄。絕大部分人跟着我，鋪子里也

还是挤满了人。在街角上我跟他們說，‘我自然得到点东西。而你們所要做的，就是学我那样地去跟他們吵’。稍后我从門口看到他們，‘整个人群都涌向他們！’”

我獨自轉回我們那條街，首先得繞个弯子。在我前面，在街角上，立着一个报亭。一个人正把“午画报”挂出来，黑体标题是：

托格里尔和保加利亚人宣告无罪釋放！

魯貝判处死刑！

它似乎使我完全失去了主宰。必須保持鎮靜。

“在极端緊張的气氛中，上院議長賓格尔法官今晨宣布国会縱火案的判決。这是合乎一般的預料的，因为……”下面的話被卷起来看不見。我應該买份報紙嗎？稍后，当我冷靜了一点的時候，我問自己。

凱蒂！今天晚上我們要去玩一下了。

季米特洛夫无罪釋放！

多美好的一个聖誕節！再沒有什麼能比这个消息使得我們快樂的了。

* * *

我們在秦謝特的家里。

他告訴恩斯特·施維布斯叫我上他家里來。他的老婆認識我們，但是她一點兒都不知道我們的非法活動。我們圍着桌子坐下來，頭上懸着一盞煤氣燈。秦謝特大嫂很隨便地歡迎我們。她自願自地坐下來，背着爐子在織東西。秦謝特曲起手肘放在桌上，手掌托著頭。晚報擺在他面前。施維布斯把它帶來，幾分鐘前曾給我看過。誰都不說話。

凶手在道义上有罪！

迈科斯基案的最后报道！

在我們这条街上有多少人家、在夏洛登堡有多少条街道的人家正在讀报呢？要是有人說几句话就好了！我看了看施維布斯。他在揉弄着桌布の角。他不愿看我一眼。我們本不該到泰謝特这里来的。在这里，一点友情都沒有，使我非常不习惯。我徒然地从眼梢望着泰謝特的妻子。織針在她的手指間晃来晃去。她完全沉醉在她的工作里。她是一个有着一付紅紅的圓臉孔的矮胖的妇人。圍在臉旁的黑发辮，雪白的圍裙——一个跟这间房子十分配衬的妇人。它是这样地阴郁而干淨。那个有閃亮的銅摆的古老时辰鐘，紅絨沙发上的綉白花边的靠套。泰謝特突然推开椅子，站起来。他来回地踱步。他的妻子停住了織針，望着他。

踱了一会他又坐下来，大声地給我們讀报。

“‘……充滿了不耻瓦尔街受政治对手的制肘的狂热念头，一支特务队伍組織起来了，这宣告了国社党的来临。正当唱着歌的冲锋队通过瓦尔街的时候，队长迈科斯基走在队伍前头，襲击开始了……’”

靜下来一会儿，泰謝特大嫂还在望着泰謝特。

“‘……为什么犯人們沒有被宣判謀杀冲锋队长迈科斯基和警察藻里茲呢？不幸的是，我們不得不提出使我們許多讀者大失所望的答案，那就是，审讯的結果仍未能証明被告中有一人开了那致命的一枪。当前現行的刑法不允許判被告死刑。如果他們迟半个鐘头后才犯下罪行——也就是說，在一月三十一日，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那时，根据“保护国家和人民法”，他們早已被

判死刑了。’”

連泰謝特大嫂也為檢察長的起訴詞中的赤裸裸的殘忍而震驚。

“但是，那……”她說。

泰謝特打斷她說。

“他自己承認了，被告中沒有誰開了那一槍——”

“這位檢察長蘭克表示遺憾，他不能宣判無辜者死刑！”我插進去。

“在第三帝國，”施維布斯陰沉地說，“人命值不了幾個錢”——手指啪嗒一聲響——“就工人來說！”泰謝特推開椅子，又在房裡踱起步來。很久一陣子，只聽見他的鞋的吱吱聲。

之後施維布斯開始說話。他的話跟我們剛才談論着的毫不相干。

“昨天海爾黛告訴我說，沖鋒隊同黨衛隊打了一架。在沖鋒隊的除夕狂歡會上。在柏林大街。在巴布格爾啤酒店裡。一個沖鋒隊員被打死。沖鋒隊也不能長期受黨衛軍的氣，呢？”

誰都不答聲。

再次打破沉默的是施維布斯，他嘲弄地說。

“呢，昨天攻擊報登了新聞？‘我們的沖鋒隊同胞，他以身殉職’。”

泰謝特走近他的椅子。

“不錯……”他慢吞吞地應道，顯然在想着別的事。這樣，沉默了一陣之後，他接着說，“很快就會宣判的了。”

“是邁科斯基案嗎？”

“是的。他們打算在他們開進我們這條街的一周年以前宣布判詞。”

汉兹·普勒斯从集中营释放出来了！汉兹·普勒斯，是一个年轻同志，在今年春天正在张贴标语时被捕的。汉兹·普勒斯，一个徒步旅行家，留着一头长发，直垂到颈后。他通过地下的交通关系给我捎来一封信，信上说他又回来了，他是因圣诞节大赦而得释放的，现在想要跟我见面。我于是安排了一个会面的地点，并且警告他，来时路上要特别小心。

昨天我见到他。那是在佛兰兹那里。当他来到时我们大吃一惊，但是我们未教他发现这一点。可是，佛兰兹意味深长地望了我一眼。汉兹已变成瘦得可怕的人。他的面颊深陷，脸色灰白。过去他是红润健硕的。每当我们因为他的那头长发而开他的玩笑时，他总是回答说，“我要告诉妈妈把它齐后脑勺剪去。”如今他的头发剪得很短。这使得他的形相更难看。

他告诉我们说，即将被释放的人，事先都得在集中营的操场上排队。集中营的主任作简短的训话，告诉他们不要把政府的宽大看成是软弱。无论是谁，如果被发现再跟政府作对的话，就杀无赦了。

虽然受到这种威胁，嚐尽了集中营的苦头，汉兹·普勒斯毫不动摇。他渴望再跟我们一起工作。我们跟他解释说，至少得等三个月之后。这是为了他和我们的安全。他弄明白了以后，同意了。然后他告诉我们他曾经收到他妈妈寄给他的圣诞节包裹，而且当告诉他我们在我们的街道收集这些包裹的基金的时候，他高兴极了。他把包裹送给了别的同志。他是在收到包裹的那天被释放的。之后，他又问到所有其他同志的情况。他要确切地知道事情到底怎么样了，我们是怎样继续工作的等等。但是我们只是说了一个大概。这倒不是我们不信任他，不过是

我們認為目前他不應該有不必要的沈慮。在今後的幾個月里他應當把身體調養好；此外什麼也不該做。

但是現在要讓他跟我們完全隔絕是不可能的；那樣做他會受不了的。有一陣子我們曾經考慮過應不應該那樣做。最後，我們安排好每隔一段較長的時間，我們之中的一個人跟他會面。會面地點在柏林市外，要尽可能地少冒險。因為我們從旁的區那里聽說到，特務在嚴密地監視着那些從集中營里釋放出來的犯人。

他還告訴我們，除了少數人外，在集中營的同志都是堅定不移的。

“你們可曉得在勃蘭登堡誰和我住在一起嗎？”他突如其來地問我們。“艾力希·繆森！”

在這之後他就得把繆森的全部情況告訴我們。他的敘述深深打動了我們。我和他一起呆到深夜，別的人早就走了。我要求他把所有細節都講出來。甚至要他把勃蘭登堡集中營詳細地描畫出來。全世界都應該知道艾力希·繆森是如何被折磨……

在勃蘭登堡集中營的三號營地里。剛打過七點不到幾分鐘。第九室的四十名囚犯站成兩行。漢茲·普勒斯也在其中。他們起床已經一個半鐘頭，打掃過了他們的兵營式的牢房，喝完了清淡如水的咖啡。可是他們站在那兒却抖個不停，好像他們感覺到還在夜里睡覺的又濕又涼的稻草鋪上。他們身上只穿一套薄薄的徒有其名的衣服。

漢茲·普勒斯把頭低下來深深地埋在兩個肩膀之間。自從那頭長髮被剪掉以後，他老是覺得脖子後冷嗖嗖的。他們的頭髮全都剃成囚犯式的。集中營設在一所老監獄里。這所老監獄

由于卫生条件很坏，早就不拿来做监狱了。瘦高个的伍长穿着黑色的党卫军制服，吹毛求疵地在行列中走来走去。他在检查每个人执行他的“立正”口令的情况。普勒斯越过他的脸直望着十五呎高的红砖墙。伍长后退几步，双手放在背后。

“成四路纵队走！”大声喊出口令。

人们匆忙地插上去。“但愿今天的‘操练’不那么糟就好了，”普勒斯忧虑地想。“艾力希·缪森肯定是推不过这一关的；他看起来似乎随时都会倒下去似的，真是的。”刚才他曾经看到缪森，当他们排四路纵队的时候，艾力希站在他的右手第三个位置。他站在那里，躬起腰，下颚快要贴到胸口。新口令来了。

“纵队，左转弯……快步走！”

艾力希·缪森走在他那列的前头。汉兹·普勒斯焦急地等待着下一个口令。“最好他别开始喊跑步——别喊缪森跑步吧！在这儿是很难帮助他的。眼看到却不能帮助他！”

当下一个口令响过院子的时候，新队形刚站好。

“目标教堂——跑步——走！”

隔着整整一个院子。从墙根到教堂有一百五十码。一百五十码！由于多日的监禁，由于恶劣的食物而营养不良，他们全都虚弱不堪。他们一想到用力气就发抖。在跑的时候，普勒斯眼朝右看。艾力希·缪森垂着头在跑，好象肩上背着一袋重物。他跟不上队形跑，稍稍落在别人后面。难道在他前面的人都疯了么？他们为什么不跑慢一点！全是对狱卒们的可恨的畏惧。他没有跟他们一道跑步，他自己是不会来跑的。

木鞋在水泥地上呱答呱答地响！他们都大口地喘气。普勒斯看到缪森更加落后了。是哪个该死的家伙挨着他跑的呢？甘索！难道他没有见到么？他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么？

“拖住他——拖住他，”普勒斯低声說。靠近他的两个人把話傳过去。甘索动了一下，迟疑不定。他当然是在考虑：“拖繆森一把，拉住他，当他們監視着每一个行动的时候，假如有誰去帮助別人，同样……”

“甘索！”普勒斯严厉地叫道。

前者又犹疑了一下，然后捉着繆森的臂膀。就这样他們到达教堂。但是还没有完全来到！当他們离教堂只有几碼了，新口令又喊出口了。

“縱队右轉弯……！”

回去。又回去！他們全都这样想。脉搏飞速跳动，心口扑扑响，但是没有多少时间去思考了。伍长跟着他們走到院子中心来。

“目标牆壁……跑步……快步走！”

經常是跑步，沒有休息。拖住他一道。支持下去！艾力希·繆森和別人一起跑到院子的那一边。那伍长一定是以为把他們折磨够了，或者是他不想在这一次把事情弄到爆发的地步。

总而言之，这种“体操”在經過无休止的慢步走和队形操之后結束了。

每天都是这一套。在下一个口令喊出来之前，他們全都知道了。

“左轉弯！右轉弯！……成四路縱队走！……列队！……”

今天早晨，他們比往常晚了一个半鐘头回到稻草鋪上。靜！安靜直到中午十二时！长长的一个早上，只要沒有命令下厨房工作，人們就可以干自己的事了。到厨房是削土豆皮。集中营里有一千一百六十人。四十人要削一千一百十二磅土豆。每人削二十八磅！

今天汉兹·普勒斯和艾力希·繆森都不用去做工。他們躺在稻草鋪上，繆森的头枕在手臂上。普勒斯看到他的后背怎样因急促的呼吸而顫动。

“我可以帮你点忙嗎？”他柔声地問道。

繆森轉过头来，沒有抬起来。“不用，沒有什么……我只要休息……休息……我是太累了，”他急急地回答。

他的面頰高进去，臉色蒼白。那把稀疏的灰白胡子已被扯掉了一半。他閉上了眼，眼睛四周有一道黑圈。他头上的骨头在太阳穴那儿突出来，形成深坑。汉兹·普勒斯觉得自己很激动。艾力希·繆森。一位老同志。现在只剩下一个由他的鋼鐵意志維系着的破碎的軀体。在这一点上，他胜过所有年輕人。他見过了許多集中营。到处受到对犹太人的待遇，一个被人憎惡的“煽动的犹太記者”，每天都受到最毒辣的折磨。普勒斯認識他已多年了。他参加过几个會議，在这些會議上，无政府主义的繆森曾攻击他們的政治观点。但是这一切都成为过去了。在这里他們成为忠誠的朋友。他們分受同样的苦痛和灾难。

但是，尽管如此，繆森的反対意見还是絲毫不改。他拒絕使用策略，哪怕是这在集中营里能起一点点作用也吧。在最后的几个禮拜里，他那表示反対的意志，他那垂危病人的坚强掙扎的意志，几乎沒有一天不产生奇迹。

“我已經活到头了……我不怕死。只是慢慢地死去，他們想逼到我自杀。但是他們永远不成，这一点永远不会成功的……！”

昨天繆森跟他談到了这个。他的眼光突然坚强起来。

“我是不会屈服的……我不会向他們屈服的！”

“假如这种执拗脾气不是用在一些最不重要的命令上，那末他的情况是会好些的，”普勒斯在想道。

就是这样，微不足道的事造成了对他的一连串的惩罚。

各处的楼梯都扫干净了，扶手擦得晶亮。

“肮脏的犹太人。穆森，扫楼梯去！肮脏的犹太人。穆森抹扶手去！”这些就是他作为惩罚而不得不做的连续不断的差使。这就是普勒斯和其他同志之所以自愿帮他做的原故。头两次一切顺利。然后“冲锋队同志”吕巴赫怀疑起来了。

“什么？你们这些猪獠！你们虽然是亚利安人，你们却帮助肮脏的犹太人穆森！”

拳打脚踢加重了种族上的歧视。

汉兹·普勒斯向房外望去。在屋檐的大梁上面的窄窄的斜窗。第九号室正是屋檐下的一间四壁空空的房间。有二十码长，八码宽。稻草铺靠两边摆列。中间是一排排分东西用的长桌和凳子，一张挨着一张。在这栋红砖大屋里还有两间房间。只是拿来作集中营之后，它才“装修起来”。有一排排钉死的窗户的牢房不够用。

“冲锋队同志”吕巴赫！他坐在那边，无目的地摆动双腿，在监视着房间里有什么事。他紧靠门洞坐着，门洞那里有一道双层的格子门，门上装有铁刺，门的一半在房间里。看起来象一个关森林野兽的笼子。在门的内外墙上挖有看守的洞，这样可以从室外过道里看到一切。吕巴赫“同志”负责他们这个房间。一个因盗窃而被捕的冲锋队员，他认为自己比起别人来是个体面的犯人。党卫军有很好的理由指定他当室长。事实上，在第九号室里他远不是资格最老的。党卫军狱卒所尽力掩饰的专制手段，吕巴赫全都用上了。有谁想离开房间就必须向吕巴赫申请。在请求时，还得立正站好，双手贴住裤缝。

“吕巴赫同志，我可以上厕所吗？”

完了之后同样也要报告。

“呂巴赫同志，第九号室一人上厕所回来。”他們被迫称呼卑鄙的压迫者做“同志”！

他很明白自己的有利地位，并且尽量利用它。当每月的食品包裹来到时，他便高兴得跟猫儿一样嘴里咕咕作响，然后坐在收到包裹的人身旁，乞求一点赏赐。他們大多数人都分点给他。唯一的原因就是害怕！“他恨我就好似恨毒物一样，”普勒斯想道。“他从来得不到我一点东西。我們各人都把对方看得很清楚。”一个真正的室长對他們說来，会有多大的不同呵！在削土豆的时候，第六号室的难友告訴普勒斯說，他們的室长是一个一度当过海軍軍官的同志。他宣布他的規則：“对所有的獄卒要表示尊敬，說話时要按标准的軍隊方式。那样便造成一个好印象。”从此以后，第六号室被党卫軍獄卒們認為是模范室。不久連他們的早晨的“体操”也由軍官同志来主持。他以“非个人的效率”来指导他們。

从那以后，他們免除了一切的压迫。很快地，他的影响扩大到食物的分配上来。“模范”六号室不久发展成为一个大公社。他們共享食品包裹，交换衣物。不仅是如此；他們組成了——馬克思主义小組！“一切由非个人效率来安排，”那个同志笑着說。

普勒斯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在前面，呂巴赫已經跃起来，在門口的籠子似的地方立正站着。对其他人來說，这是个訊号。木繩和其它木具被扔到一旁。他們全都从鋪上、从凳子上跳起来，在床前站成两列。房間里一片靜默。有人在竭力忍住打喷嚏。从过道上傳來沉重的皮鞭声，接着是鑰匙的叮噠声。“大概是那两个新伍长，两小时的换班人，”普勒斯想道。他望着繆森。后者随随便便地站着，甚至两腿叉开。他的整个神情表现了不

尊敬的态度。第一道門砰然打开。接着是带铁刺的那道門也开了。只来了一个党卫軍伍长。对拍响脚后跟的呂巴赫理都不理，他从他身旁走过，直走到房間里来。然后他带着搜索的眼神巡視。他的左手拿着一迭白紙。

信来了！

“是呀，”他說，“唔……唔……是的！”

他的行动很特別。好象有些什么特別的事。难道是有入写得太暴露了？但是亲属們都很清楚沒有一行字不經過审查的。

在后排的人沒有注意到他的奇怪的神态，但是他們已想到他的来是和信件有关。他們滿臉流露出期待的神气。双脚仍然笔直站着，但是身体已焦急到顫动起来。好象他們全都要說，“唉，为什么你还不拿出来呢？……；拿出来呀！”

“是呀……唔……”那个党卫軍伍长又重复了一次，然后翻閱那些信。然后他开始喊名字。被喊到的人逐个走出来。立正把信接过来，向旁走几步，然后开始讀信。他們的妻子、母亲、孩子們写来的。

普勒斯和繆森都沒有信。不管怎样，那些沒有收到信的全部都得立正站着，直到伍长离去为止。現在他手里只剩下了一封信。他打开了它，开始看。然后他又一次順着行列看。“有問題了，”普勒斯想。“但是如果有人写了一些不該說的話，他为什么还不叫喊呢？”伍长还是沒有叫喊誰的名字。站在他对面的一行人表现了不安的神情。但那些接到信的人一点儿也不去理会这种神秘。他們的心神已远离这里——远远地。

“帕舍尔克！”伍长終于喊道。

帕舍尔克站出来，是一个年近三十的汉子。他的又闊又厚

的肩膀，跟他的瘦小身軀相比，好象不知誰給安放錯了。他的臉充滿了忧郁。帕舍尔克？他不是就是那个申請出營的同志嗎？但是還沒有批准呢。他的妻子病倒在醫院里。

“这儿，”伍长，拿出信來。

帕舍尔克接過來，打開它……把臉藏到雙手里。信紙飄落地上。帕舍尔克躺在它旁邊，又泣又哭，象個小孩似的。突然他放聲大哭，他的后背上下起伏，他的頭還是埋在那雙粗大多筋的手里。

讀着信的人全都跳過來。那伍長轉過身徑自走了。海因茲·普勒斯拾起信紙一讀：“茲通知你妻子已死去。”

他們把帕舍尔克扶回到他的稻草鋪上。不知是誰把那封信放在桌子上。活象有一股股冰冷的气息从紙上散发出來。帕舍尔克还在啜泣。有几个人捂着耳朵坐在自己的床鋪上。

又過了一天。他們拿到了面包口糧——每人一天四分之一個面包。這點面包就是他們一天的食糧了。因為光吃梳打和完全沒有油水，他們全都想吃得要命。這一天，普勒斯分配到廚房的任务。他常常偷放幾個土豆到褲袋里去。現在就煮着它們。兩個人靠門口站着放風。爐子安在靠近那道象籠子似的雙層門那里。這種午餐的加餐也吃不了多久了。再過幾天爐子就要拆掉。那時這一切就都完了。土豆不夠分配給大家。其中一部分常常要分給“同志”呂巴赫。

土豆好比封口的錢！

兩個放風者之一輕聲地噓口，警告地舉起了一隻手。可以聽到門外過道里傳來腳步聲。那鍋土豆只好託它在爐子上煮着。唯有希望他們沒有看到。來人中有兩個是九號室的伍長——其餘兩個是誰呢？他們是新來的！看來集中營的警員換

过了。

四名党卫军走下由两排人所形成的过道。吕巴赫困惑地尾随着。

“在你这个室里有犹太人吗？”普勒斯听见一个新来的伍长在问。

“犹太人吗？我敢说有！”

这不就是不久以前给帕舍尔克带来那封信的那个党卫军吗？就是！那个要命的字眼说出来了。犹太人！那付红色的农民脸孔扭得很可怕。他要向新来者表明他是一个多么好的小伙子！

“犹太人，站前来！”他咆哮叫道。

四个人走上前来，艾力希·缪森也在其中。那个农民吐了一口痰在地上，然后照最近的一个人操了一把。

“那里，舐掉它，你这犹太猪獾！”

那两个新来的伍长的笑声在房间里震响起来。被吆喝的人，一个瘦弱的小个子，摆出了一付绝望的脸孔。他的眼睛从地上转到那个党卫军的脸，又转回到地上。普勒斯从眼梢盯着缪森。他的胸膛激动地起伏，他的上下颌在活动。夹鼻眼镜下的眼睛收拢来，燃烧着憎恨的火焰。如果轮到的是他会怎么样呢……怎么样呢？

其他的人都在这样想。他们的脸都很严肃。“好吧，怎么样？”

那伍长举起拳头来。在两个新接班人面前，他的名誉是大有关系的。那个瘦弱的矮个子还在犹豫了一下，然后跪在那个生气的伍长面前，把脸贴近地板。普勒斯看见他用袖子把那口痰抹掉。农民脸孔胜利地转向那两个新来的冲锋队员。

“你們看見了吧!”

他轉回向着行列,人們死死地瞪着。

他轉过来面对着那些紧盯着他的排列起来的人。

“这儿,你們又一次有机会看到这些肮脏的犹太猪獾是什么样子!”

四个党卫军一齐哈哈大笑起来。

“你們这些笨头笨脑的工人應該向你們的領袖們表现出自己的本色来!”

新来的党卫军牵强地露出牙齿笑笑。

“你們这些亚利安人会一样地做嗎?”

农民面孔带着質問的眼光扫視人群。沒有人回答。他发怒地抓住第一个人的臂膀。

“我問你,作为一个亚利安人,你会照样做嗎?”

这个人被吓住了。

“不会,”他悄声地說。

“这才对呀!”那个党卫军伍长声震屋瓦地大笑。

之后他走向站在第一排的四个人中的两个人面前,把他們拖到其他的党卫军面前。艾力希·繆森还站在原地未动,

“也許他今天走运了,”普勒斯放下心地想道。

“你們开始对打吧。”

两个人互相望着,不知如何是好。他們的臉上只有恐惧的神情。三十副眼瞪着他們两人。房屋里好象热得炙人。

“你們大概忘了怎样跳打耳光舞了,是嗎?”农民面孔冲着他大喊。

他把那个矮点的推到一旁,自己站在另一个人的正对面。

“看着我。就是怎样!”

他重重地向那个人的脸上打了一拳。他摇摇晃晃，倒下去，缓慢地又站起来。泪珠从眼里下掉。鼻孔里汨汨流出鲜血。

“还得我教你多久呢？如果你不动手那就轮到你了，”伍长向那矮个子咆哮。

那矮个子开始殴打另外的那一个。但是他站着不还手。直到那伍长从后面给他一拳，然后他也动手了。那些党卫军纵声大笑，然后其中一人捉住农民面孔的手臂。

“住手！”

两人挣扎着走回队伍去。满脸是血。普勒斯的双脚觉得象铅一般的重。人类的神经再也忍受不住了。一周又一周，永远是一样。他又看了艾力希·缪森一眼。他的头低垂到胸口。他必定是早就不看这些了。

“稍带问一下，你们的犹太名字叫什么？”一个新来的党卫军伍长问道。

他心平气和地而且多少有点高兴地问——真象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喂，那边的，你们的名字呢！”农民面孔冲到站在最前头的那个人的面前。

普勒斯没有听到前头三个人的名字。他在等待，等待，充满了畏惧。现在轮到缪森了——该艾力希说了——现在！于是他听见了他的声音。带着预兆不祥的因愤极才有的平静口气。

“艾力希·缪森。”

那个问名字的党卫军惊讶地走上前来。他的头尽向前靠，把领子绷得紧紧地。

“那就是缪森——那个当记者的犹太混蛋！这儿，在这里，在第九号营！”

普勒斯觉得喉头里有个硬块在升起。现在这一切又得从头来一次了。每次更换守卫的时候就会重演一次。“那就是繆森嗎？……繆森！”

艾力希站在那里，面不改色。他正視着那个党卫军，带着只有依仗自己的坚强意志的人才有的輕蔑和决心。在他的眼光中流露了他的不屈的决心是不可动搖的。

另一个党卫军伍长也走上前来。

“是的，那就是他！”他若有其事地说，好象在陈列他所搜藏的一件珍宝似的。

那个新来的党卫军已从惊讶中恢复过来。他在口袋里摸索。掏出一张发黄的剪报，把它拿给其它几个人看。

“那就是他们交给我的！他们告诉我特别当心这个家伙！这是慕尼黑苏维埃时代①的革命论坛报！”

他用手指指着那张剪报说。

“他在这儿呢！那就是他！”

他跳转身来，在繆森眼前揮着那份报纸。

“你要对当时被你们的人所枪杀的十二个人质负责！十二名人质呀！”

① 慕尼黑苏维埃，是指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它于一九一九年四月七日在慕尼黑宣告成立。同时并組織了一支保卫革命果实的紅軍。社会民主党的国防部长糾合了德国北部的法西斯军队来鎮压巴伐利亚的革命。当时苏维埃政权由左翼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組成，繆森也是无政府主义者團員之一。共产党人拒絕参加这个面目不濟的政权。只是在后来共产党人才起来领导保卫共和国的战斗。白匪軍在进攻慕尼黑的沿途中一直不断地枪杀被俘的紅軍，于是紅軍某师某部为了报复，于一九一九年四月卅日枪毙了十二名在慕尼黑參預准备政变的法西斯党徒。此事并没有經過任何負責方面的指示。而繆森是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三日被捕的。

他的声音达到最尖的地步，然后嘶哑下来。

其他三个党卫军紧站在他的身后。四张脸孔都充满了狂怒。一阵冷气爬进普勒斯的血管。“完啦，完啦”他只想到。

艾力希·缪森的声音打破了房间里的静默。他昂然站着。

“我和那件事完全没有关系。早在那以前我就被逮捕了！”

“我们会在楼下搞清楚的，你这个犹太混蛋！”新来的党卫军吼道。

他攥住缪森的臂膀。

“带他下去！带他到楼下去！其他新换防的警卫应该看看！”

他们随手把缪森拖走。他的头低垂；一双鞋在地板上拖拉着。带铁刺的门砰然关上；外面的门也带上了。静悄悄的。其他人目瞪口呆地站着，低下头来听着。什么也听不到。

几小时过去了。

晚餐的汤送来了。普勒斯喝不下去。他们都躺下来睡觉了。

几小时又过去了。

普勒斯无法入睡。他禁不了那些焦虑的念头，他的头发痛。

又过去几小时。

艾力希·缪森没有转来。

汉兹·普勒斯两眼睁得大大地躺着不能成眠。突然从室外中央甬道透来一缕亮光。室门被打开。守卫肩带上的品亮的扣子在灯光下发亮，正沿着地板拖进来一件黑黑的、毫无生气的东西。他们把它抛在挨近普勒斯的床铺上。普勒斯纹丝不动。

但是当室门刚一关上，他跳起来。别的人也醒过来了。黑暗里充满轻轻的耳语声，草铺的簌簌声。普勒斯向摊开来的身

形俯过去。

“艾力希……艾力希……”

不見回答。他用手触摸，搖他。繆森依然和哑巴一样。当他摸到他的头和臉时，他感到手上粘乎乎的。在这个恐怖时刻的长久的折磨下他终于忍受不了。他把头放倒在那一动也不动的肩头上，哭起来了。

从那以后誰也不能跟艾力希·繆森談話了。他們把他的耳朵打得稀烂，以致內耳露出来，活象一个又紅又亮的气泡。

在往后的日子里，艾力希·繆森同汉茲·普勒斯之間形成了一种更加密切的关系。汉茲·普勒斯經常备有鉛笔和紙片。用写字来代替那丧失了的声音。

* * *

報紙今天刊登了迈科斯基案的判决书。五十三名人犯被判处三十九年徒刑和九十五年監禁。

報紙的消息說替被告作証的四十七名証人都沒有要求宣誓作証！但是沒有哪一家報紙对官方指定的“被告辯護士”的发言、或是被控告的同志們的最后辯詞披露过片言只字。

国社党机关报“人民观察家”用黑体标题报道：

沒有判赤匪死刑！

“对謀杀迈科斯基的共产党人的判决书，以出乎一切意料的温柔的口气宣判了。和国会縱火案的判詞同样，这也将是难以理解的。必須防止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情緒，就是‘笔可以毀掉刀劍所得来的’。我們深信，有势力方面将仍会找到适当的途徑来。”

“攻击报”的醒目标題：

最高的判決只有十年勞役！

“甚至當宣讀判詞的時候，旁聽席里就鼓噪起來了，後來發展成一片騷亂，以至首席法官不得不宣告退庭。

“判決書只滿足一種情況：它符合法律的厚道。但是，那將引起人民群眾，特別是邁科斯基的忠實的黨衛軍人的巨大不滿以及在宣讀判決書時法庭上的鼓噪情況，完全準確無誤地證明了：建立一個符合德意志人民的天然情感的、真正的德國法律，來代替那冷漠的、形式上的詞藻的堆砌，是何等的必要……”

最重的判決——只是十年。

不久以前，我碰巧跟一個數月前被判徒刑的同志的妻子談話。人家不允許她給他送任何的包裹。只許他每八個星期從她那里收到一封檢查過的信。只許她一個人每三個月探望他一次。每次探望時間只有十分鐘，而且是在監視下。由於獄中的伙食，不到幾個月的時光，她的丈夫只剩下了一付骨絡。單調的獄中生活在損害着他的神經。由於缺乏工作，大部分犯人無事可做。任何的精神上的調濟都因被看成是“太人道”而被取消了。

“人民”“抗議”法庭關於邁科斯基案的判決書，這都是邁科斯基的心腹朋友——三十三支隊的沖鋒隊員首席法官不得不暫停宣讀判決書；“人民觀察家”相信有勢力人士終將會找到適當的辦法來。

在第二天一個沖鋒隊後備隊員告訴我們之後，我們才懂得了這個事件及其危險的意義。現在三十三支隊已派出代表到普魯士司法部抗議。國務部長弗萊斯勒當場接見了他們。他向沖鋒隊員們作了保證。他說，“我們正在建設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但是我們的目標尚未達到，沖鋒隊同志們。這就是何以我

們必須認為那份判決書是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庭所決定的。元首親信的人將會把我們對判決書的意見報告給他的。他的部長們將會很仔細地審查這件事，並且將會根據我們的決定而採取行動。”

* * *

我的寫作又遇到了新困難。手稿太厚了，以致放在原來的藏著的地方已不甚安全。因此，我把它存放在一個政治同情者的家裡。兩周後他把它送回來。他解釋說，他覺得不保險。之後，我把它送到另一個人那裡，他從各方面看來都是“妥當”的人。但是如今他也把它送回來了。他的看門人常用奇怪的眼光看著他，知道他過去常看左派的報紙。所以如果我能把包包拿回去，對我們兩人都好。我事先都告訴過他們我的書是寫非法的事情的。我不得不先說個清楚。我把手稿捆扎得很結實。但是現在我相信他們倆都打開過。他們看到了裡面講的是什麼，曉得萬一這本手稿從他們那裡搜出來了，那將會有怎樣的結果。

若是如此，每一個知道這件事的人，在今後的日子裡都能危害及我。也許他們還會想到，我一定會使得秘密警察找到他們頭上的，如果我繼續不斷地把寫好的手稿送到他們那裡去的話。

不管怎樣，我不相信他們的理由。他們只不過是害怕罷了。所以今天晚上我不得不把手稿放在我的住所。但是我仍必須想盡一切辦法，在明天把它送到別處。在我們這個危險的區里，它不能放在我的房間里。

* * *

報紙報道。

“在一月三十號深夜某時，謀殺案的一周年，將在邁科斯基大街舉行紀念會。參加紀念會的將有沖鋒隊西部部隊全體和威

克的特別警察師一個師。參謀長海因斯將迎接邁科斯基的父母親。然後沖鋒隊司令魯姆發表演說。中隊長奧古斯特·威廉親王，警察總監海軍上將狄、李維佐，警長碧克，戈林將軍，警察總長達魯將軍——國社黨國防體育俱樂部的領袖，大隊長胡林，柏林市長，優秀的領導者賴帕特博士，沖鋒隊總監希姆萊，亦將出席紀念會。”

泰謝特站起來，從木釘上取下帽子。他的妻子站在爐旁，正在煎鍋里攪拌着。當我們走到門口的时候，她回轉身來。

“仔細點，保爾，請你。今天他們會來上成千的人。”

泰謝特走回她身旁。用手攬着她的肩膀。

“不必擔心。今天會有許多人看熱鬧的。別擔憂；完了以後就上床去吧。”

婦人點了點頭。她放下木匙，直送我們到門口。看着我們下樓梯。要是我今天還來探望他一次——這婦人會犯猜疑嗎？

有三個人正站在房子前面聊天。

“你也紀念嗎？”其中一人問道。他的雙手深深插入皮夾克的口袋里。

其他兩人嘲弄地笑起來。我拉了拉泰謝特的袖子。不必要逗留在这里，看來要爭論起來的。

“確是如此，”泰謝特回答說。

“我好象認識那個年紀輕的，”當我們走開了以後我說。

“帕納得·盧茲，”泰謝特回答說。“他來這兒才兩天工夫。他是從下鄉義務勞動中逃回來的。他從東普魯士騎自行車——在這個大冷天里——回來的！”

他望着我。

“我只跟他談過几句。我們將讓他給我們做一個報告。他

会有話可說的！”

“帕納得·卢茲？他不是参加过青年紅色陣綫的嗎？”

“是呀，一点不錯。我們也必須設法叫这个小伙子积极起来才行。但这还有時間来做。我們首先必須很好地考查他一下再說。”

上灯时光已过去很久了。現在街灯发射出幽黃的光綫。它們的光亮在冬夜里消失。但是透过发电厂的高大的波浪式的窗戶，依然在照耀着亮光。当天气变成又冷又湿的时候，我們的街道上往往是杳无人迹的。但是今天却人来人往。我們碰到許多熟識的面孔。我們以眼代口，默默地招呼同志們。泰謝特突然用肘臂触我。艾迪正向我們走来。我看到他装上了他的玻璃假眼，穿着他的那套藍色衣服。他穿得完全象个“过路人”。当走得很近的时候，他不禁愕然。他的确是不打算“認識”我們的！我直望着他，微微地搖搖頭。他懂得了，走了过去。再走不一会，我們看到恩斯特·施維布斯。他跟艾米耳·施密特在一起。他們做得对；“不認識”我們。这使我想起了汉茲·普勒斯。当他被捕时，艾米耳·施密特曾是跟他一起貼傳单的。現在他已从集中营里被釋放出来——今天他不該在这儿逗留！假如他来的話，那就是极端的粗心大意。但是很快我就明白了；我們肯定是要見到他的；街道不太长。看来同志們事先都有了默契。他們的出現使得我們全都想起了街道的老样子。当然，每个窗戶里都挂出一幅卐字旗。它們是我們的掩护。冲锋队今天曾使用了他們的“聞名的手法”。

我們跨过克魯迈大街，走近紀念碑。碑前站了密密麻麻的人群。他們把整条馬路截断了。罗塔克尔。六个月前，当紀念碑破土时，他曾和我一道站在汽車房入口处。岁月过得真快。

有好些日子我們沒有聽到他的消息了。最后一封信是从南斯拉夫寄来的。流亡委员会曾把他一家人送到那儿去。

“讓我們穿过去吧，”泰謝特說。

我們挤入人群中。沒有誰注意到我們。橙黄色的閃动着的亮光，是从錫制的油碟里升起的火焰。它們放在紀念碑的兩側。发出燒油的气味。那股味太濃了。兩名冲鋒隊哨兵石头似地背牆站着，身穿灰色長冬大衣，鋼盔的帶扣在下巴下扣起来。在人行道上，两个哨兵之間，放着飾有采帶的花环。銅碑挂滿了綠叶环，頂上是用樅树枝編成的卐字。在哨兵左右兩側，各豎了一株月桂树。

其他的老百姓，跟我們一樣，不敬禮就走了。還有其他一些人，大部分是穿制服的，在走近的時候，停下来，立正，举手行希特勒式敬禮。看熱鬧的人來來往往。街上慢慢挤滿了旁觀者，他們要看看那盛大的閱兵式。

我用臂肘碰碰泰謝特。我們近旁有两个党卫軍在談話。

“……即使是現在，他們几乎全是我們的敵人，雖然他們是挂起了我們的旗。”

“那天晚上應該把一切燒光，”另外一個回答說。“最糟的就是你不知道能够信任誰！”

頭一個冲鋒隊還說了一些話，但我們一點也听不懂是談些什麼。兩個人走開了。我們也就走開去。

迈科斯基現在成了“殉道者”。但是他自己也曾經使他們一度感到麻煩。因為他拒絕隨着同伴們上教堂。

“我們必須回到我們那條街上去。很快他們就會封鎖這個地區。”泰謝特打斷了我的思潮。

“好的。”

街上越来越挤。成群成群的人走向銅碑，又走回轉來。主要是些老百姓。我只看到几个孤單單的穿着希特勒青年團制服的人。冲鋒隊必定是在什么地方集合，准备閱兵。他們很快就會把路拦住；秦謝特是對的。那末我們該怎麼辦呢？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我們可以到佛蘭克大媽那里去，保爾。她正住在紀念碑旁边，”我悄聲地說。

秦謝特望着我。

“佛蘭克大媽……？”他懷疑地問道。

“就是那个她男人赶过郵車的老婦人。濟卡爾斯基還繼續从她那儿收到捐給紅色互助社的捐款。”

“你很對。那是一個絕妙主意。”秦謝特很高興。

我們快步走。在克魯邁大街後面，靠近紀念碑，人越發多。佛蘭克大媽的房子的門大開。人們，大部分可能是房子的住客，站在門外。几分鐘後我轉回來。秦謝特曾在門外一旁等着。

“成了。她還沒有睡；不要緊的。”

我們一個跟一個地上去。佛蘭克大媽看到我們很高興。

“我以為你是來跟我談談的……跟我……”她反復說了一遍。

一定是出乎她意料之外的。她還在驚訝地搖著頭。她的眼睛閃耀著快樂的光芒。她的滿頭白髮梳得紋絲不亂，從正中分開。她的臉上布滿無數微細皺紋。她看來很健壯和警覺。必然是已過六十歲了。

佛蘭克大媽在我們前頭輕快地走着，揮動一雙起皺的手招呼我們。“來吧，來吧，到前面……客廳里來。”

佛蘭克大媽從桌子那里搬來兩把椅子，然後離開我們。我坐下來。對面，在絨沙發的一個角落上，坐著一頭大貓。

泰謝特向窗口走去。

“从这儿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說，然后回到房里來。“但是佛蘭克大媽在哪里呢？”

我站起來。

佛蘭克大媽正在厨房里磨咖啡豆。茶壺在煤氣爐上吱吱响。

“我想那不是給我們煮的吧？”

佛蘭克大媽笑起來了。

“自然是給你們煮的。現在走吧，走呀！”

我還在抗議，但是她把我推出厨房去。

我們喝着咖啡。佛蘭克大媽不斷提出問題。

有好久她得不到机会跟同志們談話了。濟卡爾斯基每次只來上几秒鐘。不，無論如何，她还是不会上床睡覺的。我奇怪这个老妇人会这样娓娓健談，会那样消息灵通。她經常看報紙。“如果你要知道这个时期以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必须要从報紙上讀出其言外之意來！”她向我們眈眈眼。

“濟卡爾斯基常常还带点別的东西來。”她假笑說。“要不是这样，人們就不会知道什么了。”

我們年輕人應該以这个老妇人做榜样。她尽了她的本分。她繳党費，常常多出一个馬克。她的男人从前参加过斯巴达克斯，她仍然忠于我們，也許是出于对他的追念。他曾駕駛过一輛郵車。这时他就患上了致命的肺炎。那是多年前的事了。如果納粹党人知道一点这些事的話，他們就会取消她的撫恤金。佛蘭克大媽——一个勇敢的妇女。

泰謝特在窗口跟前站着已好一会儿。

“他們現在正在清街呢……他們正在清街，”他忽然說。

我們两个并肩站着。叮噹的鐘声冲破靜默傳到我們这里。这儿——另一个鐘又响了，但是声音远了一些。我們默不作声彼此看了看。好吧。这是正戏的一幕——否則，是不会在午夜里敲鐘的。

从右面，在街道弯进去的地方，就在发电厂那儿，傳來低沉的鼓声，参差不齐的歌声。我从窗口探身出去。在后头，他們正轉出街道弯处。我看不清人形，只看見两排火炬。当我縮回头时，我发现就在我們窗下靠右边，有黑压压一群人。我們沒有听到他們走过来。是一般人？还是亲屬？歌声越来越清晰可辨。

有了褐衫軍，这条街道自由了。

有了冲鋒队，这条街道自由了。

接着行列的前列来到我們眼前。歌声响彻狹窄的街道。单独走在前头的、穿制服的人形，兀地把手伸成一个角度。他們从我們下面走过去了。长长的火龙，举起的手臂，穿着制服的后背和帽子，随着进行曲的节拍摆动。

“肃清街道！”……但是一年前还没有为你們肃清。然后你們打算用襲击的办法来夺取。你們带来你們的歌曲，你們的滿是釘子的靴声响遍了街道。但是你們得不到它，哪怕是現在——經過一年的最血腥恐怖日子之后，也还是得不到手！你們还是走在我們的街道——一个敌对的土地之上。在你們的“革命”周年。在你們“胜利”的周年！

在冲鋒队队伍过后一小会儿，来了——长长的四列縱队的灰鋼盔团。鋼盔上白卐字閃閃刺目，身旁斜背着步枪。这是威克的特別警察，戈林的御林軍。在警察师的前头，一名軍官骑着一匹生气勃勃的駿馬。随着馬的騰跃，他的鋼盔也上下跳动。他

的右手握着一把发亮的长剑。当来到和纪念碑平行时，他把剑举起来。

“敬……礼！”

在钢盔团行列里忽然看到一个猛然的动作。许多只手一齐把着步枪。这不是一个纪念仪式。其目的是再次企图恫吓我们。法西斯国家的力量。

“师团立——定！”

“向右——转！”

钢盔团现在面向纪念碑。在它的左翼，从右方走来一个冲锋师。又听到了更简短、明确的口令。冲锋师团显然是站在右翼了。

“三十三支队，”泰谢特凑着耳朵说。

阅兵式还没有结束。一队队旗帜从左方、右方涌过来。在纪念碑前按各自的位置停下来。

全场沉默下来。军官跨下的骏马喷着鼻息，蹬着蹄。声音传到我们这里还很清楚。突然，从右方，汽车号角声撕裂了沉默。几秒钟后听到新口令。“冲锋队，立正！……向右——看！”

警察师军官也发出口令。步枪枪托刮过沥青路面。一小群穿制服的人——灯火集中倾泻在他们的制服领口上和帽上——检阅行列。一个矮胖子走在头里。勒姆！他没精打采地举起右手。紧跟在他后面的穿黑制服的——希姆莱。蹒跚行来的胖子——戈林。想想看，他居然会耻勒姆走在他的头里！

鼓声咚咚响。

一个声音开始打破沉默。

一个人高高地挥动双手。他欢迎迈科斯基的父母亲——“光荣的客人”，那是海因斯。

就是我們的战士，我們的警鐘。……”

我偷偷地瞧了泰謝特一眼。当窗下的手再次举起时，泰謝特轉开身去，带着厌恶的神情。朝房間里走了几步。

一片沉默。

当窗外升起赫斯特·韦塞耳的歌曲第一个音节时，泰謝特轉向窗子，急忙地把它关上。

“他們唱……而我們的……而我們的……”弗兰克媽媽探出头來說。

我們默默地坐了一会。我不时地朝窗下望。

好哇！他們走了！

弗兰克媽媽把房子的钥匙交給我們。

“祝你們好運道，孩子們。要坚持到底。”这是她最后的几句话。

* * *

一九三四年二月一日。理查·許提希和属于他的护房队的同志們的审讯，从今天开始。正如我在本书的前面所說过的，他們被控在去年二月十七日同党卫軍和冲锋队冲突时，打死了党卫軍头子封·阿赫。冲突发生在納粹在夏洛登堡进行的多次惩罚性行动中。我們的同志原拟自卫。他們沒有火器；是党卫軍开的枪。阿赫受了重伤。我們曉得，为了这桩事，三十三支队和警察在上个月抓走了我們二十四個同志。在九月初，秘密警察同党卫軍和冲锋队一起，突然封鎖我們的街道，搜查了几所房子。

单是那一次，就抓走了十五个人。但是現在，報紙說只起訴了十八个人。

对这我們只有一个解釋，那就是，說來真可怕，其他六个同

志一定是被杀害了；否則他們一定跟別的同志一道被控訴了。

失蹤的同志中有兩人跟我很熟悉。他們的名字叫窩斯和德雷塞。

* * *

我下過決心永不再用我的自行車去進行非法的工作了。有一次，當我在輪胎里藏運非法材料時，衝鋒隊曾經追擊過我。

昨天的情況真是千鈞一髮之險。

我蹬着車子上鄰近某區——到秘密的文化站去，給我們的小組取小冊子。這些日子，我們的小冊子很充足。它們都偽裝得很巧妙：有時象鉄路的廣告本，封面上是一個漂亮的女郎的照片，或是偽裝成“防空規則”。這種小冊子每本的封面都不同，而且頭一頁和末一頁常常是真正的納粹出版物。

文化站在一條僻靜的街道上。當我轉到這條街上來時，我忽地想到在這裡騎自行車未免太刺眼了一點。房子全都是現代化的建築，住戶大部分是不騎自行車的公務人員！我突地發現在房子外邊已經停着一輛自行車。該死的！兩輛自行車！一定是還有別的人上這個同志這裡來取材料了。但是如果我在那兒蹬來蹬去，直到另一個走了為止，那就更會犯疑了。我終於決定還是進去，便把車子並排停放。一個年輕女人按預先約定的信號——和平常的擦鈴不一樣，出來開門。我說出口號來，她便請我進去。不一會兒那個同志出來了。他早先就認識我。我立即告訴他我是騎車子來的，問他外面是否湊巧也停了一輛車子？……是的，另外一個同志在後屋裡呢。那是失策；他應該告訴我在另外一個時間來才對，我埋怨說。那不是他的過錯，那同志對我說；另外一個同志本應在前一天來的。然而，不管怎樣，現在已經晚了。我催促他趕快；我越快離開這裡越好。於是他把傳單拿來，

我把它們藏在衣服底下。這只是幾分鐘的功夫。

當我探手到口袋里取自行車的鑰匙時，我發現在鎖鍊上有張小紙條。我慢慢打開鎖，用另一隻手把紙條打開，用身體掩飾我的動作。

兩輛自行車！

當心！危險！

紙條上寫着。我把它揉成一團，裝作抹抹嘴——把它咽下去。然後把車子倒過來，慢慢地把鎖鍊解開，同時腦子在狂熱地想，眼睛沿着街道掃望。

頭兩個字和我自己看到的一樣；可是下面的警告呢？它真的是同志們的警告呢——還是某個特務分子的胡亂猜測呢？如果是後者，那我不該把字條咽下去，而應該把它丟在地上。我上樓去共總才幾分鐘。

這兩個人會來過這裡嗎？遠遠有兩個人，好似在街上散步。正在右邊。而在街角那兒街道兩邊還分站着兩個人。落網了！此外，街上空蕩蕩的，連鬼影都看不見。而我身上還帶有傳單——他媽的——這就足夠抵得上兩年苦役了！如今怎麼辦？多難的問題！騎車子走吧，不管怎樣你總會被抓起來的。我慢慢地把車子推向陰溝去。對過的兩個人當中，一個人停下來，朝我凝視着。那件厚大衣，那頂呢帽，嚴峻的臉孔——秘密警察！我的腳機械地蹬着踏板；我的腦子里亂噓噓地活象一窩蜂似的。五碼——八碼——他們為何不喊“停住”呢？我來到了拐角，慢慢向右拐。那個人站在那兒，雙手插在大衣口袋里；他漫不經心地把呢帽子向後推去。我們兩人的眼睛定定地对望着。那是哈利！這個區的區委之一。哈利！哈利！那麼，在那邊的那個人必然

也是同志了。因此是他們写的警告条！那么在我后面的两个人是秘密警察的暗探了。我敢肯定說。在这些日子里，人們养成了对这种事情的正确感觉——而且，如果不是的話，那又何必写警告条呢？

我繼續蹬着我的車子。沒有人拦阻我。过了一些时候我才意識到，不管怎样我这次又是走运。我觉得我好象是被人及时地从絞架上救下来似的。

我騎了大約一个鐘头的車子，把整个鎮都走遍了。許多次停下車来，在店子的櫺窗前观望。直到我确信沒有人跟踪我，我真的不受監視了之后，才轉回我們的街道来。但是不管我怎么想，我不能把这些綫索連起来。

但是不久之后我就弄清楚这回事了。同志們經常派出崗哨来“掩护”这个文化站。那天是秘密警察头一次光临——但是他們当时沒有搜查！第二天他們来搜查了——但是当他們来到的时候，已是一所“清白”，正直的住宅。房子被搜得个翻天覆地，但是扑个空。那个同志甚至沒有被抓走。当然，他立即被“免除了”我們的工作。

但这是我从事非法工作中最后一次騎自行車了。从今起，柏林市交通公司可以把我列入它的忠誠乘客名单內。这笔車費只好想法筹备出来。另外，以后我必須穿着得“高貴”点才出外。納粹分子很少怀疑他們那些衣裝講究的工人。

真奇怪，很快我的精神又振作起来了。

不过，真个值得奇怪嗎？我发现所有其他同志无不如此——这是一个好現象！秘密工作使我們每天都处在危險中。但是如果你的安全不断受到威胁，你就会失去对危險的某种程度的恐惧。我們認識到，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被捕，我們必須控制自己保

持鎮靜。大部分同志都能做到這一點；他們知道，多年的監禁，甚至他們的寶貴生命，乃是失掉鎮靜的刑罰。

* * *

恩斯特·施維布斯現在正好來到。他給我帶來兩份今天的報紙。我必須寫篇東西。給關於阿赫審訊案的號外寫的，這份報今天晚上付印。

好幾個月來，我們一直為許提希和他的護房隊擔心。現在我們的恐懼被証實了。他們企圖在阿赫審訊案中宣判死刑！

我找出幾份舊報紙來，在那上面我標出了有關這個案件的報道。這是保存材料的唯一辦法。把它們剪下來是太冒險了。

一九三四年正月二十四日，“晚報”

“這次審訊的目的不僅是為了懲罰對解放德國的運動所犯下的滔天大罪，同時還要在法律的全部權限內永遠徹底地消除夏洛登堡的布尔什維克威脅。”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日，“柏林晨郵報”

“必須讓陪審團來決定法庭是否認為對衝鋒隊員阿赫的致命的一槍，就是由証人衝鋒隊隊員阿謨的沒有瞄準的一槍。”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日（同一天），“人民觀察家”

“武器專家不能肯定子彈是從何種槍械中放出來的。給他看的手槍是破鏽不堪的，而且也沒有什麼特征可以有助於他提出意見來。”

對於我的文章中所引的這些報紙的片段只須略加說明。因為它們相當清楚地証明了審訊是如何進行的，它有一個目的，而且是唯一的目的——死刑。我還應指出，在這個案件中廿四個同志被逮捕，而只有十八人出庭受審。這就是說，其餘六個人必定已遭謀殺了，不然的話，他們會站在被告席上的，

* * *

“……成百人死亡！成百人死亡！几天内就决定了。就在今后几天内，我对你说！”

泰谢特踱来踱去。

“它必然是那样的！而且将是那样！难道你以为这对他们会和对我們一样嗎？他們有机关枪！他們有手榴彈！”

泰谢特在桌子旁边艾迪跟前停住了。桌上凌乱地放满了报纸，濃黑的标题！

在奥地利扑灭了数个叛軍中心点！①

政府軍进攻卡尔·馬克思大厦。

保安队損失惨重。②

“莫索里尼在边界上集中軍隊！希特勒很可能正在准备进兵奥地利！我們全都希望奥地利同志将会胜利，艾迪。但是它也可能是另一种結局。它……”

“別他媽的去管那些耍笔杆的是怎么写的。工人們已打出第一拳，而我們却坐在这里，連給他們一点儿帮助都做不到！这就足使我們都发狂了！”

“別嚷了！”

“你听我說，好嗎？你不能小声点說嗎？你曉得这对我們会是什么吧！”“現成貨”在艾迪的眼前摆手說。

泰谢特又在房間里快步地走来走去。艾迪用手撑着脑袋。整个黄昏就是这样过去的；事实上，自从奥地利的头一个消息傳

① 这是指一九三四年二月奥地利革命工人反对奥地利法西斯主义的武装起义。

② 保安队是奥地利的反革命軍事組織。

来后，就是如此。每个人用許多問題来压倒別人。每个人都在希望。我們几小时地連續爭个不休——互相叫嚷。我們五个人今天会齐了！

“工人們在英勇地战斗着，”——恩斯特·施維布斯又挑起了爭論——“但是勇敢、机枪等子一切嗎？一个总罢工是最主要的——一切都必須停止不动。你讀一讀吧；工厂里繼續工作着！”

艾迪发怒地把桌子上的紙扫到地上去。

“讀呀！讀呀！但是他們至少是在保卫着他們自己呢！当阿道夫上台时我們干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沒有——沒有。就算是他們不会贏的，至少他們为此而战斗着。他們确是努力嘗試过的！”

艾迪是对的。即使受到軍事上的失敗，也胜于毫不抵抗地让法西斯分子攬得了大权。那常常是令人丧气的：我們自己目睹过这一切的。

“奧地利的同志們考驗了工人的力量。他們会从錯誤中吸取教訓；这在今后的斗争中将会有用处。……”

“今后的斗争？你說的是什么意思，今后的斗争？他們还在战斗着呢！”

“我們了解你的心情，艾迪。但是，要弄清楚我們該怎么办，我們还須討論這個問題，否則这一切爭論就毫无意义了。”

艾迪又把脑袋埋在手裏。

“在某些地方店鋪照常開門。发电厂又在送电了；火車开动着——火車！你曉得这是什么意思嗎？那就是杜尔福斯政府能够調动它的法西斯保安队，它的軍隊。工人却被困在他們的基地里。他們用大炮轰击着房屋——工人們的家！”

泰謝特猝然地停止了踱步。

“你不能还在跟工人說，把枪保留到最后的必要时刻——当法西斯分子开始破坏民主的时候。几年来他們一直在破坏着民主！如今工人不等別人告訴他們，已开始使用他們的枪了。因為他們認識到危机已来到。”

艾迪猛然抬头。

“我怎么說来的？难道我不是一直这样說的嗎？”

“但是恩斯特早就說过了。但是做事只做一半是没有用处的。这应该事先計劃好！”

“不管結局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們給我們树立了榜样。我們德国工人也能向他們学习。在这上头你說得很对；我們沒有走得那么远。但是我們沒有得到大部分工人的支持。我們只有……”

“我可以告訴你我們有什么！我們一个勁地侮辱社会民主党人，这就是我們所做的事！”

“我們自然是犯了錯誤，但是我們却是很誠心誠意地要求一个統一陣綫。”施維布斯插进來說。

“我們也从我們的錯誤中学到东西，艾迪。但是这也改变不了事态。我們要制止希特勒上台！单独我們自己是做不到的。我們只是到現在才組成統一陣綫。我們面前还有着最艰苦的斗争。我們……”

“我們現在最好停止爭辯吧。你所做的只是重头引起爭論！”“現成貨”打斷說。“不管別的，已过了十一点了。”

我們这条街空无人迹。发电厂里的机器仍在嗡嗡地响。

* * *

今天在理发鋪里有一个納粹党徒說：

“內战！德国人屠杀德国人！阿道夫·希特勒的‘人民公社’^①使我們避开了这一切。杜尔福斯要負已流出的鮮血的責任。而这一切全是因为他不允許言論的自由！”

對我們來說似乎又是另一回事了！血，他們已經杀害掉的成千的人，那不是屠杀嗎？难道理查·許提希不是血肉之軀嗎？

阿赫审讯案——判死刑的叫囂。

国会纵火案轉移了人們对迈科斯基案件的注意。

奧地利起义也被用来达到同阿赫审讯案一样的目的。

面前的桌子上放着当天的晚报。我瞪着眼看了又看。我感覺到暈眩；房間似乎在我四周旋轉起来。

“阿赫案的判决书

理查·許提希判处死刑

“理查·許提希因破坏和平和企图謀杀判处死刑、褫夺公民权終身。其余十四名犯人判处苦役九十四年和监禁十八年！”

“……特別法庭不得不处理跟迈科斯基案件同样类型的罪惡。但与后者不同，它从开庭到判决只花了六天的功夫，由于审讯中摒除了一切多余的事項，所以在短短的時間中質詢了一百名証人。

“国家檢察官敦布劳斯基还說到‘本席根据类似的案件和考慮到这一事实，即这些以及类似的攻击一再表明是蓄意的行动，毫不犹豫地得出必然的結論，毋須过份依据提供的佐証和質辯的結果。本席并不認為已証实阿赫是被許提希开枪打死的。在阿

^① 人民公社是国社党头子們用来掩盖社会上的不平等的所謂統一的德国社会的謊言。

赫被打倒后，他又站起来受到致命的射击，当时他是在迄未能解释的姿态下站着的。但是首犯应受到法律上最严厉的惩罚。本席深信那些执法者会对象许提希这种行动判以死刑。如果其他被告只得到一年到十五年苦役的判决，只是因为特别法庭决定相当从宽处理这些犯人’。”

庭长，第三帝国最高法院院长作如下的声明：

“檢察官的結論是不完整的，因为檢察官不能提供証实許提希的其它罪名的佐証。还應該考慮到，自从犯罪行为发生到如今已一年了，当时所有的証人都是处于一种极其冲动的状态。而且，最后，当天晚上的事件是在照明条件不良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是为何証人的証詞在許多地方大大不一致的原因。但是檢察官并未作出許提希向阿赫放出致命的一枪的結論。它不可能鉄一般地証实誰放的那一枪。另一方面，業已証明許提希犯了严重破坏公共秩序之罪，并且違犯了保护人民和国家法，又是后一罪状的首犯。再其次，他犯了謀杀罪。”

檢察官只說：“阿赫是在迄未能弄清的情况下受到致命的枪伤的。”

不管怎样被告之一必須处死：理查·許提希。在他們眼目中他不是一个人。他是可恨的夏洛登保护房队領袖。他是我們最优秀最可貴的同志之一——而他們是知道的。这就是他們之所以拿他示众的原因。

理查·許提希，我們的理查，被判死刑！

“被告无动于衷地听取判决。”

而現在呢？我們不能够走到街上向每个人大声疾呼說，理查是无辜的，必須制止这些褐衫党人的司法謀杀。难道我們真的无能为力嗎？沒有别的办法挽救理查嗎？

* * *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七日(第二天)

連“人民觀察家”報都在其關於阿赫案的報道中証實理查沒有開槍打阿赫。

“不可能確實地證明是許提希或是哪一個人開這一槍，不過，許提希曾扔下結束了阿赫的生命的那顆子彈，不管它是從何人的手槍里射出來的！”

* * *

被雇于白蘭涅克梅耶公司的同志——“現成貨”，已站在指定的街角上。

“一個人嗎？”

“我託其他兩人到勃恩克咖啡店去了。要是我們三人都在這兒等着，會不保險的。”

我們慢慢地走着。車輛和通常一樣的絡繹不絕，車輛接成一長列一長列地駛過；緩慢的行人在人行道上擠來擠去，

“現成貨”象是一個來自上層階級家庭的青年人，刮得光滑的臉頰，一頭黑髮抹得油光閃閃。他把冬大衣的領子翻起來，卻又不戴帽。這就是“上層階級”青年人在這個區的衣着。

“到勃恩克？那是個闊氣的地方。而且我們在那兒能夠談話嗎？”

“自然。他們經常滿座的，因為那兒有音樂。我還有足夠我們喝咖啡的錢。”

“好吧。”

邁克斯和艾爾溫想從我這兒得到什麼呢？他們都是“現成貨”的同事。他們跟他說的只是他們要跟我談話，他是最宜於安排這種事的人。

几个月来，“現成貨”曾供給他們報紙。他們常常索取印刷品。這是他們去“做買賣”的最妙的材料。他們組織了讀者小組，每人交納幾個銅板。當小冊子看過之後，他們卖掉它。有時一份報他們可以賣到兩個馬克或者還要多。他們跟“現成貨”打交道，他每次給我送錢來的時候總是滿臉堆笑。我們不時給他們一些理論書籍，供他們自己看。邁克斯在政治上比艾爾溫進步得多。我們到過邁克斯住處兩三回。他把他的舒適的房間供我們開會用。

咖啡店里擠滿了人。我領頭繞過大厅里的桌子。人們在高談闊論。在幾張桌子上，一對對的人兒緊挨着坐在一起。杯碟叮噠作響。女招待奔波于桌子之間。她們頭戴粉紅小帽，配上奇奇怪怪的圍裙。樂隊在正面舞台上演奏着。但其餘兩個人在哪里呢？在那邊，在廳背後角落上的一張大理石圓桌上。他們找到一張好桌子。

“晚上好，卡爾。好位置，不是嗎？”

他們都很高興。他們只知道我叫卡爾。

“是很好。你們還是象過去一樣地能干。”

“現成貨”要了兩杯咖啡。在鄰桌上的是誰？一個老年人。他忙着張羅他那壯碩的同伴。他們不會害事的。但是在那邊桌子上——一個沖鋒隊小隊長。他也在忙着招呼他那塗脂抹粉的小婦人——而且無論如何，在這種吵聲中他是聽不到我們的談話的。

邁克斯把幾枚錢幣推過桌上來。驕傲地微笑。

“先註我們干這件事。六個馬克。是最近一次材料的收費。”

“收下了，謝謝。”

“什麼時候我們能夠……？”艾爾溫問道。

“下星期。照往常一樣。”我朝“現成貨”點點頭。

“好的。”

沒有人開腔。邁克斯啜了一口啤酒。艾爾溫擺弄著一支鉛筆。他們必然是有些什麼特別問題。要靜一靜下來再談下去。不久以前邁克斯對我說他是個猶太人。最高明的種族調查者也會認不出來的。一頭火紅的直髮。而且他長得又高又瘦。一付聰明、合標準的相貌。勇敢的伙伴。如果他被發現的話，會因為他的種族而受到更壞得多的待遇。

“呃，卡爾，我們要跟你談些事情。”

邁克斯終於開口說。

“我在聽著。你說吧。”

邁克斯沉默了一下。

“我們要到家庭①里來，”他安靜地說。

艾爾溫點點頭。

“是的，這就是我們所要跟你談的。”

我驚奇地放下小茶匙，睜大兩眼瞪著他們。他們想要參加黨？我思想上曾作一切準備，就是沒有準備這一招。我感到非常的興奮。

“現成貨”也感到突然，輪流地望著他們。我不言不語。他們要……邁克斯還有可能；但是艾爾溫呢？我仔細地端詳一番艾爾溫，就如從來沒有見過他似的。那修飾整潔的頭，纖秀的雙手。怎麼回事，他還滿臉的孩子氣；不滿二十歲呢。艾爾溫應該參加青年運動。但是他住在我們這個區。這個區的青年運動差一些，正在改進的過程中。邁克斯年歲大一些，聰明一些。

① “家庭”是黨的代用語。

但是他們可知道一点点現在參加黨是怎麼一回事嗎？用不着立即分配任務給他們；他們已經証實了他們是值得信任的。

我們曾遭受到損失——需要新黨員。

他們還在望着我。

每逢有新人加入我們的隊伍時，我們總是高興的，特別是在這些日子裡。但是這意味着不只是經常賣賣報紙而已；他們還缺乏“工作”的經驗。因此不能一開頭就讓他們充分地參加到這一切裡來。這是為了他們自己，也為了我們。我向他們解釋道，

他們可認識到在這些時日里“家庭”要繼續工作是多麼的困難嗎？我並不打算做個悲觀主義者，但是他們可曾想到有朝一日他們可能遇到多麼的遭遇嗎？是的，他們很清楚這一點，邁克斯這樣回答說。他們就這個問題曾考慮過一個時期。但是他們不再滿足於光是賣賣“畫”^①，他們不能照老樣子干下去。當前最主要的是，每個人把他們的全部精力貢獻給工作。

我答應立即着手解決艾爾溫的問題，因為他住在我們這一區。他將從“現成貨”那裡得到回音。邁克斯的問題將要多等些時間。他住在另一個區，所以我必須先跟那兒的“同伴”接上頭。當我能夠把他介紹給他那個區的同志時，我再跟他會面。他們對答案都很滿意，默默地握了握手。

邁克斯和艾爾溫先走。那個沖鋒隊隊長還坐在鄰桌上。他正撫摩着他的女伴的手。

在安排邁克斯入黨的問題上我碰到了困難。他那區的能干的同志要我提出三個介紹人。儘管他認識我，我也向他說明邁克斯已給我們工作了好長時間，他還是固執己見。他堅持說這

① “畫”是黨的宣傳品的代用語。

职责……假设敌人从空中进攻夏洛登堡……敌人机队飞越……
某某街的房屋……然后转向街上的交通……目标，夏洛登堡发
电厂，由于及时施放烟幕，错过了目标……投下许多炸弹……街
上有未炸的炸弹……防空协会标明了假想的炸弹地点……

德国小学生们，担当起你们的义务来！

搜集廢炸弹……优秀的搜集者将得到奖赏……特别是
从……”

娃娃兵！我曾经多少次在报纸上读到，“他们发现了一枚第
一次大战中留下来的炮弹……爆炸了……三个孩童被炸得粉
碎……”

小学生们受到褐衫党教育的彻底荼毒。所有的同志都可以
说出关于他们的孩子的同样遭遇来。法西斯教师天天在缠扰他
们，要他们加入“少年团”^①，加入希特勒“童军团”。他们被教导
把“公民”当作次等人看待。不断的“野餐”辅以纳粹教誨。在这
上头，他们学会钻铁丝网，处理弹药箱，以及类似的“演习”。当
他们回家时，衣服经常弄得又破又脏。在他们的游戏场上这些
“课程”继续下去。烧着的房子用化学药品来扑灭。那些成为小
队长的儿童只要有长途行军，随时可以不上学，这样他们学到的
比其他儿童少，然而他们考试一定会及格，因为他们是“长官”。

纳粹利用儿童的浪漫主义倾向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儿童们
的组织被允许随时可以在大街上游行，高唱沙文主义的军歌。巡
警甚至可以为他们停止一切交通。这必定使他们感觉到他们是
多么的受重视呵！制服、肩章和军鞭对一个孩子来说意味着多
少东西呵。这使得他们有机会在别的孩子面前装模作样，在

① 纳粹的儿童组织之一。

大街上裝“成年人”。

由于这种影响，一些我們同志的孩子要求送制服做生日礼物。当他們还小的时候，他們的父母不能跟他們談我們的想法。他們害怕孩子們会对別人講出去，这样他們的孩子会使他們遇到危險。我知道有些同志由于孩子的关系从不携带非法物品。但他們藏有我們的少先队^①的書籍。在晚上他們拿出来念給較大的孩子听。“我必須至少給我的孩子一点那些东西；除了納粹学校的无聊东西外，他什么也沒有讀过，”一个同志对我說。

褐衫党人們要把整个民族，从小时起直到老年时代，訓練起来为他們的征服的战争之用。

泰謝特汇报說，西門子工厂正以最大速度制造战争物資。有的車間开足三班。雇用了新的金属专门人材——工具工，鑄工，机械工，等等。許多人被派到室外工作。“装配工作，”新飞机场！他們全都宣过誓——声言如果他們泄露消息要受到严厉的处罰。德国工业上的虛假繁荣——战争物資。我們一貫地認為德国是远东的战争物資的供应者。現在，第三帝国正在武装起它自己来对付苏联。

由于这种原因，我們的許多同志才能够回到工厂里去。进入法西斯的战争工厂！我們將需要它們！

* * *

我們又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

佛兰茲·桑德尔，我們的佛兰茲被捕了。昨天晚上在我們的街道上。佛兰茲——在我們的街道上！現在我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們在各处进行了詳細的調查。我們必須找出全部

^① 少先队，属于当时德国进步工人运动的儿童組織。

嘴角上。他站在那里張开大嘴，朝对过望着。老板娘奇怪地看着他。其他三个人被他的奇怪行动引起注意。之后他让自己振作起来，向門口奔去。

“我以后付錢……一会儿就回来，”他結結巴巴地說。

老板娘追上前去，打算抗議，但是格隆茲已走出店外；甚至沒有停步把門帶上。这时那三个人当中的一个站起来。他看見格隆茲向魯西寧大街的方向跑去。由于看不到我們这条街上有什麼出奇的事，他們无法猜到格隆茲这种怪异行为。（佛兰茲必然是在一秒鐘前躲进他的房子里去了。那个走到門口去过的主顧認識他。他告訴我們說他沒有看見他。）

“他一天比一天顛狂了。不过，保險他会付賬的，”老板娘对其他的人說。

不多一会，冲鋒隊員們奔向我們这条街来。穿褐衫的人群迅速地分散开，形成一道环鏈，从拐角的两栋房子一直延伸到发电厂与救济宿舍之間的小胡同。之后，一群冲鋒隊員走进佛兰茲住的那栋房子，站滿了所有通向后院的楼梯口和門戶。

从佛兰茲的那栋房子看不到什麼不平常的地方。但是靜默的街道一下子就惊动起来了。一排排的窗戶上堆滿了臉孔。一群群人站在門口，用憎恨的眼神斜瞪着褐色警戒綫。他們全都站得远远地，但是他們的无声的抗議似乎刺到了褐衫汉們。冲鋒隊員們显然感觉到这一点。他們神經質地扭动他們的头，望着一排排的房屋和窗戶。那些买卖人从他們店鋪的窗戶里胆怯地偷望着，只有一个水果商例外；他笔直地站在他的店門口上。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不安想法。要逮誰呢？他們这样突然地光临……誰有危險了呢？誰？……誰？

佛兰兹敲响他家的門鈴。沒有人開門。凱蒂還在辦公室里沒回來，媽媽病倒在床，起不來。鄰居舒爾茲大嫂聽到他捺鈴。當她看到佛兰兹時，她吃了一驚。不錯，她有他家的鑰匙；她解釋說，白天她照顧他的媽媽。她拒絕上醫院去，而凱蒂是整天不在家的。凱蒂早該告訴他，佛兰兹回答說。他要看看媽媽，跟她說幾句話；他會立即就走。他很快便出來了，但停下來告訴鄰居，他曾經試試勸服媽媽上醫院去。對她來說那是上策。她的情況比他想到的還要壞，是這樣的瘦弱。之後，他飛步跑下樓梯。一秒鐘之後，鄰居聽到下面樓梯上有撞擊聲。

一個聲音在喊著，由於發怒而嘶啞。

“我們終於逮住你了！現在我們可抓住你了，你這個畜——！”

當褐衫黨徒走到街上來的時候，可以看到站在各個門口的人群中突然活動起來；窗戶里的頭驚恐地抬起來。他們的喉頭上湧起一陣窒息的感覺。那是佛兰兹·桑德爾——他們的佛兰兹！街上每個人都很熟悉他。

街上依然一片沉默。男人們站在門前。但他們口袋里鼓起了攢緊的拳頭。所有的窗戶擠滿了旁觀者。我們的街道在死一般的靜默中送別佛兰兹。好象有許多雙手從四面八方伸過來，要再一次和他握手。

佛兰兹一定也体会到這一點。他臉上平靜如常。他的雙唇甚至浮現出一絲微笑。他向街道兩旁，向上面的窗戶點頭。

沖鋒隊員快步地推著他。向魯西寧大街，向近科斯基營房那邊走去。那是佛兰兹最後一次見到我們的街道——我們的街道最後一次見到佛兰兹。

* * *

我當天晚上聽到消息之後，我首先想到的是，必須警告秦謝

特。泰謝特，因为他跟佛兰茲住在同一栋楼房里。而且因为我们不知道三十三支队可能还要逮捕我们当中的哪些人。

从西門子城来的电車頻繁地开过来。它們全都挤得满满的。一天中的这个时候，是西門子工厂放工的时候，加了許多加班車也应付不过来。我站在停車站上，飞快地閃望所有下車的乘客。泰謝特在哪儿呢？也許他今天提早下車去买东西了？

在我們的街口上等他会不会更好一点？太显眼了。而且如果他 from 另一头走来，他会毫无防备地进入家里。

車子一輛接一輛开过来，停住，空空地开走了。

这一輛沒有——下一輛也沒有。每分鐘都在折磨着人。

我踱过来踱过去——我覺得好象过了几小时似的。

又一輛車开来。在这一輛里，終於来了——泰謝特！

他覺得惊奇，晃蕩着他的飯盒。

你在这儿？他只說了这一句。

似乎接下去該問“为什么？”了。但是他不再吭声，跟我并排走。我心情十分沮丧。偷偷地瞟了他一眼。他的眉宇間有一道深痕。近几天来他变得更苍白，頰上顴骨更突出。好象从理查的判決宣布以来变老了。而現在我还必須告訴他这个消息。

“为什么……？那当然不是什么称心的事吧？”他終於說。

我沒有望着他。每走一步就象敲我脑袋一錘似的。

“他們逮走佛兰茲！”

泰謝特站住。

“佛兰——茲？”他拖长說，好象他沒有听清楚这个名字。“他的那个区被发现了嗎，或是什么——怎样……？”

他攔住我的臂膀。

“在我們的街上——一个鐘头以前！”

泰謝特用手抹了抹額頭。

“在我們的……在我們的……”他不解地說。

我拖他走開。我們不能引起注意。

“鄰居給他開的門——她說他要看看他的媽媽。”

泰謝特不回話；定定地朝前瞪望。

“他們很突然地圍住房子——也許——”

我啞啞不成句，但是泰謝特已經明白了。他沒精打采地點點頭。

“這就是我為什麼要等你。”

我們往下走。泰謝特還是不言不語。他緊閉着嘴，沉重地呼吸着。

“我們必須找人告訴鄰居去警告凱蒂。我們兩個不管誰去都是太危險了。不能讓她母親知道這些事——不能在現在……”

“揚，”泰謝特只說了這一句。他緊握住我的手。

我避開他的目光。凱蒂——她只好自己克制自己。我沒有勇氣——至少現在沒有——

“我走了。讓我們忍住吧。要是我——算了，我們看到底有什麼事發生吧。”

他再次握握手。我望着他走開去，然後反過來順着房子走去。

我們會從不同的方向到達同一地點的。但是那也挽救不了我們——如果現在輪到我們的話。

* * *

凱蒂在母親病的時候睡不上多少覺。老太太經常到清晨才入睡。在佛蘭茲來之前，她幾乎已經同意上醫院去了。但是自從佛蘭茲來看過她，她一直拒絕離開家。以病人所特有的固執；她反復說她要在家裏等着他下次來探望。凱蒂向她解釋，佛蘭

茲可以同样經常地到医院里看她。但是不行，她坚持留在家里。从那以后，对凱蒂來說，日子不但使得她在生理上感到緊張，而且在精神上也感到痛苦。現在她的母亲不斷談起佛兰茲。他怎样了，他曾經答应很快再来。凱蒂不敢託她的絲毫真情实感引起她对佛兰茲的真正遭遇的猜疑。

佛兰茲現在在哪里？他受到什么待遇？凱蒂四处打听他的下落。地方警察局，宣称毫不知情；在亚历山大广场警察总局的政治警察部，亚尔伯莱赫特亲王大街的秘密警察，在秘密地方警察，在哥倫比亚赫斯。他們全都簡單明了地回絕了她。佛兰茲·桑德尔？沒有听到过这个名字。不行，他們不能作任何調查；这类事太多了。我們也帮不了凱蒂的忙；如果我們着手調查他的下落，只会引起怀疑。我們劝凱蒂告訴海尔黛，佛兰茲是被警察抓走的，而不是被冲锋队抓去的。因为海尔黛将完全責怪自己，因为是她把他母亲的事告訴佛兰茲的。自从佛兰茲抓走后，海尔黛伤心极了。她一談就是如何設法为他尽力。凱蒂每次都得告訴她，她不知道他在哪里。如果海尔黛查詢佛兰茲的事，那她只会被牽連进去。而且如果她知道是三十三支队逮捕的佛兰茲，肯定她会設法从她的兄弟那儿打听打听。我們必須防止她把自己暴露給她的兄弟——冲锋队的头目。

三十三支队！佛兰茲会不会还在迈科斯基营房里？冲锋队不許凱蒂进去。值班的軍官調戏她說，她可以在下班以后向他报告。在哪儿，在哪儿，佛兰茲？每天早晨凱蒂醒来首先想起的就是这个“在哪儿”。

一天早上她起得很早。匆匆忙忙穿上衣服，从厨房里給她媽媽端来臉盆和手巾。在回来經過客厅的时候，她的眼光落在前門的鉄絲信籠上。有件白色的东西放在那里。一封信。在这

个时候，一大清早？定必是昨天晚上最后一班邮件来的，黑夜里沒有注意到。信封上有打了戳的邮票。一封公函？是給艾丽斯·桑德尔太太的。凱蒂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封信在她手里突然象鉛一样重。一封公函！她犹豫地把信翻轉来，然后扯开带孔的一边。

“在医院里逝世……由于心脏衰弱致命……将在……发回安葬”凱蒂把信看了又看。之后，輕輕地喃喃自語，一点也未意識到自己在干什么。死了——但是誰？死了——但是信不是給她的。她机械地把它翻过来。是給艾丽斯·桑德尔太太的……
弗兰茲——弗兰茲。

“凱——蒂，凱——蒂！”

媽媽用无力颤抖的声音叫她。凱蒂站起来。她两臂軟綿綿地垂直地站了一会，手里仍然捏着揉皺了的信。她抬起臂膀；它感覺到又僵硬又沉重，好象这不是她的臂膀似的。她又看了看那封信。

“凱——蒂！凱——蒂！你——在哪儿？”

凱蒂强自打起精神。她的媽媽！到如今她还不致教媽媽曉得这些事；这是必須瞞着她的又一个理由。她把信藏到抽屉里。她的母亲撑着胳膊坐在那里。她一定是曾經白费力气地試圖站起来。她的臉黃黃的，顴骨高聳。

她責怪地看着凱蒂。

“我一直在喊……喊了又喊……而你却不来，”她說。

她指指臉盆，手巾。凱蒂把这一切拿到床前。

“你……不是……快要……上班嗎？”桑德尔大媽問她。

是呀，她必須上班去。她不去了；从今以后她什么都不在乎了。

“我們——我們今天放假，”她回答說。

她聽見自己对媽媽这样說也觉得奇怪。媽媽把手巾放下，疑問地看着她。

“你怎么那样講話呢？……你觉得不舒服嗎？”她問道。“你臉色这样白。”

“我没有什么——我們今天放假，”凱蒂又說一遍。

她必須尽力打消她母亲的怀疑。

佛兰茲死了的消息，一个早上閃电似的在我們街上从一家傳到另一家。整条街道在哀悼。虽然看不見黑紗，但是我們的同志的逝世流露在每个人的臉上。在談話中，在无言的目光中可以感觉到他的存在。佛兰茲跟他的街道告別了。他进到房子里来。他不到处敲門；沒有一扇門打开，但是他走遍了每一处。

一个老妇人在哭泣。他經常帮助过她，那个小伙子是帮助过她的。帮她带东西，鏟煤。

一个同志想道。

“你还記得嗎？……新哥隆——帝国會議……弗雷德雷希許恩，大厅里的大打出手嗎？你还記得嗎？你好，佛兰茲。你是最优秀的……”

他們到处都在跟佛兰茲告別，永远告別了。

我們的街道很长。

这里有許多房屋。

* * *

我慢慢地走过柏林大街。海尔黛住在这条街的对过。今天晚上不要忘了問秦謝特她住在哪里。今后我們必須更多地照顧她，因为她失去了佛兰茲。我的眼光落在一家鐘表店的电鐘上。有的是時間；我不必在十二点前到那里。我在就近的一張椅子

上坐下来。車子川流不息地过去。太阳已經相当暖和。树木！几天前还是毛黄的嫩芽。現在已长出了嫩叶。变化来得这样快，几乎教人可以看出它在变。該是多么痛快呀，躺在綠茵茵的草場上——小虫子飞来飞去……佛兰茲！他永远再也看不见这一切了——永远不再跟我們一道去野餐了。这一切突然地回到脑子里来。打那以后，我只見到过凱蒂一次，是在市外的格呂恩瓦尔德。她到夏洛登堡冲锋队的斯坦达尔医生那里去。他住在凱撒堤一套奢华的房間里。“最健壮的人也会因心脏衰弱而死的，”他双关地說。她被允許单独到殯仪館看佛兰茲。他們只許她隔着窗戶看；尸体停放在离窗戶几碼远的地方，裹上白布单。只露出一点点臉孔，就連这部分还是敷上一层厚厚的粉。她認不出他来了，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他不是。她一边啜泣一边告訴我一切。我說不出半句話；只能輕輕地撫摩她的头发。我找不到什么可以安慰她的話。佛兰茲永远不会回来了。

在这事之后，我們完全不能会面了；肯定她是被監視了。在最近一个时期內是够困难的。

我底思潮轉回到那闊大的瓦尔德墓地上。成千上百的工人当时圍着坟墓站着，他們在来基地的途中把交通都堵住了。为了买几朵花，为了車費，他們許多人得捐獻出他們仅剩下来的几分鐘。充滿着仇恨和悲伤的臉龐，又浮現在眼前。妇女們在哭泣；此外就是死一般的靜默。这是由秘密警察的警卫的咄咄逼人的臉孔所造成的沉默。共青团的一个年輕同志冲到未盖土的坟上，开始講話。他还說不上几句，秘密警察就把他拖走了。可是千百个声音在喊：“复仇！紅色陣綫！”……

我睜开眼。是大白天。

你再不跟我們在一道了，佛兰茲，我最亲密的朋友和同

志……

动物园在对过。人們站在大鉄門的前面。他們都在看鉄栏后的大象。在前头的是，揚宝，最老的一头象，正用鼻子接受糖块，然后把沙子往它那龐然的軀体上撒，把一柱水噴向天空。我左近的人在欣賞着这幅情景。大人和小孩一样地高兴。我从口袋里掏出我的报纸“晚报”。我右手拿着报，时时注意着。車站上的时鐘的針正好迭在十二上。現在那个同志随时会来到。不过他还未来到。再沒有別的人拿着一份报的。我不認識那位同志，不过我已听到关于他的詳細描述。他也会拿着一份报纸，用暗号跟我打招呼。外表上我好象和在这里的其他人一样，在观赏那嬉戏的大象，但是我时刻都在观察我的四周。不多久，一个戴着金边眼鏡、面色蒼白的小个子走过来。他也挤到那些站在鉄籠前的人堆里。那是他！我已經养成了这种工作的高度敏感性。介紹的形状是对的——他手里也拿着“柏林商情报”。我注意到他在偷看他周圍的人。但是最好还是稍等一会；也可能是一个偶然的巧合。我繼續看大象，但是把手中报纸的第一版更顯眼地翻在外面。过了几分钟。这时我旁边^的一个妇女走开了。很快那个小个子占据了她的位置。

猜对了；不过得小心。

“你觉得那头象有多大了呢？”小个子立即用輕細的假嗓子問道。

这句话好象是无心地問的。沒有人回答；他們都在望着对过。

“說不上来。八十岁，也許一百岁了吧，”我鎮靜地說。

但是即使到了現在！这还是一个隨便問的問題。回答——現在得看回答了！

然說出來。

台爾曼。我們最後一次看見他是在比洛夫廣場的示威遊行中。

“同志們對謀殺約翰·謝爾^①和其他三人作了一次很好的回答。一天晚上他們在舒尼堡的兩道鐵路橋之間掛起標語。‘為約翰·謝爾報仇！’那里經常是交通擁擠的。兩三百名工人在早晨上班時看到這些標語。其後消防隊開來取下這些標語。”

沉默。

當泰謝特這樣談話時，他有一個這樣的家和這樣的妻子，常常使人覺得出奇。

他在西服甲克的口袋裡摸索，掏出一張小紙片，遞過來給我。

是一份剪報。

在欄頭上用大號字印着：

執行！

下面用小號字寫着：

下令立即執行。

我把紙片揉成團，憤怒地扔到地上。

“第三帝國的報紙！”泰謝特說。

他站起來。拿出最近一期的我們的“紅旗報”。

① 約翰·謝爾在台爾曼被捕後成為德國共產黨的領袖。他在從事地下政治活動中被捕。敵人曾殘酷地迫害他，企圖逼出一些關於黨的機密來，但是他堅貞不屈，儘管受盡恐怖刑法，未吐露出一點消息，後於1943年與其他三個德共領袖同時被難。

我很惊奇。

“你还藏着这个……在家里?”

“昨天才从海尔黛那儿取回来的,”他解除我的顾虑说。“我有我的理由给你看这个!”

我看着那份报纸。其中有几版打上叉,其他几版划了线。在一篇关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报道旁边有用大字写的“废话”。

一篇关于在纳粹魁首们治下的乱七八糟情况的报道上,眉批着,“相当真实。正如在马克思主义制度下那样糟!”

我不懂地望着泰谢特。他笑起来了。这样前面的两个黑牙根又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是纳粹党徒们的评语!”

“海尔黛给……?”

“她把得到的报纸给了纳粹分子一些!”

他变得严肃起来。

“那取得了很好的结果,正如你看到的。但是现在她的做法呀!”

“怎么样?”

“自从佛兰兹死后,她完全失去了控制。想使自己全力参加非法活动来忘掉那些事。她每次都恳求我多给她报纸、工作。”

“从前她一直送报纸给纳粹们。但是不让他们晓得是谁送去的。一般是塞进他们的信筒里去。从她的兄弟那儿弄来地址。偷偷地从他的记事本子上抄下来。但是现在她好象是相当公开地送报纸给几个纳粹分子。总之,许多人。她不承认,但是除此之外,她怎能得回它们呢?”

海尔黛。她过去曾这样做过——但是谁也未对我提到过。

佛兰茲一定也知道這回事的。

“我們暫時不能再給她任何工作了。那只會招來不好的結局！”

“我需要你同意這一點，”秦謝特說。“無論如何，我們必須解除她的工作一個時期。她是徹底地垮了。”

他想了一下。

“我將告訴凱蒂。她們可以常碰頭。她們在商業學校時就彼此認識——那是一個很好的理由。”

他談到海爾黛曾經對他說，近些日子來，她的兄弟常帶着痛苦的表情。在家里他再也不談政治了。雖然他一貫是愛作長篇大論的政治演說的。他只有一次說到他的沖鋒隊上司要給他找份差事。當一名獄卒。他拒絕了。得到的回答是，他只不過是一名鎖匠而已。海爾黛相信她兄弟正開始失去對納粹運動的信心。當她埋怨從她的工資中抽走苛捐雜稅，或是她媽媽嘮叨物價上漲的時候，他不象往時那樣為政府辯護了。這一切一定使海爾黛變得更不小心。

我很驚訝。費列斯，沖鋒軍頭子！

我留下來安排下一期報紙的技術細節，和過去一樣我負責這期的報紙。秦謝特答應負責那篇社論。

當我離去的時候已經夜深了。我們的街道象荒漠似的。不常見的煤氣燈把它們的微弱光綫投落在几所孤零零的、后座聳起的一層或兩層的小房上。它們站在那里有百多年了。長滿了青苔。支離破碎的房檐好象要從牆上滑下來似的。

發電廠的機器發出單調的、無休止的嗡嗡聲。

* * *

紅色互助組織的一名工作人員今天交給我几頁打字的文章

件。紅色互助組織是專門進行對我們那些被關禁的同志的援助工作。那是阿赫審訊案中一名高級司法官員的報告。在那個審訊案中判處理查·許提希死刑。這份報告要送到國外報紙上去發表。

“以可敬佩的技巧，理查·許提希終於能夠揭露出真相，雖然他很清楚這樣做法會使他遭遇到什麼樣的命運。他要求舉行秘密審訊，以便在作供證時能夠說出真正的事實。他陳述了他和他的同志在對證中所受到的虐待。情況如下：

“許提希與另一被告坐在主審的警察長面前。

“後者先問許提希：‘你開槍了嗎？’

“許提希：‘沒有。’

“於是其他被告，包括年方十八的赫伯特·卡利亞斯，在許提希和警長在場的時候，被警衛用斯湛布克^①殘忍地加以鞭撻。

“警長又問：‘許提希開槍了嗎？’

“回答：‘是的。’

“於是許提希被問道：‘你開槍了嗎？’

“許提希：‘沒有！’

“警長問其他被告：‘許提希是不是說謊？’

“回答：‘是的。’

“警長：‘拿起皮鞭打他，因為他不知羞恥說謊話。’

“許提希着重說，當這種方式的對證到了這種地步，被告常常否認他們的供證，並且拒絕打他。直到窩斯和德雷塞被殺害，這種鞭打繼續了好多星期，警察才弄到手他們所需要的罪證。許提希還向法院陳述沖鋒隊分子在哥倫比亞赫斯怎樣毆打群眾

① 斯湛布克，鞣牛皮做的一種鞭子。

的。犯人躺倒地上，一般是不能動的。兩個沖鋒隊分站兩旁，用斯湛布克鞭打，這樣便留下一個V字形的創痕。窩斯，他拒絕供証別人，實際上是被活活打死的。他在一次這樣的審問後不到一個鐘頭便死去。

“當我被打得個半死時，我扯開我的衬衣，向沖鋒隊叫道：‘這裡，開槍打死我吧，但不要碰我的同志！’

“‘沖鋒隊被這種氣概打動了，他們有一陣子放鬆了刑法，’許提希格向法庭陳述說。

“之後他補充說，由於他在哥倫比亞赫斯的經驗，他決心死也要做一個共產黨人。

“國家檢察長只是指出，根據許提希的零碎回憶的証詞，可能是真的，被告不會受到很溫和的待遇！”

保羅·窩斯。被鞭死——因為他不愿誣陷許提希。我們習慣叫他“麵包師傅窩斯”。在1932年，當他從醫院里出來的時候，曾給我看沖鋒隊戳他的刀痕。他經常在禮拜天參加我們的小組，幫助我們推銷報紙。“你有一付這樣大的嗓門，揚”他經常說：“隔兩排房子人家也可以聽到你的聲音。”他的寬闊蒼白的面孔，一頭長長的黑髮，清晰地涌現在我面前。當他走路時他是怎樣地習慣擺動臂膀。他走起來有點駝背，兩腿稍微有點朝里彎。這是由於長時間做麵包的原故。麵包師傅窩斯——理查·許提希。我們并非全都是季米特洛夫。我們不能全都講得跟他一樣好。但是千百個無名的季米特洛夫正在整個德國進行着鬥爭。

他們要把這份報告弄到國外報紙上去。也許還能挽救理查·許提希！

我在街上走了許久許久，腦子里只轉着一個念頭。走累了，帶着一個發痛的腦袋，我轉回到我們的街上来，這時我突然意識

到，在最后的两条街道上有一人尾随在我后面。他跟着我轉到我們的这条街上来。我站在黑暗的門洞里等一等，然后探头望望。那个人走过去了，在拐角后头的那条街上消逝。一定是一个碰巧晚归的人。時間已过了清晨一点半鐘。

我悄悄地脫下衣服，把头埋到枕头里。

* . *

我从床上跳起来。有人在敲我的房門。我觉得头里嗡嗡作响。它痛成这样。我的睡衣湿漉漉地粘在背上。我把手压在太阳穴上，弄醒自己——站起来。鬧鐘上指出才四點鐘——却有人敲門！

搜屋——警察！我害怕得一动不动。我的手在发抖；我定不下来。我还留着报告在这里——报告！还有別的东西嗎？沒有。那份报告藏得很穩妥！我慢慢向門口走去，打开門。我的女房东站在过道里。她在睡衣上披上一件睡袍；一綫綫細薄白发垂在肩上。

“看老天爷分上，貝特遜先生，出了什么事嗎？你喊得这么响！”她担心地說。

“我出事嗎？什么也沒有。我攪扰了您，很对不起！”我勉强自己說。

老妇人回到自己房里去，边走边摇头。但我望着窗外。

街道籠罩在暗淡的灰色里。

这种情况已繼續了好几个星期。在夜里，在睡梦中，褐衫党人在追我；白日里，我靜听着楼梯上每个脚步响声，每次門铃声。我神經質起来了。我必须尽快安定下来一个时期。我曾經喊过什么来着？我記不很清楚；一定是关于面包师傅高斯的事，女房东是否常听到我在恶梦中的叫喊？我甚至可能因此向她暴露

了自己。

我望着那乱七八糟的街道，楼板上的氈絨垫子，望了好久。我打冷顫；牙齒格格响；睡衣滑粘粘地貼在身上。

* * *

后备冲鋒隊員 X，两天前向恩斯特·施維布斯汇报。汇报他在香料厂的工作。X，他曾把庫尔格耳在迈科斯基营房里所受的苦刑告訴我。（庫尔格耳所以被三十三支队逮起来，只因为他们要知道弗兰茲·桑德尔在哪里。弗兰茲已經死了——但是庫尔格耳还是被关在奧倫楠堡集中营。）

X 現在坐在我对面，抽着烟卷，一語不发。我不去催促他，可是想法不期而来：他曾經属于我們某个群众組織，还是原样未变，認識我已多年，然而还是觉得很难把他自己的心事說出来。

“从夏洛登堡突击队逮捕了总共一百二十名冲鋒隊員。为的是发牢騷和不守紀律。他們关在伊莉莎白皇后大街的夏洛登堡警察营里。他們被当作‘特权犯人’看待！准許互相談話，打扑克，抽烟。但是每天有兩個鐘头他們要端正脑筋。可以在院子里做体操。”

“一百二十人。你沒有弄錯嗎？”

“是不錯！我甚至从其中几个人那里听到被关的原因。”

X 捺灭他的烟蒂。

“其中一个是‘老卫队’了。在建立他那个突击队时出了把力的。突击队給他找到了工作。他失业有好多年。在上工的第二周末了，他在厂子里吵吵嚷嚷——說什么人們只賺到一条狗的工資。奴役比以前更厉害得多！”

（泰謝特告訴过我在他厂里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而另一个呢。他的情况正好相反。他本来有个好差事；在

一九三三年三月加入的冲鋒队，因为他不想丢掉了他的差事。不断的行军使他受不了。他的女朋友离开了他，因为他从来也没有时间陪她度周末。他只是因再不参加活动被捕。他受了两次八天的拘禁。在亚历山大广场警察局。之后，他又逃避职务。现在在警察营里他们大概要把他当一个‘行军改造者’。”

X架起腿；手指在沉重的皮靴上叩打着。

“但是他们逮捕的大多数，是因为他们宣传第二次革命。”

“我们听到过这件事。你知道详细情形吗？”

“只听到他们在自己人中所说的：‘冲鋒队确是从火中取出了栗子，但是我们被骗了。头子们占了我们的社会主义；他们踩着我们的背爬到一切好位置上，这就是他们在德国的全部改革，’以及类似的說法。”

他从桌子上拿起一张纸，把它撕成条条。

“你跟这个有关系吗？”

“也许。关于这个我一点儿都不晓得，”我含糊地回答。

X把纸条放在手里搓来搓去。目不转睛地瞪着它。

“唔！呃，好吧！我还听到这个故事。一个后来被他们逮捕起来的队员，手里拿着一份报纸走进突击队的建筑物。那是一份‘红色冲鋒队员’。有人把它插进他的信箱里。他念了几段摘录的东西。一篇文章谈到‘元首们的’侈华生活。文中指名指姓。赤色分子还谈到了往昔的许多美好事，他指出说。‘但那不是他们要镇压共产党人的理由。噢，不是的，不是为了那个！’”

（我当然晓得这份报纸。它是由那些已经同情我们的冲鋒队员出版的。）

他静下来很久一会。

“你認識經理湯瑪士嗎？”他突然問道。

“不認識。為什麼？”

“他的案件在沖鋒隊里引起一場大風波。幾個‘老衛士’也因此被關在警察營。他也是利用報紙。那是過了多久他才說出來的！”

“湯瑪士經理原是一個納粹政治指導員，被派到柏林交通公司。他突然失蹤了。幾天後報紙上刊登公告說，湯瑪士經理溺死在哈非爾河。很快真相大白，是他自己在報紙上發公告。警察逮捕了他。在一個海濱市鎮上。他隨身帶着柏林交通公司的福利基金；只有二十萬馬克……”

“可是那些沖鋒隊員，他們為什麼被捕呢？”

“他們是公共汽車售票員。在他們車廠站台上出現了一張布告，宣布湯瑪士經理逝世，將在某日舉行殯禮，但是不准一個工人參加。這自然使他們覺得出奇。納粹頭子們一般是要舉行盛大的殯禮的……”

“很好！往下說。”

“就說。盜用公款的事很快就傳開去了。沖鋒隊員們在工作時談論它；他們甚至到上級的粹納分子那里，要求給以解釋。他們認為，作為一個老沖鋒隊員，這是他們的職責——於是他們不得不閉上嘴。‘墮落的說怪話的人’！帶着這個稱號被關到警察營……”。

X的看法是，就是這些逮捕使得這些事件成為沖鋒隊員之間的談話題材。不滿意的人很多很多，只是靠着嚴格的強制才能把他們維系在一起。納粹魁首們也知道這一點。

我問X他願不願意隨時嘗試跟這些沖鋒隊反對派談論我們的意見。我們的任務是要最充分地利用這種不滿。我們必須把

它导入我們的軌道里来。他至少得把发牢騷的冲锋隊員的名字告訴我們。我們將給他們送報紙，往后，我們甚至可能設法親自和他們建立联系。X拒絕了。這對他來說是太冒險了；他得想到他的家庭。他肯定会听到更多的詳情，并且會把它們傳給我們。但我們不能指望他會出更多的力。我告訴他這些關於冲锋隊員間的情緒的報告，對我們來說有多么的重要。（普勒斯也告訴过我，在勃兰登堡集中营和巴比將軍大街的野地警察营里，关着冲锋隊犯人。其他区的同志也报告过同样的情况。）

X是我們小組跟冲锋隊接綫的人。這是我們頭一回听到關於夏洛登堡冲锋隊內部不一致的詳細情况。領導我們这个区委會的同志告訴我，他們跟夏洛登堡冲锋隊還有其他接綫人。

我們必須設法使得X以后能够更公开地跟覺悟過來的冲锋隊員談話，并使得他隨後把他們介紹給我們。

* * *

桑德爾大媽关上房門。她的鄰居站在門旁。她向老婦人走過去，把手放在她的肩上。

“等等，等等！你大概不是想要下樓吧，你起來才幾天呢？你得當心自己呢，你要曉得，”她責怪地說。

她扶着桑德爾大媽，后者好象自從生病後萎縮了。在床上的日月在她身上留下烙印。她的臉窩陷下去。

“你對我實在太好了——我只是想出去買點東西，”她回答說。

“但是等凱蒂回來時，她可以去買呀。再說要是你等着要，我可以去買，”好心的鄰居抗議說。

桑德爾大媽搖搖頭。

“該是我重新開始的時候了；必須再習慣起來。如果佛蘭茲

看見我這個樣子，他會怎麼說呢？

“佛蘭茲，老是佛蘭茲，”舒爾茲大嫂想道。“我們一直瞞着不告訴她佛蘭茲已經不在了。這棟房子里所有的住戶。但是當老婦人最後終於曉得這樁事時，會出什麼事呢？”

“你是最後一個見到他的。佛蘭茲說什麼來着？他什麼時候再來？”桑德爾大媽問。

“他說他很快就會回來，”她猶疑地回答。“是的，很快。”

“很快，很快，”桑德爾大媽重復着；“但這已是老早以前的事了。”

她走向迴欄樓梯，全身靠在扶手上。

“但是你不該出去的，你真是不該的！”鄰居又說。

“但是我要去——而且我必須去。”

鄰居目送着她，搖搖頭，表示不同意。老婦人每次只下一級，她的手從一個扶手滑向另一個扶手。

牛奶舖里只有另一個揹着手籃的婦女。她在跟女店員談話，後者在切薄片干奶酪。當門打開時，她趕忙放下刀，跑出櫃台來。

“桑德爾大媽，你來了！”她驚奇地說。“說真的，你起來得太早了！”

她扶着老太太，拉出把椅子來給她坐。

“現在坐下來，好好的歇一歇。”

桑德爾大媽坐下。

“我必須重新開始，你曉得。”她粗重地呼吸着。

女店員重新切她的奶酪；顧客走向老太太。

“這樣說來你是桑德爾太太了？”她若有所思地說。然後憐憫地說：“那末佛蘭茲是你的兒子？”

“是的。你認得他，我的佛兰茲嗎？”桑德尔大媽問道。

“我跟他很熟。我常見到他。我記得他很清楚，”那妇女回答。

“梅亚太太！梅亚太太！你还要别的嗎？”女店員隔着柜台插进來說。梅亚太太轉过身来。她奇怪为什么女店員这样大叫大喊。后者正站在陈列貨色的玻璃櫥柜后面，隔着柜台点头，搖頭，把手指警告地放在嘴巴上。但是梅亚太太不明白这些訊号。女店員繼續隔着柜台点头，手指叩着嘴唇。

“怎么一回事？”梅亚太太終於問道。“不錯，給我四两意大利香腸，还有四两舌腸子。”

她指着玻璃柜。

“你認得他？”桑德尔大媽溫柔地問她。

“是的，我認識他。他是个好人。真是很不幸，”梅亚太太說。这当儿，女店員又喊，“梅亚太太！梅亚太太！”

后者开始生气起来。

“是的，当然是那种——那边那种！”她說，很不高兴。女店員繼續打手勢，但是她的主顧再不勞神理会它們。

“他好長時間不在这儿了——可是他要很快回来的，”桑德尔大媽毫不怀疑地說。她暗暗对自己微笑起来。

“誰呀？”那个妇人狐疑地問。

“哦，佛兰茲，我的孩子，”老太太細声細气地回答，象是在跟她自己說話似的。

梅亚太太于是一直走到老太太面前，直望着她的眼睛。她毫不在乎女店員在远处用刀把子敲柜台。

“你的佛兰茲？”她疾忙說。“他再也不能来了。唉，六個星期前我們把他埋下土的！”

鋪子里一片死寂。女店員站在那里，張着嘴巴，兩肩下垂；刀從她手里滑下去。桑德爾大媽心里一陣顫動；她的手指抓住罩衫。她就那樣坐在那里很久很久。一动不动地，瞪着兩眼。（在這幾秒鐘內，她必定明白了幾個星期來所發生的許多事情；鄰居們時刻都在準備幫忙，其他住戶的同情的臉孔，凱蒂的神經質，她這樣蒼白和憂愁的原因。）

突然間，老太太從椅子上跳起來。她的臉開始扭曲；她全力地尖聲叫喊。那個主顧跑出去找人幫助。但是當他們把桑德爾大媽扶出鋪子的时候，她還在呼喊。在院子里，在樓梯上。之後整棟房子又靜下來。陰沉的面孔，緊閉的雙唇，人們站在門口上和窗戶前。

* * *

我站在廣告牌前。那是一個和其它一樣的廣告牌。牌的上半部貼着一幅大招貼。上面畫着一個女人；身子是一根香煙。下面寫着“柏林納林”，“大園朱諾”等大字。近旁是鮮艷的照相機廣告，“愛與吻”，“惠羅尼加”，“安尼瑪利”，“公司的新娘”。

我看了又看。我禁不住要看正當中的黃色招貼。我禁不住要看。

“告示！”

“法院新聞處宣布，理查·許提希，柏林人，一九〇八年三月十八日生于波敦杜夫，經由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六日柏林法院特別法庭依法判處死刑。死刑于今晨在柏洛漢湖刑事監獄庭院內執行。

“柏林，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四日。”

我不知道我在這個告示前面站了多久，但是我不能再站下去。

左,右,左,右,动作是机械的,不听从我的意志。人們匆匆忙忙地走过;車輛的嘈杂声好象来自远处。

我慢慢地轉回我們的街。

生于一九〇八年三月——今晨在柏洛淇湖处死——年方二十六岁。太阳明亮地照着。它的光綫从一排排发亮的窗戶中反射出来。一长串的車輛开过去;街角上的巡警揮动着手臂;行人匆忙地走着。一切如常!

* * *

我来到市中心。这儿到处都沒有貼出那份公告。单貼在夏洛登堡,在我們的地区当中。打算恫吓我們。下午我又走到我們的街上。在这儿他們曾跟我一道行走;我們常常站在这边。我在柏林大街的拐角地方停下来,朝上看那藍白色的路牌:

迈科斯基大街

这条街有一天会被叫做:

理查·許提希大街

虽然他并不是住在我們这条街上,但是他曾在这儿跟我們一起斗争过。

我慢慢地朝前走。

他那粗大的声音,秀丽而凌乱的头发,濃黑的眉毛。昨天晚上他們派了一个牧师到許提希的牢房里。他拒絕了他。还拒絕了向戈林呈递要求寬赦的申請书。我走向广告牌跟前。从口袋里掏出一張小紙片,赶快把它潤湿,斜貼在“告示”二字上。紙片上印着用小孩玩的印刷机印的字:

死人也能跟我們談話！
我們的戰鬥繼續不斷！
我們會報復的！

* * *

翌日。艾迪給我帶來新聞。理查·許提希臨終願望是，他的棺材應該運過他的街道。

褐衫黨人要履行。為什麼不呢？每天都有不少的殯車駛過柏林的熱鬧大街。

但是我們聽到了這個消息！

我們的號召從一個口傳到另一個口，傳遍我們街上的同志。要在那里！

指定的時辰快到了。三三兩兩，我們走向那狹窄的工人階級街道，在這兒居住過理查·許提希。那是一刻鐘的路程。

艾迪和艾米耳·施密特走在我的前頭。我們小組的其他同志都在上工。他們絲毫不曉得這回事。我跟漢茲·普勒斯爭論了好久，直到他同意，他剛從集中營放出來，不該露面。我們默默地走着。所有人的臉孔上都顯出仇恨和悲愴。我們都感覺到，今天理查·許提希在跟我們告別。幾乎覺得似乎他在向他的護房隊和我們發出他的最後命令：“最後一次站好隊。”

我們全都知道，每一步都可能使我們更接近那躲在一旁的褐衫警察。但我們都準備學他畢生那樣面對這種情況。

一隊隊警察在那條狹窄的街道上走來走去。一小隊一小隊的衝鋒隊站在街角上。但是他們未估計到我們曉得這次殯葬的消息。穿制服的人帶着緊張的表情望着房子的窗戶。它們都關上了。但是人們站在房子外面。婦女們拿着菜籃，不少人拍響她

們小孩的手掌。男人們一动不动地站在她們旁邊。他們的手插在褲袋里。街道又短又窄。我們不是第一批來的。“行人”們分成小堆地走來走去。更多的人繼續從小胡同里走過來。艾迪和施密特現在穿過街的對面去。我已經告訴他們，萬一我們當中有一個人被捕時該怎麼辦。人們一堆堆地在人行道走着，彼此隔開。他們的鴨舌帽拉低到遮住臉，他們的手插在粗衣服里。“行人”。好幾百這樣的人。我們彼此微微點頭，交換沉默的目光。有許多我失去了聯系的同志都來了。從“合法”的時日我就認識他們。奧托，阿伯特，威利他們全都還在這兒，都還活着呢！

千百人在走來走去——可是街上一片死寂。可怕的靜默。兩個小孩沿着柏油路滾鐵環。他們用尖尖的童音互相叫喊。一個啤酒店的小伙計把一桶桶啤酒扔到人行道的草袋上。沖撞聲每次都迴響着。

那兩個寬肩膀的人呢？秘密警察的暗探。淺色呢帽，標準的夏裝；這兒每個人一眼就認出他們來！年輕點的一個有一撇小胡子。另一個剃得光溜溜的。肥胖的臉龐，粗短的脖子——一付標準的強盜面孔。他們也在走來走去。犀利地瞪望着碰到的面孔。在右面，那個補鞋匠！他的鋪門敞開。他把“他的活計挪近亮光”。勤快地擦着一只急需修補的靴子。那個水果商！他突然發現他的果籃，他的櫥窗需要“收拾”。街上有不停的活动。由於這一切，使我看來時間好象是站着不走了。好象我們全都停止呼吸。我的神經緊張到了極點。分鐘過得象點鐘。現在！在左面，在街道的盡頭，制服出現了！藍色警察服，其中雜有幾件褐衫。棺材車。兩名沖鋒隊員挽着繩。人行道上的人群象是變成石頭了。所有的頭都轉向街道上。人們緊緊擠在一起站

在阳沟上。他們走到門外来，和其他人联合起来。一下子临街的窗戶全部打开，活象是有一个警鈴警告住戶們似的。

在前面，左边，他們正举起他們的帽子。这个行动波浪似地順着人群展开。靜默。沒有生命的靜默。馬蹄得得响。棺材車——制服——緩慢地走近来。我后面的一个女人大声地哭泣。現在灵車来到我們面前。我的眼睜得大大的。我艰难地吞咽着。于是一束紅花从天而降，在灵車上蹦起来，落在柏油路上。我抬头四望。从我們头上的窗戶——这边，又一束！

“你为我們而死，許提希同志！我們將給你报仇！”一个妇女从另一个窗戶高声喊道。突然間，我們都不再是这里的許多单个人。我們一下子变成为一个人，一張嘴。千百个声音合成一个声音叫道：

“复仇！复仇！紅色战綫！”

冲鋒隊員勒紧繩。灵車猛地停住，孤零零地站在街中心。穿制服的奔向人行道。他們向人群鞭打，把人打倒地上。